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6.8.22
2016年第34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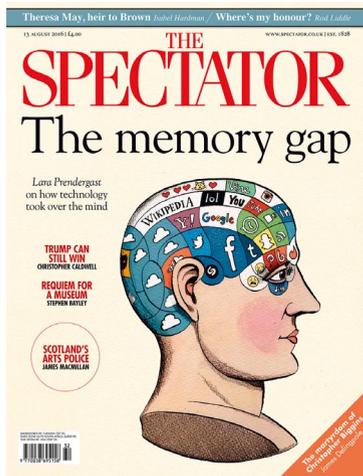
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样本
傅雷的傲与烈

900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生活周刊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旁观者》2016.8.13

数字失忆症

在如今繁密的信息网中，比起记住信息内容本身，人们更倾向于记住信息在哪里能被找到。如今，人们想获取的信息几乎都可在网上查到，还需费心记忆吗？人们仰赖智能手机的便捷，就像把大脑的部分功能外包给了数字化网络。只是大脑的可塑性会让它逐渐适应我们的选择，习惯了互联网储存信息的方式，“数字失忆症”患者也会越来越多。



1 / 《新闻周刊》2016.8.19

警务改革

美国警务改革的倡导者认为，频发的警方暴力执法与袭警事件折射出警察部门出现了系统性问题，种族歧视并非其主因，改革急需进行。美国警方希望通过培训、改良装备、丰富警员构成、改善以“破窗效应”做参考的打击犯罪政策等系列措施以提高执法公信力，保证执法效率与公正间的平衡，修补警方与少数族裔之间的裂痕。

3 / 《新科学家》2016.8.13

寻找另一片海

目前的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将找到外星生命的目标锁定在土星的行星环和木星上，其表面巨大的海洋领域都拥有丰富的海底冰冻外壳分泌物，很有可能蕴藏着未知的生命。美国航空航天局正在积极展开这项探索生命的任务，科学家表示，甚至不需要离开地球，就可以对外太空极端的海洋生态系统探测出一二。

2 / 《经济学人》2016.8.13

不死之药

人类的平均寿命在过去 100 年已经大幅延长，这得益于饮食、住房、公共医疗的改善以及一些药物的作用。若要进一步延长寿命也许就要靠专门的抗衰老药物。乐观的人说，这会使很多人的寿命延长到如今的寿命上限，即 120 岁左右。与此同时，最长寿命也可能延长。如果身体的某一部分耗损了，可以将其修复或整个置换。未来，百岁老人将会越来越多。

4 / 《大西洋月刊》2016.8

美国人现在安全吗？

“9·11”之后，美国政府在对抗“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及各种生物、网络恐怖袭击上已投入 1 万亿美元之多，这些投入都一一奏效了吗？奥巴马政府通过向国际舞台上的扩散去追捕外部恐怖组织领导人，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土安全管理。但对于现在的美国和世界，恐怖主义“不再出现”是天方夜谭，接受现实、加以预防并缓解已经造成的精神伤害才是当务之急。



P30

封面故事

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样本

傅雷的傲与烈

- 40 傅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孤独灵魂
- 58 作为父亲的傅雷：家与国之爱
- 66 翻译家傅雷：从罗曼·罗兰到巴尔扎克
- 72 《艺术哲学》：神韵气味之由来



P116 专题报道：权力衣着，那些女政治家们……

社会

- 时事：“中等强国焦虑”：日本的政治变数 78
 时事：土耳其：“伊斯兰化”恐慌背后 84
 手艺：刘伟学：寻路余杭油纸伞 96
 专访：土地利用规划纲要，结构与布局的优化 101
 往事：国际饭店，观察中国开放史的另一种通道 104

经济

- 市场分析：国债热只是开始 76
 收藏：派普夫妇的中国书画 108
 商业：北汽新能源，“从里面打破的鸡蛋”？ 112

专题报道

- 权力衣着，那些女政治家们…… 116
 希拉里，从时尚终结者到老江湖 122

文化

- 专访：大学博物馆，收藏标准与学术伦理 128
 专访：秦立巍：大提琴人生 132
 话题：充满鱼子酱味的俄剧 136
 旅游与地理：走进巴利阿里群岛，地中海最后的伊甸园 140

- 科技：最伟大的旅程 150
 科技：硅谷，流行吃饲料？ 154
 书评：桃子的滋味 162

专栏

- 邢海洋：“互联网+”还在风口上 16
 袁越：精子危机 159
 张斌：你的肤色，人心激励 160
 宋晓军：美国轰炸机齐聚关岛要干啥？ 161
 朱伟：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3） 164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66

封面图片出自《傅雷书信选（增订本）》《傅雷谈艺录（增订本）》，三联书店 2016 年 9 月刊行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6年第34期，总第900期，2016年8月22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海鲜诱惑

作为吃货，食材美食永远令我兴致盎然，也深知不该只满足口腹之欲，要提升品位和兼顾大义。但说实话，比起美食，海洋污染和渔业困境的报道，从没让我认真看上三分钟，也许是乏味的报道抵不过美食的诱惑。初以为这期内容是说美食，便来围观海鲜的奢侈消费，不料却被记者一路牵着步入另一个空间，遨游一番才发现其博大，不知不觉间竟涉猎了海洋渔业、环境科学、水生物学，甚至社会学等领域。没注意到科学含量极高，竟读得有滋有味、异常顺畅。佩服记者，任何一个面临的难题，都能提供我国政府的努力和他国的应对经验，从律法到实践都有涉及，这样的全球视野让读者非常受益——不是被诸多问题堵得脑梗心塞，而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中，合理导出让未来变得美好的方向。

上海 君子兰

重温办证难

看到《公安部：公安派出所下月起不再出具14个事项证明》的新闻，再联系日前自己恰又重温了一遍“办证难”全系套餐，对照官方“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的主旨，往日种种加上近日辛酸，个中滋味，对比冲突，真是“太刺激”了。

去年“两会”，总理呼吁集中力量解决“疑难杂证”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多部委联合到单机构作战，一遍遍一轮轮，不知整治多少回了。这次提到的“不再出具”的14个证明，也基本和一个多月前《12部门征求意见：公安派出所拟不再开具20类证明》新闻所提的重叠吻合。我倒觉得，只有当“不用”出具那些奇葩证明，民众日常生活也不受影响，甚至因此体会到减负后的轻松惬意，这才是政策预期效果。

如果这边仍是九龙治水，各自为政，A部门已决定不再出具，B部门却死抓着不放，最终被两边踢来踢去、更加生不如死的还是磨破嘴跑断腿却仍办不成事儿的民众。这就是从行政和社会运行的整体机能上没有解决此前的机械僵化官僚无比的“证明依赖症”，只是在某一项文件执法中，硬性接入导致的运行不畅和互不兼容问题。说来说去，还是站在各自部门角度，都是从文件到文件，并未以人为本，人性化地正视民众切实需求和不堪负重。

这真不是瞎说，咱现身说法，贡献最新一例：因住址变动，近期去迁移户口。本是同城调移，按说一两个工作日就该搞定。参照新闻说涉及户口的“凡户口簿能够证明的，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如户口迁移情况、住址变动情况”。现至少还是新规之前，且因是新盘地址登记，需要派出所介入。在跑人才中心、跑物业后，得知派出所尚未更新小区地址，又恰逢国际盛会，户籍系统升级维护。耐心等到会后，系统开放，跑去派出所。片警这次笑咪咪解释，登

记地址的工作人员外出，数千户纸质资料无人录入，于是被温柔“送”出。几天后小区有人爆料，说可办户口了。发信咨询，无回音。再去，那片警可能慌着下班，边往外走边装作“不是本尊”，让打电话。三次电话后接通，对方劈头盖脸一顿怒不可遏“咆哮式吼斥”，大意就是假消息，别问了，反正不能办。后看邻居群里吐槽，原来被这位暴脾气警官辱骂的不止我一人。

灰头土脸滚回来，还得忍气吞声，觑着脸再去，想想真荒诞得可笑。不说效率问题，也暂不提时隔几天却翻脸如翻书的片警态度问题，这都什么年月，按一般民众朴素想象，就算录入新盘资料，有纸质需存档，那也可拷贝电子信息，一键复制，岂不事半功倍？怎会因无人打字，而延宕月余？这不比此前工商总局“缺纸”半年办不了证更夸张么？

我们以为的“魔幻”，其实就在身边。这还是“新规”前，这边还给出证明，都能有如此奇葩事儿。如果“新规”后，只一句“不出”“不管”，岂不更是有各部门单位要求不一、衔接不畅的大麻烦在后头等着？

读者 李晓亮

防患未然

前天，老家的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老家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最严重的是离我们村子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那个村子几乎被洪水淹没了，要不是村民们及时逃到两边的山坡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葬身在洪水中。那几日，村民们在山坡上哭爹喊娘，直到被救援的部队用大铲车救护，然后被安置在镇里的中心小学。

我的心里非常焦急，那个村里住着我的两个表哥和表妹，特别是大表哥，前几年将新房居然盖在极易犯水的沟门口。不等我问，哥哥就向我描述大表哥家的惨状，所幸的是人逃了出来，可好

端端的一个家被水冲得连一根针也没有留下。我的心很痛，表哥的家没有了，我知道，这几间房花光了表哥大半生的积蓄。

去年，我和哥哥给故去的舅妈送葬，大表嫂很是自豪地带我们参观她家的新房，还说盖这几间房花了30多万元。我们在屋里说话，大表嫂带着几分玩笑的口吻说，我姥爷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告诫他们，千万不要搬到下面的平地上去住。而他们眼看着一个村的人都搬到下面去了，一年一年相安无事，最后他们就将姥爷的话当成了笑话和耳旁风，还说过去的人愚昧、胆小怕事。

水火无情，应该说，故乡的这次洪灾，一部分是人自己造成的。表哥他们的村子，过去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居住在高处，虽然出行不便，但可以防水。过去的人并不傻，什么地方宜居，那都是经过一番考察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防水。因为，没有相对的防范措施，只能别无选择地居住高处。表哥他们的村子，村里边的深山里群山环抱，深沟无数。有时候，他们居住的地方雨点不落，深山里下了山雨，也会出现山洪暴发和泥石流滑坡。更何况，周围的地方全遭暴雨袭击，上百条深沟里的洪水汇集到一起，滚滚的山洪都向他们村里袭来，村民们又将新房盖在洪水必经的低处，不被水淹这才怪呢。

这一次，遭洪涝灾害的村子还有很多，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村庄里的人们，全都

是将房屋建在随时都极易被洪水侵袭的洼地里，有的干脆将房子建在村边的河道里。近几年，由于生态环境的不良，有些地方数年的干旱，别说是洪水，许多的河流都干枯了。于是，人们就开始无所顾忌，为了出行便捷，为了做生意招人，加上多数人的家里都有车，没有人还想住在高处。随意搬迁愈演愈烈，有许多地方政府，不经过地质专家的考察，为了业绩进度，盲目地随意安置。我早就得知，我们周边的几个自然村，要被征迁到一个大村的村边上，这个村的村边上是一条干枯了的河，每到雨季，好几个县的洪水都汇集到这条河里，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次洪灾的教训就是，不要取巧侥幸，永远铭记防患于未然。

河北沧州 季文亮

家乡的大渠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但上次回老家看到的那一幕，至今仍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今年清明节放假，孩子想跟小伙伴一起去参加小记者的一个活动，到山里去看桃花、摸螃蟹，父亲则想趁着还能走动，再回老家看一眼。我就劝小孩和我一道儿回老家，小孩有点不乐意，问：“老家有啥好玩的？”这一问，我还真想起来一个地方——村外的那条大渠，此时应是清流潺缓，鱼翔浅底，岸边竹林外桃花数枝，近地儿油菜花金黄一片。小时候大渠那边儿就是这样的美啊！于

是我信誓旦旦地告诉孩子：“有啊！要花有花，要虾有虾，肯定比他们去的地方好玩！”

“你说说大渠那儿到底有啥？”回家前一天的晚上，孩子就迫不及待地要听我讲有关大渠的故事了。于是，我记忆的闸门就一下子打开了：这条大渠是早先兴修水利的成果，主要为沿途村庄灌溉农田之用。大渠经过我们村，上下各有一个涵洞相连。上面的涵洞有一里多长，常年有泉水涌出，使洞内水位保持在半米左右，即使是大旱之年，上游水库不放水，把这点水聚起来，我们村也能抽水浇不少的地。幽深的涵洞，对小孩们来说，既显得恐怖，又有些神秘。时常有外村人拿个瞄子（红缨枪），到涵洞里扎老鳖，一捉就是一大桶。下面的涵洞就短多了。夏天，洞里的水不深不浅不热不凉，是孩子们最喜欢洗澡、游泳的地方，渠水大些的时候，胆大的孩子就会从洞口上的路边向水里扑跳，或扎个木排玩漂流。渠岸靠河滩的一边较低，中途有几个小渠口子，边上总会堆些上面平坦的青石，供人在其上槌皂角、洗衣服。老师也曾带我们到这里，坐在梧桐树下，把脚泡在水里避暑、读书。渠岸靠村一边是10米高左右、斜坡上辟有行人小道的土地堰，高处不仅长着很多兔子和牛爱吃的草，还有远志、大蓝等可以挖来卖钱的草药。近水的地方夏天有连片的薄荷，

既可采来做成就饭的小菜，也可当药材卖；秋天则是一路菊花盛开，捋来可泡水喝可装药枕。尤其是沿途有三五眼水泉，泉水清澈甘甜，是野外劳作的人们方便的饮水处。泉水流过的沙石下，躲着数不清的小青虾，泉流环绕的泥土上，会有苜蓿长得翠绿欲滴。而渠中水草下的鱼虾，用竹篓随便逆流拉着一跑，就能捞到不少。在这里常能看到爬到石头上晒盖的老鳖，做窝石缝的火燕儿鸟，藏在蓬草中的兔子、野鸡和见人不惊的花鼠。

万万想不到，回到老家第二天，当我带着孩子兴冲冲地来到大渠边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条令人欲呕的垃圾沟了。往昔过水的大渠已快淤平断流，散发着恶臭的污泥浊水上长着些焦枯的野草，渠边上到处都是乱倒的垃圾。那条曾给童年的我带来无限快乐的大渠，再也没有了往昔的美好。后来了解到，以前大渠年年冬天有下游要浇地的村子组织人来清淤，现在靠地度日的农民少了，没人组织维护水利工程了，上游水库也不往下放水了，大渠也就慢慢报废了。老家严重的旱象一直没变，时有年份旱得颗粒无收，兴修水利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现在外出务工的是多了，但机械也多了，修些水利工程不是更难而是更易了，只可惜上边老是重视在嘴上啊！

河南洛阳 张晓阳

俄罗斯 | 哈雷摩托节

8月13日，数千名哈雷爱好者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办的哈雷摩托车大游行。







俄罗斯 | 高空摄影

(右图) 俄罗斯摄影师乔治·朗切夫斯基 (George Lanchevsky) 为了克服恐高症, 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登上世界各地最高的建筑拍摄照片。他攀登过基辅的独立广场、吉隆坡的双子塔、莫斯科的七姐妹大楼等摩天大楼, 并站在楼顶上拍摄下一张张令人眩晕的俯拍美景。图为朗切夫斯基在俄罗斯某栋楼的楼顶给朋友拍的照片。



英国 | 胡里节

(左页上图) 8月13日, 伦敦民众在温布利公园 (Wembley Park) 庆祝胡里节。胡里节起源于印度, 举办于初春以庆祝寒冷冬天的远去, 有着将亲人染色以庆祝万物复苏的习俗。

孟加拉 | 洪水

(左页下图) 8月12日, 在孟加拉首都达卡郊区, 一名妇女站在涨水的博多河边看着被洪水淹没的村庄。今年夏天, 孟加拉遇上10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马来西亚 | 火山喷发

(左图) 马来西亚吉隆坡 45 岁男子 Ts Kok 近距离拍摄的婆罗摩火山喷发的场景。滚滚火山灰喷涌而出遮天蔽日，周围的风景区在火山灰的遮盖下宛如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若影若幻犹如仙境。十分有趣的是，他拍摄当时是和同伴骑在马背上的，他们热衷于探索一些大众旅游景点不为人知的一面。

英国 | 野味

(下图) 8 月 12 日，伦敦梅菲尔区的一家餐厅内，厨师马克用早上猎回的松鸡做成美食。每当狩猎季节来临（8 月中旬到次年 3 月），整个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英国这块地球上最好的狩猎沼泽地和山区。无论是 8 月中旬的松鸡和野兔，还是入冬后的野鸡和鹧鸪，你都能最早在英国享用到。8 月 13 日后在菜单上看到松鸡是非常正常的（本季以 8 月 12 日的“The Glorious Twelfth”为开端）。



“互联网+”还在风口上

文 / 邢海洋

美股上市公司第二季度财报于7月中旬拉开帷幕，标准普尔500强公司预计将连续第六季度销售额下降和连续第五季度盈利下降后，终于赢得了喘息的时间。相比上一季平均每股盈利（EPS）下降8%，很多企业虽盈利仍不理想，但有所改善，整体出现止跌好转迹象。银行股大多好于预期，整体表现平稳；科技股参差不齐，股价再现冰火两重天。但事关“互联网+”，尤其来自中概股的几份靓丽财报，提示给投资界的是：“互联网+”仍站在风口上。

第一个上场的重磅科技公司是苹果，利润同比下滑27%，英特尔是难兄难弟。紧接着，那些重磅互联网巨头给出来的都是令人惊叹的好消息。谷歌母公司Alphabet营收21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77亿美元增长21%，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25%。亚马逊第二季度净利润8.57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净利润9200万美元相比增长832%；净销售额为30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32亿美元增长31%。Facebook继续行驶在高速成长的轨道上，第二季度的每股收益为0.97美元，远高于预期的0.82美元；当季营业收入64.4亿美元，好于预期的60.2亿美元。

中国的互联网电商巨头和社交网络交出的成绩单则更为“爆款”。阿里巴巴收获上市两年来最快成长，本季度营业收入321.54亿元人民币，同比涨59%。与此同时，淘宝的最大竞争对手自营式电商代表京东营

收为98亿美元，同比增长42%。社交媒体方面，新浪微博给出的答案也不输于人，当季净营收1.469亿美元，同比增长36%；归属于微博的净利润达2590万美元，同比增长516%。

把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财报进行梳理，两类成长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一类是已经稳定给股东带来回报的行业巨无霸，他们赚钱的能力远超传统行业，却仍然显示出超速扩展的能力。如《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这个财季甚至亏损，谷歌母公司Alphabet，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下，第二季度的净利润竟能够增长24%。要知道，这是一家年营业额接近千亿美元、利润200亿美元的巨头，市值一度超过了苹果，全球第一。谷歌作为一家子公司的营业收入占到了Alphabet总营业收入的99%，所以基本上是谷歌一个子公司在养整个母公司。而谷歌的利润90%都来自于其搜索引擎里对商家收取的广告费。时至今日，当互联网广告被移动广告攻城略地之时，不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NON-GAAP），谷歌第二季度运营利润率达到了35%。

另一类则是走出盈亏平衡点的企业，如今大踏步地开始赚钱。4年前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才上市的时候净利润10亿美元，2015财年净利润升至37亿美元，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则达到20.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19亿美元增幅高达186%。电商巨头亚马逊的利润逆转则显得更引人注目，成立了21年，亏损了20年，现在则是连续第三个季度利润暴涨。当利润同比暴增9倍的财报发布后，8月1日亚马逊股票市值涨至3660亿美元，首次超越埃克森美孚公司，成为全球市值第四大公司，前三名分别为苹果、Alphabet和微软。而Facebook的市值也逼近了埃克森美孚，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或很快为科技公司占领。

既然科技巨头已经站上市值顶峰，未来上升空间是否早有“天花板”等在前面？要知道苹果就是在冲击万亿美元的挑战中铩羽而归。一个亮点是，巨头们似乎又搭建起了新引擎。去年，亚马逊的销售额达到了实体巨头沃尔玛的四分之一，市值却超过了这家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可即使这个关键的时

阿里巴巴上市以来的股价走势（单位：美元）



点亚马逊也是不盈利的，或者说刚刚做到盈亏平衡。多年前贝索斯开辟了多种全新的业务，除了送游客上太空的火箭，还有云计算和智能硬件。亚马逊开始选择的是IBM的软件，但它开发了云计算AWS业务，提供计算、数据库存储、内容交付等功能。亚马逊的云服务客户超百万，全球云服务市场份额超半。当你上网聊天、更新软件时，背后多是亚马逊在提供支持。智能硬件方面，亚马逊开发的阅读器Kindle和智能语音家庭助手Echo以极低的利润甚至赔本销售，靠出售内容获得利润。回到老本行电商，亚马逊大力推广会员服务，2016年第二季度，美国的Prime会员增长至6300万，与去年同期的4400万比，增长了近一半。

回到国内，中国的电商巨头们也在时时挑战着投资者潜意识内的“天花板”。根据阿里巴巴的最新财报显示，目前其多个零售平台的年活跃买家达到4.34亿人，较前一季度的年活跃买家数量净增仅有1100万人。而在去年，阿里巴巴几大零售平台全年净增加了7300万活跃用户，每个季度都能获得超过1500万左右用户的用户增长。可阿里巴巴季度营收增长了59%，之所以如此，得益于其在市场份额上的扩展，阿里并购了苏宁，还在移动市场上攻城略地。阿里在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移动端季度收入达175.14亿元，年增幅高达119%，占中国零售平台总收入的比例增至75%，去年同期比例为51%。消费者在网购上的花费也更多了，截至2016年6月30日，移动用户的每用户平均年花费为人民币140元，而一年前是76元。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使投资者看到了新希望，它在大数据上的投资有了回报，云计算业务继续保持三位数增长，第二季度的营收达到人民币12.43亿元，同比增长了156%。

阿里这架超级“印钞机”难道就没有物理意义上的极限？截至3月底，阿里巴巴集团的年交易总额已经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758.9亿美元），今年笃定成为全球最大零售体。此前全球第一的是沃尔玛，2015财年的总营收为4821亿美元。如果说美国人口基数只是中国的四分之一，阿里巴巴完全可以因为市场规模成就全球第一大电商奇迹，可中国人的收入远逊于美国。而在海外，电商平台无论如何做，销售额与实体店还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的消费观念在升级，消费能力也在提升，可这一切似乎都不能阻止阿里扩张的脚步，如今，阿里平台的交易量已经能够占到全国社会零售总量的十分之一，活跃买家近中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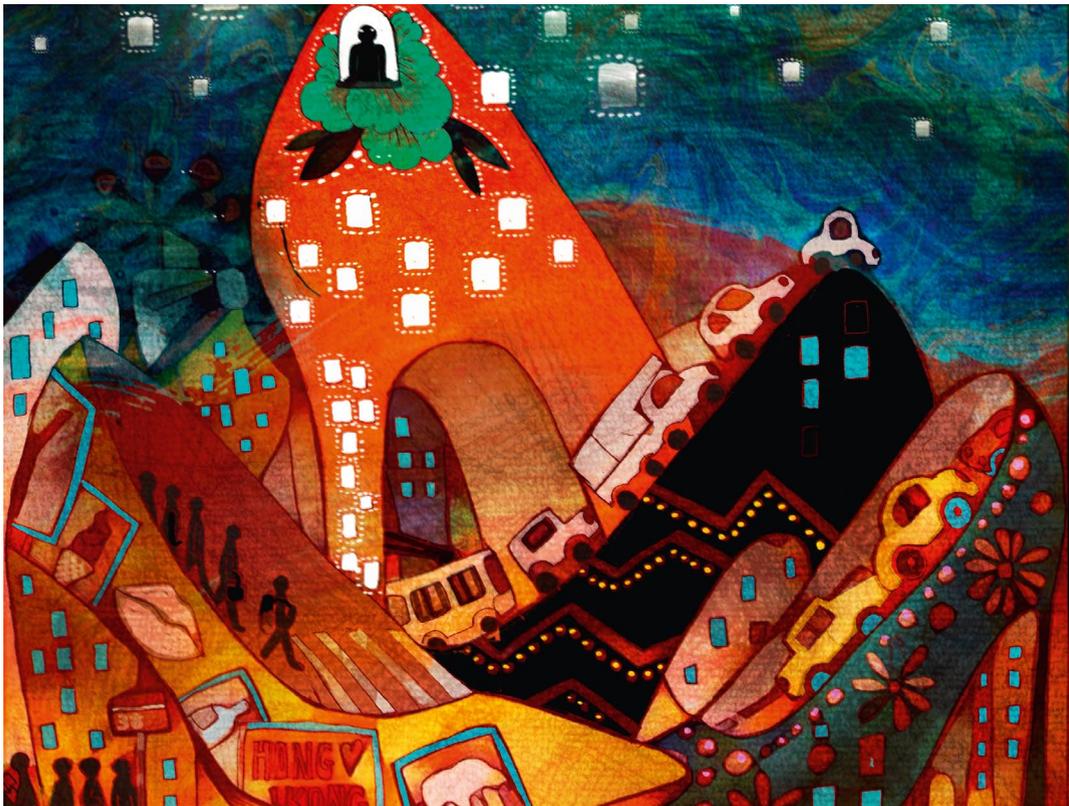
年人的一半，阿里每向前走一步，都将是奇迹。未来难道中国的消费者都不逛商店了？其实负面的迹象已经出现，在手机销售中，步步高旗下两个品牌Oppo和Vivo仅凭借着店面销售就挤占了小米的互联网营销。

无论是互联网电商平台还是社交媒体都是赢家通吃，判断这些站稳了脚跟，开始“躺着赚钱”的企业“钱景”，也只需研究它们所处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互联网扁平化的特征，使得市场竞争中的企业不在正循环中就在负循环中。所谓的正循环是指登录Facebook的人越多，你能联系的人就越多，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要加入进来。淘宝也一样，买家和卖家越向这个集市聚拢，市场就越有人气，越能提供琳琅满目的商品，反之，竞争对手就越来越没了人气。

当淘宝模式把交易平台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时候，京东这个一直在“砸钱”的互联网零售商已经跻身《财富》全球500强，是国内唯一的互联网企业。对手发大财，京东却一直在战略性亏损，买地、建仓库、做物流。二季度，若按照NON-GAAP计算，本季度已实现扭亏为盈，经营利润3.6亿元人民币，正式进入盈利期。而实现净利润超预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季度内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京东毛利额达到98亿元人民币，毛利率连续6个季度实现增长，这一财季更达到约15%，创了新高。引人注目的是，电商间竞争越来越残酷，京东却实现了健康的现金流，储备了充沛的现金，为今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这些经历了互联网兴衰大浪淘沙剩下的佼佼者，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它们都深谙取悦消费者之道。苹果CEO库克曾经请教过巴菲特如何管理好一个企业，巴菲特回答说：“关键是让你的顾客开心。”在Facebook，用户体验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它的竞争对手MySpace被默多克收购后，广告压力毁掉了用户体验，从此销声匿迹。谷歌在每开发一个产品时都会问一句“What if”，假设开发出来一个安全、便捷、快速的浏览器会怎么样？答案是：用户会开心，他们会喜欢这个产品。在亚马逊，一套自动化系统会观察，如果提供的客户体验没有达到标准，系统就会主动向客户进行补偿。对贝索斯，顾客让人害怕，合作伙伴和员工就没那么让人敬畏了。

那么，谁还能够阻止互联网巨无霸继续它们的成长轨迹呢？答案是人口、收入和市场份额，这些人类不可能逾越的“天花板”。



栏目插图 | 范薇

楼面价超香港

8月8日，香港公布新界屯门地块成交楼面价约3万元（按内地口径调整）、新界沙田楼面价约4万，而北京6月2日成交的延庆区地块实际楼面价已达3.01万、上海7月14日成交的虹口区地块楼面价7.6万、深圳6月2日成交的龙华民治地块楼面价5.6万，“北、上、深”三地的楼面价已超香港。内地一线城市之所以房价还没有全面超过香港，是因为内地多地点楼面价早高过了周边商品房价，香港未出现“面粉贵过面包”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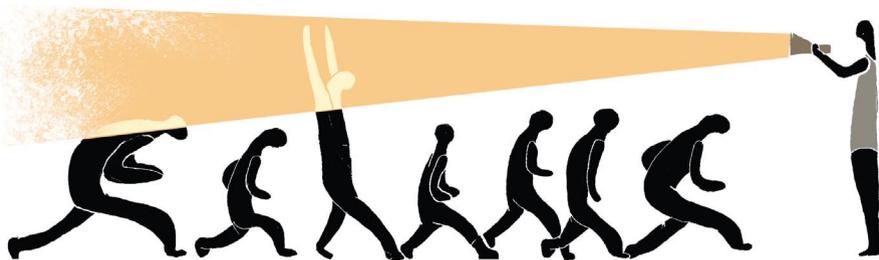
深港通

8月11日，证监会宣布成立深港通专项组，除券商股外，A股深港通概念股便集体走强，浙江世宝、新华制药、山东墨龙等盘中均“雀跃”。参照沪股通的568只股票，深港通标的选择应是深市代表性股票，若深港通由深成指数和AH两地上市股票作为首选股票池，市值覆盖比将达到61%。深市高股息率、大市值和较低市盈率股票，如美的集团、洋河股份、平安银行、国信证券、宋城演艺、云南白药和乐视网等或受益。

汇改一周年

8月11日“8·11”汇改一周年，在岸离岸人民币劲涨，人民币中间价上涨275点。一年前，中间价贬值1136基点，开启了人民币的贬值闸门。此前的8月5日，IMF公布了一份关于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评估报告，指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根本缺陷是中间价机制不够市场化。一年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初步形成，可其间习惯于汇率稳定的中国人也经受了数次货币崩盘预期的洗礼。





不降利率是“叛国”

经历政变未遂、埃尔多安清洗和标准普尔降级后，土耳其里拉兑美元7月下旬一度跌破3.00。为吸引投资，挫败政变后，土央行今年第五次下调了利息。8月，总统埃尔多安向国内银行进一步施压，称他会将银行抵制下调房贷利率的行为视为叛国行径。埃尔多安此前要求银行将年度房贷利率降至9%左右，而目前市场平均水平约为13.7%。法国巴黎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等多家外资行下调了利率，接近埃尔多安要求的水平。



抢地不如抢股

闯入万科股权之争后，恒大在廊坊发展的股权争夺战也激烈上演，廊坊发展股价飙升，8月上旬涨幅高达66%。恒大明确增持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策契机，廊坊发展一直是廊坊市重大项目土地一级开发企业，在当地拥有大量土地资源。房企交叉持股愈演愈烈和一线城市土地拍卖减少有关，短期房企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资金流紧张而是无地可拿，收购兼并可快速补充土地储备。国内房企集中度不高，最大房企万科市占率不到3%，更提供了兼并的土壤。

低息之困

8月10日，新一期国债开始销售，今年虽未降息，5年期的国债利率又下降了，从4.22%降到了4.17%。7月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3.76%，预期收益率比6月下降0.02个百分点，再创新低。一系列违约事件提振了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需求，而高收益资产供给减少，信托、基金子公司等影子银行监管加强，非标扩张受限，均加剧了利率下滑：2013年社融的新增非标（委托+信托+票据）有5.2万亿，2014年降至2.9万亿，2015年仅有5776亿，而2016年前6月累计才488亿，剧烈收缩。

疯狂的债市

8月初，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跌至1%下方，爱尔兰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0.37%的历史最低，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1.11%，逼近2015年最低点。当英国央行推出新一轮QE，出高价买长期国债时，市场竟然不卖，3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降至1.258%，而去年底还在2.6%的水平，今年迄今25年期及以上的英国国债回报率达到34.8%。出于对各国央行长期宽松预期，债券已经不再是避险品种，而成为被疯抢的风险品种。



无心之累

上班加油干，回家葛优瘫——如果这是你的生活常态，那么要小心了。根据发表于《心理学前沿》上的最新研究结果，这可能意味着个人的潜意识需求与职位需要之间存在显著偏差。长此以往，不仅会导致工作缺乏动力、效率低下和孤立无助感等职场问题，还会增加患上焦虑、心血管疾病、免疫系统紊乱、失眠和抑郁等身心疾病的风险。瑞士苏黎世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研究者指出，不同个性的人在潜意识中对工作也有不同的期待，当一个外向的、渴求亲密关系的人不得不从事几乎不同他人打交道的专业工作，或一个低调内向的人不得不为整个大团队负责，即便有其他激励因素存在，潜意识的 mismatch 也会暗暗消耗工作者的能量。

好消息

助人益己

深陷中年危机？多花点时间去做志愿者吧。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小组对 5000 余个家庭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后发现，在不惑之年积极从事志愿工作的人精神健康状况要比不这样做的人好得多，而且随服务时间累积递增。有趣的是，这种益处只有在 40 岁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戒烟朋友多

许多烟民担心戒烟会令自己变得孤立，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烟草研究与干预中心用 3 年时间跟踪调查了 691 名烟民的社交生活后发现，戒烟者虽然会减少与其他烟民的接触，但却交到了更多的非烟民朋友。鉴于吸烟行为已经日益非主流，这事实上意味着社交圈得到了扩展。



坏消息

咸海滩效应

全球变暖不仅令海水酸化，还有可能催生越来越多的“咸”海滩。这是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自然资源发展中心的 研究小组日前在《科学报告》杂志上发出的警告。抽样调查显示，加速蒸发导致的近岸海水咸化一方面会影响内陆淡水资源的水质，另一方面也对沿海生物造成威胁。

有备大患

诸葛一生唯谨慎，或许正是其六出祁山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发表于《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上的最新研究显示，事先想好后备方案会显著削弱一个人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表现，从而降低成功率。研究者指出，深谋远虑有其时间和精力上的代价，过度追求万全反而会事倍功半。



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渴望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可是却老是认定这个世界残酷又丑陋。我不难想象，就算是最纯真无邪的一首歌，要是你心里有鬼，那不管怎么听，你都会听到歌里有魔鬼。

——罗伯特·麦卡蒙，《奇风岁月》

游泳作为运动的历史更短，在生物力学和技术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研究和改进之处。与游泳相比，跑、跳和投掷是人类遗传密码里带有的动作。这导致田径运动领先了游泳很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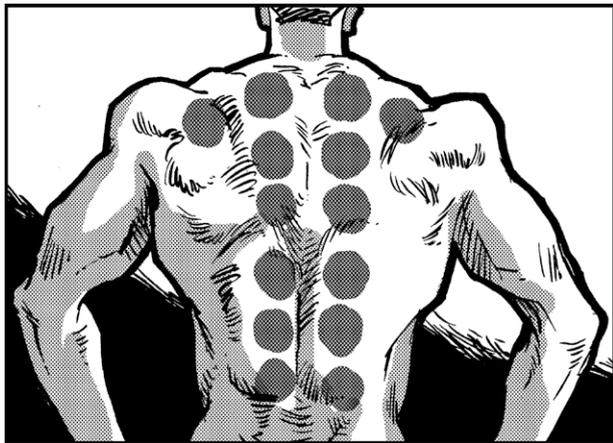
——西班牙《世界报》解释为何田径比游泳更难破纪录

我感觉自己是面对巨人歌利亚的大卫，但我口袋里一块石头也没有。

——美国选手米西·富兰克林在未能晋级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后说。《圣经》中记载，巨人歌利亚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

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可以各自在一个永久主办地举行。这就可以避免每次都要新建设施的情况，从而削减建设成本。奥运会永久主办地不是新想法。古希腊人就是这样举办奥运会的。在大约1000年的时间里，奥林匹亚是古代奥运会的永久主办地。

——《华盛顿邮报》刊载的伊莉娅·索明的文章说



（插图 山洋明）



我敢保证，人类始终是在神奇和离奇故事里打发时日，他们真切又热诚，总是会认可各种理由的仪式活动。唯有在仪式中，我们才能弃绝自身的怪异，变得真正地完整。

——奥登，《考古学》



数字

1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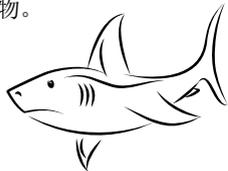
万美元

根据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公布的纳税申报单，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去年共收入1060万美元，其中超过600万美元来自演讲。两人的慈善捐款超过100万美元。

500

年

一个国际研究者团队发文称，他们运用特殊技术发现，格陵兰鲨鱼可以活长达500年，是已知的地球上寿命最长的脊椎动物。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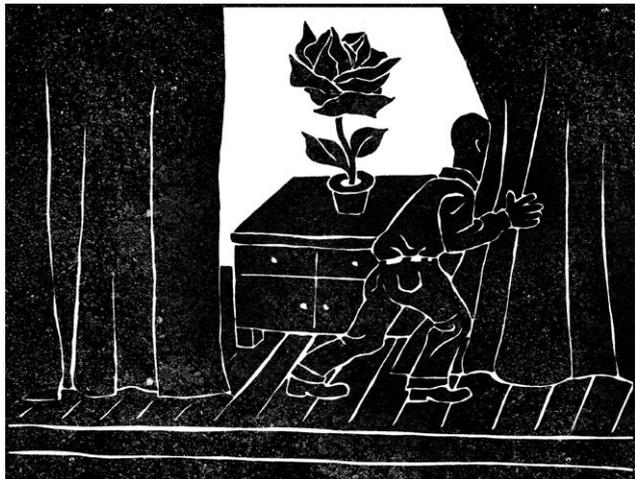
个

三星是里约奥运会的手机赞助商，可向数十万涌入奥运场馆的观众独家出售手机，苹果使用迂回策略，在一家距奥林匹克公园约10公里的苹果商店销售14个国家代表色的表带，包括顶尖运动员等买家在社交媒体上自豪地展示他们买到的新表带。

下半阙歌

文 / 普尔曼

图 / 谢驭飞



王家栋说他曾一度怀疑自己生病了的时候，那会儿的聊天背景是在蝴蝶路的一家小酒吧里。撇开王家栋的病变不说，我真的曾一度怀疑这间酒吧老板会不会撑下去。以我笨拙的商业眼光认为此处不是适宜地，前后是家庭旅馆，左边一条单行道，连个停车的地方也没有。该地唯一的好在于一到夏天，两边的香樟浓荫蔽日，问题是它又不是露天酒吧。酒吧很小没有舞池没有驻唱，有的是一套卡拉OK设备和一架钢琴，老板偶尔上去弹一曲《卡农》或别的。后来酒吧老板自己说该房屋是他父辈的私产不存在房租的压力，每年的营收比我们上班族多不了多少，我们自然深信不疑，私底下暗自叩问自己对于追求却不敢有这种维度和张力。

王家栋用行动对我的走神表示了愤慨，在清脆的玻璃杯的碰撞声中听他的讲述，我和另一朋友对视一下后齐声说他矫情，然后让其买单，仰脖子喝完杯中的酒水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各自回家各找各自孩子他妈。至于王家栋的“情绪有周期性起落”，这真的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情绪这东西，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互掐了上百年直至现在也不能确切定义。就连李银河这样的大师都曾自曝说“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生存意义’的危机”，情绪低落时就会有万念俱灰的感觉，况且半辈子走来绝非一帆风顺的我们呢。时间排着四季却非永远都芳草如碧。

那一句“矫情”估计能让王家栋睡得安心，

虽然简单粗暴，不过能拔脓就是好膏药。有时因为某人有时因为某事，那种忽生的孤独感让人对这个世界不想有只言片语。比如某人在一个他能够看得见的地方写上一句“南方四月芳菲尽，北国此刻春始来”，都足以让其独坐一天。其实，在我们看来都可以解释为是因闲极所以无聊。年轻时候寻找爱情，而人到中年，爱不爱是其次，相处不累才重要，凡事没有绝对只是取决于条件所需。估计王家栋他念念不忘的那个人，时至今日已经很明白自己一定是他心头无可替代的那个人，但是却永远成不了能够在阳光下与之并肩携手的另一半。

所有的爱情皆卑微。原本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总有一方宁愿低低“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生活不仅也不限于只有情爱。从距离的伤感中奔突出来，继续投身于安身立命的职场舞台中表演的王家栋，立即又被另一种无法宣之于口的无奈所侵袭。职场3.0时代的这茬人技术纯熟却为人嚣张，不懂谦逊也有不算恶意的不尊重。更有甚者的观点说女人就应该长得美貌如花，玩够了爱情就找个有钱男人嫁了……可怜老王坚守一辈子的传统爱情观被撞得粉碎。3.0们在内部群@他的时候连声“前辈”的称谓都欠奉，当他决意把群名片修改成“隔壁老王”时，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得到3.0们的热捧。有美妹一溜排的撒花表情，说叔终于接地气，教授他先学会不生气，然后再学会气死人。☑

心理学之恋

文 / 泊立
图 / 谢驭飞



深夜1点55分，李小姐还是在忙她的心理报告。数不清这已经是第多少天，李小姐还是没能在两点之前睡上觉，而后果就是，她现在脸上挂着的黑眼圈已经快掉进十八层地狱了。

当初选课时，一堆朋友叽叽喳喳围绕在她身边劝说她不要选心理学，毕竟商科的课程已经够多了，何况心理虽是独成一门学科，却又与生物化学物理息息相关。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就是铺天盖地的各种英文专业术语，还有写不完的报告以及赶上磁悬浮列车的上课速度，简直令人望而生畏。

网络上的鸡汤铺天盖地，如同救世主似的宣扬个性，提倡人们要“跟随本心”，那苍白无力的字里行间并未能抽出可以给予人重击使人清醒的棒槌。其他人看了连忙嗤之以鼻，划清与鸡汤的界限，生怕溅出来的汤汁弄脏了衣裳。但李小姐脑子里全是一腔热血，硬是固执得很，毅然决然地抛弃了那些选择容易拿分的课的朋友们，一脸凛然走进了心理学的课堂。

很快第一篇报告的题目就出来了，要求描写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及变化，不限体裁，甚至没有说诗歌除外，李小姐除了惊奇之外还有点喜，洋洋洒洒挥就了一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女孩重游故地时想起曾经相伴却遭遇车祸的男孩，因此感伤无比而最后自杀。李小姐十分深情，写到结尾时还动容地流了眼泪。

提交之后，又过了几天，李小姐收到了一

封来自粉色头发老师的邮件。他在信里询问李小姐是否还好，是否在感情上有过创伤，是否需要他们的帮助，关切之心透过电脑屏幕竟把李小姐刺得一愣。她又接着读了下去，在一长段关心的下面，那位老师又列出了一长串可以寻求帮助的清单，清楚地写下了地址电话以及工作人员信息等。最后还表示了歉意，说是相信李小姐活得非常好，但如果有不开心的事，随时欢迎找他聊天，最后还附上了一张微笑的自拍。

李小姐想起上课时这位一大把年纪还染了一头粉色头发的老师，热衷于探险，常常独自穿越无人区，断了胳膊也还是打了石膏就来上课。讲起课来也总是慷慨激昂，唾沫飞溅，他时常提起自己刚进入大学时的心理科成绩一塌糊涂，但后来仍然当上了他最爱的心理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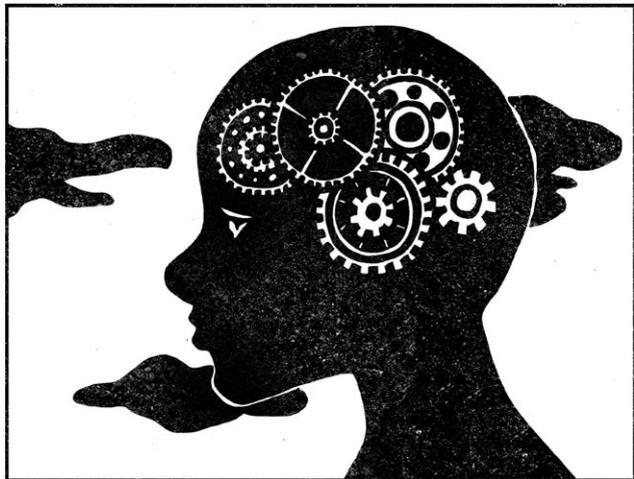
满屏幕密密麻麻的字符化成感动填满李小姐的心，她抬头看见那个夜晚的月亮好像格外亮，远远地照亮了她伏案在桌的小小身影。学习就像恋爱，第一眼总是要选最符合眼缘的那个，在相处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真相浮现，有好的也有坏的，可即便如此，爱仍然是一场美妙的梦啊，谁也没说过美梦一定会醒，说不定就修成了正果了呢。

想到这里，李小姐抬头看了看今晚的月亮，仍是一声不出陪伴着她。她扒了扒刘海，又继续埋头一字一字地敲下报告。☑

机构之死点跳脱

文 / 艾特子衿

图 / 谢驭飞



M小姐不算早慧,但足以担当得起“勤于思考”这四个字。所以,即使是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12字箴言里浸泡了许多年,她还是老神在在地在文理分科那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科。M小姐理科成绩很好,在如狼似虎的尖子班也从未掉出前五名,偶尔语文成绩出挑一点儿还能当个第一玩玩儿。大人对她这种弃理学文的“自我放弃”行为扼腕叹息,M小姐不以为然。理科生分析整理数据,文科生用整理分析出来的数据解剖事实的原样和真理,这么说来,理科生怎么看怎么像文科生的打工仔。M小姐顺势一跳,进入文科自立山头当霸王。

高中的东西实在算不上深刻,左右不过把一定容量的知识反复咀嚼,不求精益求精,但求稳中有进。M小姐大失所望,秦始皇统一六国已经是老生常谈,鲁迅讲的闰土刺猹也屡见不鲜,从这些东西里再解构不出什么新鲜血液来了。放假回来的表哥住在M小姐家,还带回了期末挂科的机械书。M小姐喜不自胜,像读小说一样熬夜爱不释手地读完了一本在外行看来跟洗衣机说明书一样枯燥无聊又生涩难懂的大学课本。其中最吸引她的就是机构的“死点跳脱”,跟她的生活态度不谋而合。机器都是由主动件运动带动从动件从动的。主动件的个数就称为“自由度”,一般简单的机构只有一个自由度。当我

们对这个简单机构的主动件施加一个力,整个机构就会规律周而复始地运行。如果施加两个力呢?这时候施加的力大于机构的自由度,机构不知道该跟随哪个指令运行,两个力相互拉扯,导致机构的薄弱环节崩溃——这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一旦生活中出现了多元化选择,就陷入死机状态。像M小姐这种复杂结构,属于第二种情况,她是那种自由度至少为二的机构,一旦生活只给她一个单方向的力,M小姐就无法在这种驱使下周而复始地运行,一个周期走完,她就会在原路再走一次和开辟一条新道路中抉择,陷入死机。在机械中,这种故障的处理方式是,给这个机构多加一种力,也就是让它受两个力的同时驱使,这样机构就会正常运行了。这种解决方案简直和M小姐处理生活困境的大部分方案如出一辙!

“高二”后半年,M小姐拎着书包拖着桌椅板凳一路杀回了理科教室。旧时的班主任目瞪口呆地找她谈话。M小姐说,她发现去年自己的见解太狭隘,文科理科各有千秋,分占半壁江山答尽世间百态。最近,她还是比较迷理科的思维方式。老师一推眼镜,不知所云,不过他早就习惯了M小姐奇奇怪怪的脑回路,也就由着她了。M小姐的第二种力终于上线了,她这个复杂机构终于又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啦! ▣

朋友圈

文 / 林安东

图 / 谢驭飞



每天醒来，总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

我为什么要在闹钟响起的时候睁开眼睛？为什么下意识地要拿手机？为什么要按开机键？为什么要滑动九宫格上的不带意义的原点来解锁手机？为什么要用大拇指来点击一块康宁黑猩猩玻璃？为什么是玻璃？为什么是大猩猩？为什么要点击微信 APP 图标？为什么要特别在意图标上猩红鲜艳的 12345 的数字角标？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给我的留言？为什么又那么好奇别人在朋友圈里给我留了什么言？

总之一句话，我为什么一醒过来就要关心别人做了什么、过得好不好？乃至我们错过了这个由若干个别人的世界组成的朋友圈什么，我们错过了么？朋友圈又是什么？等彻底惊醒过来（被时隔半个小时惊醒的闹钟所惊醒），我们好像又开始做一些看似无意义，实则蕴涵深厚的动作。

我们站在抽水马桶前，遵循学前教育和家庭管教下的潜意识准则，以奇怪的蹲坐姿势排泄体内的渣滓和毒素，这是伟大的人类社会统一为我们规划的卫生标准，这急不可耐的下意识动作，体现的是文明世界对于藏污纳垢这一亘古难题的巧妙安排；我们刷牙，拿起由石油工业衍生出的塑料长柄制品，甚至和我们发肤肉体上最坚硬的釉质器官亲密接触的刷头部分都是石油——这种黑糊糊黏糊糊的亿万年前的树木、动物躯体，历经齿轮、火焰、催化剂、淬炼、蒸馏提取而得的，

这体现了历史的车轮不可避免地在碾压着你和我。

然后取下毛巾——又是涤纶加棉毛的混合制品，60% 棉花和 40% 的涤纶，甚至我们面对面用以查看面容的镜子，也是石英和水银缠绵交融的一部分——即使它偶尔不客观地缩瘦 / 拉胖你我的形体——这种来自镜子主观的欺骗行为，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相敬如宾。

我们打开不锈钢水龙头——这种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英国军方解决了枪管生锈的战争产物，在马达、水泵、液体感应器混搭而成的自来水系统下，感受来自多年前存储在城市某处水源地的水，在那股“清泉”中品尝氢氧化钙和氯化钙和平相处的漂白粉的味道，我们一点都看不见他们，他们却在历史和文明的瞭望室对你刚起床时的面容指手画脚。

如果我们每时每刻的感受，都被过往文明的经验所包裹。我们是否还有心思去潜心思考朋友圈里“朋友们”的一颦一笑？所以，我决定放下手机，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看这堆由二氧化硅、集成电路板、重力感应器组成的虚幻的世界忧心忡忡或者开心不已？

然后，闹钟再次响起。恐怕是要迟到了。✍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多角度台灯

设计师埃里克·加拉诺 (Eric Galano) 的这款台灯 HYDRANT, 由手工雕刻技艺加工而成。造型主打简约风格, 尺寸小巧, 便于挪动。LED 灯珠镶嵌在木棒中, 以悬臂式的姿态向前延伸探出, 可实现棒体自由转灯, 为不同角度的光照提供更多便捷。

可视温度烧水壶

家用烧水壶 Stagg 在设计上迎合了人的视觉平衡感。手柄顶端的一块小平面增加了稳固性和可操控度。壶盖上的温度表使人方便掌控烧水温度, 以达到茶水冲泡的最佳口感。



深海无人机

设计师罗恩·费伦茨 (Ron Ferencz) 的这款概念化水下无人机, 装有三轮风扇, 配有高清摄像头。镜头不仅为无人机负责导航, 还能够拍摄魅力无限的海底风光。





多功能氛围灯

设计师 Jay Hyun Kim 推出的这款 Cosmos 时钟扬声器，可作家中调节气氛的灯具。扬声器的表面由一张星座图构成，详细展示了北半球所有可见的星座。而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则分别表示了时针和分针。扬声器的音乐和色调还可以通过相应的手机软件进行调节。



尤塞恩·博尔特限量腕表

由宇舶表打造的尤塞恩·博尔特限量腕表搭载飞返计时机芯。黑色陶瓷表圈与表盘以绿色和金色点缀，表带装饰牙买加国旗轮廓。透过蓝宝石表背可见机芯印制“闪电博尔特”剪影。



创意办公用具

创意办公用具 RULE/ONE 是一款集标尺和圆珠笔于一身的便携式文具。设计师利用帽夹的延伸制作成尺子，而尺子内部的磁铁又与笔壳连在一起。RULE/ONE 还配有电容笔头，以便灵活方便地在触屏设备上工作。

裙子的鞋

日本设计公司 Nendo 打造出一款“穿裙子”的高跟鞋 Skirt-shoes。鞋子上的“裙子”部分采用了透明的 PVC 材料和真皮皮革，而鞋跟部分的可视化处理则凸显了高跟鞋本身的轻盈感。





棱镜彩球

蒂芙尼 2016 秋季“传世之作”珠宝中的棱镜系列项链及吊坠，沙弗莱石、锰铝榴石和蓝宝石等释放绚丽的色调，体现了对于光线和色彩的巧妙运用。



混凝土台灯

Menu 品牌的“混凝土台灯”结合细腻与粗糙的材料，白色玻璃灯罩搭配灰色混凝土基座，基座上的黄铜旋钮同时是开关和调光器。

漂浮的沙发

Sancal 品牌的“漂浮沙发”是多彩的多用途沙发，靠垫、头枕、臂枕等可以选择不同的色彩和织物，沙发背板同时充当屏风，上面还可以挂围巾或外套。





蝴蝶刺绣

Valentino 新款“My Rockstud”系列手提包，蓝色牛仔布结合深蓝色皮革纹理的小牛皮，包身上用不同色彩的丝线，刺绣出翩然飞舞的蝴蝶。



玫瑰腕表

Piaget 伯爵 Altiplano 系列细工镶嵌腕表，直径 32 毫米的白色表盘上绽放着娇艳的玫瑰，总共 96 块花瓣由雀眼枫木和梧桐木切割拼镶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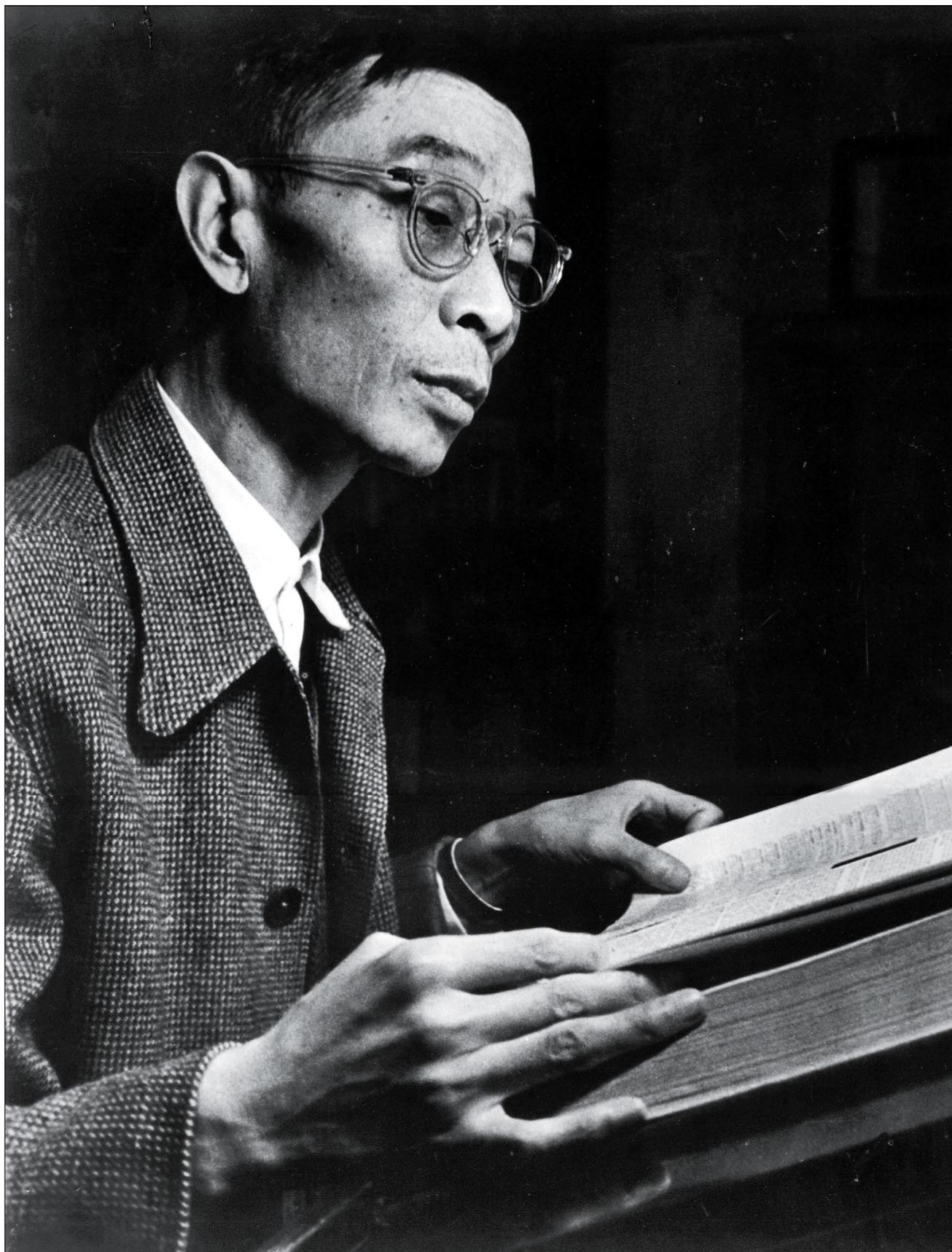
新古董桌

Baccarat “新古董”边桌源自品牌标志性的 New Antique 花瓶，透明水晶深层切割的新古董花瓶被转化成桌子底座，托起白色卡拉拉大理石桌面。



羽毛挂钟

L'atelier d'exercices 的“羽毛挂钟”以法式扁平玻璃罩搭配木质外框，内置静音扫描式机芯。钟面上取代指针的是鹞与野雉的羽毛，展现自然的动态之美。



傅雷（1961年春）

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样本

傅雷的傲与烈

记者 王丹阳

1966年，这一年对傅雷夫妇来说，异常艰难。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决绝选择。

安定坊5号的家春秋

江苏路284弄安定坊的跟前如今新造了条地铁，从地铁口上来，这座小小入口的花园里弄就在手边，一拐进去，5号的黑色铁门就赫然在眼。总共是5幢18单元的联列式洋房，5号稍显不同，不仅装了大铁门，还有一块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石牌贴在门边，寥寥几字，任你心照不宣。

出入铁门的人对门口逡巡的人都目光警觉，很快地把门一锁。听说，很多知情者想来参谒，有爬墙进来拍照的，居民很反感，反映道“这都是私人的房子啊”。确实，这房子在“文革”时“大换血”，他们都是70年代搬入的，没一个见过之前的男主人傅雷。

为了不让这房子抛头露面，极其讲究私密性的老上海人跟政府讨价还价，只能把“傅雷故居”的介绍牌贴在里面，于是你需要有机会走进铁门，凑上那座假三层、褐色卵石铺面的德式别墅，才看见一块失色的铜牌安在一根方柱挑空的门廊底下，因为门廊朝西洞开，檐下光照黯淡。

岐山居委会一个姓李的主任说，按傅雷的知名度，这房子该做成故居对外开放的。同个里弄里钱学森的故居就已经“谈好了”可参观。但傅雷的房子有点特殊。“毕竟对他两个儿子来说，这也是伤心地，人家也是有点忌讳的。”她这样说，带着点同情地揣测。江苏路、愚园路一带文风炽盛，1949年以后，这里是弄堂、棚户区 and 老洋房首尾相接、交杂分布，但在工人阶级的“掩映”下，傅雷、施蛰存、顾圣婴、杜重远、钱学森等在此撑出另一番世界。50年来，这一带的劳动群众对傅雷多少有点耳闻，并不因为他的翻译，而是夫妇俩的自缢和傅聪的“叛逃”，这在“文革”时都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也是最极端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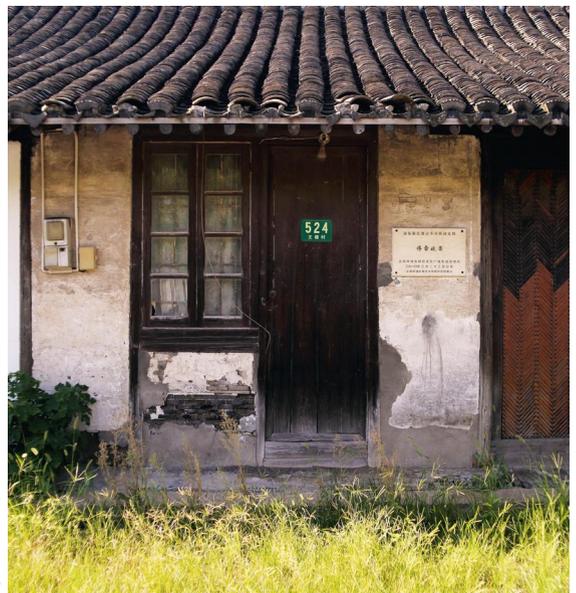
1966年9月3日

如今的5号住着四户人家，1936年造的房子，一律朱漆木门，格局至今未动。房子L形站在小院西南角，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狭长的钢窗冷落地开在山墙上，让房子显得像碉楼。傅雷一家曾住的底楼如今大门紧闭，其实朝南的阳台外有个100平方米的大花园，1966年以前是傅家整个租了这宅子，花园就是独享的，所以抄家时花园里被掘地三尺的英国月季都是傅家协同里弄里的文化人精心研究嫁接的。1966年后，这花园随宅子变集体所有。

二楼的王炳贞1971年时住进来，如今89岁耳背得厉害，他记得当时四户人家都属三军，这房子是军产，跟我反复嘀咕着当年是“四人帮”指示三军复员缺住房，而这边是“自杀的自杀，坐牢的坐牢”，房子空出来……因为底楼有150平方米，慢慢演变成三家，终日鸡犬不宁，最后被一家独占，后来这家也另有住房，底楼被走马灯般地出租出去，现在底楼开了个私人会所，“做了饭店，吵得不行”。

50年暌违，回到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来最后的风声鹤唳。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查，晚上19点多离开。23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常去他家听傅聪从波兰寄回来的音乐会唱片。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续四天三夜，也让义无再辱的傅雷走上绝路。多年后，李名强曾在香港向媒体记者辩解：红卫兵把袖章给他戴上，“我能不去吗？谁会愿当反革命？”

抄家队离开时，傅雷和朱梅馥三晚没有合眼，花





(本组图片：张雷摄)

1. 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曾被傅雷命名为“疾风迅雷楼”
2. 安定坊
3. 南汇航头镇王楼村的傅家祖宅，鼎盛时有36间，因为还有四户的搬迁工作没有完成，一直无法开放
4. 底楼的花园，傅家曾经在这里种满月季，如今是一个私人会所

4

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上大字报。即使陷入人生最后的绝境，夫妇俩以闭门隔绝的方式阻挡住来自外界的关切，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桢听见他家一片嘈杂声，屋里灯火通明，去敲了门，朱梅馥站在门前与他对视片刻，默默把门关上。31日，朱梅馥之弟朱人秀致电傅家，被朱梅馥换作陌生人的声音挂断……

9月2日晚上，傅雷、朱梅馥和保姆周菊娣照样三人对角坐在书房里，傅雷伏案写东西，“两个人还有商有量”，周菊娣事后这样告诉过朱家的人。晚上20点的时候，朱梅馥叫她早点休息去，“明天小菜少买点”。翌日早8点半，周菊娣一直没有等到主人的卧室门开，按照傅雷刻板的作息，他们是7点就起床的。一直到9点半，她在敲门无人应后紧张地推门而入，眼前的惨状轰然撞碎入傅家11年来的斯文印象。1985年，在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的回访后，当年是自缢还是服毒的谜团渐渐明朗。

按照《傅雷之死》的考证，长宁区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看到“夫妇俩一左

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他进门时劲儿太大，傅雷头上的绳子断裂，整个人掉在了藤椅上。他们的绳索是那年代才有的蓝格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打个结，地上的棉花毯亦被后世称道为临死的优雅和尊严而流传不休，这是为了不在更深半夜惊扰外人。屋内台灯昏昏，暗示着发生在天亮前。

可以想象，两人一个是穿着短裤汗衫、另一个穿着睡衣被车送走的，送他们最后一程的只是周菊娣的哭天抢地，这位45岁的浙江镇海农妇和傅先生、傅太太情如至亲，去谁家都没有在他们家干得那么长。因为傅雷是有争议的名人，当天车是开到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进行尸检，在他的颈下发现了马蹄状索沟，傅雷在圈子里出了名的清高孤傲，死后的斯文体面便身不由己了，周菊娣念着他俩是光着脚上车的，翌日买了两双黑布软底鞋送到殡仪馆。

左安民在《傅雷之死》里有段自述：“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500多户中有200多户被抄家。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

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傅家本可逃过一劫，傅雷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彻底成了个无职无衔的自由派，靠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翻译稿费养活一家四口。音乐学院的造访另有其因，那是因为傅雷写给上音钢琴系主任李翠珍的一封信，后者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后因丈夫在香港曾几度赴港团聚又不肯返沪，非常时期被划入特务，上音的红卫兵在抄家时发现傅雷一封信，信里劝说她返沪，于是一并有了特务之嫌。但以傅雷直如竹筒、口无遮拦的刚硬脾气，也许因李翠珍被抄家是偶然，但趋于决绝是特殊时期的必然。

悲剧的诞生

“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傅雷留给朱人秀的遗书中说道。在夫妻俩精心列就包裹的遗物清单里，这封写给朱人秀的遗书格外悲切却沉静。因为两人曾在夜深时去花园里观察月季生长习性，这座花园就被怀疑埋藏着“变天罪证”，变天罪证没有挖到，却找到新的反革命线索。

那是朱梅馥三姐朱纯寄放在傅家阁楼的一只箱子，里面有一个印有蒋介石头像的圆镜和一张印有宋美龄像的旧画报。“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朱梅馥的亲侄女、朱人烈之女朱佛容向我回忆起那两件把柄至今难以心绪难平，她告诉我，那是朱纯夫妇在解放前曾在安庆某银行任职，一直想调来上海工作，便曾在傅家寄存过物品，不料正值上海解放，旧系统无法存续，两人就一直没能落脚上海。这个寄存的箱子，也让朱纯在亲戚的责怪中抱恨终身。

在2013年重编版《傅雷家书》里，瞩目处之一是一封1966年8月12日寄去英国的信：“对于一个

在旧社会中生活逾四十年，满脑子‘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反动思潮’的人来说，他（毛泽东）的‘自我改造’自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这是他写给在英国的傅聪的最后一封信，曾因逸散而没有在旧版中出现。但这封信透露着他最后的心路。

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树华告诉了我一段插曲：傅聪曾经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这封信，“我敦促他一定要找出来，因为它折射傅雷已经有自杀的想法”。最后忆起信是给了一位香港记者，对方却也找不到了，如今面世的只是英文报纸上择段刊出的半封信，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金圣华转译。

“想象我们的孙儿（傅聪之子傅凌霄）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一点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傅雷晚年也是多疾缠身，白内障、肾下垂，还间而伴有三叉神经痛，58岁的身体犹如风烛抵抗萧萧暗夜，他在信末已写，每次只能看5分钟书。“报上的长文都是妈妈念给我听的，这封信是我口述由她打出来的。”

决绝的种子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在他心中酝酿，傅雷常怒发冲冠、横眉竖目的，从不避讳自己近似儒家杀身成仁的念头。1958年4月30日，他被“补划右派”，那时他任上海市作协的书记处书记，也是他生平最后一份“正职”，兼任《文汇报》社外编委。那天深夜他回到家后，灯下曾对朱梅馥对坐而叹：“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傅雷二子）还太小，今天我就……”

现年81岁的周佛容向我回忆起这个姑父，不无对他的悲剧性性格的喟叹：“他这个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不怎么懂在现实的人情世故上回转，划右的时候就说要自尽了，我听我妈妈说，我姑姑说‘不许你自杀，我还有两个小孩呢’。”在她印象里，姑父的脾气性格绝对不好伺候，“我姑姑因为他吃了不少苦”。

1966年8月23日，他又说了同样的话，周菊娣曾经在当年事后的公安笔录里提过，那天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两人就开始整理字画古董，第二天晚上傅雷就在书房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让他们砸，最大不了两条命。”朱梅馥高中同学张原我的女儿艾方惠曾经叙述过这样的细节，那是在当年8月27日，她和母亲最后一次造访傅家，把寄放傅家的首饰拿了回来，



傅雷很坦荡，说这次无论如何不愿再受辱。“他要带着梅馥一起走，我母亲力劝，‘老傅，如果要走，你能不能把梅馥留下？’他说他不能让她一人活着受苦。”

无恒产的弄堂人家

在王炳贞老人家二楼的阳台上俯瞰花园，一片绿荫如盖，已很难想象当初满园月季的景象，最初的竹篱笆围栏也不复踪影，用高墙代替。底楼的会所摆了几件遮阳伞、桌椅在外面，一股适憩的安宁气沁人心田，曾经作为傅家的花园也曾高朋满座，比如，住在愚园路1028号的施蛰存只要折过一街角就来到了他家。

这是傅雷在上海最后一个家，从1949年起住了17年。虽然夫妇俩都是上海南汇周浦人，却像多数漂

泊沪上的文人家庭，一生无恒产。这房子本是上海的翻译家宋淇的，后者的身份曾是港中大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张爱玲后期作品的重要出版人，在解放后移居香港。傅家租下房子的时候，宋母还住在二楼，一楼就做了傅家的客厅、书房和主卧，傅雷是埋头书斋的喜静之人，两个儿子就住在顶上的阁楼。

傅家在那条弄堂里算不上殷实，甚至是拮据的。按照遗书上的说法，房租是55块，据周菊娣透露，每月的伙食费在48块，还有大笔开销用在傅聪的钢琴学费上。但根据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傅家虽非大富大贵，也算过得小康——60年代上海的双职工家庭月入在百元左右，也有丈夫一人养活一大家的情形，如果工资过百，女方也可赋闲做家务。傅家就是这种情况，傅雷靠非固定的大笔稿费维持家用，朱梅馥虽由教会女中毕业，但15岁订婚后就中止学业，一生

左图：傅雷夫人朱梅馥的侄女朱佛容

右图：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树华

操持家务。这个看似并无特殊的家庭，在波澜不惊的集体主义大环境下挑出一个极其不寻常的精神世界。

纵使傅雷因译著丰硕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翻译大家，但纵览他的履历，却从未有过显赫的职业身份。数个任职，都潦草短暂，归根结底跟不事权贵的性格有关。他曾在1937年写给史学家罗香林的一封信上有过自省：“实缘弟秉性憨直，不惯作吏。”

施蛰存在一篇《纪念傅雷》的文章里写到他1939年在昆明拂袖而去的情形：“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回上海后的傅雷成为自由人、特约翻译，一家住在今重庆南路的巴黎新村4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翻译罗曼·罗兰。”

“反右”时期的悲观种子

1957年春，埋首翻译的傅雷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惊回现实，经历了一次如沐春风般的鸣放。3月4日，他在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这是他第一次亲见毛泽东。“此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他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给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去了长信传达精神，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楼适夷说：“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

那年夏天，鸣放的热度急锋一转，形势进入整肃。《文汇报》以“中间路线”为其定调，“他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属于中间分子”。12月，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上写道：“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做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而在1961年，傅雷曾给寓居新加坡的挚友刘抗去信，也印证了4年来身体奇差，“精力大衰，几乎足不出户，工作时间不得不减少一半，

傅雷是整个家庭中脆弱而敏感的受护者，而朱梅馥是出了名的现实的调和者，如果傅雷是锤子，她就是棉胎，始终细心观察并护佑着爱走极端的丈夫。

五六年前每日可工作10至11小时，今则逐渐减至5小时”。1959年他就在一封信上写过：“随时准备撒手而去，永远休息。”

“那时他得了泪腺炎，伤心加上这个毛病，每天早上起床时枕头湿了一大片，我姑姑、爸爸、叔叔（朱人秀）都劝他要想开。”朱佛容说。从她无奈和略带惆怅的描述里，傅雷是整个家庭中脆弱而敏感的受护者，无法与世俗勾兑形成了他始终孤闭的精神堡垒，而朱梅馥是出了名的现实的调和者，如果傅雷是锤子，她就是棉胎，始终细心观察并护佑着爱走极端的丈夫。“他没法在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碰都不能碰的。”朱佛容提起他时不自主地流露着一丝不解的嗔怪，同为上海本地人，这位“继爹”（南汇话里姑父的意思）与精明圆融一点不沾边。

1957年，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想保他过关，暗示他把“检讨”的调子定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就算在思想上不反党，但是“在实质上反党反社会”。“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但傅雷冷冷回绝：“没有廉价的检讨。”于是1958年，他被正式补划为“右派”。划“右”后不能出书，楼适夷专门请示中宣部，被告知得换个笔名来出版，但这个权宜之计也被傅雷回绝了。楼适夷恤友心切，一方面把他的译稿压下，准备摘帽后再发，另一方面照支稿酬。

就在那段时间，傅雷仍不顾今夕何夕地埋首在字句间，以至于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中都写道：“两年来营养之缺乏，非你所能想象，因此百病丛生，神经衰弱，视神经衰退、关节炎、三叉神经痛，各种慢性病接踵而来。”在出版无期的长夜中，他翻译了《幻灭》，还嫌40年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存在诸多幼稚的纰漏而重译了一遍，把丹纳的《艺术哲学》译成，为傅聪抄写了6万字的《希腊的雕塑》一章寄去。朱梅馥写信说：“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缭乱（多写还要头痛），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

那段时期，安定坊5号的门口人少鞍稀，因为傅雷的“闭门谢客”也使得众人不便多扰；再则，经历一次扣帽子大戏，也与有些人交恶，从此不相往来，比如《文汇报》社长徐铸成就是一个。1957年7月，傅雷著名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暗示了徐铸成“真主意，假商量”，措辞之风带有一种反常态的阴谋论；徐铸成在8月写《我的反党罪行》，揭露曾“和傅雷密商很多事情”，把他拖入“右派”。从此，徐铸成再去傅家，被朱梅馥推出门外。

除此，还有前一天还来安慰，后一天就对他大搞

揭发的意外之人，比如他的表姐夫裘柱常。在1959年11月的履历表上，傅雷就填写了三个社会关系：上海的朱人秀、周煦良和北京的楼适夷。周煦良也是翻译家、《文汇报》的社外编委，与他在解放前合编过《新语》半月刊。那年，他来到傅家，带来一个消息：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去了英国。这件事也许是傅雷最后一桩遗恨，他至死没有再见傅聪，傅聪旅英20年后，是在1979年父亲的平反追悼会上首次回国。

凭借傅聪当年作为首个中国人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获铜奖的名头，他在国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陷于意识形态漩涡时的中国社会，他是中国送去波兰留学的最早一批钢琴家，在临近学成之际，凭着一张全欧通用的护照“叛逃英国”。事后，他回忆说：“如果回来，一定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

怒与刚

1961年，傅雷摘帽，施蛰存折过街角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在施蛰存幽默的笔调中，并不隐晦于他干柴烈火般的脾气。“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8月13日，当朱佛容在寓所向我谈及傅雷之怒时，我方始理解为何朱梅馥在一封1961年的家书中这样苦口婆心：“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知夫莫若妻，信里所谓的“秉性乖戾”，与朱佛容哭笑不得的描述隔空暗合。

傅雷的“怒”是一以贯之的，对外对内都显示着一种绝对而鲜明的性格特征，孔子说“吾未见刚者”，施蛰存嗅到他身上的一种主调“刚劲”。朱梅馥用“乖戾”形容他，不是没有道理，他曾一度与刘海粟决裂，理由是画家老朋友张弦打抱不平，那时刘海粟对张

弦在创作报酬上做扣压，后者染病死后刘海粟都不愿为其卖画筹款，傅雷悲愤之下把刘海粟骂个半死，公开交恶。

在家里他象征绝对的威严和父权。“我爸曾想把我寄养在他们家，那我不要吓死的哦，傅雷那个脸不要太凶哦，其实他人蛮好的，就是上海人说‘吃相太难看’（指态度不好）。”朱佛容习惯性调回上海话，就像姑妈姑父在家也说上海话一样，他们的普通话说得都不好。

他喜欢安静，却不时在书房里竖着耳朵听傅聪的琴声。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朱家人去看望朱梅馥，总在客厅里絮叨家常，这时，坐在门口廊道边琴房里的傅聪开始淘气乱弹，“声音响得盖过你说话”。不料傅雷从三楼书房冲下来，就是一顿打手心。杨绛在《忆傅雷》中也写过类似的场面，两个小孩鬼头鬼脑地偷听大人在客厅谈话，“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傅雷在家中一上火气，有什么扔什么，花瓶、蚊香盘、鞋子，朱佛容都亲眼见过或是听大人描述过。在知识分子的斯文外壳下，其实这就是个典型的望子成龙的父亲、为自己树立权威的家长，虽然也喝过洋墨水，但身上有根深蒂固的江南乡绅望族的儒家文化传统，指引其不自觉地缔造一种严正威仪的家风。

所以朱佛容记得，他家规矩太多，各种讲究，中饭是11点半吃，晚饭是19点，吃点心也有时间，都是铁律。有次她去傅家吃饭，他家是分餐制的，每道菜都在自己的盘子里夹好，饭桌上的格局是夫妇俩在长桌的两头对坐，两个儿子靠着母亲坐在一边，朱佛容坐在表哥和表弟的对面。“他远远看见我这没菜了，‘梅馥，给阿洁（南汇人在家中各取小名）添点菜’。两个儿子没菜了是把盘子往妈妈这里挪一挪，‘妈妈，给我夹点菜’。我想我还是吃了快走吧，哪里敢多要。”

60年代初在安定坊，刚生了小孩的朱佛容去姑姑家找她拉家常，无事从不打搅在书房的傅雷。“保姆菊娣走出来跟我说：‘洁小姐，傅先生叫你进去坐一会儿。’他的面孔还是跟我小时候时一样：‘你怎么那么瘦，你不是认识很多医生吗，去验个血不是就解决了吗？’他就是这种口气，说着在我的通讯录里写上个医生的电话，叫我去看。”但她记得，他对外婆，即自己的岳母是非常尽孝的，那时外婆住在傅家，他每顿药都亲自拿上跟前。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朱佛容与傅聪曾先后被送进毗邻巴黎新村的西城小学，校长是朱人烈朋友的太太。傅聪没读一会儿就退学了，原因是他太调皮，经常被老师耳朵拎得哇哇直叫。傅雷对此有意见，“你教育不来我的儿子”，于是就索性将他接回家中请私教上课，很多朋友对这种管教法不以为然，施蛰存说：“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傅雷是在一种极其传统的严父孝子观下成功的，傅敏在初中毕业提出也要学音乐时，他就明确告知：“我的精力和家里的条件只够培养你哥哥一个。”这也基于他看透次子无此天分。

“他自己就是棍棒之下出来的，所以在那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他相信棍棒之下能出孝子。”傅雷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树华这样解释。朱梅馥知道傅雷的童年是“清教徒般的生活”，他1908年生于南汇县渔潭乡傅家宅，即在今日的南汇航头镇王楼村。傅家是当地的望族，上世纪80年代时尚有160多户。傅雷祖上曾持田产千亩，后渐家道中落，至他父亲傅鹏飞不图守业济家，飘然在外，被恶人陷害狱中。

傅雷的母亲学孟母三迁，为培养孤子将他带到周浦镇上入读小学，傅雷在自述里写其母，“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愤，以泪洗面，对我又管教极严，16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从四书五经中走出的傅雷在为人处世上不能摆脱儒家传统的影响，但教条式的童年埋下其后世悲观性格的阴郁之种。“我也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在内。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

他对清贫的看法就颇能说明他的精神底色，“清贫二字为何连在一起，清则贫，亦唯贫而后能清”。这点从他他对美国的厌恶里也可映鉴，1965年，他给在美国旅行的傅聪写“换了我，恐怕比你更受不住20世纪高度物质文明的生活，和极度贫乏的精神生活的对照，的确是个大悲剧”。更悲剧的是，他从精神上抗拒资本主义式物质生活，又在新中国的集体主义海洋上摸不到精神停靠的边际，政治上天真乐观得很。

“国内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反党集团事让你在英有所闻，我们家也为之惊心动魄，万万想不到建国17年，还有残余资产阶级混进党内的分子敢如此狂妄向党进攻。”这是1966年6月3日的家书，那时他已坦言“工作的苦闷比你厉害得多”，那年的信

中总透露着来日无多的情绪。他自感童年的阴影在心中扎根，“年纪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像枚宇宙粒子漂浮于尘世。

2013年，傅雷骨灰正式入葬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墓志铭上刻的是他在家书中的原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王树华觉得，这句话恰到好处地概括了他孤独和不群的一生。“我们觉得孤独是这个世界难得的品质，傅雷的精神价值就在这里。”他说。2011年，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王树华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每次他把在北京的傅敏请来南汇开研讨会，会有意识地把傅家在南汇的远亲近邻介绍给他，“他都不认识的，他说从来不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亲戚”。朱佛容曾经告诉过我，傅家极少有亲戚走动往来，“感觉他（傅雷）没什么亲戚，所以想想蛮悲惨的”。她指1966年的变故。

说起傅雷骨灰的安葬，王树华也费尽周折，“要反过来去找他们的”。他指傅聪和傅敏。傅雷的骨灰曾因他是“自绝于人民”而流落民间，又差点被销毁，1979年平反后一直寄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家中一直没人再提入葬之事。但王树华在南汇筹办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又兼着南汇博物馆的事，一直想把骨灰的事落实。“我跟傅聪、傅敏说，他不仅仅是你们的爸爸，他现在是公众的傅雷，但傅敏跟我说：‘这不是我爸爸的风格，你们就撒大海吧。’”

朱佛容是从上海交通大学船建学院退下的力学系教师，朱家的命运曾也一度受到“傅聪叛逃”和傅雷事件的影响，导致在事业上各有插曲。50年后，她说到这对夫妇还是禁不住失声了：“我娘娘（姑姑）很和气，继爹脾气不好，但他们都是好人。”1966年9月3日之后没两天，她知道了这个消息，在悲痛与惊栗中慌乱地自顾着，她记得她与亲哥哥把家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封皮面费劲地扯下来，特地走到人民广场找了个垃圾桶扔掉。“路上我和哥哥哭得不行，两个人互问怎么会这样，我哥哥有点神经质了，我还得把他控制住，不要被人发现。”

70年代后期，家中同样被批斗的朱佛容搬到了乌鲁木齐北路上的一座电梯式的德式公寓，从安定坊沿着愚园路走一公里路就到了那里，愚园路是条知名的幽静小马路，8月盛夏更是梧桐斑驳洒满一路和两边洋房的墙头坡顶。我从安定坊走到朱佛容的家，在50年不变其貌的马路上曾想，如果她的姑姑和姑父挺过了那个年代，也许真的会在一个朗朗乾坤般的午后，走过愚园路去她家，像最普通的家庭那样闲话家常。☑



绘画·阿梗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傅雷题赠罗曼·罗兰的照片（1934年2月）

傅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孤独灵魂

文 / 曾焱

纪念傅雷先生，以及那些像他一样“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灵魂。

1965年9月12日，傅雷像往常一样，提笔给远在伦敦的长子傅聪写信。第一封是用英文写给傅聪当时的妻子弥拉的。弥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傅聪在1958年不得已从波兰出走伦敦后，曾给父亲带来精神上沉重的苦痛和压抑，好在两年后他与弥拉相爱结婚，给了父亲少许宽慰。自傅聪婚后，傅雷不再单给儿子写信，有时也会写给儿媳，希望她能多了解一位中国父亲对艺术、对家庭的看法。

那天他几乎以整封信谈论的，是自己正读着的书，查理·卓别林“一本卷帙浩繁的自传”。傅雷向弥拉感慨，自己跟卓别林在许多方面都气质相投，尤其是孤独。“我的生活比他平凡得多，也恬静得多（而且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我也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他读得伤感极了，忆起久远的过去：“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虽然从未忍饥挨饿——人真是无可救药，因为人的痛苦从不局限于物质上的匮乏。”

现在来看，这本传记带给傅雷的心绪震荡显得不太寻常。自1954年，傅雷就一直给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傅聪写信，1958年12月底因出走事件中中断。后来因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批示，1959年10月后他们父子又获准恢复通信。从1954年1月18日晚第一封，到1966年6月3日最后一封，傅雷写信的间隔通常在一周左右，少则三四天，最繁密时也顶多每日一封（据增订第五版《傅雷家书》）。而1965年9月12日这天，白天和晚上，他竟接连写了两封信，分别跟傅聪夫妇深谈读后感受，字里行间，似有难以尽言的心情。

1965年，正是傅雷饱受忧患、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政治的阴霾之下，埋头译作之外，给孩子们写信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撑。有了1957至1961年当“右派”

的教训，傅雷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与人交往。他几十年都是靠稿费生活，从未向国家领取工薪，而现在聊以寄托精神和生活的翻译也由于政治气候的严峻而几乎停止了。前一年交稿了50万字的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始终没有能够出版的消息，他收入骤减，终日忧心一旦不能译书，将难以维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傅雷哀伤。他的眼神急剧衰退，医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险，必须立刻停笔休养。这一年来，傅雷内心在不断挣扎，迟疑着，要不要给认识多年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写信，请从前曾经维护过自己的这位老领导帮忙，从政府方面申请些钱来治病与生活。

在那个晚上，写给傅聪的信里他又一次谈到卓别林的孤独：“他是非常孤独的人，我也非常孤独：这个共同点使我对他感到特别亲切。”他也责备自己：“我越来越觉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其实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可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conviction（信念）。至于嗜好，无论是碑帖、字画、小古董、种月季，尽管不时花费一些精神时间，却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虚空、自欺欺人的混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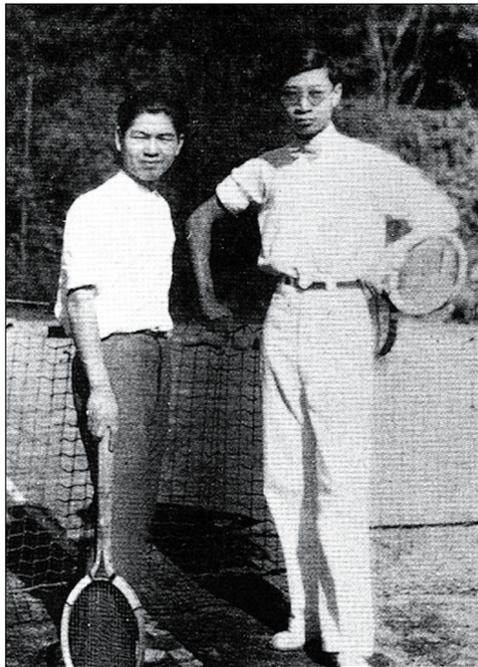
从卓别林，他是否想起了三十几年前的《夏洛外传》，信中没有提及。但这本书于他，既和卓别林不可分，也深刻于他自己的生命。卓别林创造了不朽于银幕的小人物夏洛（Chalot），法国记者菲列伯·苏卜（Philippe Soupault）又把他写入“幻想人物列传”，而刚从巴黎回国的傅雷因为深受书中人物的感动，决意将该书译入中国——稿成之后，虽说屡经碰壁，1933年9月他还是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了它。

《夏洛外传》为傅雷第一本译著，也是他漫长翻译生涯的起步。当时25岁的傅雷，在译者序中用这样激情的语句，向读者勾勒他钟爱的夏洛：

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最高贵的英雄。



左图：傅雷与刘抗（左一）在法国打网球（1929年10月）

右图：画家刘海粟（戴眼镜者）与傅雷（右一）在巴黎

（FOTOE供图）



卓别林曾说，他原想由夏洛造成一种“悲怆的哲学”（Philosophie Pathétique）。在辞世前一年的9月12日这个晚上，傅雷是预见到了吗，在这无法自主的浮世里，自己的命运离悲怆又高贵的夏洛竟是那么近？

从周浦到巴黎

1927年12月31日下午，在湿冷的浦江码头，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和几百名旅客一起登上了法航公司的“安德尔·勒邦号”（Andre Lebon）邮轮。

他买的是一张三等舱票。头等舱和二等舱主要是外国人和三两中国官员。四等舱留作法国从安南（即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调防士兵的营房。三等舱人不多，其中只有两个中国旅客，除了去留学的傅雷，还有一位是中华益友社的雇员洪永川，受命去欧洲推销国货。两个年轻人同住一间舱房，一路做伴，经过将近34天的海上航行后，抵达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

傅雷将同伴送上了去尼斯的火车，自己按计划去了西部的普瓦捷，在那里补习法语，为进巴黎大学做准备。

据洪永川的回忆，在邮轮上，傅雷的法语和英语

程度还都无法和人交流。他告诉同伴，虽然过去曾读过法语，也在大同大学念过英语，因不常用，都已遗忘。他们利用船上的时间，请了一位同船的安南青年补习法语，每天教授一小时，进步很快。到普瓦捷后，傅雷寄宿在一个法国人家里，房东是个老太太，待傅雷很好，每天教他发音和会话。傅雷又另请了一位法文教师，教授文法和读本。他很刻苦，法语进步飞速，到1928年9月，他顺利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主修课是文艺理论。同时，他自述中提到，自己也在卢浮美术史学校听课。1929年3月上海艺专校长刘海粟到达巴黎的时候，一年多前还不能开口说法语的傅雷，已经可以给他们夫妇教授法语了，也在一些正式场合帮他做翻译。1931年5月，傅雷和刘海粟一起去意大利朝拜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作品，在这趟旅行中，傅雷由在罗马认识的一位贵族夫人引荐，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和罗马扶轮社的邀请，用法语作了题为《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之意义》的演讲。

傅雷和刘海粟相识之前，先认识了原上海美专的一位留学生刘抗。1928年他们在巴黎遇上后，一同在郊外的Nogent Sur Marne的家庭宿舍中租住，从此朝夕相处。“我因了他，对音乐和文学获益不浅，他也因了我，引起更大的艺术兴趣。”他们一起参观博

物馆、画廊，去得最多就是卢浮宫。傅雷被刘抗带进了一个巴黎的美术的小集团。这个名单里，有刘海粟、庞薰霖、滕固、汪亚尘、王济远、张弦……归国后都是中国美术界的一批耀目的先行者。傅雷的人生和事业，从此和艺术，也和这些朋友交缠在了一起。

1929年3月来到巴黎的，还有在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当教授的散文家孙福熙，以及他的二哥、文学编辑孙伏园，他们和傅雷一样，也在巴黎大学文科攻读文学和文艺理论。而诗人梁宗岱、美学家朱光潜，这些人也都和刘海粟交好。傅雷因此常和他们聚在刘海粟夫妇下榻的旅馆里，聊天和争论，有时也陪着刘海粟去卢浮宫临摹名作。在亲密的相处中，刘海粟发现傅雷有极出色的鉴赏力，文字又漂亮，于是向他建议：你不要把时间再花在创作实际方面了，还是潜心研究美术理论和美术史吧，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

1930年，仍在巴黎的傅雷写了一篇《论塞尚》，寄回国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虽然只是一篇通过资料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画家的文章，22岁的傅雷却颇有自己的见地。他写道：“要了解塞尚之伟大，先要知道他是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

给予艺术至高的精神地位，视伟大的艺术家为时代人物的代表，这种宗教般的热爱，傅雷一生再未改变。

傅雷到法国后为什么选择学习艺术史？他对艺术宗教般的热忱从哪里来？如果回到20世纪前20年的那个时间节点，就会发现，傅雷其实是那个时代中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一个例证。

傅雷1908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现属上海市南汇县下沙乡王楼村）。在他祖父一辈，家里还是当地大户，有几百亩地，30多间房。傅雷的父亲傅鹏，虽然继承了家族全部财产，却折损了大半。傅雷不到4岁那年，在周浦镇一所扬洁女子中学任教的傅鹏又被人陷害入狱，得了肺病，出狱不久就去世，年仅24岁。

傅雷的母亲李欲振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却非常有见识，在族里威望很高，族里发生纠纷，往往请她公断。丈夫去世后，她又接连失去两个孩子。为了让唯一剩下的儿子能够有出息，1912年，她带着傅雷、奶妈、账房、佣人，从闭塞的村里举家搬迁到了十几里外的“小上海”周浦镇。傅雷7岁由私塾启蒙，11岁后又在镇小学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学到上海去了。他的母亲，再次凭着见识和胆量，将他带到了更广阔

的新的世界。

他们离开老家周浦到上海，正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从晚清康有为开始，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者就对美术的重要性有一种急迫的误读。在洋务运动背景下，中国近代美术最早建立在图画手工的概念之上。康有为曾写道：“绘画之学，为各学之本，中国人视为无用，岂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赖画之发明。”李叔同在留日之前，也向国人极力推崇法国的美术体系，认为法国举办万国博览会以来，“不惜财力时间劳力，以谋图画之进步”，所以成就为世界大美术国。而美国和日本，也是因为学习了法国，美术工艺才日益进步。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的“美术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先进人物既从社会发展和国家强大的角度来看待美术的意义和地位，也接受了蔡元培所倡导的“把美术视为一种超功利的美感教育”“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这种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美术”概念的理解。

傅雷转学上海后，考入南洋中学附小四年级，结果却在一年后就因为顽劣而被校方开除了。第二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傅雷因为一言不合就和同学打架，又公开反对宗教信仰，初中还没毕业就又被学校开除了。1924年，他仍以同等学力考入大同大学附中。

虽然屡受挫折，但整个少年时期，傅雷都接受到中国最好的西式教育，自然也在这种氛围中受到熏陶。他一生中对美术和音乐所保持的宗教一般的纯粹态度，最初应该来自这种时代的印记。

早在傅雷于老家念私塾的时候，1915年，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就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加上“庚子赔款”的资助，许多中国留学生开始了赴法留学之路。赴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选择了学习艺术，集中于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随着林风眠、林文铮、徐悲鸿等早期学生陆续归国，在20年代逐渐形成了中国

整个少年时期，傅雷都接受到中国最好的西式教育，他一生中对美术和音乐所保持的宗教一般的纯粹态度，最初应该来自这种时代的印记。

近现代美术教育上的法国体系，其影响力超过了1905年开端的日本体系。

傅雷动身去法国留学已经是1927年底，留法潮其实已经在回落。据傅敏从父亲好友周煦良处听闻，1925年“五卅惨案”时，傅雷在大同附中上学，因为带头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大同校董吴稚辉认为他是共产党，要抓他。傅雷寡母急了，把他领回了浦东老家。风平浪静以后，傅雷又到上海的一所很普通的持志大学念了几天书，不久就去了法国留学。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得过一张毕业文凭。

傅敏也疑惑过，父亲当年为什么突然决计去法国？后来他发现，父亲有一个表哥叫顾仑布，属于20年代初勤工俭学留法的那一批学生，学的是纺织，那时候已回国，是一个工程师。这个表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看到我父亲这个样子，就劝我父亲去法国留学，他讲的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情况对我父亲很有吸引力，我父亲脑子非常灵活，善于吸收新鲜事物，要不怎会带头闹事呢！可要做通我祖母的工作，并非易事。这么一个传统的妇女，又是寡母孤儿这么过来的，怎么舍得让一个儿子，不远万里到法国去留学！这里头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我父亲的姑母傅仪，她毕业于当时的一所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中（现在的上海第三女中），对这个祖姑母我们从小就非常佩服敬畏。她英文极好，小时候见她看英文小说就像看中文小说一样，人也非常开明。我们兄弟俩调皮，父母出远门时就把她请来家里坐镇，能把我们镇住，是这么一个人。她从中斡旋，说服了我祖母。”

“可是我祖母提出一个条件：出国前必须跟我母亲订婚。我母亲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妹，大概前三四代有姻亲关系。他们俩本来就很好，我父亲欣然同意。这样，我父亲才顺利地留学法国。”

傅雷如何看待自己将要在异国他乡度过的5年？他在船上发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这次赴法留

学，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但我之所谓烦闷者，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我曾多次想过：我数年来的颓废生活，应该告一结束了。

艺术是幻想的现实

1935年12月，已经回到上海的傅雷翻译了法国当代名作家莫洛亚（Andre Maurois，当时译为莫罗阿）的一本中篇小说集《恋爱与牺牲》。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习惯，他写下洋洋洒洒的译者序，抒己胸臆：

——彻底牺牲现实的结果是艺术，把幻想和现实融合得恰到好处亦是艺术；唯有彻底牺牲幻想的结果是一片废墟。

——艺术是幻想的现实，是永恒不朽的现实，是千万人歌哭与共的现实。

傅雷和他早年那些在法国一起求学的艺术家朋友，已经把艺术当作信仰，供奉在了人生的祭坛上。刘海粟、庞薰琹、滕固……仅这三个人和傅雷之间的交集，叙述下来，几乎就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小半部历史。

1931年8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同船自巴黎回国。一个月后到上海，那天正是“九一八事变”，令他们刻骨铭心。

23岁的傅雷旋即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的办公室主任，同时开授美术史、艺术论、名画家传和法语四门课。当时美专和刘海粟都深得蔡元培看重，学校教授名册里尽是张大千、黄宾虹、贺天健、潘玉良等名人，傅雷回国就出任办公室主任，在旁人看来起步不凡。然而他在美专只待了两年就辞职了。最直接的原因是年轻画家张弦的病逝。张弦是他们在巴黎就熟识的朋友，傅雷也非常欣赏他的绘画。回国后他也受聘于刘海粟的上海美专，因为贫且病，1933年夏天突然去世。傅雷伤心愤怒，批评刘海粟作为校方待老师过于刻薄。多年后的1957年，傅雷在《自述》中解释这次辞职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某某某待我个人极好，但却待他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傅雷和刘海粟在巴黎虽然亲密，回国后又为他的画册撰写美文《刘海粟论》，但因为艺术观点和为人方式的差异，傅雷一贯知人论艺，心里日渐和他疏远。张弦死后，他更是为友冲冠一怒，公开和刘海粟绝交十几年，直到50年代才稍有往来。傅雷任教美专的时间虽然短，但他在此期间编写翻译的两本教材：《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罗丹艺术论》，半

傅雷任教美专的时间虽然短，但他在此期间编写翻译的两本教材：《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罗丹艺术论》，半个世纪后仍在读者中传播。



翻译《人生五大问题》等莫罗阿著作时期的傅雷（1936年）

个世纪后仍在读者中传播，也令他这段经历难以被淡化。

比上海艺专任职更短的，是傅雷和留德美术史家滕固的两次合作。傅雷记忆他与滕固的相识时间为1929年在法国巴黎，但实际应是1930年的5月间。滕固由上海乘日本邮船“伏见丸”经香港、新加坡赴欧洲游学，途经巴黎时去探望了他过去的校长刘海粟，这样就认识了傅雷。1932年，滕固从德国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以艺术史考古学研究获取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回国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中

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诸职，从事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考古研究和艺术教育工

作。傅雷从美专辞职后，滕固曾分别于1935年3月和1936年冬，请他参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前往龙门石窟考察。两次时间都不长，因为环境艰苦，傅雷给朋友信中亦有抱怨上了滕固的当。但以傅雷的性格，也算是难得的两次合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随全国机关团体和教育机构南迁。1938年3月，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杨绛与钱锺书在40年代曾是傅雷家茶会的常客

右图：作家黄苗子。1948~1949年，他和夫人郁风常与傅雷争论艺术和社会问题

因为短缺经费，教育部下令已经汇集于湖南沅陵的两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并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后来因为一系列冲突，发生校长林风眠出走事件，滕固临危受命，1938年7月被教育部派去履职校长救火。

滕固再次想到了傅雷，聘请他为教务主任。1939年2月，傅雷从上海转道香港、越南，到达昆明。结果却是两个月后又回了上海。傅雷《自述》：“未就职，仅草拟一课程纲要（曾因此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张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与滕固意见不合，五月中离滇经原路回上海。”

施蛰存在《纪念傅雷》一文中记述了他当时目睹的情形：“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

傅雷自昆明愤然而返后，从此寓居上海家中专心译书，一生没有再到任何机构出任过公职。傅雷从美

术评论和教育的路上折转了方向，成就了一个杰出的职业翻译家。不过，杨绛提到她和钱锺书在上海的时候，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国朋友，钱锺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美术批评家）。而那至少是4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

罗曼·罗兰的奇迹

傅雷赴法那年，不到20岁，正是青春彷徨的年纪。到巴黎后，他最早接触到的是十八九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如夏多布里昂、卢梭、拉马丁一路，书中那些迷惘而无望的恋爱，罗曼蒂克的热情和幽思，令他更加无可解脱。

很偶然中有一天，他读到了法国当代作家罗曼·罗兰的一本《贝多芬传》，竟遽然触动：“读罢不禁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贝多芬传》和罗曼·罗兰对傅雷人生的影响重

大，在他8年后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文章还可窥见。1936年，傅雷好友、在上海美专教授西画的留法画家张弦病逝，当时还不到30岁。傅雷长叹中写下悼文——《我们已失去了凭藉》，开头两段，既是对好友遭遇的痛惜，也是他自己最真的人生感悟：

“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惶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重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重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

当他写下这些字行，几年前在巴黎读到《贝多芬传》的震颤，大概是如在眼前。

1931到1935年期间，回到上海的傅雷先后翻译了《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弥盖朗琪罗传》，并开始译《约翰·克利斯朵夫》。1934年3月3日，他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信，后者在同年6月30日回了信。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11月初版《托尔斯泰传》的时候，将原信制版印在卷首，傅雷以它为代序，自己加拟了一个小标题：《论无抵抗主义》。1935年8月，傅雷第二次给罗曼·罗兰写信，托付乘船赴欧的友人带到法国马赛港，再寄给旅居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傅雷在信末落款细致，自称“远方之谦逊崇拜者及忠实弟子”，名字是第一次写信时即用的“傅怒安”。他还随信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也有敬语、落款。罗曼·罗兰收到后，在照片边上标注：“傅怒安，‘三名人传’的中译者。”关于用名的变化，据傅敏说，傅怒安是他父亲学生时代用的名字，一直沿用到抗战胜利。40年代他给黄宾虹的信，也都是署名“傅怒安”。但《傅雷传》中说，他15岁后改名雷，以怒安为字。后来他用的笔名如“疾风”“迅雨”“移山”，还有“疾风迅雨楼”的斋名，都是从这名和字而来。他后来写那篇沸沸扬扬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就是用了“迅雨”笔名。

根据翻译家戈宝权的回忆文章，虽然罗曼·罗兰的那封回信早在30年代就被傅雷拿出来发表了，但他自己所写的两封法文去信，都是直到80年代初，才由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教授迈克尔·鲁阿夫人帮助，从罗曼·罗兰夫人处影印后带回中国，之后由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据法文译出发表。

傅雷对罗曼·罗兰的热烈崇拜，无论从他信中措辞还是最后落款方式，都显得毫无保留。这位法国作家如艳阳如风暴一般奔泻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对

于年轻傅雷，以及傅雷未来全部人生态度的影响，从中可以体味。

戈宝权在他回忆文章开篇即提到，在傅雷之前，其实还有一位名叫敬隐渔的中国留学生也译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敬隐渔着手翻译并与罗曼·罗兰通信，是1924年，那时他还身在中国。1925年8月，他去往法国，入里昂中法大学，其间曾到瑞士沃德州的新村拜访过罗曼·罗兰。那两年，这个年轻人还将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等作品译成过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发表在一本《欧罗巴》杂志上。

1926年1月10日，郑振铎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七卷第一期开始连载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发到第三期就中止了，“也就是译到该书的第一卷第二部第五大节为止，并未译完”。没有译完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敬隐渔境遇的剧变。戈宝权不太肯定地提到了敬隐渔的命运，“他后来在法国得了色情狂症，一九三零年初返国”，“传闻他是在一九三一年‘以狂疾蹈海而死的’”。

心愿未竟的敬隐渔，全心付出的傅雷，他们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名人传”的狂热，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关联着那个时代。

“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汗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和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开窗子。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



（视觉中国 供图）



(东方IC供图)



(东方IC供图)

左图：画家黄宾虹1935年在香港

右图：傅雷好友柯灵。20世纪40年代傅雷曾在他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

中这样写道。

“如何生如何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中，中国的年轻人对个人命运、民族存亡的困惑和彷徨、希望和启示，在这些书里得到了观照，“在其中认出自己”。

今天的法国文坛，能够给予罗曼·罗兰的位置恐怕已经有限。但在20世纪早期，尤其是“一战”前后，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写作以及反战思想正在法国和欧洲文坛发生着影响。罗曼·罗兰188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通过会考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在法国近现代史上，这几乎是所有思想精英和大作家们走过的标准道路，和他同时代的保罗·克洛岱尔，比他年代稍晚的萨特、福柯、罗兰·巴特等人，都曾是著名的“高师学生”。罗曼·罗兰一生写过十几个剧本和数本小说，但10卷本长篇《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然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本以贝多芬为原型的传记体在1905年开始连载，1912年出版，小说结构如交响乐一般宏大，里面对欧洲古典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尤受推崇，一时纸贵。罗

曼·罗兰虽然没有得过法国最有分量的龚古尔文学奖，但是拿到过另外两个重要奖项——费米娜奖和法兰西学院文学奖。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了他最高加冕。

在傅雷去往法国的1927到1931年，罗曼·罗兰已经是欧洲当代文坛名人以及人道主义活动家，在很多场合，他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字一起出现。写过多本名人传记的茨威格，在1921年为他也写了一本《罗曼·罗兰》。以罗曼·罗兰那个时期的影响力，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傅雷发生的至深影响。

傅雷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到国内后，它对中国几代读者的魅力堪称深远而恒久。“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样诗一般的译者序言，多少读者都可以随口背出。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初译三本是在1937~1941年出版的，百万字，译了三年（50年代

初，他又花费两年重译了一版）。文坛老人黄苗子8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老朋友在上海见面，那时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最畅销书之一，“他的译笔不仅流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作家叶永烈也向本刊说到，他在80年代写傅雷和傅聪的报告文学时，采访过很多亲历者，其中上海一位学者曾向他讲过自己名字的由来，说是年轻时读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激情之下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约翰”的一个中文谐音，就这样用了一辈子。

而《贝多芬传》，傅雷1928年到法国不久就读到它，早于《约翰·克利斯朵夫》。1932年他将此传译完一稿，但此后十几年间，国内出版界无人接纳他的译稿，理由是之前已经有一个译本（傅雷说他从未见过这个译本）。1942年生活书店在上海的骆驼书店出版《贝多芬传》，用的实际是傅雷因对自己从前翻译不满意而做的重译稿。

“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的这本书。”十几年过去，他仍心心念念要重译，《贝多芬传》当年对年轻傅雷的震撼可以想见是如何的刻骨铭心。在译者序的第一段，傅雷写道：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可恶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15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

直到50年代末，傅雷有次还说，他回看自己从前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还是罗曼·罗兰，同时代是个原因，另外也是因为“气质相近”。

不过对这位偶像的文学成就，傅雷的评价到了晚期似乎有些变化。他在1953年写信与宋奇（即宋淇）讨论19世纪西方文学的高低，就说：“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

办《新语》才给廓清。”1962年1月21日写给傅聪的信中又说：“巴尔扎克不愧为现实派的大师，他的手笔完全有血有肉，个个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决不像罗曼·罗兰那样只有意识形态而近于抽象的漫画。”

绘画也好，文学和音乐也好，傅雷的见地都随时间历练而愈明锐，愈高远。他于己于人也都坦荡无私，并不遮掩对过去的自己观点的不再认同。

黄宾虹画展和中西融合的追求

傅雷一生自告奋勇代朋友办过三个展览会，除了好友张弦去世后的遗作展，其余两个，一是在1943年为黄宾虹的八秩纪念画展，一是1947年好友庞薰棻的画展。

1943年的“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是傅雷艺术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他的作为和作文，不但向世人推出了黄宾虹这样一个大画家，也展示出他个人最为成熟的艺术观念和文化思考。

与同在法国留过学的徐悲鸿、林风眠，庞薰棻、刘海粟等画家一样，傅雷回国之后，尤其是40年代后，对西方艺术风格和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参证研究逐渐深入。

1931年秋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也参与到庞薰棻等人创办的决澜社的画展活动中。他们那时的主观愿望，原都是相信“艺术也可以救国”，希望把在法国学到的西方文化和艺术系统移植过来改造中国，让艺术也能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相吻合。

傅敏说，《罗丹艺术论》就是这段时间作为教材翻译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也是那个时候编写的美术史教材。但在1966年前，傅雷从来没有向两个孩子提起过。傅敏推测是父亲一向对人对己都要求高，而这两部稿子他也许不满意，所以一直束之高阁。

《罗丹艺术论》是被刘海粟的一个弟子在刘家一大堆旧东西里翻出来一套油印讲义，用正楷抄下来给了傅敏，才有现在出版的《罗丹艺术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是傅敏从上世纪80年代抄家退回的一堆书稿中发现的，是傅雷亲手装订的一本手稿，封面上用正楷写有“二十三年六月编”，也就是1934年。傅敏当时把书稿交给父亲的挚友庞薰棻先生，请他来决定是否出版的价值。1985年书稿在三联书店出版时，庞薰棻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评价它“不单是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作品，同时接触到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等等”。这也是《世界美



傅雷夫妇下黄山，途经杭州时合影（1936年8月中旬）



术名作二十讲》至今受到读者喜爱的原因，因为他就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博雅之士，给人丰富而优美的精神享受。

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困扰中国文化界的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论争从未间断过，而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抗日救亡大背景下，文化界更急切地要去寻求一种文化态度，实际上是和当时由战争带来的民族生存思考联系在了一起。在美术界，同样是从法国（包括比利时）回来的吴作人、常书鸿，加入了“西行经验”的行列，去边地写生创作，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个人艺术创作的重大改变，他们的西部题材画作也得到了相应的美术史地位。傅雷的好友庞薰琑，在前往西南的过程中，受到陈梦家、沈从文等学者鼓励，开始沉浸到中国古代美术之中，从艺术角度研究古代纹样和装饰画。同时他也成为中国艺术的田野考察者，最早深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收集大量的民俗资料，也绘画了《贵州山民图》等绢上水彩和白描作品。1946年，傅雷在上海吕班路震旦大学大礼堂为他举办了《庞薰琑绘画展览》，于序言中，称赞他“融合东西之成功，决非杂糅中西画技之皮表，以近代透视法欺人眼目者可比”。

傅雷则返身回到传统精神。他最深刻的艺术思想和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他与黄宾虹的书信来往之中。

当时黄宾虹人在北平，年近八十。从44岁到74岁，黄宾虹在上海生活了30年。74岁那年他应艺术专科学校邀请北上讲学，因日军占领平津，被迫滞留在了北平，十年闭门绘画与研究金石。傅雷如何与他相识并深交至此，有不同的说法。傅雷自己在1943年5月25日致黄宾虹的第一封信中，说到两人八年前曾在刘海粟家有过一次会面，也曾在上海美专看到过陈列的黄宾虹峨眉写生十余幅，不过那时彼此都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而据傅敏所写，他父亲是在表姐顾默飞家看到黄宾虹的画，激动不已，于是提笔给黄宾虹写信，黄宾虹收到傅雷的信，也同样激动不已，尽管他们年龄相差45岁，黄宾虹却认为傅雷确是“平生一大知己”，自此这对忘年交书信不断。

傅雷在信中说他看宾虹先生的画，“纯用粗线示物象，似近于西欧立体、野兽二派，不知吾公涉想中，又在追求何等境界”。黄宾虹答他：“欧风东渐，心理契合，不出廿年，画当无东西之分，其精神同也。”

傅敏记得的是：“相交12年中，父亲给黄宾虹



原上海法租界菜市街上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旧址

（摄于2015年）

写了117封信。顾默飞是前面提到的我父亲的表兄顾仑布的妹妹，是黄宾虹的女弟子。从1943年春开始，我父亲为筹办黄宾虹的书画展，到处奔走。那个时候我还小，才6岁，印象里就是父亲出出进进，忙得很，家里尽来老头，因为黄宾虹这一辈的人那时都已七八十岁；整天听他们讲黄宾虹长黄宾虹短的，后来我记得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举办了展览，那时黄宾虹不时把画寄来，我父亲亲自登记做账，展会上卖了画，还得设法把钱汇到北平，这些来往的信件，包括他给黄宾虹报的账目，都收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傅雷书信集》中。”

1943年11月，黄宾虹八秩书画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二楼开展，同时印行《黄宾虹画展特刊》小册子。这也是宾虹老人的第一个展览。傅雷以“移山”笔名撰写的文章《观画答客问》，以非常古典的一问一答式文体，回答了许多当时对黄宾虹绘画的质疑与不解，被认为是一篇评论黄宾虹绘画的重要文献。

黄宾虹成名很晚，在文化圈子里虽然也有不少人

知道，获称“南黄北齐”，但在身价和名气上还是比不上齐白石。以社会地位，也不及晚辈徐悲鸿、刘海粟等艺术名流。傅雷四处奔走，一己之力操持一场画展，仅仅是因为喜欢他的艺术。而在画展开幕的那天，宾虹老人远在北平，并未能到抵现场。直到5年后的1948年5月中旬，傅雷携朱梅馥赴北平盘桓一周，才首次与宾虹老人正式见面，谈画说艺。

那次画展后，傅雷为黄宾虹所做的一切，颇有几分西方艺术赞助人对伟大画家那种倾其所有的劲头。黄苗子曾回忆当时的傅雷，“为宾老极力推售作品，或替他向画店寄购，或筹各国内外展览，或向中外爱画友人推荐，或自己购藏等等，所得‘润笔’，多至数十万元，少的数千元，傅雷都详列清单，逐笔汇到宾老手上……”1960年后，黄宾虹已去世好几年，傅雷给黄苗子去信商量他遗著的整理。那时候傅雷和黄苗子都刚摘掉“右派”帽子，傅雷却不管不顾，建议黄苗子在北京向美术家协会提出举办黄宾虹遗作展，还介绍他去找陈叔通。黄苗子说当时他“右派”帽子虽然摘了，却也自卑心重，不愿见人，这件事就耽搁了。

这样为一腔热情而不顾一切的情形，傅雷身上常有发生。只是并非总能得到像宾虹老人这样的知音唱和。

40年代，傅雷和作家柯灵要好，有时以笔名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1943～1944年，傅雷有两篇文章在文艺圈里激起了一番热闹。先是他在10月号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读剧随感》，其中最后一节评到张恨水，却没有追随那些进步文艺人士去一味贬低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他说：“张恨水的小说我看得并不多。有许多也许是非常无聊的。但读了《金粉世家》之后，使我对他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崇敬，甚至觉得还不是有些新文艺作家所能企及于万一的。在这部刻画大家庭崩溃没落的小说中，他已经跳出了鸳鸯蝴蝶派传统的圈子，进而深入到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但傅雷也很不客气地说，张恨水的成功只是到此为止，“他对生活的看法，到底，不免鸳鸯蝴蝶气啊！”鸳鸯蝴蝶的特点就是“小市民性”。傅雷以曹雪芹为比照，“曹雪芹在文学上的成就，就大多了。那就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哲学——不管这哲学是多么无力，多么消极，他能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去分析笔下的那些人”。在那个年代，能够用哲学的体系来看待写作优劣，傅雷已属凤毛麟角。

1944年4月发在《万象》上的那篇相当著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又是近万字的长文。他称赞《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圆满的作品，对《倾城之恋》《连环套》却多有批评，甚至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张爱玲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对这批评不以为然，回应“《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然而结果就如傅雷所预言，两个月后，《连环套》在《万象》上的连载就被腰斩了。

因了傅雷的艺术修养，他在文字感受上又有多数人不及的古典和优雅。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七巧和小叔子季泽的一段千回百转，是季泽站在她面前，诉他藏了十年的爱，“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对此傅雷有一段精彩不逊于原文的评价：“‘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伦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都沉浸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只透入我们的内心。”

宋以朗说，“迅雨”到底是谁？当时引起热烈的讨论。据他说，张爱玲最初也不知道是谁，还是南下香港后，才从他父亲宋淇那里听说了。作为两个当事

人的好友，宋淇的描述是有意思的：“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摇动她对自己的估价。……傅雷中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张爱玲作品的爱之深和责之切。”

197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看》收入了《连环套》。张爱玲在自序里写了一段简短的话，里面说：“……那两篇小说（指《连环套》《创世纪》）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坏。”

宋以朗说，到最后承认“确实写得坏”，表明她赞同傅雷的意见。

去留之间的命运

从巴黎回国的几个月后，1932年1月，傅雷和表妹朱梅馥结婚成家。他们此后在上海生活三十四年，搬过三处地方，不过距离都极近，生活基本是安稳的。

最早是住在吕班路201弄53号，傅雷1934年给罗曼·罗兰写信那会儿，落的就是这个地址。他们在这里有了傅聪和傅敏。1938年搬到同一条马路上的巴黎新村4号，住到1947年才离开。傅家的最后一个住处是江苏路284弄安定坊，风风雨雨18年，直到他们夫妇相伴弃世。

“1947年，傅雷搬到了我们家隔壁，傅、宋两家成为邻居。根据资料，安定坊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建筑面积1476平方米，共有15栋18单元独立洋楼建筑，每栋独立房屋两层楼高，内有几个单元，当时全部都是宋家的物业。”香港作家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一书的《傅雷》文中写道。

宋以朗的父亲是宋淇（1919～1996），民国时期即活跃于上海的文艺评论和翻译群体，和钱锺书、傅雷等人都有深交。1949年他从上海移居香港，后来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后，亦立嘱将自己的遗物（包括遗稿）交给他和夫人邝文美保管。这些事在华人文坛很有名，所以世人都知宋淇和张爱玲为至交，却不太了解，他也是傅雷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相处如同家人。在《傅雷书简》里，收入12封写给宋淇的信，或论翻译，或谈生活日常，只是那时候傅雷在信中称呼的还是宋淇的三个旧名：宋悌芬、宋奇或笔名林以亮。

1943年冬到1946年春，还是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傅雷、宋淇与十来个朋友发起过两周一次的茶会。

据傅敏的回忆文章，茶会每次请一位来客为大家讲座，有时文艺，有时科技，也谈论时局。当时傅雷讲过法国文学，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淇则讲到更为奇怪的题目，关于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还有一位常客是导演陈西禾。这样的文艺沙龙，应该也让傅雷想起年轻时候在巴黎，和刘抗、刘海粟他们的恣意长谈，“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结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茶会在杨绛的《忆傅雷》里，大概就是她所说的不能忘的夜谈。“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傅雷搬到安定坊后，这个茶会就歇了，散了。一位自上海跟随到香港的宋家人曾向宋以朗讲过安定坊当时的大貌：1、3、5、7栋毗邻一起，除了7号住的是个商人，其他三家都是文化人：1号住着从德国回来的萧乃震和夫人成家、女儿萧芳芳，3号是傅雷一家，5号是宋淇一家。上海文化圈总千丝万缕地牵连着，成家和在嫁给萧乃震前，曾是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在上海艺专时期也做过傅雷的学生，而傅雷和刘海粟则是巴黎留学时期的密友。萧家的女儿萧芳芳，在香港后来成了著名的影视明星，《傅雷书简》中还有50年代傅雷写给她的一封信。安定坊这四家人，1949年后陆续离散，最后只有傅雷一家留在了大陆。

宋家在1949年5月搬到了香港。傅雷其实离开上海更早。1948年他变卖了老家的一些田地，又将上海的房产抵押，携全家去昆明，住了七八个月旅馆。去昆明的原因，傅雷后来在1957年前后的交代书中写道：“适友人宋奇（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旧游之地，指的是傅雷曾在抗战期间受邀去昆明，短暂参与国立艺专办学的那段经历。但他和昆明好像缺些缘分，这次大概仍然是事情没有进展，1949年6月，傅雷夫妇带着小儿子傅敏飞去香港，而傅聪坚持独自留在昆明入读云南大学外文系。

他们一家三口到香港后住在堡垒山，即现在的炮台山。虽然朋友们都劝傅雷留下，但半年多后，傅雷

还是决定回大陆。他们一家从香港搭船到天津，陆路转去北京，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锺书夫妇等老友见了面。杨绛在80年代初《忆傅雷》一文中写过经过：“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从杨绛的记述看，傅雷从香港到北京，大概也是想从老友处了解一点新政权下的情形，决定何去何从。如果当时他们一家留在北京，命运会不会有另外的方向？以傅雷的刚直性情，恐怕也无分别。

回到上海后，傅雷一家仍住回安定坊，只是从3号搬到了隔壁宋家的5号。这是一幢带花园的洋房，傅家借住一楼，宋淇的母亲和老太爷未离开上海，仍住二楼。50年代傅雷和宋淇通信，还经常转告他家长辈的情形。宋淇太太邝文美有个妹妹，去了美国，留下一台钢琴寄存在安定坊5号。据傅雷写给宋淇的信，这钢琴曾被傅聪初学时借用，是他最早用过的一架琴。傅雷曾连写两封信与宋淇商量，说傅聪学琴一事“已成骑虎”，买琴看来“在所难免”，而上海好琴日渐难寻，所以着急托他问问，邝家老太太是否有意愿将那架钢琴出让。大约是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傅雷在第二封信中告知，他请两家琴行估过价了，“一出500万，一出550万，当然以后价为标准”。

当时用的还是“旧人民币”，550万约合新币550元。宋以朗说，其实那时候大部分宋家人、邝家人已不在上海，只剩下他祖母和老太爷，即使傅雷让傅聪继续用这台钢琴也没有人会说话。“但傅雷坚持买下，提议的价钱也公平透明，可以看出傅雷这个人执着、做事无拖无欠的一面。”

傅雷回到上海后，仍旧闭门译书。他决定继续靠稿费养家，这样才是“清白”的生活。作家叶永烈告诉本刊，80年代他去上海作家协会查找傅雷人事档案，发现他虽然曾经有过“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这种头衔，却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根本没有他的档案。叶永烈后来在当地派出所查到一张傅雷填写的《闲散劳动力登记表》，上面几行简略的文字，写明他在1945年前做过的四次公职，比如1931～1933年在上海美专教书，1935年曾代前“古物保管会”往洛阳考察龙门石窟……前后加起来不足三年，“这是他唯一的档案”。

1949年后，上海文化人里面只有他和巴金没有领过工资，在家工作，自食其力，独自“隐遁于精神领域中”。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费维持。他家后来住了18年的江苏路安定坊，是上海比较高档的街区，1949年后也有不少名人住在附近。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娣曾跟叶永烈说，各家保姆常在一处买菜会聊些家常，傅雷家每天的菜金都是比较少一些，比其他几家都过得节俭。

正因为要靠稿费生活，最后5年，他80万字的译稿无法正常出版，眼睛又出了问题，傅雷才会忧心忡忡、内心苦闷，担心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傅敏转述，1961年9月，他父亲写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石西民的求助信，催人泪下：“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因念吾公历年关怀，爱护备至，故敢据实上达。私衷期望，无非能早日恢复目力，以后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据傅敏所知，后来石西民会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商量，每月汇给傅雷200元，作为预支稿费。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他的遗译《幻灭》和《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时，就不再有稿酬了。

“唯有以爱真理甚于爱友一语自谢耳”

傅雷的脾气刚直、急躁，甚而暴烈，这在他很多老友的回忆文章里都有提及，也包括傅聪和傅敏对父亲在家中的记忆。《傅雷家书》中收入的第二封信中有一段，傅雷说他“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傅敏在此句下面注写说，“父亲教子极严，有时近乎不近人情，母亲也因此往往精神上受折磨”。

傅雷也剖白过自己这种脾气的缘由：“……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得大生其气……我执着真理，却又时时抱怀疑态度，觉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高级更进步的真理。”

他经常和朋友争论艺术和社会问题。黄苗子生前回忆，抗战前就通过庞薰霖认识了傅雷，到1948~1949年，他和夫人郁风与傅雷来往较多，时有争论，背地里开玩笑地叫他“老顽固”。但有一次，



作家叶永烈

郁风公然当面说傅雷是“老顽固”，黄苗子正担心他要狂怒了，傅雷却坦然地回答：顽固至少是 classic 的，它比随波逐流好！黄苗子说：“郁风一直欣赏‘顽固至少是 classic 的’这句话，它是多么不平凡！”

傅雷性子急躁，但在做学问和一般生活小节上却又极严谨。傅聪前些年回忆他父亲：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他做人也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他会洋洋洒洒像写一本书一样的回一封信。密密麻麻四五页的长信则是常见。

1936年7月，傅雷和画家好友刘抗相约同上黄山。他先出发，到山下后边译书，边等朋友过来会合。在给刘抗的信中，傅雷细密地附写了一纸“旅行黄山须知”，要他随身携带查看。傅雷在须知上面谆谆列出

12条：哪趟火车最凉快，中途应住哪家旅店安全又价廉，行李在路途中如何处置才妥当，随身该买些什么物品和食物，穿多少衣服……无不悉心嘱咐。

抗战前夕，刘抗移居新加坡，世事更迭断了音讯。60年代初傅聪去新加坡演出，两家才又因此联系上。1961年7月19日，刘抗给25年未见的傅雷写来一封信，并将自己生平第一本画册《峇里行》寄赠给他。傅雷7月31日收到这封信后，激动不已，回信竟写了六个半小时，至精疲力竭。有意思的是，傅雷急性子不改，这样一封久别之信，未及诉得几句思念，他就直言起来，说对寄来的画册的编排和外观感到很不满意，在信中一口气挑出八个毛病。他告诉老友：“好在我老脾气你全知道，决不嗔怪我故意挑眼儿——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发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

也是在这封睽违25年、长达数千字的回信中，傅雷畅谈艺术，臧否国内画坛。1961年，他已经历了被划“右派”，译著不能出版，傅聪出走……处在极度压抑的阴霾之中。在他给刘抗回信的7月底，他头上仍然戴着“右派”帽子。但谈到艺术，傅雷几近枯萎的心就像被点燃了，和老友毫无保留地笔谈，让他整个人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那些文字，是他多年修养和沉淀的释放，也是那个虚假的时代一次最直言不讳的艺术评论：

“二十余年来我看画眼光大变，更不敢凭空胡说。……融合中西艺术观点往往会流于肤浅，cheap，生搬硬套；唯有真有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诗意，中国人的审美特征的人，再加上几十年的技术训练和思想酝酿，才谈得上融合‘中西’。否则仅仅是西洋人采用中国题材或加一些中国情调，而非真正中国人的创作；再不然只是一个毫无民族性的一般的洋画家（看不出他国籍，也看不出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吴昌硕全靠金石学的功夫，把古篆籀的笔法移到画上来，所以有古拙与素朴之美，但其流弊是干枯。白石老人则是全靠天赋的色彩感与对事物的新鲜感，线条的变化并不多，但比吴昌硕多一种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至于从未下过真功夫而但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直是自欺欺人，如大师（指刘海粟）即是。还有同样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的。如徐××。最可笑的，此辈不论国内国外，都有市场，欺世盗名红极一时，但亦只能欺文化艺术水平不高之群众而已，数十年后，至多半世纪后，必有定论。”

傅雷以石涛为600年来天才最高的画家，“其实

宋元功力极深，不从古典中‘泡’过来的人空言创新，徒见其不知天高地厚而已”。

对于谈笑有鸿儒的张大千，傅雷并无好评，指他造假石涛是第一流高手，自己创作却只能是从陈白阳、徐青藤、八大那里搬些花卉来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

情谊和学问，在傅雷那里从来楚河汉界。他在法国游学四年，深受卢梭、伏尔泰、罗曼·罗兰等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人对事的评判标准只遵从正义和真理、真和美，并不太顾忌是否合乎时宜。

在给刘抗的信中，他对刘海粟的艺术及两人的友谊有一段最坦诚的评价：“国内洋画自你去国后无新人。老辈中大师（大师是傅和老朋友之间对刘海粟一贯的称谓，并非评价）依然如此自满，他这人在二十几岁时就流产了。以后只是偶尔凭着本能有几幅成功的作品。解放以来的三五幅好画，用国际水平衡量，只能说平平稳稳无毛病而已。如抗战期间在南洋所画斗鸡一类的东西，久成绝响。没有艺术良心，决不会刻借钻研，怎能进步呢？浮夸自大不是只会‘故步自封’吗？近年来陆续看了他收藏的国画，中下之品也捧做妙品；可见他对国画的眼光太差。我总觉得他一辈子未懂得（真正懂得）线条之美。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方面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你想他自高自大到多么可怕的地步。（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所以我只是感激他对我友谊之厚，同时仍不能不一五一十、就事论事批评他的作品。）”

傅聪曾说，他的父亲虽然咄咄逼人，但性格里头有一种 Charisma，也就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做学问和做人的赤子之心。郑振铎却曾叹说，傅雷有一天可真要为这“赤子之心”而受难。

1954年，傅雷就因此惹过一回麻烦。那年8月将举行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傅雷被邀请参加，但没有去，5月写了一篇长1.5万余字的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寄给楼适夷提交筹备会议。可以想见，意见书在会上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杨绛在《忆傅雷》一文中曾提到了当时的场面：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

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钱锺书为此事去信上海责备傅雷，傅雷生了钱锺书的气，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恢复书信往来。

几年后，这种执着的“赤子之心”给他和家人带去了更可怕的连累。1955年，上海政协吸收傅雷当了政协委员。“我父亲是这么一个人，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常认真。当了政协委员，从1954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写的总结、意见书达18万字，涉及的到文学、音乐、美术、国画、儿童读物、出版事业、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等极其广泛的领域；为写这些东西，还做很多调查。”傅敏说，那个时候他上中学，天天看到父亲怎么找人谈话，而大多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工程师、教授、医生、律师，当然还有作家。另外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5分钟或10分钟，傅雷就在家给太太朱梅馥念稿子，让他掐时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写发言稿也是极端认真，往往有一稿、二稿甚至三稿，跟搞翻译一样的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父亲把李莘请来，就是李德伦的妹妹，来纠正发音，因为父亲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讲的普通话南腔北调的影响效果。可是恰恰这么一个满腔热情、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在为政府为党工作的人，最

后却打成‘右派’，谁能想得通呢？”傅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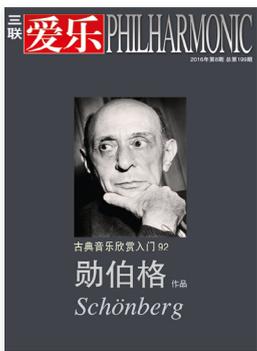
1958年4月，经过上海作协的十次批评大会后，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到了1961年10月，他的“右派”帽子总算摘掉了。亲友纷纷来道贺，他却面无表情：“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在傅雷身上，愈到后期，愈矛盾地融合着西方知识分子和东方儒士品格。傅聪1992年在香港接受学者金圣华的访谈时，就说，他父亲还有另外一面。“他一方面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希腊精神，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

〔主要参考书目：《傅雷家书》（1981，三联书店）、《傅译传记五种》（1983，三联书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1998，三联书店彩色插图版）、《傅雷谈艺录》（2010，三联书店）、《傅雷书信选》（2010，三联书店）、《傅雷与他的世界》（金圣华编，1996，三联书店）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宋以朗著/陈晓勤整理，2015，花城出版社）、《傅雷与傅聪》（叶永烈著，1995，作家出版社）、《永远的傅雷精神》（傅敏著，2016年4月15日修补与增订）。实习记者王琪对本文也有贡献]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八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2

- 走向无调性——格奥尔格诗歌影响下的勋伯格创作
- 张路瑶、白住欢、李方颖对勋伯格的《升华之夜》、《月迷彼埃罗》和《华沙幸存者》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潘德雷茨基《波兰安魂曲》的首演

逝者 女高音歌唱家阿德琳娜·帕蒂

话题 名家谈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

漫谈：选择聆听属于自己的音乐与演奏

爱乐笔记 早安 阿格里奇

米住的故事

现代音乐 约翰·凯奇的“数字音乐”

作曲家档案 “冰岛的西贝柳斯”约翰·莱夫斯

演奏家档案 古尔德关于贝多芬的自问自答

唱片说明书 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勃兰登堡协奏曲》

作品 莫扎特《交响协奏曲》作品与版本比较

听片购片与收藏 兰多美斯卡与霍尔邵夫斯基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

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傅雷与傅敏在寓所小花园（1961年冬）

作为父亲的傅雷：家与国之爱

文 / 蒲实

那一代人的情感处理方式，有太多时代印记。傅雷一家，尤其如此。

严父：沉重与细腻

重读作为父亲的傅雷，少了些年少浅阅时对他渊博学识和精神境界的仰望，多了些同样为人父母对待生活日常的平视——如今，我们对亲子关系的理念已与从前迥异。傅雷脾气的暴躁和刚烈人所共知，放在

父权色彩依旧浓厚的传统中国家庭关系里，有时难免让人沉重。

20世纪40年代初，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在上海初识傅雷，很快成为他家常客。傅聪和傅敏那时尚幼小，大孩子傅聪刚及学龄。楼适夷对傅雷管束孩子的方法“很不以为然”：“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同桌进餐，他就注

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警告，傅雷就罚他只吃白饭；学语文，只准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小学生中已经流行起来的自来水金笔。楼适夷回忆，有一次带傅聪到豫园玩，给他买了支儿童金笔，结果一回家就被父亲没收，说小孩不该用那样的好笔，傅聪伤心哭了一场。楼适夷的暗自嘀咕是，对幼童教育主张因势利导，而傅雷严厉施教，有些“残酷”。

他的观察有很多佐证。抗战末期，钱锺书和杨绛与傅雷和朱梅馥夫妇相识，两家住得很近，晚饭后常去傅雷家“朴素幽雅客厅里”夜谈，是沦陷的上海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岁月里，最能打破沉闷苦恼的聚会。在《忆傅雷》一文里，杨绛回忆起他是“含笑的”——“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只是那笑脸只许朋友看，绝不许孩子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他们的僵硬冲突的父子关系，客人们经常会觉得尴尬，但好像对傅雷来说也是习以为常，倒是太太朱梅馥连声抱歉。杨绛打趣：“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锺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

1947年，傅雷搬到上海长宁区江苏路安定坊宋淇家隔壁，宋、傅两家成为邻居和要好的朋友。据宋淇之子宋以朗回忆，他姐姐即出生于此。姐姐的女佣陆春莉曾向宋以朗回忆，傅雷以往住她隔壁时，“会听见他大喊大叫，有时还扔东西，或打自己的两个小孩。佣人们私底下用上海话称傅雷是‘神经病’”。“反右”时，傅雷曾撰《自述》长文，陈述过自己暴脾气的童年渊源：“4岁丧父，父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入狱三月，出狱后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年仅24岁。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亲出外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24岁），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愤，以泪洗面；对我又督教极严，16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一次，傅雷在外玩耍时间过长，母亲就威胁把他扔进河里；成绩不佳，母亲曾滴热蜡烫他肚皮。幼年丧父，且在强势母亲的管教下成长，埋下了一些傅雷的性格悲剧，包括爱情的几次不伦和经常在家里慷慨地谈论“死谏”——他对这种中国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触，有着古代的烈士精神。

傅雷与两个幼年儿子的关系，少见亲和，充满紧张与冲突。1979年，离开祖国多年的傅聪首次回国，与杨绛话往事，仍记得“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他小时候练琴，边弹奏边偷看《水浒传》，父亲在三楼从琴声察觉出异样，下楼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5岁时，他在客厅写字，父亲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就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鼻梁，顿时血流如注”。傅敏虽对父亲为他讲解古典名著与英文原著时层层剥丝的启发式教育很受用，但也记得对那些一个个抛出的问题，“一旦接不上，父亲就会怒斥‘滚出去’，过会儿再唤进屋”。1948年客居昆明，傅聪与父亲的冲突更是频发，以致傅雷去香港时，只带走傅敏，将傅聪托付给朋友照管。这才有了1951年夏天，傅聪通过在教堂举办演奏会募钱，自己回上海的流浪历险记。直至1954年傅聪去北京准备前往波兰留学，傅雷在信中忏悔似的写道：“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傅雷这里指的是1953年父子之间的一次剧烈争执：傅聪认为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曲》要比父亲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重要，傅雷勃然大怒，斥其狂妄；傅聪遂离家出走，住进小提琴家毛楚恩家中。一个月后，傅雷因岳父去世，感喟人生无常，才接回傅聪。傅聪与父亲性格的相似，也可见一斑。

然而，若细读《傅雷家书》，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流逝，就慢慢沉淀出严父的反思和温情；严苛之中，傅雷是极为细腻的。家书里对一些极小的细节颇费周章的“絮叨”，浸透纸背的都是用心：他叮嘱傅聪“信封上的字别太大，把整个封面都占满了”；进别人家里，“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里，不穿大衣时，也要除去围巾；手插在上衣袋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切忌切忌”；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写和讲英文时不要毫无变化地说“多妙”“多了不起”，而可选用“宏伟、堂皇、神奇、神圣、超凡、高尚、圣洁、卓越、精妙”等字眼，“避免冗赘的字眼及词句，让表达方式更多姿多彩”；对傅聪的感情问题和婚后的家政料理，更是很多次千叮万嘱。1961年，傅聪在来信中屡屡提及对艺术中的希腊精神感兴趣，傅雷特意手抄他已翻译完却不知何时出版的一章约5万字给傅聪。那是傅雷在国内政治环境中非常艰难和苦闷的一段时期，身体状况已每况愈下，一写字就眼花流泪、腰酸背痛；他在信中很少言及苦衷，更



(王文澜 摄)

傅聪 (摄于 1995 年)

多的是不厌其烦地与儿子讨论艺术的微观，并多次叮嘱他“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行动慎重”——政治时局阴霾遮蔽整个天空，傅雷看到了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自觉孤弱、不善圆转周旋，精神上的幻灭正日益加重；傅聪在国外多年，谨守父亲教诲，身体力行。

宋以朗在整理给父亲宋淇的家信时，发现傅雷为傅聪借用钢琴，给宋家至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日期是10月29日，没有年份，其中写道：“阿聪借用邝家的琴，早晚必要敲得不成样子，在我们也不能交代。而他学琴已成骑虎，看来买琴一事，在所难免。你能否代问邝老太太，有意将该琴出让否？若然，我可请人估价，再函征同意。倘邝府仍欲保留，则我们则需及早托人物色。目前留沪洋人，十九已经走掉，卖出来的琴也没有了；而文工团等等又从内地到沪大批采购；再等下去，恐怕就要买不到琴，或能买到而只是七拼八凑的再造三造的砌码货。梅馥为此着急，屡次催我写信问你，我因忙于工作，搁到现在。希望你早日给我回音。”……多年后，宋以朗感慨：而在那样的环境下，支持儿子的音乐追求，绝非易事。

贤妻慈母：家庭的维系

傅雷一家所有的亲朋好友，对傅雷太太朱梅馥的回忆都是美好的。杨绛在写傅雷发现孩子听大人谈话，要追出去训斥时，特别写到朱梅馥在傅雷前赶了上去，“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傅雷的书斋被朋友称道，除了各种工具书和大字典伸手可及，还有一个温馨的细节：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朱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朱梅馥的。傅雷称呼朱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他说，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连杨绛都感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朱梅馥是傅雷的福气，也是他的运气。为傅雷的暴躁脾气，朱梅馥曾多次落泪，在给傅聪的家书中写道：“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难免。”却更多不是埋怨，而是怜傅雷、为他担忧。刘海粟这

样回忆她的好脾气：“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惊人的温柔，成天忙于烧饭、洗衣、带孩子；还替他查字典、翻书、抄稿、写信，忍受着他有时极不近情理又没有来由的愠怒。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

在一个现代女性看来，朱梅馥的隐忍和顾全大局几乎到了不可能实现的程度。傅雷是在赴法留学前，在母亲要求下与14岁的表妹朱梅馥订婚的。到法国后，他却爱上了法国女子玛德琳，写信给母亲要求辞婚，托刘海粟寄回国内。不久，傅雷发现玛德琳与多人保持恋爱关系，愤而分手，差点自杀。幸亏刘海粟私自把那封信压了下来，傅雷才在回上海后与朱梅馥完婚。傅雷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浪漫的人，也会滋生一些浪荡的情感。1936年冬，傅雷到洛阳做了一段时间“中央古物保管专门委员会洛阳办事处主任”，其间结识了一位豫剧女演员，结下一段情缘。他作了一首诗：“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灵光。柔和的气氛，罩住了离人——游魂。”

1939年，傅雷又结识了成家（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美丽的妹妹成家榴，陷入到对她的热恋中。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成家与萧乃震的女儿萧芳芳后来成了香港影星，她在60多岁时向外界回忆起成家榴，说道：“我阿姨过世多年。她年轻时长得好美，到老都很美。听我母亲说，那时候，傅伯伯非要阿姨坐在他的身旁，他才能安心翻译。如果没有她，他就关在书房大发脾气。傅妈妈在外怎样劝他都不行。他甚至宣称，要用钢笔戳自己的喉咙，把傅妈妈吓得不轻。为这事，我舅舅还找他理论过。阿姨活着时，不好意思说上一代人的感情。但每次谈到傅伯伯，她的表情就很甜蜜，脸上挂满阳光，手捂在心口，一副陶醉的模样。傅聪来香港演出，与我阿姨也特别亲昵。我想他很爱这位长辈，大概也是因为她是他父亲爱过的人吧。”

张爱玲还将傅雷的这一段婚外情，依据成家榴对她的诉说，写进了1944年的小说《殷宝滢送花楼会》。1982年12月，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写道：“《殷宝滢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个空军，很快



朱梅馥与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4年1月）

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成家榴说是因为朱梅馥太善良，自己只好退出。）在小说中，傅雷成了“古怪、贫穷、神经质”的罗潜之，而成家榴是“殷宝滢”。张爱玲借殷宝滢之口骂傅雷：“他那样的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对这件事，傅敏形容母亲的爱“包容浩荡”；她不仅打电话叫成家榴来家里，以给傅雷灵感，还对丈夫给她写情书克制隐忍。据说这些信成家榴珍藏至死；她向傅聪坦言：“你父亲是爱我的，可你妈妈人太好了，我不得不离开。”朱梅馥不单单是温柔的妻子、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她还有菩萨心肠”。

但朱梅馥的隐忍，绝非旧时代女性的愚忠。多年后，当傅聪面对爱情与婚姻问题时，她才在信中对儿子述说道：“那时你5岁，弟弟2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

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她对儿子的婚姻幸福，和她从未谋过面的儿媳弥拉的快乐，充满关切，屡屡嘱托傅聪不要和他爸爸一样主观固执，而要顾及弥拉“活跃的青春之梦”。她因此写道：“我是绝对同情弥拉的，决不愿意身受折磨会在下一代的儿女身上重现。……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但她告诉儿子傅聪：“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傅聪结婚后，她几乎每封信都要提醒傅聪不可伤害弥拉，“弥拉太了解你了，她多么温柔可爱，千万不可伤害她，千万不可把你爸爸对妈妈的折磨加在弥拉身上”。她的宽容，让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也为之动容。

某种意义上，朱梅馥才是这个家得以为家的维系力量。给第一位儿媳弥拉的信中，傅雷写道：“你妈妈是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女性。她温柔婉约，对聪的为人影响很大。多年来要不是经常有妈妈在当中任劳任怨，小心翼翼，耐心调停，我与聪可能不会像今日一般和睦相处，因为我们两人都脾气暴躁，尤其对小事情更没有耐性。”傅敏、傅聪小时候，朱梅馥为他们挡住父亲疾风骤雨似的训斥和体罚；当傅雷渐渐年迈，她又成了在儿子面前护卫父亲尊严的人。1961年，国内的经济状况极为艰难；但傅雷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向儿子开口求助。朱梅馥在家信中近乎严厉地向傅聪指出傅雷营养的缺乏和身体状况的恶化：“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爸爸这几年来的心情？他不愿，我也不愿与你提及，怕影响你的情绪。我实在看下去，便在信末向你表示……你来信只字不提。……他不但为了自尊心有疙瘩，还老是担心增加你的支出，每次嘱咐寄食物，心里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股脑儿都会冒出来……牛油是你在家从小见惯惯之物，也不是什么奢侈品，为什么去年11月我忽然要你千里迢迢地寄来呢？你就是没有用过脑子想一想，

分析一下。”

傅聪自幼在朱梅馥身边长大，对她最亲、最理解。自傅聪1956、1957年回国后再度回到波兰，又前往英国，母子俩一别就是十几年，再未见面。1966年国内动荡的时候，傅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就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这是母子最后一次通话。那年4月，傅雷便“总感觉为日无多”，别说一家人相聚，就连写信读信的快慰，也不能能享多久。朱梅馥则总在梦中梦见儿子，“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奏鸣曲”。她说她开始享受睡觉的乐，因为每夜入睡前，都能有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团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深知傅雷的性格，那时，她已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7月起，她开始不停数着孙子凌霄生日的到来，“一个月后凌霄就过生日了”“三星期后凌霄就过生日了”“现在只剩下三天了”。她给从未见过面的孙子编织了毛衣，想象着有一天能亲眼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怀里……但傅雷对这一点，已一点不抱希望。

8月27日，傅雷和几位朋友简单在家吃了晚饭。他说，这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人格再受侮辱了，“要带着梅馥一起走”。朋友们力劝，如果要走，能不能将梅馥留下？傅雷说，他不能让她一人活下去受苦。朱梅馥深知，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可挽回了。

兄弟俩：才华与命运

傅雷两个儿子，哥哥傅聪与弟弟傅敏的关系，常让人想起讲述天才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与她姐姐故事的电影《她比烟花寂寞》：姐妹俩从小都学习乐器，姐姐一直学得更好；妹妹在一次演出中脱颖而出，父母便把接受最好音乐教育的有限资源都给了妹妹；姐姐最终只在乐队里做了一个普通的笛手，过着平凡却踏实的幸福生活；妹妹在掌声与光环笼罩的舞台生活之外，反而愈加孤独。俩人相互嫉妒竞争，又相互亲近眷顾。

傅雷曾回忆，傅聪3岁至4岁之间时，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傅雷决定让傅聪学一门乐器，无论将来从事什么，“能有一艺术园地耕种，一辈子受用不尽”。于是，傅聪7岁半开始学钢琴，启蒙老师是数学家雷垣。傅聪9岁时，

傅雷的好友、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将他介绍给前上海交响乐队创办人、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至他去世后，傅聪又换了几个教师，但都没遇到合适的，傅雷便要他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高中。那时傅聪极为叛逆，不愿练琴，愤懑反抗父亲，“甚至于要出人命”。

直到傅聪17岁，傅雷才肯定他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1952年底至1953年1月，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25周年，傅聪首次登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不久，傅聪被选拔去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赛”。联欢赛结束后，他作为中国艺术代表团成员去东欧访问演出，不久受到波兰政府邀请，留学波兰，并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傅聪出国前，一家人去火车站月台送，傅敏哭得很伤心。哥儿俩的感情一直很好，现在他少了一个玩伴，觉得很伤心。年少的他还并未意识到，兄弟俩的命运轨道也就此分道扬镳。在那之前不久，傅敏刚在父亲的劝阻下，放弃了继续学习小提琴的想法。从香港回来后，傅敏在宋淇家的宅邸偶然发现了以前一位犹太租客遗留下的一把小提琴。宋母将琴转送给他，他也去请雷垣教琴，还向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求教，又跟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苦学两三年。然而，听到他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傅雷断然摇头：“不行！”傅敏只得直升普通高中。傅聪曾来信鼓励傅敏走音乐之路，傅雷则回复说“问题不简单”：“第一，在家不能单学小提琴，他的语文根底太差。我自己太忙，不能兼顾；第二，他至此为止在提琴方面的表现只能说中等，在家专学二三年后是否有发展可能毫无把握；第三，敏的看谱能力不强，夜长梦多，对钢琴，更渺茫；第四，截至目前为止，敏根底最好的还是自然科学与教学，至少这是在学校里有系统的训练的。倘等高中毕业以后再酌量情形决定，则进退自如。倘目前即辍学，假如过了两年，提琴无甚希望，再要回头重读正规学校，困难就多了。”再考虑到傅聪的时代还能请到好老师补英语、中文，傅敏的资质、环境都不如他了，对傅聪的教育方式，已没办法在傅敏身上复制。多年后，傅敏回忆起父亲对兄弟俩的教育说：“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对傅聪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个学那个，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学校的教育。在我中学毕业之后，

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傅敏谨遵父训，一辈子在英语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从未动摇。1979年，他在英国整理父亲写给哥哥的家书时，发现有为数不多的信里提到自己：“初期因他天资差，开窍迟，我自己脾气又不好；后期完全放任，听任学校单独负责；他入大学后我也没写长信（除了一次以外）与他。像五四至五七、五九至现在我写给你的那样的信，一封也不曾给敏写过。无论在学业方面，做人方面，我都未尽教导之责。当然他十年来思想演变与你大异，使我没法开口；但总觉得对你给的很多，对他给的太少，良心上对不起他。”傅敏对此从未有怨言，只说“我还是开悟太晚”，遗憾父母在世时，与他们少有深入的交谈。在波兰，傅聪先得到克拉科夫音乐学院创始人杰维茨基的指导，于1955年2月参加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场外，傅雷密切关注名单上每个选手。他对傅聪的获胜本无把握：“除非洲来的以外，没有一人的学历像你这样可怜的——换句话说，跟到名师只有六七个月的竞选人，你是独一无二的例外。”傅雷非常关注傅聪的一举一动、起居练琴，与他讨论每一位古典音乐家的作品和钢琴家的演奏技巧，且频频敦促傅聪家书报告情况。傅聪在波兰的迅速进步，不仅出乎傅雷的意料，而且也让他大为振奋和鼓舞：“从你小时候起，我都怕好话把你宠坏了。现在你到了这地步，样样自己都把握得住，我不再顾忌，要跟你说：我真高兴，真骄傲！”1949年傅雷前往香港时，还因与傅聪不断的争吵，将他独自留在云南，父子关系尚还紧张；自傅聪前往波兰，傅雷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修复父子关系。傅聪在波兰获奖时，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盛赞：“东方升起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我做父亲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错误用你的才具与苦功给点破了！”他很多次用近乎焦急的口吻，敦促傅聪写信：“难道两个多月不写家信这件事，对你不是一样精神负担吗？”“我们历来问你讨家信，就像讨情一般。”傅聪考虑转往苏联学习，但并未和傅雷谈过，而是直接托马思聪向中央提出，傅雷备感受伤：“信中表现我的态度，难道还使你不敢相信，什么事都可以和我细谈、细商吗？你对我一字不提……老实说，我是很有自卑感的，这反映你对我还是不放心。大概我对你从小的不得当、不合理的教育，后果还没有完全消失。”

傅雷是以他的价值观，去看待傅聪在国际古典音

乐舞台取得的成就的，他赴法留学之前依然尚存、归国后在政治动荡中渐渐无所依的家国情怀，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提醒傅聪：“你不是抱着一腔热情，想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吗？……你的将来，不光是一个演奏家，同时必须兼做教育家；所以你的思想，你的理智，需要长时期的训练。我这个可怜的父亲，就在处处替你在这方面准备，而且与其说是为你做准备，还不如说为中国音乐界做准备更贴切……这才是真正的道德实践。”这也是傅雷家书在一段时期里的主要目的：抛砖引玉，训练傅聪，激发他的音乐感想，再将新鲜养料间接传播给中国青年，报效国家。字里行间的傅雷，在这个时期是昂然的、理想主义的，爱国之志多了施展的可能。

1957年9月，傅聪应召回国，在京参加整风运动。因为父亲“身份特殊”，他被限制在沙滩红楼文化部招待所内“集中学习”，被命令与亲人划清界限、勇于揭发、虚心接受小组成员的“批评帮助”。在北京时，他住在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家，楼适夷代他父母前来探望，他高谈苏联、波兰问题，这些闲谈都传到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那里。临回波兰之前，傅聪见傅敏，饭桌上，向傅敏透露，中央要他抱着超过世界水平的雄心，多接触群众，“将来至少要去劳动5年”，傅聪被这个吓坏了。他回波兰后不久，母亲就来信告知，作协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父亲做了三次检讨，一切工作停止，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痛苦中。这一年11月，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的心情非常坏……国内的生活和国外的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很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田地。……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1958年12月，傅聪在一位原英国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离开波兰，去了英国。他没想到会20年不回祖国，也没想到就此再也无法与父母相聚。

傅聪的出走，深刻影响了父亲傅雷的政治命运，他一直受到批斗和各种形式的凌辱。傅聪到英国后，曾写回一封长信，半年后，傅雷夫妇才收到此信。他们将信交给朱人秀，由他请示党组织。获批后，1959年国庆，他们写信给日思夜想的儿子：“10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1964年，傅聪加入英

国国籍。宋以朗曾写道，傅雷与成家和的通信，从傅聪自英国回香港举办个人音乐会开始，成家和当时已经从上海移居香港。在当时情况下，傅聪到香港举办音乐会很容易被人利用，被英国、美国拿来作反共的教材，所以傅聪到香港办音乐会的时间很仓促，搭飞机来，不开记者招待会，一结束马上走。

1965年6月5日，傅雷写给成家和的第一封信，就说到自己对傅聪的忧虑，请成家和代为搜集报章报道，并让她回信告诉他音乐会的整个过程。在这封信中，傅雷也提到宋淇，因为他得知傅聪在香港曾和宋淇通过电话，但傅聪并没转告他谈话内容。傅雷在信中问成家和：“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话提到我们吗？因为宋氏兄弟已经5年多不与国内任何人通信。倘若与你谈及，请转告我们。这些事聪以后不会在信里报告的。”写于1965年6月13日的下一封信里，傅雷又向成家和追问：“聪可曾与你提起宋伯伯通话内容？他一回去不会再做报告的了，问他也没用。”6月17日，傅雷致信成家和，希望她能转寄信件给宋家。傅雷在信中写道：“宋氏一家对我们一向很好……他和国内已经多年不通信，他有他的理由，我约略猜得出来。可是上海的房子有不少问题要处理，我想写信由你转寄给他，不知是否方便？乞告知！不方便也就算了，勿勉强。”从《傅雷书简》可以看出，他在1965年突然写了很多信交代事情，比方说急着找宋淇处理宋家房子。到现在，约略能猜出傅雷当时的用意了。但这些辛酸，傅雷很少在家书中向傅敏、傅聪提及。家书里，他和傅聪谈的仍是艺术，是音乐和对巴尔扎克与《卓别林自传》的理解，关怀他的演出不要太过紧张，家庭要打理好财务；在给傅敏的信里，他谈的还是教育和做人。直到他们在自杀前写下遗书。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1956年7月，傅敏从上海高中毕业。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外国文学系，校方力劝他报考外交学院。1959年，由于政治氛围的变化，外交学院将傅敏作为“代培生”，送往北京外国语学院。傅敏知道，父亲划成“右派”，哥哥出走英国，他的外交家之梦已破碎——一家人的命运，在国家政治潮流中紧密相连，颠沛流离。1962年，他毕业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直到北京女一中老校长要了他。老校长是傅雷的老朋友，他专门为傅敏将四门俄语课改为英语课程，让他开英语试验班，渐渐的，傅敏在教学上有了名气，直到1966年9月3日，他顿时陷入父母亡故的悲恸，继而被政



傅敏

治推入命运的漩涡，痛不欲生，两次自杀未遂。

1979年，傅敏前往伦敦探望傅聪，兄弟二人终于团聚。1980年，他回国继续做一名中学教师直到退休，并开始整理编辑父亲的文章与书信。20世纪80年代，傅聪有一次回到北京，席间说起父母“走”时他没哭，他似乎有所预料。早在1961年，父亲就在书信里流露出幻灭感与去意：“主观上并无出世之意，事实上常常浮起虚无幻灭之感。个人对一切感觉都敏锐、强烈，而常常又自笑愚妄。不知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苦闷，还是我特殊的气质使然。……你的将来，你的发展，我永远看不见了，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那天晚上，电视里播放戏曲节目。傅聪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自己的爸爸，他坐在房间里，号啕大哭起来。☑

（张新燕摄）

翻译家傅雷：从罗曼·罗兰到巴尔扎克

记者 李翊



3

落在此帖，字字皆如女作，既池用，初可任擇性之所近
 之一種，日寫數行，不必描頭畫角，但求渾神氣，有那摩一點
 兒帖上的意思就好。臨帖不過是口一規模，非作古人奴隸。
 一種臨至半年八個月後，可再換一種。
 字字拙劣，寧厚毋薄，保持天真，不色，切忌持首
 弄姿，故意取媚。
 劃于豎直是畫基本原則。
 一九六一年四月 慈庵識



1. 傅雷译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初版本，封面由庞薰琹装帧设计（骆驼书店1946年版）

2. 《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1年版）

3. 傅雷致萧芳芳函墨迹（1961年4月）

4. 傅雷在法国（1930年）

他的译作是他灵魂的小影。灵魂的小影便是一种和谐。

书斋生活

自1933年从上海美专辞职后，足不出户、闭门译书是傅雷生活的常态。事实上，解放后，清华学校校长吴晗曾通过钱锺书夫妇邀请傅雷留下教授法语，傅雷推诿说自己只想教美术史拒绝了。他宁可靠自己翻译书的稿费生活，做一个独立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选择都很不寻常。这也使得解放后的上海文化界，傅雷成了仅有的两个不要国家养活的人之一，另一个人就是著名作家巴金。

杨绛在回忆傅雷的文章中说：“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

在书斋宽大的写字台上，烟灰缸总是放在右前方，两砚台则放在左前方，中间放着印着“疾风迅雷楼”字样的直行稿纸，左边是法文原著，右边是法汉辞典。他总是这样井然有序地在桌上“布阵”，长年累月地笔耕，困倦时在烟斗里装上板烟。

据在傅雷家工作多年的保姆周菊娣说：傅雷先生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坐到书桌前，晚上7点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

傅雷的一生为什么会走上翻译的道路？傅雷的挚友楼适夷在论及这一话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与傅雷同时代的人相比，多数人只把翻译看成是人生和学术生涯中的点点浪花，很少有人会以翻译为终身的依托，更不会以翻译作为生计的来源，而傅雷却选择了翻译，并为此掀起了滔滔的巨浪，犹如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篇“江声浩荡”，其

声势直到现在依然磅礴撼人。

傅雷最早从事翻译是刚到法国求学的时候，翻译的目的单单是为了学习外文。他翻译了梅里美和都德的几个短篇小说，没有想到去投稿，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翻译家。他有意识地从翻译活动始于1929年夏天第二次游历日内瓦湖期间。这次游览，他住在一个名叫圣扬乔尔夫的村庄。在到那里之前，他就看过与这一胜地有关的作品《圣扬乔尔夫的传说》，当时就认定这是“文学上绝对成功的作品”。傅雷在饱览这里的山水风光之余，译完了这篇作品，第二年刊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上，这是傅雷首次发表的译作。也许是因为傅雷的翻译是从日内瓦湖起步的缘故，在他一生的译作中都能感觉到水的存在，那么流畅、清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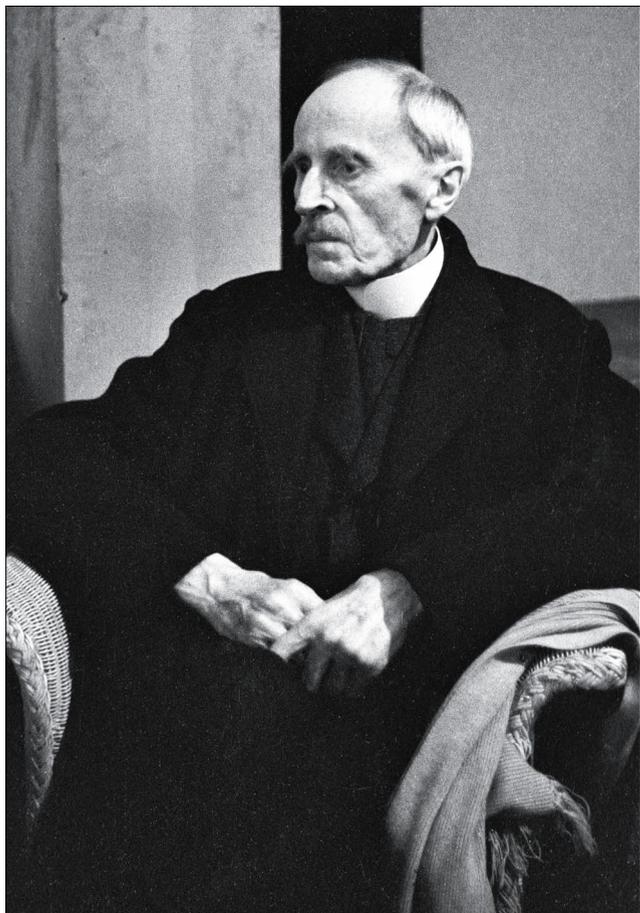
回到巴黎之后，傅雷立即投入到《艺术哲学》的试译工作。在《译者弁言》中，他解释了翻译这本书的原因：“人类文明的进程都是自外而内的，断没有外表的原因尚未明了而能直探事物之核心的事。中国的学术之所以落后，所以紊乱，也就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其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思想上的粮食和补品”。而这补品中最有力的一剂就是“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

然而，傅雷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一个思想家的清晰头脑。他信仰科学，但是也对把“科学”奉为神明抱有怀疑态度。因为把科学奉为神明的态度本身就不是科学的。这显示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翻译家所应该具备的素质：独立思考。翻译《艺术哲学》的时候，傅雷年仅21岁，那时的他已经站在一个很高的文化山峰从事西学的译介工作了。

前期：罗曼·罗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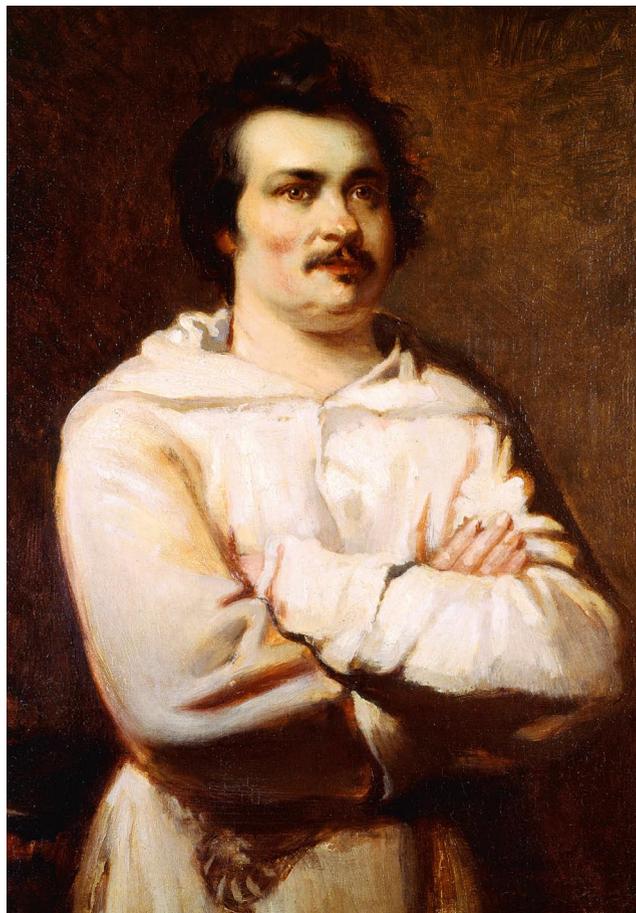
“傅雷的翻译生涯可以以1949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不同时期他的翻译选择体现出他不同的思想倾向。”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在接受采访时说，1949年以前，自认为气质相近的罗曼·罗兰是傅雷翻译的重点。

谢天振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傅译罗曼·罗兰“巨人三传”：《托尔斯泰传》（1934），《vv》（1935），《贝多芬传》（1946）。三本薄薄的小册子在我面前一字排开，封面色调简洁朴拙，竖排的繁体字印在发黄的纸页上，在一些精妙的字句旁有蓝色钢笔划过的标记线。“这不是我从旧书店收购的，是我岳父的藏书。他是



罗曼·罗兰

(视觉中国·供图)



巴尔扎克

(AFP·供图)

学中医的，并不是文学青年，却收藏了这些书，由此可见傅雷当年的译著影响之深远。”

傅雷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解释了翻译的缘由和目的。他谈到了幼年时候的苦闷，留法之后很快迷上了夏多布里昂、卢梭等法国浪漫派的作品，不知该如何度过短暂之人生，直到有一天偶然读到《贝多芬传》，才“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自此振奋。其后又拜读了《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由此他发愤翻译“巨人三传”，期望对苦恼中的青年朋友有所裨益。在写于1942年3月的《贝多芬传·译者序》中，傅雷写道：“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他还说，贝多芬给他的启示就是：“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

是我们的致命伤。”所以，“现在阴翳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傅雷翻译《托尔斯泰传》和《米开朗琪罗传》的动机跟翻译《贝多芬传》的动机如出一辙。谢天振说，从中可以看出，傅雷在翻译的选择上是本着儒家济世救国的传统信念而并非躲进书斋的逃避主义。他通过翻译这门利器，选择救国的方略就是贝多芬“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米开朗琪罗之“意志与才力”，以及托尔斯泰之“不抵抗主义”。

“这里容易遭到误解的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这其实延续了夏洛（傅雷1933年翻译的《夏洛外传》中的人物）的人生观与思想观。托尔斯泰笔下‘散发出青草和泥土的香味’的伊凡，和夏洛一样，都属于智力上的弱者形象，他们既是苦难的目击者，也是承受者。伊凡是俄罗斯大地的化身。大地上的一切都在生生灭灭，唯有大地不死。”谢天振说，傅雷也是

希望中国人都能成为“大地的化身”，那么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就得到永生。这里的“不抵抗主义”其实就是“大勇主义”的代名词。

1936至1941年，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至4卷，影响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小说主人公克利斯朵夫正是罗曼·罗兰塑造的“今日的贝多芬”。在译著的卷首部分，附有原著的序，借此可以揣摩出傅雷将这部“贝多芬式”的大型交响乐呈现给读者的意愿：“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不顾一切地去生活，去爱！”

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一年，抗日战争正式打响。长夜漫漫，傅雷思考的是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才能战胜自我，战胜敌人。他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汲取到了力量：“它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绩。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傅雷希望读者能在读了这本书后燃起希望，“在绝望中再生”。

《约翰·克利斯朵夫》2至4卷出版于1941年，这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抗战的相持阶段是最折磨人意志和神经的，没有了轰轰烈烈、呼风唤雨，比的就是精神上的韧劲，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傅雷以翻译这种特殊的形式，为在抗战中坚守住自己岗位的每一个同胞提供着“精神食粮”。尽管在抗战八年期间他只出版了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这已经足够了。

谢天振认为，解放前傅雷的翻译总是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他在为道德寻找“夏洛”，为个人吁求“幸福”，为民族谋求出路，为文明寻觅归属。

后期：巴尔扎克

1949年之后，傅雷几乎把翻译所有的目标都锁定在了巴尔扎克身上。尽管这一时期他也翻译出版了梅里美和伏尔泰的作品，但篇幅都不长。

试图转向的结果，是发现更加适合于翻译巴尔扎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个人是认为奥斯汀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以我们对Art的眼光来说，也不一定如何了不

起。”谈到莫泊桑时，他说：“最近看了莫泊桑两个长篇，觉得不对劲，而且也不合时代要求，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意儿，看来不但怪腻儿的，简直有些讨厌。”至于司汤达，他说：“我还是二十多年前念过几本，似乎没有多大的缘分。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提议要我译《红与黑》，一时不想接受。”就连曾经令他景仰万分、心潮澎湃、血脉偾张的罗曼·罗兰，他也厌倦了。所以，傅雷在1954年发愿：“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社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最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

1964年，完成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后，傅雷认为小说的翻译应该暂时告一段落，转译“客观史料”。他认为，巴尔扎克作品已经翻译了15种，“虽不能囊括作者全部精华，但比较适合我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对读者也已“足够”。

傅敏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傅雷晚年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他准备翻译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莫里哀的喜剧、高乃依的悲剧等。他是想把不同风格的法国作家的作品都搞个样品出来。同时，他已着手准备撰写研究巴尔扎克的论文以及写一部关于翻译理论与技巧的书。”傅雷还通过傅聪寄钱到法国去，委托Etiemble（法国名汉学家）去找书，为写研究巴尔扎克的论文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然而，正当怀着这个宏大的理想并开始付之实行的时候，傅雷却离开了人间。

以1949年为界，傅雷为什么会从以罗曼·罗兰为主的翻译转向到以巴尔扎克为主的翻译？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傅译研究专家金圣华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剖开巴尔扎克表面的浪漫不羁，正是文学巨人无比的意志、毅力、自律与执着；而透过傅雷表面的冷静含蓄，却满是艺术家的激情狂热。”金圣华说，因此傅雷的个性，正适合翻译巴尔扎克这位写实大师“气势磅礴，但又细致入微的作品”。

在对文学和人生的观念上，傅雷认为“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研究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而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之中，包括了2000多个人物，涉及整个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风俗史，可以说是巨细兼备的鸿篇巨制。这样的作品，“无论在规模体制或写作手法上，都恰好符合傅雷对文学的看法”和口味。

金圣华认为，傅雷与巴尔扎克，虽然思想、性情

相近，对文学的看法一致，令傅雷选择巴尔扎克为终身致力的对象，但在事实上傅雷是否适合翻译巴氏作品，除了“主观的喜好”外，还牵涉到许多“客观的条件”。

傅雷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一个适应的阶段，而测验“适应”的尺度，除了对原作的热爱之外，还得具备艺术的眼光，因为“没有相当的识见，很可能自以为适应，而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傅雷认为一个称职的文学翻译家，必须具备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人生经验必须丰富多彩，否则难以了解一部作品的精妙之处。

金圣华认为，傅雷的生平经历、才情、学养都证明了傅雷足以担当巴尔扎克的代言人。比如，巴尔扎克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上演的背景大多都是巴黎。巴尔扎克“对巴黎的描绘精致入微，无论是一个地区，一条街道，一幢建筑或一间房间，每每都长篇累牍，不厌其烦地细勾慢描，仿佛是一幅用力深厚的工笔画。这种功夫，若非对巴黎极有认识，对建筑艺术极有心得的译者，是绝对无法演绎出来的”。而傅雷正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在巴黎游学多年，对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他对建筑艺术也炉火纯青。所以在他翻译的巴氏的十五部作品中，虽然以巴黎为背景的作品就多达10部，其中罗列的大街小巷、豪宅陋室、历史古迹，不可胜数，但他一一译出，引领译文读者仿佛亲见。即便是巴黎以外的场景，也难不住他。因为他的足迹已经遍及了西欧，把一些著名的景致深埋于心，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才有成竹在胸之感。除了场景之外，巴尔扎克叙事中长篇累牍的章节、形形色色的专题，也没有难倒傅雷，因为傅雷兴趣广泛，在音乐、艺术、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素养深厚。

傅雷本人对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也很有信心：“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的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

但在谢天振看来，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很难说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傅敏就曾说过：“他翻巴尔扎克主要考虑到政治问题，当时国内的情况，翻译巴尔扎克最安全。如果不是在这情况之下，他不一定翻巴尔扎克，但是他翻了，也很喜欢。”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傅雷前期的翻译受到这方面的压力相对而言不太明显。原因之一可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战乱不断，毫无宁日，这注定了国民党政府并非是一个强势政权，从而无力在意识形态上保持高强度的控制。因此，这一阶段傅雷在翻译的选择方面弹性很大，基本上与时局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对人生和社会高度地介入和参与，翻译的作家也几乎是同时代的作家，如罗曼·罗兰、罗素等。解放之后，反映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中，俄苏文学的译介种数就大量增加，第三世界小国的译文也不断涌现。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文学翻译急剧下降，走入边缘的位置。同一时期，欧美小说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少数古典名家作品上，巴尔扎克是其中之一。”

谢天振说，从“诗学”的角度看，抗战期间是革命浪漫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能广受欢迎，因为在灰暗的日子里，这样的作品能让读者迸发出激情，燃起生命的希望。但是，解放之后，新生政权要求文艺为社会现实服务，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肯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自然受到追捧。这一时期，傅雷所写的译者序言中，出现了许多“典型环境”下的“典型形象”，出现了对所译作品的批判甚至否定性的文字。“实际上这也是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译者为了不与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诗学标准发生尖锐冲突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翻译策略。……在严峻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文学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译者总是根据所译作品的具体情况，灵活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使文学翻译合法化。”

从“赞助人”的角度看，傅雷前后期的翻译出现断层也是必然的。如果把“赞助人”理解成狭隘的“出版商”，解放前，傅雷的作品都是私人资本性质的出版商发行，这样，它们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阻力较小，因为资本有着追逐最大利润的倾向。但是，解放后，尤其是1953年公私合营后，此时的赞助商变成了只此一家的独家经营，所以此后，傅雷作品的出版完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实际上，这时候傅雷翻译的“赞助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恰恰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化身，二者彼此强化，成为一体，其后果必然是翻译行为的政治化，从而译者翻译选择的权利大受限制。

但即便是傅雷与“赞助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的时候，他的选择也是相当有限的。而一旦他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僵化，比如他戴上“右派”帽子的时候，他与“赞助人”的关系就相当微妙。傅雷晚年的译作多经周折，有的译作直到他死时都没能面世，原因就在于此。最为可怕的是傅雷一旦与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赞助人”交恶的时候，他的生计也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他是一个依靠翻译谋生的人，翻译作为独立思想的物质保障这一点在他的晚年尤其显示出重要性。在他的书稿待在出版社的角落毫无动静的时候，他的生计就受到实质性的威胁，从而成为他自杀身亡的一根导火线。

“我们也不能完全就此认定，傅雷后期的翻译完全处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他在解放前就开始了巴尔扎克的翻译，所以不妨认为他事实上在心灵中与巴氏已经交上了朋友。更有可能的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辛辣讽刺，对世态炎凉的入木三分的刻画，恰恰是具有怀疑主义精神的傅雷所需要的。”谢天振说，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由产生这样的联想：要是傅雷能继续享有生产知识的自由，他的成就会不会更大？

不重形似重神似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40岁到60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塾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谢天振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常常折服于傅雷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罗新璋曾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提出来的。围绕“案本”思想的是“文”与“质”的争论；到了“五四”以后，“文质之争”以“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形式出现。“求信”即清末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一度曾是普遍的公认的标准。“神似”和“化境”说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傅雷是“神似”的代言人，钱锺书是“化境”的倡导者。

傅雷最为人熟知的译论，即为“重神似不重形似”，这是他在1951年于《高老头》的重译本序言中提出的主张。其实，早在1934年编纂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第八讲“米开朗琪罗（下）”之中，已可见端倪。文中谈到米氏对美的观念与众不同，他“要抓住传统，撷取传统中最深奥的意义，把自己的内心生活去体验，再在雕塑上唱出他的《神曲》。……他从来不愿在他的艺术品中掺入些什么肖像的成分，他只要雕像中有伟人的气息”。要“气息”而不要肖像，可以说是“重神似不重形似”的最佳诠释了。

谢天振认为，在翻译美学思想上，傅雷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极大。他把翻译当成一门艺术，从使用“神似”的字眼来看，可以看出古代诗评家严沧浪、王渔洋等人的痕迹和顾恺之、苏东坡诗论画的影响。

“傅雷的艺术观与翻译观其实是前后连贯，一脉

相承的。”金圣华说，在《傅雷全集》第十八卷有一段傅雷谈艺术的文字，虽是谈艺术，却把翻译中的“神”与“形”，把重现原著神髓的活译与拘泥于字面意义的死译两者之间的区别，阐释得清清楚楚。

傅雷意识到，在文字“距离”的背后，实质上是“民族思想方式”的差异。“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这两种心智很难彼此融合交流。”因此，他认为，译者应该力求找到心智相通的作家，翻译内容熟悉的作品，才能曲传原作的微妙。所以，“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作家和熟悉的作品之后，傅雷要求理解原作，“化为我有”。“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傅雷说，译者只有深入原作者的时代背景，体验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才能超越文化、心理、时空等障碍，和作者实现心灵的契合，把他的心曲说给读者听。

在谢天振看来，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之说，暗含的实际是“神形兼重”，只不过二者不可得兼之时，有先有后。他所谓的“神”既指贯穿原文的“总体精神”，又指字句声色里蕴含的“神韵”。神是“意在言外却又无处不在的神思和气度”。这样反过来对译者的要求就非常高。傅雷说，“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是不适合成为译者的。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而艺术修养，除了天赋之外，还要有后天辛勤的培养和耕耘。

对自己的译文，傅雷从未满意过，一改再改。“愈来愈觉得肠子枯索已极，文句都有些公式化，色彩不够变化，用字也不够广”“仍嫌古雅不够，18世纪风格传达不出”，诸如此类的文字，时常出现在傅雷的笔端。不仅如此，他还写评论、序言、索引、注解等多种方式，以便读者充分地理解原作。“如果仔细比较，你会发现，傅雷的译著，注解特别多。”谢天振说，正是凭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傅雷才创造出了大量优秀的译本，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在文学翻译界，卓然成家。■

（参考书籍：《傅雷全集》；《傅雷与他的世界》，金圣华编；《江声浩荡话傅雷》，金圣华主编；《傅雷，那远逝的雷火灵魂》，谢天振、李小均著）

〔封面故事文章中除署名图片外，均出自《傅雷书信选（增订本）》《傅雷谈艺录（增订本）》，三联书店2016年9月刊行〕

《艺术哲学》：神韵气味之由来

主笔 / 薛巍

傅雷说：“中国学术之所以落后，之所以紊乱，也就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其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他认为丹纳的《艺术哲学》能帮助中国人提高科学精神。

以科学方法研究艺术史

傅雷在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翻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在中译本尚未问世之际，他就在家书中多次向他（未来的）儿媳、梅纽因前妻的女儿弥拉推荐这本书。1960年10月21日，他写道：“因你对一切艺术很感兴趣，可以一读丹纳之《艺术哲学》。这本书不仅对美学提出科学见解（美学理论很多，但此理论极为有益），并且是艺术史通论，采用的不是一般教科书的形式，而是以渊博精神之见解指出艺术发展的主要潮流。”1961年4月9日他又在写给弥拉的信中说：“《艺术哲学》是一部有关艺术、历史及人类文化的巨著，读来使人兴趣盎然，获益良多，又有所启发。你若有闲暇，一定得好好精读和研究学习此书。”

傅雷翻译这本书主要是为中国读者考虑。早在1929年，21岁的傅雷在巴黎攻读艺术史时就打算翻译丹纳的这部书，并写了一篇《译者弁言》。他在译者序中对丹纳的生平做了简要介绍：“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1828～1893）自幼博闻强记，长于抽象思维，老师预言他是为思想而生活的人。中学时代成绩卓著，文理各科都名列第一；1848年又以第一名考入国立高等师范，专攻哲学。他和许多学者一样，不仅长于希腊文、拉丁文，并且很早精通英文、德文、意大利文。1857至1871年间游历英、比、荷、意、德诸国。1864年起应巴黎美术学校之聘，担任美术史讲座。他的《艺术哲学》是课程讲稿，于1865至1869年陆续出版。”丹纳还著有《英国文学史》《现代法兰西的渊源》《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研究》《意大利游记》等书。

《艺术哲学》从目录上看有些枯燥，如第四章第二节“文学作品的各种元素”“性格”“性格的元素”，

但正文的文字非常具体、生动。傅雷说：“丹纳不仅是长于分析的理论家，也是一个富于幻想的艺术家；所以被称为逻辑家兼诗人，能把抽象事物戏剧化。他的行文不但条分缕析，明白晓畅，而且富有热情，充满形象，色彩富丽；他随时运用具体的事例说明抽象的东西，以现代与古代做比较，以今人与古人做比较，使过去的历史显得格外生动，绝无一般理论文章的枯燥沉闷之弊。”

丹纳的著作也有他的时代印记，即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而这种哲学早已被认为是过时的了。美国艺术史家迈克尔·马尔莱斯说：“从总体上说，在19世纪80年代，丹纳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愿意接受他的思想的人越来越少。到19世纪90年代初，丹纳已经不再像15年前那样受人敬重。”丹纳的《艺术哲学》出版后在艺术批评界引发了巨大的骚动。这本书本身相当保守，他对艺术品的定义符合学术潮流。但他总体上的方法很有争议。他提议要用纯粹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在他看来，种族、环境和时代决定了艺术的创作。他提出的科学的艺术评论的概念招致了理想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的批评。左拉很欣赏丹纳，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丹纳的体系有些简单化，并讽刺说他不明白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超越他们的时代的。法国批评家埃米尔·汉纳昆说，丹纳忽视了艺术天才。之后许多人都说，丹纳对艺术最重要的方面——个性——不够敏感，他忽视了伟大艺术家的特质，属于他本人拒斥的现实主义传统。评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说，丹纳把农艺学的方法用于文学史。他研究一个国家的阳光、地形、气候，然后把艺术家的产生呈现为蘑菇、甜菜、无花果、孢子甘蓝的生长。

对于丹纳受到的批评，傅雷非常清楚。他在《译者弁言》中说：“丹纳的哲学是属于孔德派的实证主义。他从极年轻的时候，就孕育了一种彻底的科学精神，以为人类的精神活动是受物质的支配与影响，故他说精神科学（包括哲学、文学、美术、宗教等）可与自然科学同样地分析。他所依据的条件便是种族、环境、时代三者……物质方面的条件都给他搜罗尽了，谁还能比他更精密地、更详细地分析艺术品呢？然而问题来了：拉封丹的时代固然产生了拉封丹，鲁本斯时代

的佛兰德固然产生了鲁本斯，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时代的意大利也固然产生了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然而与他们同种族、同环境、同时代的人物，为何不尽是拉封丹、鲁本斯、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呢？固然天才是不世出的，群众永远是庸俗的；然而艺者创造过程的心理解剖为何可以全部忽略了呢？丹纳把心理学完全隶属于生理学之下，于是充其量，他只能解释艺术品之半面，还有其他更深奥的半面我们全然没有认识。这是丹纳全部学说的弱点，也就是实证主义的大缺陷。在文学上，自浪漫主义崩溃之后，由写实主义而至自然主义，左拉继承了丹纳等的学说，想以人类的精神现象都归纳到几个公式里去，然而不久也就与实证主义同其命运，发现此路不通了。”

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研究思路上说确实被认为早已过时，成了不完全的美学了。傅雷之所以仍要介绍、翻译此书，“正着眼在其缺点上面，因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现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治学方法。尤其是艺术常识极端贫乏的中国学术界，如果要对于艺术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非从这种实证主义的根本着手不可……中国学术之所以落后，之所以紊乱，也就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其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于是我们眼里所见的国学只有空疏，只有紊乱，只有玄妙！”

种族、环境和时代

丹纳宣称他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艺术，他写道：“由于透视学的发现，解剖学的研究，造型技术的进步，肖像画的应用，油画的发明，绘画关心到真实的血肉之体。这时绘画才从正确的模仿过渡到美妙的创作。”但读起来会发现，他大部分时间在描绘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习俗、精神面貌。他的方法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的。美国布朗大学艺术和建筑史博士玛丽·莫顿说：“丹纳在他的讲座中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社会学式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他想通过客观、经验主义的观察和仔细的文献引证，把历史和文化研究提升到自然科学实现的进步水平和现代程度。到1913年，他的《艺术哲学》已经出了14版，被翻译成了英语、德语、丹麦语和俄语。丹纳从背景研究艺术史的方法非常有影响。到20世纪末这种方法被称为社会艺术史。他指出的艺术品和它的环境之间的联系吸引了几代艺术家和批评家。”

丹纳说艺术诞生的三个要素是种族、环境、时代，

他往往从生理学意义上的种族说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比如他说：“越是伟大的艺术家，越是把他本民族的气质表现得深刻。”他对欧洲各个民族的特性概括性的观察基本上符合一般人的观感，如：“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与绘画。”德国是欧洲最有学问的国家，“那儿人人认识字，尤其在北部；年轻人都在大学里待上五六年，不但有钱的或境况优裕的，而且差不多全部中等阶级，甚至下层阶级中也有少数人熬着长期的清苦和饥寒进大学。社会上极重学问，有时竟造成一种做作的风气，流于迂腐。许多青年目力很好，也戴着眼镜，装出更有学问的神气。法国有些青年只想在俱乐部或咖啡馆露头角，一二十岁的德国人可不是这样，他念念不忘要对人类、世界、自然、超自然，还有许多别的东西，



丹纳

有一个总括的观念，想有一套包罗万象的哲学。对于高级的抽象的理论的爱好，专心，容易了解，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及得上德国人。德国是一个创立形而上学和各种主义的国家。可是太多的玄想妨碍图画艺术”。

他对历史背景的介绍有时候稍显冗长，对民族性的比较都非常有趣：“拉丁民族中，配偶关系不大受到尊重：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的戏剧和小说，老是用‘通奸’做主要题材；至少那几个国家的文学以情欲为主体，听凭情欲为所欲为。相反，英国小说描写的是纯正的爱情，歌颂的是婚姻；在德国，风流的行为并不光荣，便是在大学生中也如此。在拉丁国家，风流是被宽恕的或容忍的，有时还受到赞许；婚姻的约束和夫妇生活的单调似乎很难忍受。拉丁民族最喜欢事物的外表和装饰，讨好感官与虚荣心的浮华场面，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总之是喜欢形式。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意事物的本质，注意真相，就是说注意内容。”

在环境方面，丹纳说：“尼德兰在威尼斯之北1200公里，气候更冷，雨水更多，浮云蔽日的时候也更多。威尼斯派的画和佛兰德斯派的画总体色调不同，相比前者，后者色彩失去一部分温暖，琥珀、火红和棕黄的色调不见了。”

民族性也取决于环境。“尼德兰人生活的地方气候潮湿而少变化，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大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他们极想挣钱，孳孳为利，但积聚钱财的要求并没有狂热和过分的程度。他们生性安详沉着，日常的享用恰如其分……在比利时，烹调的技术极高，便是客饭也精美之至，我认为欧洲第一。市房不像我们千篇一律，而是一所独立的建筑物，有特色，有个性，既有趣，又别致。”

种族、环境这两种因素基本上是固定的，时代则是会变迁的，而且在丹纳看来，时代的变迁往往朝着不好的方向走。他对历史的叙述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他说：“真正理想的人物只能在原始和天真的时代大量诞生；直要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各个民族初兴的时候，在人类的童年梦境中，才能找到英雄与神明。”

在他看来，文明化即复杂化，这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要绘画发达，土地不能荒芜，也不能耕耘过分。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如果还能回到形象，那是花足了力气，经过剧烈的病态的抽搐，依靠一种混乱的危险的幻觉才能办到。这便是我们今日的精神状态。我们不是自然而然成为画家了的。”

《读书》2016年第八期目录

卜 键 污厄

陈家琪 小议“伪善”

元同惠 道德的本源与终局

刘 东 “大空间”与“小空间”

何 磊 城市、养生与当代

王 珅 从“日本风”到“中国热”

短长书

从人艺停演话剧《潘金莲》谈起（李

春梅）·“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刘荣兴）·日本海外社社的反宗教本

质（石晨曦）·“吾不如”之论（刘涛）

陈 慧 正视美国左翼文学的复杂性

晋 军 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

号”上的生与死

曹卫东 爱就是要走出无家可归的状态

张 治 钱锺书眼中的薄伽丘及后继者

谢一峰 拼贴与“杂拌儿”

品书录

理学研究的新突破（李伯重）·裂变

时代的痛苦心灵（刘俊峰）·日本的

核电劳工（陈卫平）·美的文化政治

实践（张华）

聂智琪 代表性危机与民主的未来

方 旭 真理的复仇

蒋原伦 奥尔巴赫与西方叙事传统

孙来臣 《战争哀歌》：越战老兵无

法愈合的心灵创痛

金 雯 金宇澄的谜语人物：负情感

试论

刘大先 “裸命”归去来



《读书》丰富生活
生活需要读书，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帮我们 拯救 你的 冰箱

你的冰箱需要帮助。由于目前的电力生产主要由燃煤产生，因此冰箱在运转的过程中的耗电会产生废气污染环境，且产生的温室气体也加剧了气候变化。我们必须转换能源的生产与使用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正为政府、企业以及全社会提供有效方案，号召大家为能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作为个人，你也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地球是我家，一起保护它。了解详情，请访问 50.wwfchina.org



国债热只是开始

主笔 / 谢九

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追捧低收益的国债，导致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日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国债的热潮可能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8 月 10 日，票息为 2.74% 的 10 年期国债刚刚上市交易第三天，收益率跌破 2.7%，创下 2009 年 1 月以来的新低。低收益的国债之所以越来越受到追捧，也是投资者在当前经济下的无奈选择。

市场上可以提供的高收益资产越来越少，是资金涌向国债市场的重要原因。以银行理财来看，过去几年可以投资的高收益产品，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比如过去能够提供高收益的地方债，在最近一年多以来大规模的地方债置换中，逐渐被低息的地方债所替代。而随着监管力度升级，银行理财对于信托、票据等高收益非标资产的投资也被大大限制，而近期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监管文件，对于银行理财投资股市也做出了严格限制。从最近几年来看，银行理财收益率已经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2015 年跌破 5%，2016 年跌破 4%，未来继续走低仍是大概率事件。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市场上爆发的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尤其是大量央企和地方国企频繁违约，政府已经不再为违约企业无条件兜底，市场环境的风云突变，使得大资金在寻找投资对象时，不再将高收益作为唯一选项，而是不得不更多考虑风险因素。

在高收益资产越来越少，风险越来越大的同时，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却越来越多。由于实体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大量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目前我国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速为 11.8%，但是狭义货币 M1 增速高达 24.6%，二者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在央行官员盛松成看来，M1 快速增长主要是企业活期存款增长过快所致，大量货币流向企业，但是企业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向，只能把大量的钱留在活期存款账户上。大量的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只能在金融市场寻求回报，而目前市场安全可靠的高收益资产越来越少，于是国债就成为资金追捧的新宠。虽然不到 3% 的收益率并不高，但是考虑到其安全性，以及其他资产的回报率不断下降的背景，国债的吸引力还是变得越来越强。

如果从全球市场来看，国外投资者对于国债的追捧热度远远超过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屡创历史新低，今年 8 月初，脱欧后的英国宣布了 7 年以来的首次降息，继欧元区和日本之后，又一个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始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使得全球国债收益率进一步走低。不仅如此，现在有很多国家和经济体的国债甚至已经是负利率，比如欧元区、日本、瑞士、丹麦等等，但依然有大量资金购买，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在全球主要市场中，负利率国债的比例大约已经占据整个国债市场的三成。

资金购买负利率国债，意味着不仅得不到收益，反而要出现亏损，为何大量资金要做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除了部分国家央行为了执行量化宽松政策不得不买之外，还有大量的机构和私人投资者也主动购买了负利率国债，主要还是因为市场上可供大资金配置的资产实在太少，负利率国债虽然收益为负，不过购买者并不一定会持有到期，随着市场价格波动，还是有可能会获得正收益；其次，由于投资者对未来经济预期比较悲观，即使持有负利率国债会导致资金出现小幅贬值，但是和未来的通缩以及资产下跌风险相比，持有负利率国债仍然可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之举。

在目前全球国债收益率迅速下跌甚至大规模负利率的背景下，中国国债相比之下可算是高息债券，以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来看，中国的国债收益率水平比同期限海外主权债券高出 150 ~ 300 个基点，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国债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而中国国债市场的改革开放，也使得境外机构购买中国国债越来越便利。2015 年以来，中国的债券市场逐渐提升对境外的开放尺度，尤其是今年 2 月，央行发布 3 号文，鼓励境外中长期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对所有类型的境外机构全面开放，过去只有境外央行、主权基金、国际金融组织等机构可以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在境外依法注册成立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发行的投资产品，以及养老金、慈善基金、捐赠基金等央行认可的其他中长期机构投资者，均可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基本对所有类型的境外机构予以开放，同时对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还取消了额度限制，这些举措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境外资金购买人民币国债。

去年 1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批准人民币加

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将在 SDR 货币篮子中占据 10.92% 的比重，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新的货币篮子将正式生效，随着时间临近，SDR 对于人民币产生的需求效应也开始发酵。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6 月份，境外机构净买入 400.90 亿元人民币（约合 61 亿美元）的中国境内债券，创 2015 年来月度最高值。

中国国债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也使得境外资金对人民币资产的价值判断出现有趣的变化：一方面，人民币贬值预期在国际乃至国内市场依然强烈，从去年 8 月 11 日央行启动新一轮汇改以来，汇改一周年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超过 8%，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之下，加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民币贬值预期依然不弱；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持有美元又并没有太多的可投资对象，美国股市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继续追高的风险已然不低，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则屡创新低，和中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从追求低风险低收益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债具有其他国债难以比拟的优势。因为各具优劣，美元和人民币资产也因此产生了围城效

应，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中国国债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上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压力。传统上，发达国家的国债一直是经济低迷和市场波动时期的避风港，过去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够，因此中国的国债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不过随着今年债券市场对于境外机构全面开放而且取消额度限制，境外大资金购买中国国债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从长期来看，国际市场上的国债收益率继续走低仍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国债将近 2.7% 的收益率在目前的全球市场可谓一枝独秀，加之今年 10 月 1 日人民币加入 SDR 正式生效，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对于境外资金构成了多重吸引力。

与其他人民币资产相比，中国国债不仅兼具收益和安全性，而且也具备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吸纳大资金，因此，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国债仍将继续受到国际资金的追捧。而从国内市场来看，随着高收益资产日渐稀缺，国债的吸引力也还会继续凸显。因此，在境内外资金的共同推动下，国债的热度短时间内还不会消散。■

| 市场企划 |

科勒在中国，下一个 20 年的优雅生活

你是否想象过这样的生活：坐在坐便器上，头顶的排风系统会自动打开，疏散浴室的异味。泡澡时，淋浴房已经根据你的水温，预设了最舒适的淋浴温度。使用习惯被上传到云端，大数据将酒店空间预设成你最熟悉的状态，即便旅行在世界各地，也照样过得优雅从容……

这些功能都在科勒的新产品“智能云境”中得以实现——做到了人和产品之间、产品和产品之间、产品大数据和人之间的互联。用户可通过一个 APP 远程遥控坐便器、浴缸、淋浴系统、净·暖机、电子镜柜、净水器等厨卫设备。产品会根据使用人的不同习惯，相互自动连接并提供最合适的服务，让每一个空间都能变成“家”一般的存在。

从第一个“马槽”式浴缸的诞生，到诸多卫浴概念的创新，140 多年来，厨卫品牌科勒秉承着“优雅生活”的理念，将设计与创新视为产品的灵魂，从艺术、时尚和色彩的世界中汲取灵感，让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的消费者，都能感受到五星级酒店式的生活享受。

在将美式厨卫经典和优雅生活的理念带入中国 20 年后，科勒还将利用虚拟现实的优势，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未来，我们可以在科勒官网上进行虚拟实景的预览，去触碰这些精美的设计，了解厨卫家居前沿；也可以利用 VR 技术，提前感受自己的新家。进入体验中心，我们还能

随着自己的心意，用设计软件自由搭配卫浴产品。手机“扫一扫”，独一无二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将如约而至。

优雅，类似于美丽，而又不止于美丽。优雅的生活应是在文化与艺术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而科勒式的优雅生活还将带着美的设计与智能创新，在中国步入下一个、再下一个 20 年。





2015年9月23日，东京市民在国会议事堂附近举行集会，抗议安倍政府强推新安保法案以及重启川内核电站的政策。当天共有2.5万人参与游行示威

“中等强国焦虑”：日本的政治变数

文 / 刘怡

弥漫全球的“中等强国焦虑症”，在日本有其特殊的呈现形式：表面上被视为国内政治的“宪法改正”倡议以及日益右转的舆论风向，最终目标却是实现国际层面的“正常国家化”。东北亚的未来因之面临挑战。

7月26日，第24届日本参议院议员（7月10日完成改选）正式开始履职的第一天，26岁的失业男子植松圣手持铁锤和利刃，闯入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绿区的一所残疾人护理院，杀死了19名医生和住院病人，并造成26人不同程度受伤。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杀人事件，也是在日本极为罕见的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对无辜者实施杀戮的恶性犯罪。旅日作家刘柠



上图：2016年7月27日，津久井警察署的警员将相模原残疾人护理院杀人事件嫌疑人植松圣（蒙头者）由本地拘留所移送检察院

下图：2016年8月4日，日本新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女）在东京检阅自卫队仪仗队

在去年秋天的一则观察记中曾经感慨，日本经济和政治缺乏活力的状况正在蔓延到整个社会，舆论空间日益萎缩，国民尤其是年轻人倍感窒息。一年后，这种担忧最终以极富象征性的场景获得了印证——失业的年轻人闯入护理院，对毫无反抗能力的高龄残障人士痛下杀手。而如此惊人的事件，偏偏发生在新一届参议院选举结束、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进一步扩大议席优势之际；政坛格局的趋于稳定，和弥漫于全国的焦虑气氛形成了鲜明反差，相当耐人寻味。

8月3日，安倍晋三首相宣布对内阁名单进行2012年以来的第四次改组。新内阁的“鹰派”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由于长期以来否定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

暗示日本有“拥核”必要等争议性言论，引发了中韩等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警惕。而8月8日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意向讲话，以及8月6日起中国公务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海域的新一轮对峙，则清晰地揭示了日本由行政机关主导宪法解释和修正行为（包括作为《皇室典范》基干的宪法第2条和第5条）的模式赋予政府的巨大权力空间，以及安倍当局在海洋权益等可能影响东北亚长期稳定的问题上一以贯之的冥顽态度。经历过2010年9月的渔船撞击事件、2012年9月的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以及2013年11月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风波，因东海权益争端导致的中日双边关系紧张正在进入新一轮“升温”周期，并

成为北京在南海问题之外另一项重大的地区安全考验和纠结。

应当承认：日本民众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前途的持久忧虑，以及在安全领域感受到的外部压力，正在为安倍一贯追求的“国家正常化”目标创造条件。高达58%的内阁支持率，以及2012年12月以来自民党—公明党联盟对行政和立法机关控制权的双重强化，则为安倍实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如果说南海问题的升温显示了全球层面的中美战略竞争对亚洲地区安全造成的直接影响，那么日本的修宪企图以及美国对此的态度就从另一个方向埋下了“地区问题全球化”的伏笔。为安倍的“正常化”试探划定界限，并努力防止东海争端与南海、黄海（朝鲜半岛）问题产生勾连，将是中国领导人艰巨但无法绕过的考验。

“中等强国焦虑”

“中等强国”（Middle Power）这一概念最初由意大利诗人及外交家乔万尼·博泰罗在16世纪末提出，嗣后由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巨著《大国的兴衰》中给出了详尽定义。它指的是一类在领土、人口和资源规模上逊色于大洲级强国（例如今天的美、俄、中）的中型民族国家，其国际权势作用主要聚焦在地区层面，对世界政治尤其是全球安全问题的影响往往逊色于大洲级强国。但托庇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和战略目标的节制性，中等强国被认为是推动全球格局多极化的主要支柱，并能填补大洲级强国的权势投射网中广泛存在的空隙和漏洞。典型的中等强国包括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以及领土面积更大的印度和巴西，在“后冷战”时代伊始以及21世纪初，它们被认为有能力削弱美国的显赫权势冗余，创造一种新格局。

然而，到2016年初为止，几乎所有中等强国都陷于经济状况挣扎、国内社会分歧和族群矛盾凸显、对外政策前景晦暗不明的显著焦虑之中。美国的战略优势的确在滑落，但中等强国非但没能填补国际权势版图出现的空白，反而更多地坐困于国内议题，并使对外政策受到内政态势的直接支配。德国围绕难民问题产生的政策摇摆，土耳其的动荡不安，乃至大体上由中等强国组成的欧洲联盟的内部分裂，无不如是。作为90年代高速全球化动力的人口红利的式微，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需求低迷，乃至中东、乌克兰等地安全冲突影响的长期化，都在使各中等强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内政。但由于大众政治模式的广泛建立，政府要在内政问题上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影响、

求得最大限度的共识，往往需要经历艰难的动员过程和效率低下、曲折的决策流程；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短平快”效应、在舆论场中影响力更为显著的外交政策转向，往往被作为内政的平衡物加以强调，从而表现出对外张扬与对内焦虑并存的风貌。多边机制在应对防止核扩散、乌克兰危机和大中东动荡等问题上的呆滞或失能，更是使形形色色的“特殊主义”和权势自助（Self-help）模式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大行其道，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政治丧失稳定性和总体前途未定带来的紧张感。

这种“中等强国焦虑”，在日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排除日本总体的经济水平在上世纪60年代末即已重回发达国家之列这一前提不论，单以真实GDP增长率作为评估指标，则日本经济从1987年起已有将近30年处在低迷状态，年均GDP增长率长期徘徊于2%左右，甚至反复出现负增长，从时长和衰退程度上都创造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最差表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年4月公布的数字，预计2016年日本GDP总量折合4.41万亿美元，虽仍位居世界第三，但仅相当于中国（11.38万亿美元）的38.76%；而在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之前的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不过是2.29万亿美元，不足日本（5.03万亿美元）的46%。换言之，在中国经济表现异常强势的10年里，日本的慢性萎缩不仅进一步拉低了GDP总量，还使两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地位上发生了惊人的逆转。而以货币贬值和量化宽松、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恢复产业民间投资为举措的“安倍经济学”，看起来完全没有可能逆转两国间日益拉大的经济体量差距。《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菅野干雄在8月初公开批评安倍的经济刺激对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便是一针见血。

与经济影响力逆转相伴随的，还有日本在军事安全环境尤其是海洋安全环境方面感受到的现实压力。不妨将安倍第二次上台时的2012年设定为临界点：这一年，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的一线兵力为驱逐舰和护卫舰48艘，柴电潜艇16艘，在美国海军专家看来勉强可以凭借技术和地理优势抗衡拥有73艘驱逐舰和护卫舰、63艘潜艇以及84艘导弹艇的解放军海军。而在4年之后，海上自卫队仅仅增加了2艘直升机航母以及3艘潜艇，解放军海军的总兵力却进一步增加至1艘攻击型航母、74艘驱逐舰和护卫舰（新服役舰艇占比更高）、70艘各型潜艇以及135艘导弹艇和轻型护卫舰，差距已经明显拉开。考虑到中国在远程火力投射工具（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以及空中力量规模方面的优势甚至更为明显，日本对自身防卫力量不足的恐惧感正在持

续上升。安全压力的增长与经济的结构性衰退相伴随，使日本的“中等强国焦虑症”发作尤为迅猛。

应当指出的是，经久的失落和不安情绪不仅弥漫于日本政界，在普通民众当中的影响也在逐步发酵。近年来，尽管要求修正宪法第9条、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动议在民间往往遭遇五成以上的反对率，但赞成这类动议的比例同样稳步上升到了三成，这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举国反对增加防务开支的潮流已是大相径庭，足以印证日本的政治生态正在从总体上走向保守化。而周期性升温的钓鱼岛对峙，实际上成为安倍当局诱导和拨弄民意的日常工具，在东海局势的升级和剧烈化之中，造成一种“日本须摆脱防务束缚”的舆论导向。

另一项不可不提的因素是美国的態度。长期以来，宪法第9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在日本不曾遭遇挑战的主因，是缔结于1960年的新《美日安保条约》的存在。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日本内阁已经形成了借助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操控国内立法议程的惯用路径：1990年的海湾战争直接带来了两年后的《PKO协力法》，使自卫队可以在海外参与维和行动；2001年的反恐战争则催生了日本的“有事关联”法案，使自卫队可以为美军提供广泛的战场支援。东京在全球安全层面对美国的亦步亦趋，使华盛顿完全不必担心日本防卫能力的增长可能对美国对日本的控制造成挑战。2015年9月通过的11项新《安全保障法案》，背景正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对华军事围堵的再兴。安倍以“伴同美军行动”为中心，大幅修正安保体制，在华盛顿几乎未曾收获异议。甚至连去年8月14日他那场民族主义气息浓厚的“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谈话，在美国获得的也是一片理解和赞赏之声，足见美日两国对自身安全能力下滑的焦虑实有共通之处。

进击的安倍

8月8日明仁天皇发表“生前退位”意向讲话之后，一度有媒体鼓噪称：此举是由于天皇对安倍意图修正宪法第9条的倾向怀有不满，故而以声明退位作为抵抗。排除夸大其词的部分不论，这类解读的确有一项合理之处，即：在战后日本独特的权力结构中，尽管对宪法条文的直接修正需要由立法机关投票表决，但对宪法具体条款的解释权却掌握在行政机关之手。甚至连决定天皇退位和继承制问题的《皇室典范》，由于其核心精神载入了宪法第2条和第5条，实际上也需要经过行政机

的首肯。而在自民党—公民党联盟已在参众两院掌握多数的背景下，作为行政首长的安倍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最近10年来权力最大、地位最稳固的首相。

尽管安倍在2006～2007年的第一次执政以黯然下台而告终，但2009～2012年三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在对美外交、经济复兴乃至党务问题上的三重失败使得民众对非自民党集团可能带来改变的憧憬完全破灭；稍后民主党的内部分裂更是使选民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其他选项。安倍在此时以自民党“共主”的身份重新出山，吸取了第一个执政期内的教训，更重视安抚与诱导的两相配合：先是以标新立异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作为标签，以唤起民众的好感和信心；接着又把“正常国家化”——恢复集体自卫权，争当政治影响力和安全行动能力与经济规模相一致的全球大国——作为对抗焦虑症的药方加以提出，并汲汲以求。在到2014年9月为止的第二次执政第一任期内，他陆续实现了修订《教育基本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制订《国民投票法》等重大目标；而在理论上将延续到2018年的第二任期内，“攻坚”安保体制并促成对宪法第9条的直接修正，自是成为一项终极目标，也是他“希望静下心来积极开展”的。

在安倍等“新右派”（区别于“二战”遗留的老右派）的冲击下，战后日本以商业、福利、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架构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强推新安保法的过程中，安倍不惜操纵舆论、滥用释宪权，表现出强烈的保守化和复古色彩，却几乎未曾遭遇任何实质性阻拦。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公民两党联盟豪取78%的席位，今年7月又在参议院选举中赢得了接近五成的席位；在既定的法制议程内，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安倍的“进击”。是故尽管重启川内核电厂、强推新安保法等决策在民间一度遭遇唱衰，并在去年夏天引发过10万人规模的抗议示威，但对国会议事堂内的表决影响微乎其微——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今年3月与维新党合并，改称民进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还不到10%！受伊势志摩G7峰会以及奥巴马造访广岛等外交成果的刺激，安倍内阁在今年夏天的支持率甚至上升到了58%，并连续两个月维持稳定。在执政联盟内部，70%的自民党拥趸和60%的公明党拥趸都支持安倍将其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延长到2018年秋天，人望可见一斑。

如此稳固的政治基础，使得日本政客和政治观察家已经不惮于公开宣扬修宪目标。去年7月，日本前驻海海军武官小原凡司曾告诉香港媒体：“和平宪法某



(张健松摄/新华社供图)



左图：2013年2月10日，在钓鱼岛海域执行常态化巡航任务的“中国海监137号”执法组组长朱星林向日方船只喊话

右图：2016年6月13日，参加“马拉巴尔2016”多国联合军演的印度和美国海军官兵在日本长崎佐世保基地使用MK18 Mod 1型无人潜航器进行水雷探测训练

种意义上也是孤立宪法，导致（日本）国人什么都不想。”“日本现在试图修改安保法制，并不是要把中国当作敌人，而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相应的法制。”在安倍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同样出现了“（日本）愿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贡献”等字眼。这类解释尽管较为委婉，但显然都在指向使日本成为政治和安全上受束缚更少的“正常国家”。而在长期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未果之后，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修订宪法第9条、获取联合国宪章框架所允许的充分军事权利，并在美日安保同盟框架内尽可能大地伸张其“防卫权”的同义语。

不过要对延续超过60年的商业福利立国模式（即所谓的“荷兰化”）做如此显著的变更，在舆论动员和政治运作方面都需要时间。日本宪法规定，修宪须首先由100名以上众议员或50名以上参议员通过草案，随后在宪法审查委员会通过讨论和表决（须获得出席议员的半数以上赞成），再经由参众两院各自2/3以上的绝对多数赞成表决，才能走出国会议事堂。而经国会通过之后的修改提案，还须向全国民众进行宣传和公示，并在随后1到3个月内举行全民公投，获得50%以上的有效赞成票，才能正式生效。而依靠目前执政联盟在参众两院的绝对多数，强行通过意义如此重大

的草案，在战后日本历史上尚无先例。倘若为了显示修宪的正当性，重新举行众议院选举，恐怕在2018年安倍的第二任期结束前都不可能进入公投议程，步调并不迅捷。

但安倍在过去4年中的进击姿态已经表明：他会持续地通过外交与内政之间的互动，以及“借力”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转型，来达成目标。继续渲染政治和安全上的“中国威胁论”，在南海周边乃至亚洲其他地区寻找潜在的战略盟友，乃至继续贩卖“安倍经济学”作为提升支持率的宣传手段，都是安倍可能采取的策略。《日本经济新闻》在7月12日发表的社论认为，安倍可能在今年9月组建有参众两院议员参加的宪法审查委员会，并在今年年底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以为相对紧凑地设置修宪议程创造条件。

中日关系再审视

8月1日，中国海军三大舰队齐集东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进行了海基和空基导弹发射训练。稍后，中国海监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再度于钓鱼岛海域发生对峙，使得今年6月以来持续升温的东海局势再度进入紧张期。实际上，这种紧张也是两国安全能力和地位逆转的表现之一——以2012年的“钓鱼岛



国有化”风波为起点，中日两国在海洋权益争端方面大致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中方一改 20 世纪末韬光养晦的作风，频繁派出舰艇和飞机宣示主权，并在硬实力支撑下实施经济开发。日方则在巩固既有控制区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大搞舆论攻势，搬弄法条，营造出“中国恃强凌弱”的氛围。由于北京在传统上拒斥对海洋权益争端的国际仲裁和调停，故日方的说辞一度赢得了若干国家的同情与认可，并和南海问题形成了某种勾连。最终，双方的动作各自取得一定成效，但皆未能掌控全局，只是使两国关系周期性出现紧张。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2012 年以来的中日对抗虽然都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派势力挑起，但其加剧、升级和经久维持却出自中日互动。”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亦时见高涨，经久难消。

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被中国政府视作仅次于美、俄（苏）的双边关系伙伴；这种特殊的重视与日本在“冷战”后期曾经给予中国的战略惠利相结合，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两种貌似对立、实则暗合之处的思维倾向。乐观者认为，日本依附强者的历史使得它有可能成为中国重整亚洲秩序的基石，北京应当支持日本争当“正常国家”，扩大美日矛盾，最终以中日一致为基础建立亚洲新秩序。悲观者则认为，日本以伸张安保权利作为“正

常国家化”先导的冒险，迟早会引发中日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能否击败日本并迫使美国接受既成事实，将决定中国是否能成为下一个世界领导者。换言之，两种倾向都认定处理好日本问题对中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这恰恰都属于夸张。如前文所述，日本的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和资源规模决定了它的发展上限仅是一个中等强国，并且是直接影响力局限在东北亚一隅的中等国家。对中国这样体量巨大的洲级强国来说，日本既不足以构成持久的安全威胁，在更大的范围内能够提供的帮助也较为有限。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纠葛使普通中国人甚至研究者倾向于放大日本的意义，他们显然忽略了：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20 年中日“蜜月期”，诱因之一是苏联这个共同的战略对手，之二则是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对日本的刺激。若无外部因素左右，中日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意愿和力度都会变得相当谨慎。

今天的中日关系大致呈现这样的形态：由于日本的能力缺陷和美国在政策指导上的制约，它不可能入侵中国，中国也无必要对日本实施大规模武力打击。但在“中等强国焦虑症”的刺激下，中国通过经济和宣传手段，从外部影响日本国民和政府的心理、阻止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化”的努力，大体已达到效率瓶颈。现在需要争取的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终极目标——不管导向的是结盟还是对抗——而是使日本的“正常化”尽可能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并借助两国高层的沟通不断调整和完善本方的政策。

应当承认，尽管安倍在去年战后 70 周年谈话中所称的“二战后出生的人占现在（日本）人口的八成以上。与那场战争毫无关联的子子孙孙，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背负谢罪的宿命”不甚中听，但的确代表了大多数当代日本人的心理：他们对承认历史问题的重要性认知，远不及对中国“硬实力”和大众民族主义的疑惧来得直接。从外部促进日本民众对历史问题的正视，必须也只能以长期和渐进的方式进行；在此过程中，没有必要由于历史心结，就置同样饶有意义的经济合作、区域稳定等议题于停滞状态。归根结底，汲汲于在现阶段孤立或联合日本眼界都太过狭小，中国最终是要在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对中日关系的终极形态做出回答：中国所能接受的是一个怎样的“正常”日本，日本又将和怎样一个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共存？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新生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土耳其 “伊斯兰化” 恐慌背后

主笔 / 徐菁菁 记者 / 张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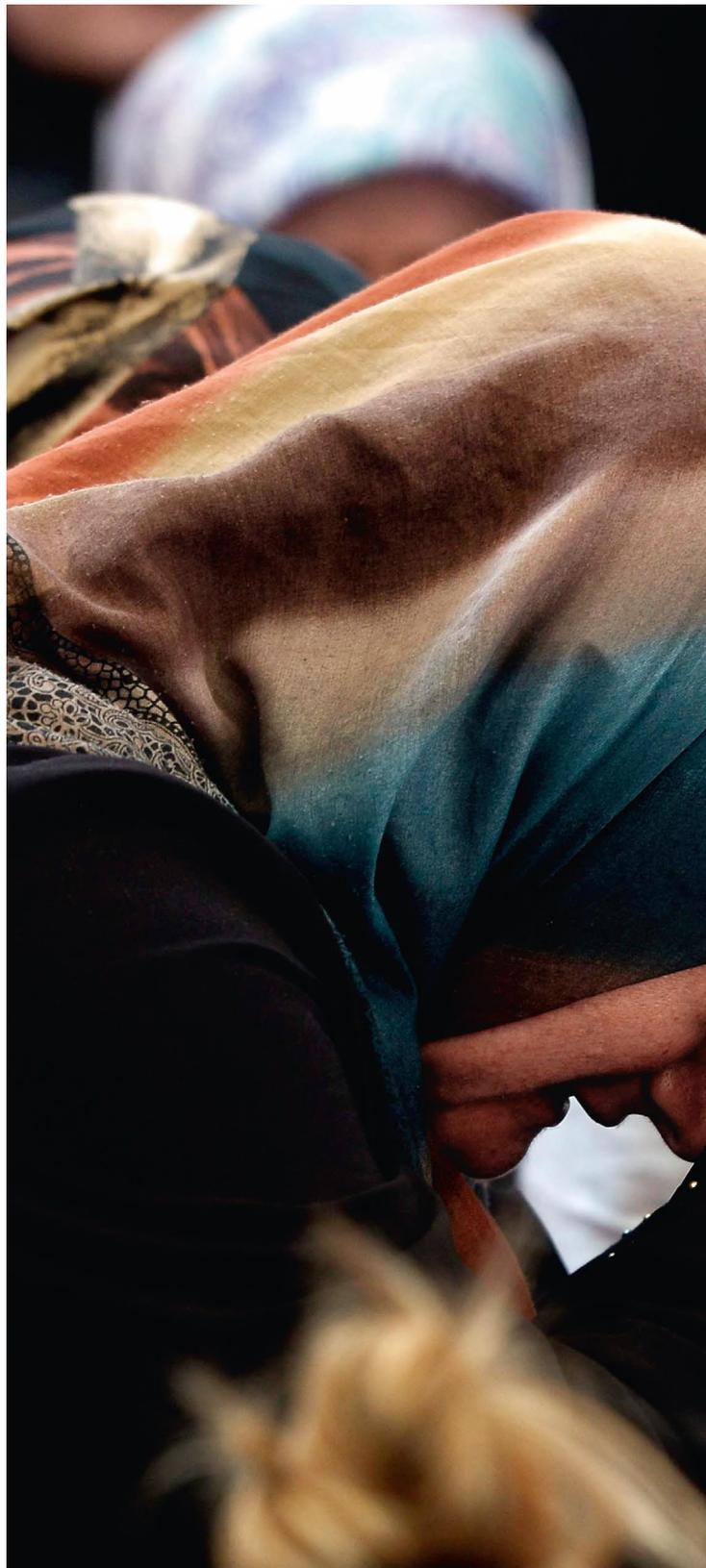
以世俗化立国的土耳其，
下一个路向是“伊斯兰化”吗？

恐慌

7月15日的土耳其政变中，总统埃尔多安躲过了两次死劫。当晚，他前脚刚离开度假胜地马尔马里斯的酒店，就有25名士兵乘坐直升机携武器赶来。而当埃尔多安乘坐湾流4型商务机从距离马尔马里斯一个多小时路程的达拉曼机场升空后，又遭到参与政变的两架F-16战机雷达锁定和半空袭扰，但对方为何没有开火，则是一个谜。

埃尔多安少年时曾在街上卖糕点，据说要是有人想骗他，很快就会遭到一顿揍。当地老人说他：“打架从来不会逃。”这一回，埃尔多安决定以铁拳反击。政变结束后，土耳其政府在军队中展开了大规模行动。1万余名军人被羁押，高级将领中约四成被开除。军队系统将进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将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家情报局从总理府管辖改归总统府管辖，将以往隶属于武装部队的宪兵、海岸警卫队、军队医院等改为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此外，土耳其最高军事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增加了文官成员，军事基地也将从土耳其主要城市中心撤走。

政变发生后不久，埃尔多安就将矛头指向了伊斯兰运动的领袖人物费图拉·居兰。以清除“居兰势力”影响之名，清洗从军队系统蔓延到司法和教育等领域。包括10名最高法院法官、140





7月18日，土耳其为军事政变中的遇难者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葬礼



名最高上诉法院法官在内的近 3000 名法官和检察官被逮捕；1043 所私立学校、1229 家协会与基金会被关闭。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重新整合了政治势力和政治资本。7 月 24 日，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和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等在伊斯坦布尔共同组织了反政变抗议集会。第二天，埃尔多安与两个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就启动小范围修宪进程达成共识。作为回报，埃尔多安提出将所有针对反对党领导人的诉讼一笔勾销。埃尔多安还宣布将于 8 月 7 日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一场盛大的民众集会，试图将持续半个多月的各地反政变集会推向高潮，凝聚社会支持。

一场失败的政变换来了与其期望截然相反的结果：

可以确定，埃尔多安与其带领的正义与发展党疾风骤雨般地巩固并扩大了权力。

如何看待当下的土耳其？舆论的态度颇值得玩味。一些在政变发生之初就欢呼雀跃的观察家说，土耳其失去了最后一次保住民主的机会。然而一个悖论是，即使埃尔多安政府真的在一步步走向极权，军事政变也从来不是民主的胜利——它不是民众革命，它的本质就是专制的，这一点在土耳其并不例外。

很显然，外界对于土耳其的一切争论的核心并不在于它是否保持民主，而在于另一种深刻的恐惧：一个“伊斯兰化”的土耳其。《华尔街日报》说，埃尔多安将把土耳其带向 1979 年的伊朗。霍梅尼革命之后，伊朗从一个世俗国家变成了政教合一的国家。

事实上，从 2002 年，正义与发展党第一次赢得



左图：7月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座清真寺参加完斋月祷告后向媒体发表讲话

右图：7月25日，土耳其军人在马尔马里斯逮捕涉嫌参与政变的军官

大选以来，这种恐惧就从未消失。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再次赢得议会选举，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得以连任，同时，正义与发展党成功地使其理想人选、有伊斯兰背景和宗教倾向的原外交部长居尔登上了总统宝座。那时就有观察家悲观地认为，世俗主义在土耳其遭遇到底失败，土耳其将逐渐改变其世俗发展道路。

世俗主义者的反抗越来越无力。1997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军方只是提出有关世俗主义和政治化伊斯兰的问题，来自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总理就不得不签署保护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决议。在军方发出备忘录之后，埃尔巴坎被迫辞职，他还被禁止在5年内从政。时至2007年4月，针对居尔的总统候选资格，军方只是在总参谋部的网站上贴出了一个声明，称军方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允许任何破坏共和国基本价值观的活动发生。这份声明被土耳其媒体调侃为“网络政变”（e-coup）。正义与发展党的回应方式是提前举行大选，并大获全胜。接着，2008年3月，世俗主义的支持者以一场“司法政变”应对。土耳其首席监控官亚尔琴卡亚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

求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禁止埃尔多安及居尔和另外69名党员在5年内参政。他在长达162页的诉状中指责正义与发展党企图利用民主方式在土耳其实施伊斯兰法、消灭宪法规定的世俗原则。然而，宪法法院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后，于7月30日以6票对5票的结果拒绝了针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各项指控

对军方及其代表的世俗主义势力力量渐微的一种解释是：埃尔多安政府蓄意削弱了军方的权力。2011年8月，土耳其最高军事委员会确认了政府对高级指挥官的任命权，服务部门指挥官由对国防部长述职，改为对总理述职。但常常被忽视掉的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些改革依然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必经之路。

持续仅仅5个小时的军队政变集合了一切失败元素。策划政变的总参谋部校级军官根本没有抓到政变目标——埃尔多安在近公里外的海滨休假，他们也没控制住身处首都安卡拉的总理、内阁成员和国会，更没控制住媒体。军队的高级将领不支持政变，更重要的是，军官们没有得到土耳其民众的认可。没有一个反对党视政变为攫取权力的机会，相反，它们都在局势明朗之前就明确表示反对政变。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奥尔罕·帕慕克说：“我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批评者，我有很多的理由批评土耳其的这个执政党。但是，政变永远不是解决土耳其问题的办法。在我一生中，我亲历了三场‘成功’的政变和四场‘失败’的政变。所有这些政变都使得土耳其的问题更严重，人民更不幸。”

当埃尔多安在用手机软件 Facetime 接受 CNN 采访，并呼吁民众“上街去给他们你们的回答”时，土耳其民众确实响应了他的号召。人们冲进了伊斯坦布尔机场，在安卡拉爬上了坦克。埃尔多安确认了自己与人民的政治契约，将其执政正当性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使得军人通过电视台来“代表土耳其人民”的努力化作泡影，原本占据优势的政变军人瞬间被还原为叛国者。

政变当天，埃尔多安在降落安卡拉机场后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即使准备极为仓促，埃尔多安依然对发布会现场进行了布置：镜头里，他的身后摆上一张肖像，那是土耳其开国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创立者。

集合一场政变的诸多元素，不难发现，对于拥有漫长伊斯兰传统，又以世俗主义立国逾90年的土耳其，以“伊斯兰化”一言以蔽之，这种判断与其带来的恐慌都未免太过草率。

复兴

土耳其军队被称作土耳其政治的“稳定器”。1960到1997年之间，军队成功实施了四次政变，颠覆有可能背离世俗主义的政府。每一次，军人们都会还政于民。就这一点而言，军队确实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变的反复发生似乎说明：土耳其社会存在另外一种根深蒂固的发展逻辑。

凯末尔对土耳其的改造符合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进化史观为其主要理论基础的线性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落后地区必然要被西方所征服，而落后地区要避免被征服就必然要以西方模式为发展目标，走向民族国家。基于这种观念，他抛弃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遗产，着手对土耳其进行全盘改造：法律源自德国、意大利、瑞士；拉丁字母替代了沿用数百年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采用西方历法，使用西方节假日和着装标准。

对于伊斯兰这一土耳其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凯





1960年6月31日，土耳其军事政变推翻曼德列斯政府后，新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图为民众持土耳其国旗庆祝



1997年3月5日，土耳其时任总理埃尔巴坎走出设在议会中的办公室

末尔开出了世俗主义的药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药方并不与西方模式相同。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指出：“西方的世俗主义，指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完全不去管宗教。而凯末尔世俗主义是一种专制主义，政治要严格地控制宗教，宗教必须在公共生活中被消除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

对于伊斯兰教的地位问题，奥斯曼帝国末期的一位思想家格卡尔普曾提出，伊斯兰教应该退出政治领域，但在社会层面保留伊斯兰教，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精神依托。但凯末尔上台后“把伊斯兰教从公共领域彻底清除掉了”。政治对宗教的管控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在1925年，土耳其共和国颁布实施了“帽子法”，该法禁止成年穆斯林男性戴旧式的无檐毡帽，取而代之的是欧式礼帽。那些违法的人要么被罚款，要么被监禁。在一次为新实施的“帽

子法”进行辩护的演讲中，凯末尔曾这样说：“压在我们头顶的这项毡帽代表着愚昧、狂热主义，同时也体现了对进步和文明的仇视。我们应该用文明世界人们惯常所戴的帽子来取代土耳其毡帽，这样就不仅表明土耳其人与整个文明家庭成员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在其他方面，我们之间其实也不存在什么差别。”

施展指出，这场激进转型的一个问题是：“凯末尔主义只构成一个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用来形成一个公用身份的，但是作为土耳其的个人来说，生活中并不只有公共政治生活，也还有日常的精神生活。而在这个精神生活而言，民族主义从来给不出任何用于规范世道人心的内容。在穆斯林社会，传统伊斯兰教是用来规范世道人心的。”

对凯末尔主义的推行，使土耳其陷入一种分裂。一方面，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伊斯兰传统成为严防死守的禁忌；另一方面，在土耳其人的公共生活里，这种传统依然生机勃勃。

1946年以后，土耳其开始转向多党派民主政治体制。政治转型使土耳其出现了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政党的根基浅薄，而传统宗教组织往往有很强的传播、动员和组织能力，民主化也就必然伴随着伊斯兰主义势力抬头。事实上，无论什么党派，其政治活动总会受到伊斯兰教的强烈影响。

伊斯兰传统在1946年已经开始了复兴之路，教育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47年，政府做出决定：在有关的教师和课程征得教育部同意后，人们可以自愿组织实施伊斯兰教育。1949年，政府决定在小学四五年级开设每周两小时的宗教选修课，条件是必须有受教育者家长或监护人的书面授权，必须使用由宗教事务局和教育部共同编写的教材，教师只有通过资格审查合格后方可授课。同一年，国民议会通过法案，同意建立安卡拉大学神学院。其他宗教措施包括新的宗教职业高中的建立、《古兰经》课程的开设、宗教书籍和小册子的出版、在公共场所允许穿带有宗教色彩的服装等等。教育部于1947至1948年开始在私立宗教学校中实施了培养宗教领导人的计划。1949年，教育部先是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后又在伊兹密尔等8城市中开设了为期10个月的伊玛目哈提甫课程（Imam-Hatip Kurslarl），这是一种短期的宗教教育

学校。土耳其伊斯兰宗教教育开始真正进入了全面正规的发展时期。

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民间的宗教组织从95个增加到5104个。1950年，当时的民主党政府规定，宗教课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必修课，同时恢复伊斯兰教的高等教育。1956年6月，政府又规定在伊斯坦布尔重开伊斯兰研究机构。在民主党政策的激励下，宗教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戴面纱的妇女人数、清真寺的数量等都有了大量的增加。1960年，军队发动了第一次政变并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政变并没有将土耳其带回到凯末尔执政的时代。1961年的宪法明确每个公民在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方面都是自由的，这回应了土耳其社会兴起的宗教需求。

“任何一个成功的宪政秩序，必定要包含着其形式（宪法典章）与质料（社会现实）之间的匹配关系，”施展指出，“倘若其匹配度很差，却仍要坚持其形式的话，则无法避免地会走向用暴力强制推行。”这就是土耳其反复出现以军事政变形式维护凯末尔式世俗主义这一现象的原因。而作为一个人口99%为穆斯林的国家，土耳其的各项政治安排里面完全没有伊斯兰的因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调整

1954年，埃尔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他的父亲是国家海事局的一名舰长，母亲是家庭主妇。由于家境贫寒，埃尔多安童年时在大街上卖过柠檬汁、香料和面包，在足球场里卖过纯净水和糖果。他曾回忆自己受到的宗教教育的影响：“我所有的一切都得益于伊斯兰宗教学校，我的生活轨迹在那时已经定下来，我学会爱国、爱他人，为国家服务、礼拜、团结他人等等。”埃尔多安常常朗诵那些蕴含着苏菲教派哲理的诗歌。他还经常运用伊斯兰术语。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他宣称自己是伊玛目。遭到批评时，他反驳说：“当你们听到伊玛目这个词时，你只是想到清真寺的领拜人，而在伊斯兰教中，伊玛目指的是拥有权威进行统治的人。”

早在大学期间，埃尔多安就追随了土耳其前总理内吉梅丁·埃尔巴坎。1970年，埃尔巴坎创建了土耳其第一个走向政治舞台的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发起了一场民族观念运动。埃尔巴坎希望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他认为，凯末尔主义者以西方模式

取代伊斯兰以及奥斯曼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个历史错误，同时也是当代土耳其各种不幸的根源。他认为，土耳其要建立民族秩序，结束西方化的进程，土耳其的身份和未来应该与伊斯兰世界而不是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坚信土耳其应该以安纳托利亚为基地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措施，创造一个远离西方的强大国家。他甚至希望建立穆斯林共同市场，以伊斯兰第纳尔（Dinar）为共同货币，并且组建成一个穆斯林防卫联盟。

从表面上看，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和反西方主义是埃尔巴坎倡导的“民族观念运动”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巴坎并不对西化和西方持完全拒绝的态度，他将西方文化与技术分开，赞成土耳其通过技术革新走向强国之路。从本质上说，他与凯末尔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关切：如何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只不过，他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浸润下起步的。民族秩序党在1971年被取缔。1972和1980年，埃尔巴坎又先后建立了救赎党和繁荣党。埃尔多安在繁荣党内的晋升速度很快。1984年，他成为繁荣党Beyoglu区的青年组织的领导人，次年进入伊斯坦布尔的繁荣党行政机构。1986年，他就当选为繁荣党中央行政委员会委员。

繁荣党在政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95年大选，他们与中右派政党真道党组成联合政府，成为第一个执掌国家政权的伊斯兰政党。埃尔巴坎当选了土耳其总理。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土耳其军方用一纸备忘录将埃尔巴坎赶下台。此后，繁荣党的旧部又陆续组建了美德党、幸福党，但都未能东山再起。在力量的重组中，不同意见者分道扬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2001年，埃尔多安创建了正义与发展党。

过去的5年对埃尔多安的政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生涯和繁荣党一道跌入过谷底。1998年，他因当众颂扬宗教诗篇被判刑入狱10个月。他

从本质上说，埃尔巴坎与凯末尔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关切：如何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只不过，他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上图:2013年,伊斯坦布尔信仰大学的学生在课堂上。这所学校是居兰运动的教育机构

下图:2016年7月6日,时值开斋节,一个小女孩在伊斯坦布尔一条贩卖鱼肉三明治的船前留影



接受了这个教训。在服刑结束之后，埃尔多安总结说：“我们现在不应将宗教象征用于政治实践中，而是指导信徒如何参与政治，也就是说不再运用导致世俗政权反感的宗教话语。”2001年建立正义与发展党时，埃尔多安在政党徽章的设计上抛弃了新月标志（这是繁荣党、美德党和幸福党共同使用的标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发光的灯泡。埃尔多安宣称自己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人”。

正义与发展党人和曾经的“民族观念运动”者有着显著的区别。他们意识形态和政策已经超越了以往伊斯兰教政党的僵化路线，它提出的口号和政纲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至少在行动上，他们不再坚持埃尔巴坎的信条，不再对西方和全球化持有敌意，相反，他们开始拥抱一个更加开放、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埃尔多安从上台起就努力追求土耳其加入欧盟，并根据欧盟的要求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除了改造军队系统，正义与发展党降低或者放弃进入议会选举需要的10%的选票门槛，降低政党获得国家财政支持所需要的7%的支持率门槛，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小型政党参加到选举中来。同时，该改革方案允许政党在选举中使用土耳其语以外的语言，包括方言和库尔德语。在经济上，他们积极将土耳其嵌入全球市场。在外交上，土耳其并没有完全转向东方。“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是正义与发展党人更青睐的语言和定位。2003年开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人使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土耳其议会投票表决的时候，作为党魁的埃尔多安曾奉劝自己的议员们投赞成票。所有这一切，都和令人们恐慌的极端的伊斯兰政治相去甚远。事实上，就在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土耳其还被西方视作伊斯兰民主化的典范。

土耳其著名政治学者齐亚·厄尼斯（Ziya Onis）认为，埃尔多安和他的同僚从繁荣党的失败认识到，世俗主义力量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世俗秩序是政治活动不可挑战的底线；同时他们意识到，在底线无法突破的条件下，必须通过民主化手段扩大边界的范围，因而成为民主的坚定支持者，这也促使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变得温和化。

伊斯兰加尔文主义者

怀疑论者认为，埃尔多安的温和化面孔不过是一种获得权力的政治策略，未来土耳其会走向更为激进的道路。但所有猜测必须基于事实：过去14年，正

义与发展党赢得了4次大选的胜利，这是1946年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正如这次军事政变中所展现的一样，埃尔多安很清楚什么才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土耳其的政治面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土耳其社会对伊斯兰传统的需求是什么？人们期待和接受何种程度的保守化？

伊斯兰政治在土耳其的兴起与经济结构及其塑造的社会阶层变迁息息相关。1927年，凯末尔政府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在进口替代政策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工商业体系。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一经济策略的结果是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治代表多是传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代言人。他们是精英主义的代表，是过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害怕竞争和全球化。

1983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土耳其开始拥抱新自由主义。其主要政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在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土耳其的中小企业搭上了转包合同的春风，并被迅速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有统计称，土耳其80%以上的中小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的，其中一半是在90年代以后建立的。其中，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中的新建企业最多。这些企业发展虽然快，但他们在国家机构中没有代理人，政府政策总是支持大企业。在繁荣党执政前的10年内，国家机构和国家银行给予中小企业的贷款只占总贷款量的3%~4%。

土耳其企业家阶层出现了中心与边缘的分野。一个标志是，亲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工商企业家协会”是20世纪70年代由11家大企业建立的，而1990年中小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

这些中小企业与同政府关系密切的寻租企业有着尖锐的利益冲突。“独立工商企业家协会”在1997年土耳其经济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军队干政：“寻租者”利益圈破坏了土耳其的民主进程。土耳其著名

正义与发展党人和曾经的“民族观念运动”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它提出的口号和政纲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1994年，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街头，女人们戴着头巾出行

的伊斯兰主义经济学家穆斯塔法·厄扎尔对藏在凯末尔主义背后的“寻租者”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这些“寻租者”都是靠政府保护剥削国内市场的掮客。这种话语在工人阶级中也大受欢迎。从繁荣党到正义与发展党，伊斯兰主义政党都使用这样的话语方式，这成功地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受益者与失意者都团结在了它们的周围。

在土耳其南部最大城市加济安泰普，Naksan 公司是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最大的塑料袋制造商之一。就像新一代安纳托利亚商人，老板塔内·纳基博格卢（Taner Nakiboglu）在美国接受教育，但却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与正义与发展党的许多领导人一样，他的妻子也戴头巾。在土耳其解除大学里的头巾禁令之前，家族里的女性为了躲避禁令远赴美国求学。任何人来到公司，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门口的白墙上刷着的醒目的《古兰经》字句。

安纳托利亚地区是这些中小企业的大本营。安纳托利亚远离伊斯坦布尔，有着保守的、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传统。凯末尔革命作为精英主义运动从未在这里获得胜利。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土耳其研究专家咎涛指出，在讨论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时，人们多会谈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但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现代化的挫折，现代化的成功也可以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社会在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之后，往往倾向于

从自身的文化和文明传统中，寻找成功的原因，并将其内化为一种自信和自豪的情感。

安纳托利亚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经济的繁荣促使这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东亚“儒教资本主义”的意识——伊斯兰资本主义。他们自称为“安纳托利亚小虎”。这些地方的工商业者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一方面接受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一方面努力践行一种伊斯兰色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恰恰是正义与发展党执政 14 年来所遵循的路线。

这些“安纳托利亚小虎”被观察家称作“伊斯兰加尔文主义者”。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国家的保守化？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奥默尔·塔什珀纳尔（Omer Taspinar）说，“伊斯兰加尔文主义者”更关心利润最大化和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他们更愿意保持政治稳定，而不是引入伊斯兰法，制造一个神权国家。

伊斯兰化？

执政 14 年，埃尔多安采取的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策中，有一些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1923 年，凯末尔建立国家宗教事务局主管宗教事务。从 2006 年开始，该部门的预算翻了 4 倍。原本由副总理管理的宗教事务局直接划归总理管理。事实上，这一举动与其说是“伊斯兰化”举措，不如说是服务于外交。当时的总理达武特奥卢是土耳其外交的建筑师。他希望土耳其能够像沙特阿拉伯一样对逊尼派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穆斯林群体产生影响。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事务联盟是德国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组织之一，宗教事务局的法国分支机构，也有同样的地位。在荷兰，宗教事务局为荷兰伊斯兰基金会支付薪水，看管 140 座清真寺。2011 年，宗教事务局还与中国签订了一份协议，代为培养伊斯兰学者，修整清真寺。在宰牲节时，宗教事务局会将符合教义要求的羊肉远运至非洲不发达国家。宗教事务局甚至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由 30 个拉美国家穆斯林学者参与的峰会，这还是拉美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这次峰会的闭幕式上，埃尔多安语出惊人地宣布是穆斯林发现了美洲。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至今，有两项政策引起了最多的非议。2013 年，土耳其政府解除了有数十年历史的对头巾的禁令，那些在文职机构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妇

女被准许自由选择是否戴头巾。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头巾在政府机关、医院、大学和学校遭到禁止，它们被赋予了极多的政治内涵。1997年，土耳其军方还给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政府权威机构严格实施头巾法案。该法案在更大范围得到了更严格的实施，以至于那些只在下班期间戴头巾的女教师也不能被升职，甚至有些男性因为自己妻子戴头巾也不能获得国家公职。在1999年4月的政治选举中，美德党女党员麦尔维·卡瓦克绮（Merve Kavakci）被选为会议议员，她本来打算戴着头巾宣誓就职，然而由于遭到支持世俗主义的议员的强烈反对，很多议员甚至坚持要把她赶出议会。德雷米尔总统甚至公开指责她是“为极端伊斯兰政体服务的奸细”。在同年5月7日，宪法法院还对卡瓦克绮提出了起诉。根据凯末尔主义者的国家意识形态，任何身份诉求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所以都是非法的。

土耳其政府迎来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土耳其反对党称它是“对共和国的一个严重打击”。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迟来的改革。土耳其评论家齐亚·梅拉尔（Ziya Meral）说：“当妇女开始公开在工作场所戴头巾时，摆在土耳其面前的挑战不是它是否越来越宗教化，而是土耳其最终是否将从一个严格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变为一个可容纳多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国家。”

另一项饱受争议的改革是在教育领域。1997年以前，土耳其义务教育只有5年时间。在学生接受完小学教育后，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是将孩子送入传统中学还是职业学校。职业学校中包括为清真寺培养宗教人员的伊斯兰宗教学校。这些学校在常规课程外，每周安排13小时的伊斯兰课程。1973年以后，这种学校的数目就呈几何式增长。1997年，每10个中学生中就有1个在这样的学校学习。1997年政变后，土耳其军方对教育进行改革，将义务教育延长至8年，使学生进入宗教学校的年龄不会低于14岁。同时，大学入学考试体系对伊斯兰宗教学校的毕业生提高了门槛。其结果是，伊斯兰宗教学校的入学率从11%下降到了2%。其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75%下降到25%。2012年，正义与发展党颁布了“4+4+4”教育改革。这项改革将义务教育年限增至12年，但从5年级开始，学生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职业学校学习。

毫无疑问，埃尔多安治下，伊斯兰在土耳其公共空间的呈现越来越多了。但以此判断土耳其走上“伊斯兰化”道路并不客观。施展指出：“复兴伊斯兰与伊斯兰化是完全两回事，它有一个质的区别。复兴伊斯兰指的是在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政治不再那么严格地压制宗教了，而伊斯兰化指的是宗教要反过来控制政治。埃尔多安上台之后，他复兴伊斯兰的种种努力让外部特别是欧洲感到，土耳其似乎是在往伊斯兰化的方向走。但以头巾为例，美国都不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土耳其却禁止。埃尔多安允许妇女戴头巾，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宗教正常化的现象，并不是说允许戴头巾就是要伊斯兰化了，这是两回事。所谓的埃尔多安伊斯兰化的进程，严格说来是把政治对于宗教的控制和管理逐渐放开。”

咎涛指出，关于土耳其伊斯兰化问题的讨论很多时候是站在西方世俗主义的立场上申论的，并没有真正站在土耳其大众社会的角度上看。从历史脉络来看，即使是在奥斯曼帝国也没有真正建立过所谓的教权主义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的教权国家。现实政治力量强于宗教，国家有正常的政治运作。统治者为自己预留了很大的权力空间，也存在与伊斯兰教法并行的立法实践。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并不是凭空创建的，也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我们无法知道埃尔多安将来会往哪个方向走，埃尔多安他自己也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法。”施展说。不管埃尔多安究竟是谁，挫败政变都不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绝对权力。2015年6月份的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的席位没有过半数，尽管在11月重新选举时获得简单多数，可见在政治程序上对埃尔多安及其党派都还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作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至今依然有着加入欧盟的意愿，这些都构成了约束土耳其的外部条件”。

“现在摆在土耳其面前的难题是：对于这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应该实现什么样的长远的、具有创新性的政治秩序安排。”咎涛指出，政变过后，埃尔多安已经具备决定土耳其未来走向的机遇和能力。选择成为一个伊斯兰保守主义者，推动伊斯兰化的进程，还是扮演一个调和性角色，不完全抛弃世俗主义和土耳其现代国家的基础？短期主动权在埃尔多安手里。■

（参考资料：《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历史机遇》，咎涛著）



刘伟学的爷爷刘有泉，最早组织恢复起余杭油纸伞的生产

刘伟学：寻路余杭油纸伞

记者 / 艾江涛 摄影 / 张雷

寻找复原传统油纸伞之外，刘伟学等人试图在许多衍生产品中融入伞元素，使余杭油纸伞获得伞之外的其他生命形态。

余杭区比想象中要大。从喧嚣的杭州火车东站，朝西北方向驱车一个多小时，在一团团翠绿欲滴的毛竹林环绕之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位于瓶窑镇西坞村的“纸伞之家”。这个工作室是在刘伟学爷爷的老屋基础上重新设计而成。去年7月，从杭州师范大学设计系毕业一年后，刘伟学说动高中同学汤薇、大学同学王胜跃，一起隐居山里，开始用全新的眼光，重新挖掘流传200多年、一度几近消失的余杭油纸伞。

刘伟学的决定深受爷爷刘有泉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钢骨洋伞兴起之前，余杭油纸伞行销全国，加上许仙和白娘子的民间传奇，已成为烟雨蒙蒙的西子湖畔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油纸伞退出生活的速度快得惊人。1982年，当自幼喜欢鼓捣东西，先后做过电工、酿酒师的刘有泉，跑到浙江富阳买了100把伞骨，想在家乡办个油纸伞厂时，却发现身边几乎找不到做伞师傅。做伞的念头自此被埋藏起来，直到2006年，在区领导安排的一次老干部招待会上，刘有泉恢复余杭油纸伞的想法受到重视。在媒体报道下，刘有泉找到余杭地区4个做伞的老师傅，自此恢复零星的纸伞生产。还在读中学的刘伟学经常在饭桌上听爷爷谈起纸伞的事情，课余也会跑去看老师傅们做伞。那时他喜欢动手做一些东西，喜欢在课本上画飞机、坦克、航母等“洋气”的东西。“尽管家里人觉得爷爷随便做做，玩玩就好，但我却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刘伟学说。

但真正打动刘伟学的，还是在2011年米兰设计周SaloneSatellite上火了一把的纸伞与衍生品设计。“那些纯色纸伞，很简约很有设计风格，如果做出这样的油纸伞，我肯定会需要啊！”事实上，这些纸伞，正是余杭设计师张雷与在爷爷纸伞作坊干活的老师傅一起打磨了几个月的产物。



“纸伞之家”设计工作室负责人刘伟学

2014年大学毕业后，刘伟学干了一年室内设计，天天画图，整个人变得非常低落，觉得生活没有任何意义。重新设计油纸伞，似乎重新点燃了他的激情。他和汤薇前去拜访张雷，在后者的启发和鼓励下，从爷爷手中接过了余杭油纸伞的制作。

张雷还帮助刘伟学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将老屋设计改造为纸伞之家工作室。一楼作为生产与演示区，包含了纸伞从锯竹、刮青、平头、劈骨、锯槽、削骨、排伞骨、穿伞、糊伞、装柄、刷桐油等所有制作环节。在爬山虎与阳光掩映下的二楼，则是伙伴们的办公与休息区。当我们到工作室时，三位阿姨正在一堆材料中忙着排伞骨、糊伞、绷花线，地上墙上所盛开的，正是一把把油纸伞。



湿糊纸伞老师傅孙水根



纸伞制作之缠花线



纸伞制作之排伞骨

爷爷的 100 把伞骨

“我做的事业还挺好。”带着浓重的余杭口音，73岁的刘有泉说。事实上，他是这个有200多户近1000口人的西坞村最有影响力的人。1984年起，从村办涂料厂，再到瓶窑镇涂料厂，厂子性质由集体到个人，直到2003年由于环境问题被彻底关停，刘有泉当了30年涂料厂厂长，由于业务的原因跑遍了小半个中国。1993年起，他还兼任了6年西坞村村长，一届余杭区人大代表。让刘有泉自豪的是，小时候整个瓶窑都在用爷爷生产的老泉牌胶水，也正因此，直到现在，他做油纸伞所用的仍是爷爷独家调配的胶水。

记忆中，爷爷对传统的东西非常喜爱。在刘有泉很小的时候，爷爷便组织了村里的一拨人，制作富有当地特色的一种鱼灯（龙头鱼尾），并在每年元宵节

舞灯猜灯谜，当年那些热闹的场景至今印象深刻。在汤薇眼里，刘爷爷喜欢折腾，聪明能干。他全靠自学，能在过节时画灶头的财神像，后来又画油纸伞的伞面。架子上一排五颜六色的纸伞，伞面上龙凤呈祥、花枝招展，都出自刘有泉的手笔。只是看着师傅做，刘有泉很快可以劈出细溜儿挺括的伞骨。更为难得的是，他具有那种将技艺与产品相结合的能力。

只是，在1982年刘有泉想创办恢复余杭油纸伞时，困难似乎比他想象得更多。调查了一圈，他只在老余杭（原余杭县）找到一位80多岁做伞骨的师傅。王师傅让他先去富阳买些伞骨回来，学到伞骨的做法，再接着找糊伞师傅，这样慢慢做起来。刘有泉跑到富阳，花300多元买了100把伞骨回来，然而却很难再找到其他工种的师傅。1984年担任涂料厂厂长之后，事务繁忙的他，无奈之下，只好暂时放



孙水根的徒弟正在糊伞面

下了做伞的念头。

这一搁就是20年。2006年，余杭区搞“文化下乡”活动，组织刘有泉等一批老干部座谈。刘有泉提起自己所收藏的100把伞骨，希望找到做伞的老师傅，恢复余杭油纸伞的生产。在媒体的帮助下，刘有泉的想法这次很快得到了回应，4个家在临平镇（今余杭区政府所在地）的老师傅先后找上门来，其中，当时60多岁的房金泉、陈月祥是骨子工，70多岁的孙水根是糊伞工，沈丽华则负责串线与纸伞组装。

刘有泉负责技术之外的所有事情。他投资十几万元，很快在第二年成立了伞厂，并注册了“仁仙”品牌，“仁仙”两个字用当地话讲像“神仙”，刘有泉希望把许仙和白娘子的传说色彩注入自己的品牌之中。硕果仅存的老师傅先后办了两期学习班，在他们的带领下，伞厂很快有了十来个人。但纸伞的市场依然非

常小，老师傅们每次过来做一两个月，不过生产几十把伞，主要作为政府的文化宣传之用，偶尔被带到一些活动庆典展示。直到2009年，设计师张雷将自己的想法带到这里，才让新生后的余杭纸伞首次有了走出国门的机会。

老师傅

尽管在爷爷的影响下，对纸伞的制作早已耳濡目染，但刘伟学正式做伞的时间不过一年多。除了思考设计与市场，他也在老师傅的指点下，不断琢磨做伞的技艺，已学会开槽、撑伞、装柄、画画等相对简单的技术环节。

劈伞骨是纸伞制作的首要工序。传统的余杭油纸伞有36根长伞骨与短伞骨，通过卡槽连接，配以用木头加工的形制精巧的伞帽和伞撑，打开之后，辐条紧密细致，俨然是精美的工艺品。

首先要将竹子锯成长短均匀的竹段，在水中浸泡一周，刮青之后才进入劈的环节。刘伟学介绍，6年生以上的冬竹，由于水分较少，是做纸伞的最佳材料。劈伞骨的一个关键细节是，劈前要在竹筒上画一条曲线作为标记，伞骨劈好，通过一个脚踩带动锯齿的机器开槽后，女工再依据画线标记将伞骨排好，确保合拢后的竹节严丝合缝。劈伞骨看似简单，实则极为考验功力，这也是为什么只有老师傅才能做好的原因。刘伟学坦言：“以前经常在山里用刀干活的老人，要劈好都要3年，像我们这样很少拿刀的人，最起码要四五年才能熟练掌握。”

1952年底，浙江省成立“雨伞手工业合作社”。1956年，12岁的房金泉跟随父亲来到临平，学做伞骨。比他大10多岁的孙水根则是合作社中负责糊伞面的师傅。在他的记忆中，1962年前后余杭纸伞生意最好，最高峰时年产50万把，许多人远道而来，凭票排队买伞。但随着机器生产的钢骨伞流行，余杭纸伞节节败退，1967年，纸伞厂最终被并入服装厂，房金泉成了服装厂的保卫科长，孙水根则跑去管生产。40年间，两人没有再做纸伞，直到2006年，几个人被刘有泉再次聚拢起来。

当刘伟学将一把做好的工艺伞带给孙水根，已经80多岁的他马上撑开纸伞，一边用手摩挲着伞面，一边点评起来：“怎么样算一把好伞？撑开以后，伞骨之间的纸要稍微凹下去一点，如果鼓起来就不好，容

易撑坏，而且没法收紧；另外，要看不同纸层形成的圆够不够圆，贴得好不好。”

2006年，再度开始做伞后，孙水根等几个老师傅在刘有泉的带领下，又专门去富阳考察了一圈。他们发现，那边的纸伞伞面用两张纸就糊完了，半张纸半个伞面，纸张也不用浸透胶水，只在伞骨与纸的结合处涂抹两遍。如此一来，制作速度虽然快，但质量则不及传统的余杭纸伞。刘伟学也意识到，与其他地方相比，余杭纸伞用浸透胶水的小块纸张所糊的扇面，更为耐水牢固，这也是他们需要保持的优良传统。

但一些传统材料的替代，似乎也不可避免。传统余杭纸伞，以桃花纸（一种薄而韧的桑皮纸）为伞面，在柿子漆里浸透，然后一张张粘贴在伞骨上。柿子漆是在油柿青时所捣的汁液，富有黏性。刘伟学用爷爷自制的胶水替掉取用不便的柿子漆，效果相同，用韧度更好带有天然纹理的皮纸替代桃花纸。尽管如此，在孙水根看来，传统材料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妙处：“往纸上刷时，胶水最多渗进去两三层，但柿子漆七八层都能渗进去，糊起伞面来速度更快。”

设计纸伞

2009年，渴望将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材质融合的设计师张雷，在西坞村遇到了房金泉师傅。按照张雷的设计图纸，房金泉将伞骨的前端做成弯曲的形状。此外，张雷还用做纸伞的纸张做了椅子等衍生产品，在2011年的米兰设计展大获成功。2015年，刘伟学和汤薇一起拜访张雷后，深受启发，他们决定一面以现代的设计思想，把传统余杭油纸伞做精，一面开发围绕纸伞文化的衍生产品。

汤薇是刘伟学高中学画时同一个画室的师妹，王胜跃则是刘伟学的大学同寝室友。三个关系要好的同学都喜欢传统手工艺，几次聊天后一拍即可，刘伟学总领其事，汤薇更偏设计，王胜跃则负责摄影与营销。前期的分工并不明晰，忙起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动手。几个富有想法的年轻人，在工作中的矛盾与争吵也在

所难免。一次，大家讨论一款以纸伞文化为主题的笔记本，刘伟学认为前期一定要紧扣纸伞做设计，汤薇则不以为然，认为笔记本用纸就是做纸伞的纸，材料本身就是伞文化的体现。

最初，他们还要努力扭转制伞师傅的一些固有认识。“比如黑色的伞，我们配纯黑的线，阿姨她们就不能接受，觉得太丑了，缠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才好看。”汤薇拿起一把刚做好的纸伞，“以前的伞头都包在纸里面，现在把伞头都露了出来，在设计上有屋檐的感觉。”尽管开始不太接受，经过反复沟通，制伞师傅逐渐接受了这些年轻人的想法。

在张雷的提议下，刘伟学开始尝试制作直径3米的大伞。这种形制的大伞在当地传统中久已不做，其他地方也鲜有此类产品。从劈伞骨到糊伞面的每个环节，都是考验。起初，房金泉用两三个月时间试做了五六把大伞，虽然可以勉强撑开，但依然存在各种问题。在去临平拜访孙水根的车上，汤薇讲起制作中的困难：“刚做出的大伞很紧，要三个人才能撑开。”通过研究，他们发现主要问题是因为开槽太紧太短。不久，房金泉生病回家，一下没有劈伞骨的人了，爷爷刘有泉只好帮着劈伞骨。加上之前所做的伞，大家前后共试验了十几把大伞，最后选出两把，交由张雷带去参加2016年初的巴黎Maison Objet家居装饰博览会。展会上，这些大伞很快被人买走。博览会上的好评，还为他们吸引到一批来自欧洲的订单。

刘伟学希望将纸伞的工艺性与实用性结合起来，除了工艺品市场，目前也有一些民宿点前来询问。尽管陆续有了一些订单，汤薇认为他们的伞依然不够完美。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出于耐用牢固的考虑，伞柄用木头制作，再加上余杭油纸伞采用湿糊纸张的做法，使得纸伞打起来偏重。做好纸伞后，再围绕它做一些自然的衍生品，“就像爱马仕开始只是做马具，后来因为大家骑马要围纱巾，慢慢开始做纱巾等周边产品”。汤薇说。在孙水根家中，刘伟学谈起衍生产品显得更为激动。在他看来，从台灯灯罩，到家具用品，许多地方都可以融入伞元素，让余杭纸伞获得伞之外的其他生命形态。

更重要的是，与钢骨伞相比，纸伞可以修补，一把使用多年的纸伞，色彩变化，承载着一份时光的记忆。“我们有把油纸伞打了五六年，纯白的伞面已经泛黄，上面打了很多补丁，但我们觉得很漂亮，有种岁月沉淀的感觉。既然是人用过的东西，怎么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呢？”汤薇说。■

与钢骨伞相比，纸伞可以修补，一把使用多年的纸伞，色彩变化，承载着一份时光的记忆，有种岁月沉淀的感觉。

土地利用规划纲要，结构与布局的优化

——专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谭纵波

记者 付晓英 实习记者 周缘



云南省西畴县的村民在收割水稻

城镇化进程与耕地、农田保护之间存在着先天矛盾，而土地利用规划纲要调整方案的出台是针对现实矛盾做出的重要调整。

今年6月底，经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调整方案》印发实施，对全国及各省（区、市）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等指标进行调整，并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进行优化。

《调整方案》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在耕地调整方面，按照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确保现有耕地数量稳定、质量不下降的要求，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65亿亩。在基本农田调整方面，按照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基本稳定、优质耕地优先保护的原则，规划期内，确保全国15.46亿亩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而关于建设用地的调整，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

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到2020年，全国建设用地总规模为4071.93万公顷（6.1079亿亩）。在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优化方面，在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和保持现有基本农田布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对基本农田布局优化调整，将城市周边、道路沿线和平原坝区优质耕地划入基本农田，提高基本农田质量；在对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时，坚持保护优先，建设用地安排要避让优质耕地、河道滩地、优质林地，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空间；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严格控制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用地规模，合理安排大中小城市用地；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促进农民住宅向集镇、中心村集中；合理调整产业用地结构，保障水利、交通等重点基础设施用地，优先安排社会民生、脱贫攻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国家扶持的产业发展用地。

此番调整后，全国在2006年到2020年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发生了显著变化，建设用地面积增幅高达65%；而耕地保有量与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这两项耕地指标在总量上基本保持不变，但不同地区的指标分配结构发生变化，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明显降低，

而东北地区的耕地指标则相应上调，如黑龙江耕地保有量指标由 1163.20 万公顷增加到 1387.13 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从 1017.60 万公顷增加到 1109.73 万公顷。

在距离 2020 年仅剩 4 年之际，国土资源部出台土地利用规划纲要调整方案，此举引发了业内很多关注和讨论，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对土地利用规划和政策思路在悄悄发生变化？为此，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谭纵波，对调整方案进行解读。

三联生活周刊：6 月底，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调整方案》，对全国及各省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的总规模等指标进行了调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台新的调整方案？

谭纵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人的专业领域是城乡规划，更多的是从城乡规划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按官方的说法，调整方案的出台主要目的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我的理解是，经过“十八大”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来市场经济、依法治国、新型城镇化等新的理念的推进，土地利用规划也按照新的目标导向做出了调整。

中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是快速城镇化，而非依赖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进步，这当然不是说农业不重要，而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核心矛盾不是农业，而是城镇化。既然城镇化是带领国家发展的动力，那它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去释放动力。所以，一部分国土空间毫无疑问地要用作城镇建设。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每年有 1% 的人口，大约 1000 万～2000 万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规模以上国家的人口，对空间的需求是巨大的，但中国没有相关的政策文件去正视这种发展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没有给予这种压力正面的释放。

有压力就要释放，管是管不住的，所以在管理过程中会出现诸多问题。现实的矛盾导致地方政府在实施土地利用总量控制的过程中，或多或少、被迫无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文字、数字和实际情况发生偏离。对于中央来说，保护耕地是一个原则问题，但落实到具体的基层的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总得想办法把城镇化的压力释放出来。调整方案出台后，大幅提高了一些建设

用地的指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来的指标不合理，现实的用地规模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规划，调整是让指标和实际情况更加吻合。

三联生活周刊：此次的调整方案中，不同省份地区的用地指标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北京、江苏、广东等发达地区的耕地指标都进行了下调，东北地区的耕地指标则相应上调；河北的建设用地上调了 188%，而北京的建设用地指标却是下调的，这在大城市中非常罕见，不同地区之间用地指标的增减调整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谭纵波：土地利用究其根本是一个国土空间如何科学、高效、合理利用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960 万平方公里是不会增加的，所以这是一个在固定的盘子里如何划分比例的问题。资源一定是被配置在最高效的地区，大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高于中小城市，更远高于农村地区，要正视这个问题。

因此，从现实角度看，把耕地指标分配在大城市周边是不太划算的，大城市周边地区，享受着交通的便利和产业、设施、服务的外溢，同样面积的土地用作农田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远高于偏远地区。而耕地指标在全国范围内统筹，重要的是保证总量不减少，以此确保粮食安全。至于耕地如何布局本来就有调整的余地。大城市的耕地面积本身就非常有限，比如北京、上海各自只有 20 万公顷的耕地，而黑龙江省的耕地面积有 1000 多万公顷，因此，从全国来看，让农业地区来分担发达城市地区的耕地指标是相对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

对于北京的建设用地指标下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首先，北京在土地利用方面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对比一下上海内环和北京三环路内的高楼密度就能看出来，当然，这里面存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问题，但用地效率低也不可否认。另外，这也是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政策要求。至于河北的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我认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相关，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出去，作为承接地的河北必然会增加建设用地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2014 年 11 月 3 日，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要求为北京、上海、广州等 14 个大城市划定边界，强调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今年 8 月，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这应该如何理解？农田保护与城市开发是否存在矛盾？

谭纵波：基本农田、耕地与建设性用地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先天就存在着矛盾。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张，一定会占用越来越多的土地。不过，很多人在土

地利用规划方面的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只有城市建设占用了农地和林地。但事实上，除了单一城市空间的扩展，城市之间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比如说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的建设，使得单一的城市之间互相联结成为一个网络。中国的城镇化也不例外，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进行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之间的通达互联在农业社会中是不需要的，也没有生产力能实现这一点，但在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会经历这些。这些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会占用农田耕地，这是城镇化必然的结果。反过来讲，为了保护耕地，是不是就不发展高铁了？显然这是一个悖论。根据现实发展需要，土地利用规划肯定要进行相应调整。

至于最近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我个人觉得有些问题。首先，永久的定义是什么？多久能称得上永久？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永久的问题。而更关键的是，中国现在处在快速城镇化时期，无论是城市本身的发展还是城市之间的联系，都必须占用土地资源，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除非不发展了，否则这个动态不会停滞。

耕地很重要，城镇化同样很重要，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回避。而且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上层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了解，但到目前为止，采用的是一个比较迂回的解决办法。现在出台的这个调整办法也是诸多努力的一种，比如说某地的一块区域已经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但在地图上显示的还是农田，那就给此地再增加一些城市用地的指标，这是应对现实具体问题想出来的缓解矛盾的对策，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问题解决路线。不过，从城市建设领域来看，我觉得虽然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但是在正视城镇化对国土空间的需求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所以，从国家发展角度去考虑问题，国土资源部门一定要对国土空间有一个综合的、通盘的考虑，正视城镇化对空间的客观需求和压力，如果置之不理，基层执行的时候还是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绕开政策。

三联生活周刊：依中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城市扩张与耕地农田保护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缓解？

谭纵波：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很难真正去缓解。《调整方案》计划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4071.93万公顷，大致是41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是4.27%。我认为无论是《土地管理法》还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它应该在大盘子里做一个切分，这是合理的，而不只是单纯强调耕地保护。耕地当然重要，但城镇化也要推进，我国的城镇建设用地不足5%，但超过90%的经济发展由

它完成。城镇化的红利在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远远高于农村，同样面积的土地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和在农村是完全不同的。城市的建设用地增加，农村的建设用地相应减少，在这个过程中是有红利的，如果推进合理的话，人均占有土地资源是可以降低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二元的土地所有制度和管理制度，也就是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土地制度。这导致的问题是农民进城不完整，他没有获得城市居民应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以至于不敢放弃农村占有的土地，就形成了一个“两头占”的问题。如果城市能把社会保障做好，把农村的建设用地转换成耕地或者非建设用地的话，城镇化是有正面作用的，这是利用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来释放土地资源，也就是《调整方案》中提到的“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

现在农村土地已经开始流转，它分成两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农—农流转和农—建流转。农—农流转是从农田到农田，不涉及土地性质的改变，主要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比如说原先几亩的土地效率不高，通过土地集约化连成几百亩土地，集中从事农业生产。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原本的农业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化，这最初在成都、重庆试点，现在北京也有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这个问题，之后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但是，宪法中规定土地是公有制，也就是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这个规定没有突破的情况下，试点是可以的，但我认为要全面开展的话就会面临法律瓶颈，它涉及中国的社会制度，在现实环境中有所突破比较困难。所以这件事情能否理想地完成，有待观察。

总之，要缓解两者之间的矛盾，不能仅仅考虑一两个方面的问题，理想状态是实现一个综合的平衡，既考虑农业生产，也考虑到城市发展；既考虑到城市过大会不会带来一些负担，也要考虑到单纯地利用行政指令迁出一些功能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这是一个综合性政策，而不是解决一两个问题，其他问题就不存在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土地利用规划调整方案的出台，是否意味着国家对土地利用规划和政策思路在悄悄发生变化？

谭纵波：在根本的土地利用规划上，方案仍然坚持18亿亩的耕地保有量“红线”，但是，我更愿意把18亿亩理解为一个抽象的象征，这个红线保证了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具体数字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不过，《调整方案》的出台，说明上层开始注意到了土地利用规划的数据和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来看，《调整方案》的出台是有积极意义的。■

国际饭店，观察中国开放史的另一种通道

记者 刘敏

罗坤的“设计改革：国际饭店与中国建筑 1978～1990”展览，其研究对象选择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饭店。

1982年北京建国饭店开业时，长安街东延线还是一片郊区景象。这座9层的四星级饭店拔地而起，立刻成了新的地平线。

这座由2260万美元投资建成的国际饭店共有480个房间，每个房间都安装了一台彩色电视、一部按键拨号的电话机，在房间里还能使用中央空调——这些稀罕的新配备闪闪发亮，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饭店。

30年后，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罗坤（Cole Roskam）开始研究建国饭店时，他发现了更多有趣的细节：建国饭店的项目是由至少15名人大常委和1名副委员长集体批示，交给国务院总理后，最终由华国锋拍板立项的；建国饭店修了迂回车道方便人们下车直接进入大堂，这种酒店车道如今随处可见，然而当时整条长安街上都没有几台汽车；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客人知道这座饭店的地下还有一排防空洞，这明显是“冷战”时代遗留的产物。

罗坤的“设计改革：国际饭店与中国建筑 1978～1990”展览，其内容是罗坤近年的研究对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饭店。包括1974年建造的北京饭店东楼，1982年的北京建国饭店、北京香山饭店，1983年的北京长城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1990年竣工的上海商城。

“这些国际饭店很多都是中国的第一批中外合资项目，许多当时国际上的建筑表达方式也是第一次由此被引入中国。”罗坤对中国非常熟悉，他从1997年开始，数次在中国进行长期的学习和工作。罗坤把这些国际饭店看作一种奇妙的介质：在“文革”刚刚结束的80年代，人们还在信奉着社会主义精神理想，同时在这些国际饭店中公开开展的旅游和酒店活动又是最资本主义的商业行为。“我想研究当时的中国是如何将国际饭店中的一切变得合理化的，这其中的矛

盾与悖论令我着迷。”

这不得不提到这些国际饭店们相似的时代背景。1978年对外开放后，大量外国游客涌入中国观光，当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就达到180多万，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然而国内的旅游设施远远满足不了激增的外宾，北京当时仅有7家涉外饭店，其中能用的床铺只有1000张，更不要提服务水平了。很多外宾一下飞机，直接被拉去长城、故宫参观，晚上再送去刚腾出来的床位下榻。有时候北京实在没有床位了，甚至要临时把客人送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第二天再接回北京。

旅游业，无疑是当时的中国获取外汇最直接的方式，可此时的中国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国际饭店。1979年1月，中国确定了第一批引进外资的试点项目，001号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002号、003号就是建国饭店和长城饭店。

华侨陈宣远是建国饭店的美国合作方，他在美国拥有4家假日酒店和一家建筑事务所，拥有丰富而现实的经营经验。陈宣远负责筹措这座饭店的全部资金，以双方投资（中方51%、外方49%）的形式共同建造和经营。中国为建国饭店计价提供地皮、劳力和砂石料等，外方负责设计和进口材料、设备等。罗坤在资料里看到，陈宣远当时还从中国政府处得到了一个保证：如果中国发生了任何政治动荡，陈宣远在这个项目中的负债将全部由中方负责。

建国饭店由北京市旅游局与陈宣远合资兴建，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经中国银行担保提供贷款。在这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国家，中美合资的方式是新的，旅游业相关基础建设的贷款也是新的，连着国际饭店这个概念，一切都是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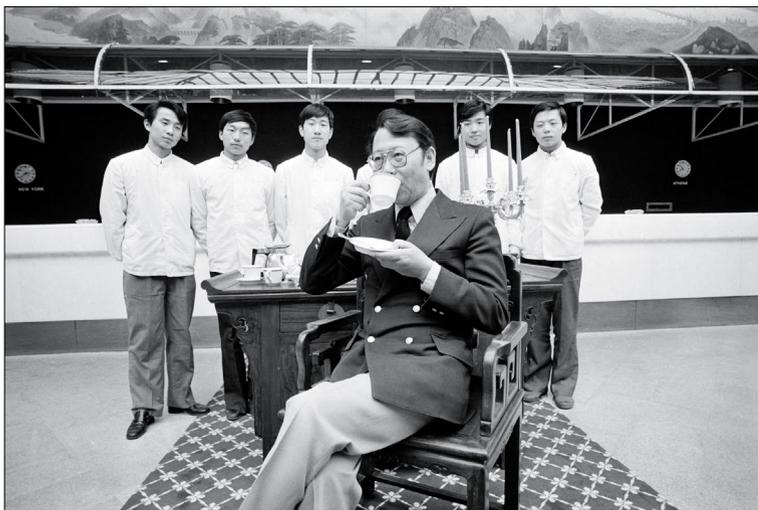
一切都是新的

为了做研究，罗坤采访了30多名相关人士。隔着30年的时光回望，很多人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足国际饭店时的兴奋感。那些簇新的空间展示着另一种建筑美学，中国人在这里认识海外的新朋友。有人告诉罗坤，北京饭店的酒吧有个别名叫“动物园”，



(新华社供图)

1



(刘香成摄)

2



(受访者供图)

3

1. 1980年6月27日，中美合资建造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建国饭店在北京开工建设，图为在工地举行的开工典礼

2. 陈宣远在建国饭店

3. “设计改革：国际饭店与中国建筑 1978~1990”展览的策展人罗坤

因为不管是外国游客还是中国顾客，都在这里一刻不停地打量对方。

硬件建好了，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酒店管理的概念，建国饭店头5年的管理团队是从香港地区整个请过来的。最开始陈宣远说“中国没有饭店”时，中方还完全不理解，经营起来才发现意识上的巨大差别。

有一次法国总统来华，点名要在建国饭店里宴请宾客，恰巧赶上建国饭店走廊天花板有一处漏水。中方人员下意识地要找脸盆接水，再赶紧树一块“请绕行”的牌子。外方经理却叫来了一名穿着黑西服的男领班，男领班看上去是在给客人引路，实际上他一直站在漏水点下面，悄无声息地用身体接住滴水。从始至终，



香山饭店（摄于1982年）

所有客人都丝毫没有察觉。

在长城饭店，罗坤听说了更有时代感的故事：长城饭店专门颁布了一个禁令，禁止员工在饭店的公共卫生间里洗头——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中方员工的家里都洗不了热水澡，大家自然希望能利用工作便利。但是作为一个国际饭店，让客人看见员工在公共卫生间里洗头无疑又太令人尴尬了。“国际饭店里的中国员工要接受很多训练，怎么去服务，怎么穿衣服，甚至是怎么以规定的标准剪头发，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

冲突之外，融合也是迅速的。

中国的艺术家们在国际饭店里推广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接触成熟的艺术品市场。1981年，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做了第一场面对普通观众的服装表演，这也是中国观众看到的第一场T台走秀。中国的摇滚乐几乎是生发于北京的国际饭店里，崔健早年基本都在长城饭店、马克西姆餐厅等涉外饭店、餐厅演出，外国游客是他们最早的观众。

国际饭店很快显示出了自己的文化和经济价值。罗坤被国际饭店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深深吸引：“这些饭店完全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微型经济特区，这里的经济活动与饭店外的世界截然不同。”例如第一批入华的海外银行，都把北京办公室设在了建国饭店的一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用“华尔街”来称呼这里。

在美国人罗坤的眼中，这些国际饭店也是一个外交场所。国际政坛领导访华时都住在这里，中国大陆

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首次交往，也都放在了国际饭店的环境之中。国际饭店变成了中外企业家联络的渠道，早期的投资者大多是海外华人，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往中，“文革”造成的僵化印象被渐渐打破，很多海外华人群体开始建立对中国大陆的信任。“考虑到当时人们对香港、澳门能否顺利回归还抱有疑虑，这种在国际饭店中的前期交往，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策略。”

国际饭店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带来外汇，也让特定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跟当时国家的大环境一样，很多保守主义者对此有不同声音：一些人认为，应该避免让大众过多地了解国际饭店中的那些市场经济活动，以免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国际饭店的灯红酒绿，在他们看来，也是贪腐和精神污染的代名词。

跨过时代的距离回望，罗坤觉得，在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堂里，人们还是更直接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改革开放”。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号在这里以咖啡、法国餐厅、迪斯科派对的形式体现，在中央空调徐徐的暖风中，一切都变得真实可感了。

从新潮变老牌

现在预订软件中搜索“北京建国饭店”“香山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留言中最常见的评价是“老牌酒店”“服务好”“名气大”，国内游客已经成为这些饭店的主流客户。

30年前还是另一番景象。罗坤在访问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饭店从图纸到实物，中途都进行了大量改动，其中最常见的改动居然是针对中国市民的：为了不让街上的普通中国人随随便便就走到饭店里去，很多饭店都添加了限制措施。像上海商城就在门口设立了保安，还在大门处修了两个巨大的抽象牌楼，以震慑住想进去转转的行人。“当时的中国政府一方面担心普通中国人会给外国客人造成麻烦，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普通市民过多地暴露在国际活动之中。”

“我听到了一大堆关于中国市民如何想进入国际饭店，又被各种办法阻挠的故事。你可以想象一下，在80年代，一个普通市民眼看着街上建起这么一个漂亮宏大的新建筑，自己却没法进去看看，整件事都显得特别奇怪。”在展览中，罗坤专门选了一些照片，显示那些宏伟的国际饭店与周边的环境有多么格格不入。

国际饭店的建筑自身就是一种奇观。建国饭店为了追赶工期、降低工费，直接复制仿照了陈宣远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假日饭店，又因为周围外交部宿舍居民对采光的强烈要求，最终变成一边只有4层半高，另一边只有9层高的设计。这个美国乡村旅店风格的饭店整体朴素、低成本，它快速建成，又快速盈利。

北京香山饭店完全是另一番局面。“无论对建筑师还是对中国政府，这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罗坤总结，“贝聿铭想以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来建造，但中方更希望看到一个现代、新潮的国际饭店。”香山饭店的325间客房以“之”字形布局，曲向延伸出5个方位，整个建筑高度不超过4层，中央是一个3层楼高、玻璃屋顶的庭院。每一间客房的窗户均向庭院敞开，窗户就像画框一样将美景引进住客视野。但饭店一建成，就被中国学界批评造价过高、房间利用率太低（平均每间客房的面积有118平方米，比同期在北京建造的13家酒店平均多出来44%）。贝聿铭从南方运鹅卵石，自己找人烧青砖并人工磨齐对缝，这些对细节的严格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内建筑界对工时工费的心理承受能力。

北京长城饭店、南京金陵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和上海商城，都还是最明显的高层建筑形式，这些大楼都建在了城市的中心地区，向人们展示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建筑形式。作为建筑学学者，罗坤发现，这些国际饭店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承担着引进最新建筑技术的使命——在“文革”中，中国的建筑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内地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施工方们，都是通过这些国际饭店，开始学习全新的混凝土加固技术。那些在市中心闪闪发光的巨型高楼，第一次把玻璃幕墙、现代线路系统和公用工程系统引入中国，像直梯、自动扶梯、有线电视这些如今已经熟视无睹的设施，最早都是国际饭店里令人咋舌的舶来品。

“如果一定要给这些国际饭店找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政府希望能从这些合资饭店里学到最多的先进建筑技术，然后迅速使用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政府更希望能给外宾们留下好印象，以便能尽快地吸收外汇。”罗坤总结。

30年过去了，这些昔日豪华的国际饭店，大多已经历了第二次翻修，以便能跟上当下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酒店业激烈竞争。我们问罗坤，这些国际饭店昔日树立的审美标准和先锋形象，是否已经彻底消弭

了，毕竟更多本土和国际知名品牌的酒店已经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老牌国际饭店的光辉，似乎已经被历史渐渐掩盖了。

“当我们审视当下的中国都市时，其实还是能看出当年这些国际饭店带来的深远影响——为了抓取吸引力而高层建筑、摩天大楼广泛使用的玻璃幕墙、建筑内外大量光泽的表面、奢华的酒店环境，以及为富有精英阶级提供的各种设施——这都是老牌国际饭店带来的价值取向。”罗坤在访谈中发现，很多眼下知名的中国建筑师都有到这些国际饭店里参观的经验。尤其是知名美籍华裔建筑师张永和，他当年的实习，就是在陈宣远的旧金山公司里参与建国饭店的设计。

“跟更新、更奢华的新酒店相比，它们也许算不上先锋了，但放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看，这些国际饭店都是重要的先行者。”罗坤说。

在即将开幕的展览中，罗坤的很多展品都是从不同的设计院、建筑公司等渠道借来的，大多数机构都很愿意配合他的展览。但在寻访过程中，这位美国学者也遇到了很多冷脸。“有些人觉得自己知道的信息太敏感了，很多当年党内的参与者参与了国际饭店的早期投资，由此接触到了国外资本，并获得了普通中国人远远无法获得的巨大收益，其中一些人至今还是这些国际饭店的投资人，他们并不想跟我讨论其中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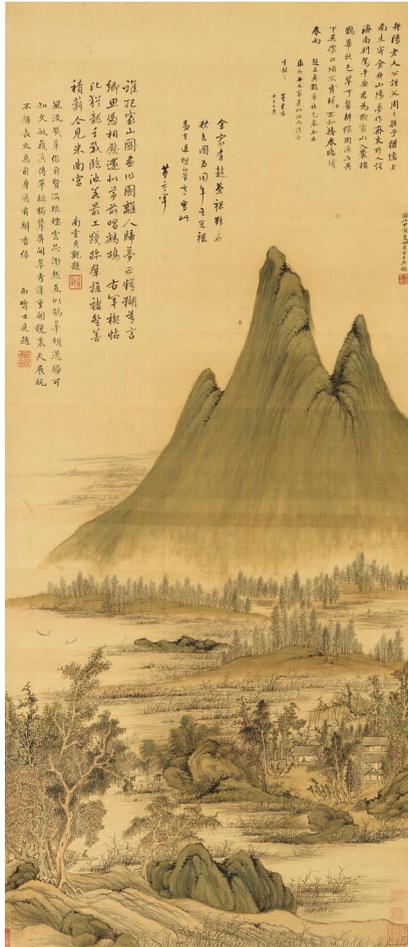
展览中可以被展示的是，这些国际饭店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建国饭店一开业，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95%的入住率。陈宣远向建国饭店投入了1000万美元资金，次年，他就获得了150万美元的净利润，而且以每年2倍的速度持续增长。10年之后，按照最早签订的合同，陈宣远慷慨地将所占有的49%股份以1美元价格转给中方所有，此时建国饭店创造的利润早已相当于7到8个建国饭店了。“1美元买一个饭店”，这是又一个只属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传奇故事。■

跟更新、更奢华的新酒店相比，老国际饭店也许算不上先锋了，但放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看，这些国际饭店都是重要的先行者。

◆ 罗伊与玛丽莲·派普夫妇的中国绘画藏品 ◆



1



2



3



1. 王原祁《虞山胜景》，水墨纸本，立轴

2. 方士庶临董其昌仿赵孟頫《鹊华秋色》，设色绢本，立轴

3. 蓝瑛《桃花源》，设色绢本，立轴

4. 王翬等《康熙南巡图》第六卷部分：从奔牛镇经大运河至常州府，设色绢本，手卷



4

派普夫妇的中国书画

记者 李晶晶

罗伊与玛丽莲·派普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以谢赫“六法”为标准，遴选最贴合他们夫妇心目中的中国绘画。选画不论画家名头大小，只论作品是否有古人遗风，且能让后世画家有所借鉴。

今年9月纽约苏富比将隆重推出“罗伊与玛丽莲·派普夫妇珍藏中国绘画”，暨纽约中国书画首场夜拍。此收藏是美国最重要的私人中国书画收藏之一，藏品均经精挑细选，涵盖明清诸多流派及绘画题材与各种装裱形式。122件拍品均来源有绪，并曾展览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十几家文博机构，数十年来未见诸市场。

罗伊·派普先生（1927～2011）为杰出银行家、企业家，于1975～1977年间任亚洲发展银行美国驻马尼拉董事，玛丽莲·派普夫人毕业于罗格斯大学德格拉斯学院，主修艺术史。罗伊于亚洲任职期间与夫人曾遍游亚洲，并对亚洲文化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中国古代书画以其蕴意深远的内容与内敛典雅表现形式让派普夫妇深受吸引，无论是以山水、花鸟还是人物为主题，抑或是立轴、手卷、册页还是扇面为形制，其收藏均有涉猎。当他们于70年代末回到美国，并定居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后，便萌生了建立一个中国绘画收藏的想法。

他们的收藏得到包括凤凰城艺术博物馆布歌迪教授（Professor Claudia Brown）、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周汝式教授（Professor Ju-Hsi Chou），以及著名艺术商霍华德·罗杰斯先生（Howard Rogers）等多位专业人士的悉心指导及鼓励。

罗伊与玛丽莲·派普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以谢赫“六法”为标准，遴选最贴合他们夫妇心目中的中国绘画。谢赫六法是中国古代美术评价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六法”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著作《画品》中。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总之创作和流传各方面，

都概括进去了。

根据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述：“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宋代美术史家郭若虚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从南朝到现代，六法被运用、充实、发展，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美术理论最具稳定性、最有涵括力的原则之一。

罗伊与玛丽莲·派普夫妇选画不论画家名头大小，只论作品是否有古人遗风，且能让后世画家有所借鉴。他们认为“气韵生动”的最重要前提是“骨法用笔”及“应物象形”，所以整批藏品中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人物等任何体裁，都是非常具象的体现。他们并不是非常喜欢个人色彩特别浓厚并近乎乖张抽象的画风，是以“扬州八怪”等不入其收藏；近现代书画笔触粗重且过分强调墨与纸之间产生的变化，派普夫妇也大都不感兴趣。因此总体来看，整批收藏虽不是每件都来自艺术史上名声最响的画家，但是收藏标准高度统一，质量整齐，干净利落，不入俗套，充分体现了派普夫妇对中国绘画的认识，也可以说这批收藏是从西方审美角度对谢赫“六法”的一种诠释。

西方学术界认为西方收藏家认真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的历史并不悠久。美国开始得更晚，但目前公私方面所收藏的精品，应该远胜于欧洲。上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收藏中国书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学术研究兴起，影响收藏家的收藏方向。大学的美术史教授开始对东方美术做理论上的分析。至此开始，中国的中国书画收藏进入以学术研究为主的系统化方向。

罗伊与玛丽莲·派普夫妇整批藏品中最重要者莫过于王翬（1632～1717）率一众宫廷画家所绘制的《康熙南巡图》第六卷部分。第六卷是描绘康熙从瓜州渡江登金山经常州府的经过。画中选取了奔牛、朝京门两处重要节点，根据画中的描绘与场景，与历史记载中的文亨桥、朝京门、花市街、米市河等常州标志性建筑相似，因此可推断，画作中标注“常州府”的画

面应该是西赢里一带。整张画气势恢弘，记录了皇帝下江南时常州到奔牛的盛况，画作中，东边城墙上方，“常州府”三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在城西运河边，“奔牛镇”三个汉字也是清晰可辨。运河两岸商铺林立，运河中舟楫往来，行人、工匠、商贩，各色人物栩栩如生，城外沿运河两岸，阡陌纵横，农田密布。

《康熙南巡图》绢本，重设色，共12卷。1691年绘，历时3年。绘康熙帝第二次南巡（1689）从离开京师到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等，每卷均有康熙出现。该画原藏清宫，后散佚，今第一卷、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第二、第四卷现收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第三卷现收藏于纽约MoMA，第六卷现收藏于美国凤凰城，第七卷现收藏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罗伊与玛丽莲·派普夫妇所收藏为第六卷，是诸段中最长且保存最为完好的一部分。此段《康熙南巡图》具有政治、历史、艺术等多重价值，并多次为学术刊物所登载。

派普夫妇还收有沈周作品。沈周集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其才情学养在作品中一览无遗。沈周《有竹庄赏月图》手卷分为书、画两部分，画中三名高士，于溪边茅亭中偏坐一隅，竹影疏斜，其中一人举杯仰头邀月；卷后有石田大字自

书诗一首，恰有太白“举杯邀明月”之诗意；卷后有石田大字自书诗一首，以黄庭坚笔意为之，更见是夜三人赏月之尽兴；本卷有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著录及多次美国出版并展览记录。

另有王原祁《仿大痴笔意山水》轴，虽然四王大部分作品皆仿宋元先贤，但此幅品相完好，可谓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宋旭《江寺晨曦》卷，烟江叠嶂，微雨朦胧处山寺俨然；蓝瑛《桃园春霞》轴、尤求《渡海罗汉》白描卷，及龚贤、查士标、顾符稹、改琦、钱维乔、侯懋功、唐岱等等画家的精心之作。整批收藏涵盖的艺术家之广泛，体裁丰富之多样，可见一斑。

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主管张荣德表示：“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鲜少有人研究鉴赏中国书画之时，派普夫妇已开收藏之先河，实乃独具慧眼。此收藏横跨明清，绘画题材多样，充分体现了派普夫妇对中国书画的认识与热爱。罗伊与玛丽莲·派普夫妇珍藏中国绘画中的作品未见于市场已逾25年，我们非常荣幸地将其呈献予美国及世界各地的鉴赏家。”

站在艺术全球化的今天，派普夫妇的收藏也许可以让我们暂时步离既定的艺术史框架，换一种角度去欣赏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绘画。☑

《新知》2016年第4期上市

(总第16期)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 新知

微信公众号: 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2016 年第 4 期要目]

Entrée

连接另外十亿人: 关于理想主义、野心和网络中立
“小丑”的文化史
没有陷落的爱
普鲁斯特和逃逸线上的青春
机器控制论(漫画)

Main

大爆炸之前是什么?
人类在玩火吗?
基因编辑

我的祖先和我——源自尼安德特人的

基因神话
永恒之问

Fusion

欧洲认同在中世纪早期的构建与当代挑战
青牛白马, 来去何兮——古 DNA 研究
视野下的契丹贵族
达尔文的 1859 年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房子的故事
亚美尼亚: 国界的迷思与现实

Dessert

繁星中的双螺旋: 日本现代建筑浏览
化学: 不对称之存在
菲利普·迪克: 半疯的文艺极客
世界上第一家机器人酒店探访记
新战术对旧大陆: 英国海洋帝国的崛起
埃及: 走进未来的法老宫殿
发现和探索大脑新大陆的历史
等待奇迹
1BOOK140 短书评

《新知》2016 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 每期 160 页, 全年 6 期, 零售单价 20 元, 全年定价 120 元。

2016 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阅: www.lifeweek.com.cn, 全年订阅 8 折优惠, 订阅年价 96 元。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阅: www.amazon.cn / www.JD.com

2015 年珍藏礼盒现已上市。



Hello Kitty 在邮轮上等你，来么？

当你登上 8 万多吨的“歌诗达·大西洋号”，发现熟悉的 Hello Kitty 时，你是否很快便进入到享受假期的状态？

歌诗达邮轮集团亚洲，在这个暑假与三丽鸥公司携手推出的全球首个专为邮轮定制设计的 Hello Kitty 形象，已出现在歌诗达旗下的三艘邮轮上：“大西洋号”“赛琳娜号”和“幸运号”。在主题航次期间，邮轮将精心布置 Hello Kitty 主题房间，从门贴到墙贴，都将印上 Hello Kitty 的萌脸和标志性蝴蝶结，营造甜美的氛围；房间内摆放的 Hello Kitty 公仔带给客人愉悦的感受；舒适柔软的床单枕套上，也有乖巧可爱的 Hello Kitty 形象伴乘客入眠。

相比其他旅游方式，邮轮旅游带来的安全感和对旅途的掌控性是最强的。确定的旅程，确定的极致享受，无须操心线路，无须操心食宿，在这种确定性下，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你只需调整好你的度假心情，放下一切琐事，慢慢地踱上船，剩下的就是连延几天的闲适。

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目的地，除了美食与美景，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演出剧目、主题派对、娱乐设施，登上海上巨无霸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经历。邮轮也是一个“IP”，比如歌诗达，她将意大利“装进”邮轮，内饰、食物、音乐、活动、艺术等，与意大利相关的细节都融入邮轮里去，构成了这个 IP。

Hello Kitty 本身也是强大的动漫 IP，与邮轮融为一体，带来的体验是特别的。虽然 Kitty 猫自问世到现在已经有 42 岁，可是女孩子们对她的喜爱之情丝毫没有随着时间而减弱，因为她呆憨可爱的脸代表着永远的小女孩情结。

Hello Kitty 不单单可以虏获小孩的心，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都会爱上她。对儿童来说，她是一个可爱的玩具；对成熟女性而言，Hello Kitty 号召怀旧情结，令人回想到童年的纯真。她代表了时下典型的“可爱”文化，这种文化给现实生活披上一层情绪化和理想化的外衣。占据了人们心灵的美好事物，自然要在歌诗达邮轮中有一席之地。她既让登船的游客们雀跃，也会让成人游客愉悦地早早进入状态。

Hello Kitty 和小船长，一个都不能少。在近几年中，歌诗达已尝试了很多，比如专为男孩们精心准备的变形金

刚主题房，让孩子和擎天柱、大黄蜂近距离接触，也有专为女孩们准备的小马宝莉主题房，连灰太狼与喜羊羊也盘踞了邮轮的很多空间。

每艘歌诗达邮轮，都有一个为孩子度身打造的场所，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思高儿童俱乐部。提供托管和照顾服务的同时，歌诗达也希望这是小朋友们快乐和友谊发芽的地方。俱乐部依据儿童年龄分成三个阶段：MiniClub 针对 3~6 周岁儿童，MaxiClub 针对 7~11 周岁儿童，TeenClub 主要针对 12~17 周岁青少年。

思高俱乐部里给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开设了相应的课程与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选择饼干制作、美术、剪纸等课程，在学习中掌握技能；船上还会为孩子们组织很多有趣的活动，如寻宝游戏、面部彩绘、小海盗游戏，有时还会举办运动比赛与卡通猜谜游戏，让孩子们在多种多样的愉快游戏中学习到团队合作精神。

歌诗达邮轮集团亚洲于 2006 年率先进入中国市场。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的统计，2015 年，中国有超过 110 万邮轮游客，其中歌诗达亚洲占中国邮轮母港出入境游客份额的 38.31%，成为在华运营母港航次及游客人数最多的邮轮公司。

在过去的近 70 年时间里，歌诗达邮轮始终致力于营造“最好的意大利”，船队游弋于世界各大海洋，用纯正的意大利热情服务为世界各地的乘客奉献愉快轻松、充满意大利风情的梦幻之旅。他们希望继续为各年龄层的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邮轮假期体验，将意大利风情与纯真甜美的童趣魅力 Hello Kitty 这两大 IP 融为一体，以“意大利风情 +X”的形式，只是开始。



歌诗达邮轮集团亚洲总裁莫兴萃与 Hello Kitty 合影



北汽新能源，“从里面打破的鸡蛋”？

主笔 / 李三



北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刚

“一个鸡蛋从外面打破了，就是份炒蛋，从里面打破则是新的生命。”

在提到汽车行业面临的未来挑战时，北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刚脱口而出的是这句富有哲理的金句。近来，北汽新能源的两件事被业界广泛关注，一是发布全新纯电动车品牌 ARCFOX，二是基于这个品牌产品设计全新流程的“众创”。郑刚认为：“互联网造车和传统公司造车究竟哪个更有希望，其实无所谓。谁真正掌握了创新的真理，在尊重 100 多年汽车造车规律的同时，能够充分地將时代的特点融合、运用，把握住全新的商业机会，谁就是赢家。”

郑刚提到了诺基亚手机，“从设计功能化来讲，诺基亚已经毫无问题，曾经堪称最耐用的手机，可为什么一夜之间被苹果颠覆？就是因为设计”。他的吐槽是有所指的，话锋一转，郑刚言归正传：“到现在为止，汽车公司有必要与有理想有抱负的伟大设计师共同结合起来，从内而外打破过去传统的架构，给大家来一点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北汽新能源车成为近期市场热点，它的新意在哪里？

郑刚：ARCFOX-1 定位是城市的、超酷的、智能和个性化出行的产品，它将是我们的众创产品平台上的第一款车。它的诞生已经不是传统造车模式，从现在来看有一万个用户，这个车就有一万个定位，它所要竞争和争取的，就是每一个用户心里的自己。我想要什么车，你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们不跟任何车竞争，我们只按人的内心需要去争取。每一个用户都可以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参与，创造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三联生活周刊：移动互联网时代，给传统造车模

式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郑刚：在 130 年汽车行业的发展历史中，它的门槛非常高，不光是资金运行、技术运行，整个产业的内生封闭性非常高，产业链从产品开发、制造供应以及分销到渠道，全部都是内生型。这个系统 100 多年都没有突破，强者更强，自己主导行业的发展。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平等，不仅是信息，更重要的是对资源的占有，也开始开放平等，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尝试进入汽车行业。对传统汽车行业的冲击，就是打破垄断，实现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叫平台化外向型、商业产品创造的模式。我们这样的传统汽车制造公司，尤其是传统的国有企业，也秉承了互联网的思维，用互联网的方式，主动改变既往的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我觉得这足以称之为汽车行业的第三次革命。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做一枚“从里面打破的鸡蛋”？

郑刚：北汽作为一个传统的大型国有企业，现在在世界 500 强排名第 160 位，我们用互联网思维进行全新的平台和商业创新。令我最充满信心的是，我们就是从内而外形成创造，打破桎梏，这真的会成为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老的流程和模式，重新打破，但新的在哪里？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学习。全世界的汽车品牌，甚至包括特斯拉，所有正向开发的电动车，他们运用了新的造车技术，却是传统的造车模式。

ARCFOX-1 和 ARCFOX-7 全是正向开发车型，所有

的造车方式与特斯拉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造车模式、理念已经超越了。我们已经开始借助于中国或者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平台，希望融合中国最具有创新力的年轻人群。

我们与重要的合作伙伴洛可可公司一起，打破已有的造车模式，引入众创，绝对称得上是重大革新，我们对此有信心的三个原因：一是我们看到了这是大势所趋，谁先尝试，谁的胜算大；二是我们有平台、有资源，关键看想象力和创造力；三是有好的合作伙伴，搭建有效的众创平台，我们即将创造中国汽车行业全新的实验场。

三联生活周刊：北汽新能源未来有哪些具体的产品计划？

郑刚：从成立之初，我们就确定了北汽新能源的纯电动车战略。在续航方面，去年是200公里的车型，今年是300公里，未来三年从200提高到300再到400公里。在300公里续航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的适用车型都提升到300公里续航。目前EX200是200公里续航，未来很有可能到400公里。我们认为到400公里续航就到头，没有必要再创造，350公里以上大家兴趣不大。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互联网设计在整个产品生产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郑刚：设计驱动创新，这是我们的价值观。整个产品创新最重要的来源在于设计，用设计来创造，带来产品的灵活性。太多中国汽车产品的设计是三个层次：最初是抄袭，然后是模仿，第三个层次才是自我设计。我认为，设计带给用户的不仅是舒适、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带给用户梦想、灵感和愉悦快乐。所以汽车作为全世界最大最贵的耐用消费品，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在圈内的设计已经走到头了，无非是一个工业品再制造。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干的“众创”，就是要从设计上来推翻传统汽车的制造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低端电动车市场？

郑刚：大约一年半以前，我们就在研究如何造出一款适合中国社会的电动车，我们称之为“国民车”，再有两个月，这个车就要上市了。这款车老少皆宜，物美价廉，实用耐看，是共享智能交通系统非常好的

选择，我觉得这将是一款爆发的车型。我们推出这款最轻灵的电动产品是基于如下考虑：电动汽车使用成本比较低廉，它天然具有全民性、舒适性，而且相对于加油站，电力供应铺天盖地，很多边远的乡村没有加油站，但一定有电，这是电动车大众化普及非常重要的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有多大的机会？

郑刚：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已经将新能源汽车列为国家的“十三五”战略新兴产业，并且给予重点支持，各地从财政补贴到使用环境都给予了大量应用推广的独立政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电动汽车最大的市场，而且是产销最大的市场。我们已经制订了到2020年的目标，北汽新能源将年产50万台纯电动汽车。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持续保持第一的领先地位，这个第一已经持续了三年，希望到2020年能进入全球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前三名，去年我们是第五名。单从销量来讲希望很大，甚至更近。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池技术方面，北汽能源供应商有哪些？

郑刚：目前因为我们是电动汽车销量最大的国有企业，因此跟我们合作的电池企业也是最多的。在这里不仅有外资的电池合作企业，也有中国优秀的内资企业。我们在北京就有电池公司，在中国排名前三的电池企业都跟我们有合资或者合作关系。这几年，主流的电池企业都跟我们有深度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补贴推动，将来如果政策有调整，如何应对？

郑刚：政策退出是早晚的事，不管早和晚，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必须时时刻刻有这样的危机感，不能够总是依靠外力输血，靠自己造血才能够生存这是很正常的事。在退坡的时候，我认为电动汽车企业最核心的任务是要以创新实现技术升级，与燃油汽车做直接竞争，吸引相当一批人从购买传统车转而购买电动车。尽管电动车的成本高，但凭借高技术、高品质以及令人心动的设计，我们就能够找到优质用户，而且可以让消费者为电动车的高溢价买单。☑



权力衣着，那些女政治家们……

文 / 何潇

不论在哪个舞台，人们对于女性穿衣永远比对男性穿衣关心。



法国设计师凯瑟琳·玛兰蒂诺和身着“国旗裙”的模特在布鲁克林大桥前留影（摄于2008年1月）



特雷莎·梅

“权力衣着”

回顾已经过半的2016年，我们发现，各国政府的重要岗位上，都出现了许多女性的身影。在缅甸，昂山素季出任新一任政府的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在英国，人们迎来了撒切尔之后的又一位女首相特雷莎·梅。不久前的7月31日，小池百合子确定当选为东京都知事，成为首位出任此职的女性。就在小池当选的前两个星期，英、德的两位女性领导人特雷莎·梅和安格拉·默克尔进行了首次会见。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远到2017年，或许能窥探到更多趋势：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有望加入特雷莎·梅与默克尔的队伍，成为又一位女性领导人；而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12名竞选人中，女性占了半壁江山。换言之，在明年，联合国很可能将迎来首位女性秘书长。根据美国《政治杂志》网站的统计，到2017年1月，全世界可能将有20个国家由女性领导。在未来一年，我们将会在各个领域看到更多的女领导。

一切在告诉我们,女性的“权力衣着”又要回归了。

“权力衣着”,顾名思义,是一种围绕“权力”的穿衣方式。它彰显权力,同时也期望以此获得权力。其中心思想是一句话:为成功而穿衣。作为一种明确指导女性怎样在工作中表现自我的女性话语,“权力衣着”最初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美国。这种着装方法,针对的是此时崛起的“职业妇女”阶层,她们希望展示与众不同的“女性气质”。

“权力衣着”的重点,在于控制“性感”,获得“权威”、尊敬和权力。其结果,是在“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之间划出了一道细细的分割带。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认识到,穿衣对于男性成功至关重要。到了80年代,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权力衣着”自然而然地被职场女性继承和沿用,成为这个时代的时装标志。

女强人的穿着,几乎统一成了某种特定的“制服”。这样的风格随处可见,好似一种模板:海军蓝套装、女短衫再加上女性化的饰物,比如丝巾和项链。对于职业女性,这样的打扮时髦而保险——即使是戴安娜王妃,在某些场合里,也会采用这样的着装。而这种风格的最佳代表,无疑是英国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着装与权力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让我们来看看而今“欧洲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克尔被人们当作时尚反面教材讨论。她也坦言说:“从没有迷恋过所谓‘时尚’。”这位德国铁娘子继承了日耳曼人的严谨,也继承了他们的朴素。担任总理前,媒体曾经给予她一个不太动听的绰号:“德国灰老鼠。”这是因为,女强人默克尔总是一身灰色套装,很少穿裙子。德国《星期日画报》对她的“蘑菇头”发型表示不满:“脖子周围竟然光秃秃的、不留头发,令人生惧。”

刚刚成为总理的默克尔,看来没有太大变化,依然是去女性化的——长裤、平底鞋和纽扣外套。因场合和季节的差异,她会在颜色上做些变化:红色、白色、绿色、黑色、紫红色……还是纯色系,没有蕾丝、花

边,或任何女性化的装饰。这种笃定的朴实,令同为德国人的“时尚大帝”卡尔·拉格斐也忍不住开口:“她的穿衣特色还不错,但剪裁需要更精致。她应该在衬衫外面穿上一件解开纽扣的外套,搭配一条剪裁更为得体的长裤。这有助于她活动自如。”

实际上,默克尔女士并非完全无视外界指责,只是,她的处理方式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在一夜之间完成“变身”——对于政治人物,急剧的形象变化,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过度的视觉冲击,没准儿就是政治笑话。默克尔的改变从严肃的灰套装开始,慢慢地在颜色上丰富,同时注重剪裁与用料。她标志性的“蘑菇头”,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时而弯曲,时而蓬松一些。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其个人形象设计师、时装设计师安娜·冯·格里斯海娜。

默克尔做得最好的一点,恰恰是没有过度女性化。她的穿衣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雷打不动的V领西装套装,区别只在颜色上。曾有一位荷兰艺术家用默克尔的西装拼出一张色卡,颜色多达90种。

在关于“权力衣着”的经典书籍《女人:为成功而穿衣》中,作者莫洛伊就指出了一系列可行性意见,教导在职场上与男性拼个你死我活的女人们如何穿衣打扮。女强人要在职场上出人头地,需要树立权威,有两类穿着会消解这种权威:一类是太像“女秘书”,这会限制其职业性;另一类,则是太性感。

换言之,要树立权威,在穿衣上,一定要“消解性感”。具体该怎么穿呢?这位男性作者是这么建议的:在维持“女性气质”的同时,必须抵制潜在的色情和“客体化”问题。因此,有些着装是要避免的,比如那些“容易将注意力转移到胸部”的服装。

在这个方面,默克尔有过难忘的失败经历。在一次晚会上,她曾经身穿一件宝蓝色的低胸礼服亮相,令所有人震惊。第二天,其照片飞上全世界小报的头版头条,成为世界人民的八卦谈资。这袭低胸礼服的装扮,被刻薄的英国媒体打趣为展现了“大规模分散注意力武器”。毫无疑问,这是默克尔着装生涯中难忘的一次,此后,再也没有见她尝试过此类大胆打扮。

与德国紧紧相邻的丹麦,也曾经有一位令人瞩目的女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这位丹麦历史上的第一个女首相,着装风格与默克尔、希拉里们大相径庭。至今,人们还记得她4年前的巴黎故事:当时,托宁-施密特从车内迈下来,鞋子落在地上,露出一条美腿。这惊鸿一瞥的一幕,被欧洲媒体认作暗含动机,有意为之。

“权力衣着”的重点,在于控制“性感”,获得“权威”、尊敬和权力。其结果,是在“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之间划出了一道细细的分割带。

这位丹麦前首相有个响亮的绰号，叫作“古驰赫勒”(Gucci Helle)。这是因为，托宁—施密特不仅作风干练，而且容貌出众，喜好名牌高跟鞋和名牌皮包——尤其是红色的古驰包。为了改变“物质女”形象，托宁—施密特在竞选前参加电视节目时，也曾经特意将一头金发束起、淡妆出镜。她甚至放弃了私家车，却依然放不下钟爱的名牌手袋。

相比男政要清一色的西装，女政要多姿多彩的穿衣风格帮助她们脱颖而出，吸引到媒体的关注。与各种政治传闻不同，这些不痛不痒的饭后谈资，通常是令人愉悦的。这令这些女强人们认识到穿衣的重要性。在这个方向，南美女人显得比较坦率。巴西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尽管政治上遭人指责，但其干净利索的穿衣风格，却令人印象深刻。而阿根廷的首位民选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出访时总是携带美容师，一天要更换4套衣服。

政治家在很早以前便发现了时尚对于政治的积极作用，只是在许多时候，他们的处理方式比较生硬。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过“尼克松”与“汉弗莱”裙子。这两条迷你裙出现在1968年前后，裙子是纸质的，波普风设计，透着未来主义色彩。尼克松与休伯特·汉弗莱的支持者穿着它，仿佛穿着一张流动海报。然而，与印满竞选宣言的海报一样，它们也逃不过用过一次便被随手扔掉的命运。

今年，人们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场景。在纽约时装周上，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穿上了马可·雅克布(Marc Jacobs)设计的白色T恤，印花为希拉里的头像，颜色为美国国旗经典三色。此举带动了时尚圈的“希拉里热”。发布会后，设计师马可·雅克布穿着另一个版本的T恤亮相。而当红超模肯达尔·詹娜(Kendall Jenner)，则在Instagram上当着4930万“粉丝”的面，秀出了自己的“希拉里战衣”。

政治角色

现代人在对外表与身份的解读中，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外表来了解他人，也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令他人了解；与此同时，我们又会心生疑窦，感到“外表是富有欺骗性的”。这种矛盾与纠结，并不会阻挡我们费尽心思修饰仪表。时尚与衣着，正是这种自我修饰的最佳工具。如果接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刻意打扮，好比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政治文宣”。

福柯在讨论“自我的技术”的时候说过这个话题。他所关注的，是我们如何以特殊的方式，将自己打造成某种特定样态的人。不同的衣着，就是这个“自我的技术”中的一部分。然而，自我展示并非毫无限制，我们怎样展示身份，与我们作为特定人群、特定阶层和特定的社会地位相关。我们精心选择并穿上身的那些衣服，是我们从属的环境与自我意愿之间相互拉扯的结果，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妥协。

人们大约还记得，2011年，当希拉里还是国务卿的时候，她曾经对粉色情有独钟：“春天我想拎着Ferragamo粉色的包包，它多好看呐。拎着一个粉色的可爱包包，谁还会不开心呢？”这种“我行我素”的穿衣风格令人瞠目结舌。而今，在竞选总统的希拉里身上，你再也不会看到这样“傻白甜”的穿衣风格了——这得益于时装顾问帮助她做的角色调整。

对于政治人物，着装从来不是简单的“自我风格的呈现”。在“呈现自我”之前，他们首先要完成社会赋予的角色塑造。在这一点上，男女无别。法国总统奥朗德经历过一次“眼镜风波”。是时，他更换了一副新眼镜，来自丹麦王室御用眼镜品牌林德伯格(Lindberg)，价值1300美元(约合8005元人民币)，被法国民众骂得狗血喷头。口口声声支持民族工业的奥朗德，却在法国经济疲软之时，花大价钱购买其他国家的产 品，在民众眼中，这副眼镜代表了“叛国”和“虚伪”。

与权力擦肩的女性着装，比男性更为复杂。一方面，她们要在穿着上兼顾“权力着装”和“女性魅力”；另一方面，还得精心挑选品牌。有一些规则是必须遵守的，比如，支持本国设计和品牌；另一方面，穿出好品位的同时，还不能给人造成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印象。

这其中有着微妙的平衡，通常的做法是混搭。因此，我们在凯特王妃身上看到了亚历山大·麦克奎恩和ASOS，在米歇尔·奥巴马那里发现了Jason Wu和J Crew，在西班牙王妃莱蒂齐亚那里认出了Oscar De La Renda和Massimo Dutti。

时尚在政治中的“破冰”作用，在女性那里运用得更好，这也是为什么“第一夫人”风尚会得以流行，从杰奎琳·肯尼迪、格蕾丝·凯莉到戴安娜，再到米歇尔·奥巴马、凯特王妃……权力一直在给大众输送时尚偶像，尽管她们一直在完成“角色扮演”。电影《摩洛哥王妃》里有一段话，是凯莉王妃的好友兼顾问对她说的，大意是：先想好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再将不



左图：丹麦前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

右图：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



足之处补全，这样你就可以获得爱戴。

有时候，政治本身也会成为时尚元素，比如凯瑟琳·玛兰蒂诺（Catherine Malandrino）著名的“国旗裙”（Flag Dress）。2001年春，这位法国设计师在美国推出了这条裙子，希望印着美国国旗图案的真丝裙子，能代表她“梦中所见的那个美国”。这年秋天，“9·11事件”发生了，这条裙子迅速成为承载民族情感的物件，许多人争相穿着。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人们又在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与海蒂·克拉姆（Heidi Klum）身上发现了这条裙子。

同样赢得人心的还有民族服装。经常因为穿衣登上头条的泰国前总理英拉，喜欢展示五颜六色的泰国丝绸服装。在德国《图片报》盘点出的全球最具穿衣风格女政要里，她排在首位。

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为了表示对祖国的热爱，总是穿着五彩斑斓的非洲民族服饰。昂山素季一袭传统的缅甸裹裙，更是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无论何时，低调总能获得好感。韩国总统朴槿惠，常穿一双褐色皮鞋，是百货商店里很久以前就下架的“Elegance”。据称，这双皮鞋修修补补穿了10年。在大选拉票时，她穿的“FILA”羽绒服，价值13万至19万韩元（人民币1000元左右）。

朴槿惠朴素的穿衣风格受到了韩国民众的认可。韩国盖洛普一项《关于总统时尚认识》的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朴槿惠很会穿衣。当问到“朴槿惠的衣着是否增加韩国的正面形象”时，72%的受访者认为对韩国形象有加分作用，仅5%的人回答没有。

女性话语

直到现在，我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权力着装”依然记忆犹新。那时的流行，是“为成功而装扮”，几乎所有女人都想打扮成女强人。最为时髦的装扮，是象征权势的套装，即女政客和女总裁们的

共同制服。这些主宰世界的女性们的标准打扮是两个大字——“高”与“大”：套装、高跟船鞋、高耸发式、巨型假珠宝……因此，当我看见特蕾莎·梅的套装、高跟鞋和夸张项链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个时代。

然而，有一样是特蕾莎·梅、希拉里、默克尔都没有，却极富意味的元素：宽阔的垫肩。

保罗·福塞尔说，肩膀一直是男性自尊的表演舞台。这话十分在理。世界各地的军服，无一例外地给予了肩膀特别关注。由此可见，发育良好的宽阔肩膀对于男性的自豪感有积极效应。或许是学美术出身，希特勒对于肩膀有着执念，并将肩膀作为男性美的特殊标志。据称，德国纳粹最早挑选党卫军时，主要依据是18世纪德国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所确立的完美男性体型模式——迷人的倒三角。

女性却与男性不同。相较于男性，女性更为突出的部位是臀部。理想的男性肩膀，通常比臀部宽一倍。而女性的肩膀，却通常比臀部狭窄。这一点，在日常的男女装设计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孩童也非常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会倾向于坐在男性的肩上，而骑在女性的臀部上。这是十分自然的区别。

战争使得女性着装变得功能性起来。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款“铆工罗西”（Rosie the Riveter）式工厂做旧连衣裤。“铆工罗西”是此时的社会偶像，激励女性同胞努力工作。人们心目中的“铆工罗西”是霍华德·米勒（J. Howard Miller）1942年海报里的样子：挽起袖子，露出肌肉遒劲的胳膊，说：“我们能做到！”（We Can Do It!）。实际上，米勒海报里的模特并不是女英雄罗西，而是17岁的工厂女工杰拉尔丁·道尔（Geraldine Doyle）。

“二战”期间，军人形象占主导地位，服装设计师也只得顺应潮流，将女士服装的肩膀放宽。对此，他们是不满的，克里斯蒂安·迪奥就曾经无奈地说，这是“女装肩部像箱子一样方正的时代”。因此，战争一结束，设计师们马上又回到了“更为自然”的风格上来。然而，“新风貌”被指责成要将女性重新关进家庭小天地，因为它的表面显然是“女性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有趣的现象，女性服装一旦要开始显示力量和权势，首先想到的，通常是放大肩部。这是一种“改变性别”的心理。然而，在如今的“权力女性”那里，这种风格改变了。我们看到，位高权重的女性们，不仅穿得富有“权力”，而且富有“女性”气质。

在80年代的著名作品《女人：为成功而穿衣》中，

作者给女性一些着装建议，包括：避免女性味十足的印花图案和过于女人味的颜色，如橙色和粉红色，这对于女性权威起到了消解作用。长裤也在黑名单里。“在女性占主导的工作场所，这样或许可行。然而，如果要和男人共事的话，你就是在让自己冒险。”因为，很显然，“男人不喜欢和穿长裤的女人谈买卖”。

当我们拿这些建议与而今权力女性的着装对比观看，会发现她们穿着的每一套衣服，都在打破这些规则。比如，她们几乎都拥有红色和橙色的单品，并且，还不止一件；她们还几乎都热爱长裤，穿着它们与所有男性共事；她们中还有人热爱印花，甚至是动物纹。在她们那里，“权力穿衣”不再是从另一个性别那里窃取力量，而是展示自身原本具有的独力力量。

一个世纪前的1916年，美国诞生了第一位国会女议员：珍妮特·兰金。在她进入政府机构之前，社会对于妇女参政一直存在偏见。妇女们奉行亚里士多德的格言，认为政治是“不道德却有权势”的男人、为了更高的道德目标不懈努力的场所。对于心灵纯洁的妇女，她们的庇护所是家庭。在当时，兰金的当选是里程碑式的。

然而，大众媒体对于首位女议员的个人生活，比她的政治潜能更感兴趣。《国家》杂志描述她的外表，说她“从上到下都是一个典型的女人”；还特别注意了她头发的颜色和发型，鼻子、下巴、娇小的身材和得体的服装。她穿着的V字领形和蕾丝滚边，与男人们穿的“浆洗整平麻布边”截然不同。

一个令女权主义者颇为尴尬的情况是，不论站在哪个舞台上，人们永远对女性的穿衣比对男性关心。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许多世纪以来，女性总是与反复无常、变化多端联系在一起，这恰恰是时尚的特色。当人们将女性与服装、与消费联系在一起时，总会想到许多隐喻。除了“女人善变”，还有“物化的女性”。无论多么朴实无华、多么端庄的着装，也不能抹掉女性身体里潜在的性感。

最后说一个颇为吊诡的历史插曲。在社会对罗西式女英雄推崇备至的时候，军队里的女兵制服却越来越时髦。1942年，美国海军W.A.V.E.S.（Women Accepted for Volunteer Emergency Service）部门的女兵穿着的一款蓝色羊毛制服，来自高级时装品牌曼波彻（Mainbocher）。曼波彻诞生于1929年，以精致的无肩带晚礼服闻名。其留名时装史的一笔，在辛普森夫人那里——与温莎公爵结婚时，她穿的正是曼波彻。■



1998年《Vogue》封面上的第一夫人希拉里



约旦王后拉尼娅

她在《Harpers & Queen》杂志“全球100位最美丽女性”和《名利场》杂志“世界最美丽的女性排行榜”评选中都榜上有名

希拉里，从时尚终结者到老江湖

文 / 杨聃

一直以来，民众从来不缺少对希拉里的话题，在从戈德华特女孩变成民主党人的同时，她也从稚嫩的时尚终结者进化成了如今身着权力套装的老江湖。

外表曾不是她上心的事儿

克林顿曾说过：“我一出生就是16岁，并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16岁。但希拉里一出生就40岁了。”中学时代，有点老气横秋的希拉里并没有那么招同龄



荷兰王后马克西玛·索雷吉耶塔

潮人一族，喜欢各种鲜艳的色彩、超宽边太阳帽，设计大胆的图案以及抓人眼球的配饰



摩纳哥王妃查伦·维特施托克

游泳练就的好身材让她能在硬朗裤装和妩媚晚礼服之间自由切换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过完 90 岁生日的伊丽莎白女王是一部皇室时尚的活历史。白金汉宫展出的 150 多件她穿过的服装，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女王服装展览。就连她戴过的帽子都是有策略性的——要保证人们能看到她的脸，同时也要前卫。她曾说过：“我从不穿米色系，那样就没人能认出我了”

男生的喜欢。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穿着引起的。她不经常打扮自己，时髦的衣服在她身上也有点别扭。另一方面，希拉里的父亲为青春期时的希拉里所做的一切决定总是跟她的母亲对着干，不想让女儿沉溺于爱情游戏。所以，希拉里只能认命，早早放弃了对外表的追求。

好朋友贝齐·埃布林看不下去了，把自己在 10

年级时曾交往过的吉姆介绍给了希拉里。吉姆一开始拒绝这样的安排，他觉得希拉里的学院气息太浓了。直到有一次，他把车停在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拿出滑板问希拉里有没有滑过。希拉里当然没滑过，但为了争面子硬说会。吉姆就把滑板递给她，她居然真的站上去了，就这么溜溜滑下了山脚，也没摔跤。就这样，希拉里成了吉姆毕业舞会的舞伴。

1969年，希拉里因为在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第一次登上了《生活》杂志，那次演讲之后她简直成了名人，并被描述成了那个时代及其价值观的象征。照片为她今后的公众形象定下了基调：厚厚的镜片的眼镜，条纹喇叭裤，还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克林顿的母亲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认为她丑陋得恐怖，尤其是发型，还不化妆，举手投足都带着嬉皮士的懒散劲儿。这也不能全怪希拉里没“表现”好，为了省钱那个学期她的头发都是自己剪的。可克林顿告诉母亲，如果他娶不到希拉里也不会娶任何女人。“我不需要一位美丽的女王或者性感女神。我这一生都会为了政治和公共服务而艰苦工作，我需要一个真正做好了准备卷起袖子为我工作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

希拉里的穿着品位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她从不介意穿那种根本不配套的衣服。她也没那么喜欢购物。从购物习惯能看出，她一旦对什么新东西着迷，就会有极端的倾向。连每个女人都向往的最美时刻，她都没那么上心。

帮忙筹备婚礼的安·亨利总结说：“希拉里更关心之后的生活而不是婚礼本身。”无论是典礼还是招待会，他们都没有专门的请柬。她做的唯一一件符合婚礼习俗的事，就是在迪拉德百货商店购买了一套现代丹麦餐具。直到婚礼前一天，希拉里的母亲问女儿礼服是什么样的时候，才发现她根本没买，也没打算买。母亲坚持让她立刻去买一件，希拉里在店里拿起一件就定了，那是一件杰西卡·麦克林托克设计的维多利亚蕾丝风格的婚纱。

据说，那场婚礼更像是政治集会，像阿肯色州最大的商业集团泰森食品的老板唐·泰森这样看好克林顿的商界人士、有钱人，以及整个选区的民主党人士都来了。

在罗斯律师事务所工作时，秘书们都在背后说一些有关希拉里的闲言碎语，大都跟她的穿着打扮有关。甚至是希拉里的秘书都在嘲笑她试图建立职业女性形象的努力，说得也挺犀利：“首先，她不穿丝袜，事务所里的老妇女们简直吓呆了。她是女性律师的滑稽版，古怪的卷发，两条大眉毛横跨前额，看起来就像两只大青虫，我们笑得都要哭出来了。上庭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漂亮一点儿，就会佩戴上一些可怕的塑料首饰，穿上高跟鞋，可她根本不知道如何穿高跟鞋走路。在她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儿带有女人味、女性化的东西。”

事实上，希拉里并不在乎这些。在为一家珠宝销

售公司赢得官司后，她就被那家公司里留着蜂窝头的女人们奉为英雄了，每个人都自告奋勇地想帮她彻底美化形象。虽然心里喜欢这些女士，希拉里却不想让自己看起来跟她们一样。

迫于压力的转变

在克林顿经历过一次失败，再次宣布参选阿肯色州长的那天，希拉里穿了身保守的套装，专门做了头发。除了衣服，头发是另一个希拉里的痛点。后来在她当上参议员的时候，为某法学院的学生做公民义务主题演讲，其中的一席话让在座学生们大吃一惊。“今天，我必须对你们说头发很重要。这是人生的经验之谈，我家里没人教过我，韦尔斯利和耶鲁法学院也没有教过我。你的头发，会向你周围的人传递出重要信息……人人都会关注你的头发，所以你们一定要重视它。”

尽管小时候希拉里很抗拒父母节俭的生活方式，但渐渐地开始尊重甚至欣赏他们。母亲从来都不需要凯迪拉克或者漂亮的衣服，并教导她不要太关注无关紧要的细节。希拉里曾严肃地说过：“我从小就被教育要看重别人的内在素质而不是他们的穿着打扮。”但其他人并非如此。

那番著名的“饼干和茶”的言论曾多次出现在媒体上，暗示希拉里对家庭妇女的蔑视，评论员们都把她的话看作是极端女权主义者，鄙弃传统价值的证据。事实上，完整的对话还有后半句表明她对女性选择的尊重。可当时形势已经失控了。竞选活动华盛顿办公室负责人葛洛丽亚·凯布说，他们简直要淹没在无休止的女性来电中了。“我们还收到了许多寄来的饼干……”怀疑克林顿夫妇的传统主义者正在侵蚀他们最核心的支持者。

这也把希拉里推向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她的过分自信反而成了一种消极因素，被扣上了“阿肯色州的麦克白夫人”和“来自地狱的雅皮士妻子”的帽子。政敌对她极端女权主义的攻击越猛烈，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就要越温和。

希拉里的朋友琳达·托马森旗下的好莱坞制作公司特意派出3名形象设计师，分别负责希拉里的头发、化妆和服装，以便帮她树立“更加柔和、自然和性感”的形象。很多跟踪竞选的记者都提醒读者或听众：希拉里不再佩戴自己招牌式头巾，她也给“自己的嘴上”了拉链，并且像普通妻子一样用爱慕的目光默默注视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曾被爆出一件短上衣穿了18年。喜欢低调，经典款的三按扣式深色裤子套装，上衣的颜色多从米黄到紫色这样的亲切色调，传递出可靠与自信的信息。在一个历史上都是男人执掌权力的圈子里，她不得不穿得像个男人，不过颜色更加鲜亮一些



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

曾被比喻成现代版伊娃·贝隆，着装上以蕾丝花纹连衣裙著称，基本上以黑色为主，私下更喜欢颜色柔和的套装。长发、重重的眼线、高跟鞋、珠宝、手袋，她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女性特质



丹麦王妃玛丽·唐纳森

连续入选最会穿衣的王室成员榜单，品位以优雅知性著称

英国王妃凯特·米德尔顿

与丹麦王妃一样平民出身的她没什么距离感，虽然着装风格感觉优雅又不失时尚，但整体略微保守



西班牙王妃莱蒂齐亚·奥尔蒂

她是所有王妃中最爱穿裤装的，因为主播的经历让她在演绎套装时多了一丝摩登的都市感





卡塔尔王妃莫扎

她的穿着风格是杰奎琳和《欲望都市》女主角凯莉·布拉德肖的组合，以善于驾驭色彩著称。特色的头巾让她在各国第一夫人中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

着自己的丈夫”。

从来没有一位准第一夫人像希拉里那样受到媒体和公众如此热烈的关注。《华盛顿邮报》一名记者观察说，尽管那是一个晴朗而又寒冷的下午，希拉里像肯尼迪夫人那样把大衣留在了车上，但她没有摘下那顶使评论界大惊失色的灰蓝色大帽子。还记得一位时尚评论家说它是“降落在希拉里·克林顿头上的蓝色不明飞行物”。不仅如此，这位评论家还表达了对“她脖子上的褐色止血带”——羊绒套领毛衣的困惑。

其实，这段时间的着装对希拉里来说是最容易的，按照第一夫人该有的样子穿着打扮——体现女性特质、高贵典雅和低调奢华等各种单调的元素。她所要做做的就是顺应90年代的潮流再加以更新：出席晚宴就穿唐娜·凯伦（Donna Karan）修身黑色礼服；平时穿St. John针织衫和一些不太知名品牌的色彩明亮、

带金扣的套裙。回头看看当时的录像，就会发现当时这位年轻的第一夫人是多么不谙世故。

1998年，在莱温斯基丑闻的余波里，希拉里成为第一位上《Vogue》封面的第一夫人，照片中的她穿着深红色天鹅绒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礼服华丽而庄重。一直以来都没发现，原来希拉里可以像封面上那么温婉。

1999年2月12日中午，穿着款式保守的裤子、简洁的上衣、平底鞋的希拉里面带微笑，大跨步地走进了白宫会客厅。楼下的总统办公室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威廉·伦奎斯身穿宽大的法官袍。这件袍子是他自己设计的，衣袖绣着金边，只有在审理总统弹劾案时才穿。接下来的剧情就如历史记录的那样克林顿是继1868年美国第17届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之后，第一个受到美国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弹劾案一结束，希拉里便准备参选美国参议员了。正是参议院刚刚宣告了她丈夫无罪。没有弹劾案，也许希拉里会一直是那位克林顿背后的合伙人，至少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公开参选之后，希拉里成了比克林顿更受争议的角色，她再次激起了人们对性别政治的讨论。

如果能引起关注那就谈吧

人人都看到了希拉里从第一夫人到参议员的身份转换。她脱下了那些色彩柔和的经典裙装，换上了深色裤子套装。大家觉得这副打扮显得希拉里在证明点什么，或者说她在害怕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事实上，她本来就差不多这样。自从离开白宫以后，每当希拉里把自己塞进连衣裙，就会发生时尚灾难。2008年，希拉里答应帮小报《美国周刊》（*US Weekly*）从一组照片中选一套“我有生以来最难看的着装”，并对穿过的衣服加以戏评，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穿裤装了。”

2012年，在一次外事活动上，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上镜时戴着黑框眼镜，没化妆，只擦了一点点口红。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化妆时，一阵标志性的大笑之

后，希拉里回答：“我很高兴终于到了不用再介意别人怎样评价我穿衣打扮的人生阶段了。”的确，素着脸的国务卿基本看不到。对此，《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希拉里未施粉黛的脸上散发着人性的魅力，通常在公众形象上很少见。”

“裤装迷”希拉里继续穿着长裤，不过它们不再是黑色，而是渐渐变成更大胆的颜色了，从无声的“制服”变成了独立的自我宣言。橘色、翠绿色、柠檬黄色、青绿色、红色，她基本上都穿过了，有时则配上一大串装饰珍珠。“我认为美国的选民们终于开始认清，女性政治家穿得女性一点、有趣一点不再是个问题。”美剧《丑闻》和《如何逍遥法外》的戏服设计林·保罗（Lyn Paolo）表示。

最近在《Harpers Bazaar》筛选出来的74个希拉里最时尚时刻中只有6个来自第一夫人时期，其中85%都是从2015年4月至今的。还记得从去年夏天纽约的竞选开演，希拉里选择了扎眼的天蓝色套装。这是一项传统的政治智慧，想想伊丽莎白二世和默克尔就能发现：衣服不失为一个让女性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有效方式。

从开始进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到结束，没人再对希拉里的穿着窃窃私语了。20多年了，人们终于结束了关于她着装的话题。也许是因为厌倦了，也许是因为他们开始学会关注那些更值得被讨论的东西，也许因为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在第四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上，希拉里的黑套装蓝衬衫简直和桑德斯与马丁·奥马利组成一个系列了，如果不知道他们是对手，很可能会以为他们是一边儿的。来自前MSNBC政治事务总监泰米哈达德（Tammy Haddad）的解读是：“通常来讲，辩论场上衣服的风格不能和竞选伙伴的差太多，要舒适并且易于手臂的活动。”有些评论人开始对希拉里感到惋惜，“安全色”在她的衣服中出现得越来越多。

时尚品味就像武器，曾经是别人用来攻击希拉里，如今换成她来用了。起初希拉里还抱怨人们太过于关注与性别相关的东西，甚至把它套用到政治舞台上，这不公平；后来发现这未尝不是一种机会。从选战之初，希拉里就在Instagram上发了一条状态，开玩笑地说“艰难的抉择”，配图是一个衣架，上面挂满了红、白、蓝的裤套装。再早一点任国务卿的时候，她也拿自己的头发和发圈儿开过玩笑。她深知人们对于时尚和公众人物的着装有着谜一样的热情。如果它能引起关注，那就谈吧。

这就是站上当代政治舞台的生活。作为候选人，希拉里接受的严格审查不仅是对她的经济平台、她的邮件，还对她的肢体语言、饮食习惯、社交关系以及她的衣服。就像今年2月威斯康星的那场辩论里，希拉里穿了一件提领黄色夹克，网上立刻展开了关于它到底是“香蕉黄”还是“芥末黄”的激烈讨论。

美国时间7月28日，希拉里接受民主党提名成为总统候选人。那天，她穿了一身白色套装，清晰地凸显于身后的人海与蓝色背景。大家纷纷臆测，为什么是白色？最终给它安上了一个历史渊源：1984年，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理候选人杰拉拉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在接受民主党提名时也穿了白色。另外，白色，紫色和金色也是美国妇女党（National Woman's Party）和女权运动的官方配色。原来，希拉里在这副“服装牌”的游戏上已经上道很久了。✍

（本文参考了《希拉里传》和《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完全不掩饰自己对时尚，尤其是对鞋的兴趣。从豹纹高跟到口红印芭蕾舞平底鞋再到漆皮过膝长靴都收纳在她的鞋柜中。她认为无论身处政治、商业还是任何一个工作领域，女性的挑战之一就是做自己，喜欢打扮自己同时有一颗聪明的脑袋



1



2

1. 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学生在博物馆上课
2. 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建筑外观
3. 博物馆里收藏的当代艺术品



3

大学博物馆，收藏标准与学术伦理

——专访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馆长约翰·史密斯

文 / 曾焱 实习记者 / 王琪

“北师大捐赠事件”令“民间收藏”的捐赠和鉴定乱象引起公开讨论，同时也让“大学博物馆”的概念、收藏标准和学术伦理走进国内公众视野。

全球大学博物馆及收藏联盟（UMAC）目前公布的注册会员为 311 个，其中来自欧洲的大学博物馆共 159 个，而美国有 46 个。这个数字辅证美国体系的相对完整。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教学博物馆”的大学博物馆，其概念与实践基本是 19 世纪以来美国的发明。

美国目前的大学博物馆有几百所，涉及艺术、人类学、科学和历史等不同方面。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是美国专门管理艺术博物馆的机构，旗下有超过 70 个成员来监督这些艺术博物馆，而在其中很多大学博物馆表现出色。以艺术领域来说，哈佛（Harvard）、耶鲁（Yale）、普林斯顿（Princeton）、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这些名校的博物馆都长期在美国艺术博物馆界排名几位。

大学博物馆具有什么样的使命？用什么方式建立自己的馆藏？在收藏领域如何遵循标准以及回应公众监督？本刊就此专访了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馆长约翰·史密斯（John M. Smith）。

作为全球顶尖艺术院校，创于 1877 年的罗德岛设计学院位于罗德岛州（Rhode Island）的首府普罗维登市（Providence）。这座城市虽小，却是美国有名的艺术家聚居地，而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也获评为美国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拥有超过 10 万件馆藏，涵盖古代艺术、亚洲艺术、当代艺术、绘画和雕塑、服装和织物、装饰艺术和设计、纸上作品和摄影七个领域。在古代部分，该馆陈列的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大理石女性头像、希腊风格阿佛罗狄忒青铜像等均属珍品。而馆藏服装和织物部分，从公元前 1500 年沿至当代，无论以丰富程度或学术标准来衡量，都

是目前美国该领域最精美的收藏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博物馆有公立和私立之分。在美国，大学创办的博物馆（美术馆）通常属于什么性质？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学博物馆体系吗？

约翰·史密斯：我认为所有的大学博物馆都会将自己视作公共机构，即便是他们可能隶属于某所私立院校。对于所有的博物馆来说，都会首先把服务公益视作自己的使命。

三联生活周刊：大学博物馆的使命和其他那些博物馆——比如大都会、MoMA、古根海姆，有什么不同？

约翰·史密斯：我认为，大学博物馆最核心的责任在于为学生和学术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从而确保藏品和项目能够满足学校的教学任务，并以一种帮助人们怀古知新的方式提升跨学科的教学与学习能力。当然，如果这家博物馆中有自己的藏品的话，他们还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如何恰如其分地保存、呈现并向公众阐释这些藏品。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一所大学想要创办博物馆（美术馆），需要通过什么方式申请？

约翰·史密斯：在美国，大学里建博物馆没有什么申办流程。不过，所有真正专业的博物馆都会通过美国博物馆联盟（the Alliance of American Museums）申请资格认证。如果博物馆是以慈善性质、非营利机构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并依靠免税的慈善捐助维持运营，那么这类博物馆还需要在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登记，以表明他们符合每一条特定要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对公众开放。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通常如何获得藏品？

约翰·史密斯：虽然大多数博物馆都会有一定的购藏基金（acquisition funds）来购买艺术品，但是大学博物馆的收藏大部分都是通过礼物馈赠的方式获得。

三联生活周刊：以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博物馆为例，捐赠在藏品中所占比例是多少？通常都是谁捐赠？

约翰·史密斯：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肯定有超过 75% 的馆藏都是来自捐赠。我们会从校友、（学生）父母、董事会成员方面收到艺术品，但最多



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馆长约翰·史密斯

的捐赠还是来自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将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视作当地最重要的博物馆。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在的博物馆每年收到多少捐赠请求？通常得到肯定回复的比例有多大？

约翰·史密斯：虽然我们也没有记录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提出捐赠申请，但是我们平均每年大概会新增500件藏品，有出钱买的，但多数来自捐赠。

三联生活周刊：接受或不接受某项捐赠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约翰·史密斯：展馆负责人和我会在接受捐赠前鉴别每一件物品。我们的标准主要是，物品自身的质量、它是不是能够填补我们现有收藏的空白、它的现状（是否需要保养），以及校内的师生和博物馆的参观者是否对这件物品感兴趣。我们也会考虑，它是否和当前先有的馆内收藏特点保持一致，以及不在馆内陈列期间该如何保存——会不会需要极为特殊或是价格昂贵的保存设备。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一个人同时捐赠多件艺术品，是否其中每一件都需要经过鉴定才能入藏？

约翰·史密斯：我们负责人会在每一件物品纳入馆藏前仔细鉴定它们的真伪和出处。

三联生活周刊：对捐赠进行鉴定是在入藏前还是入藏后？具体程序应该是怎样的？一般历时多长时间？

约翰·史密斯：鉴定的过程通常是在入藏前。这会防止今后对机构自身和捐赠者造成任何问题。而鉴定所需时间一般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说当代艺术作品的鉴定通常就非常简便。但如果是文物或古代大师画作，恐怕就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评估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曾看到一份资料，介绍说哈佛大学博物馆汇集了几代人的捐赠，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哈佛校友，最早的福格馆就得名于19世纪一名校友：威廉海斯·福格，他夫人在福格身后将其全部收藏捐给哈佛。类似这种早期的大型捐赠，校方是否也需要经过鉴定才接受？

约翰·史密斯：我不能说哈佛该做什么或做了什么，但据我所知，他们博物馆拥有一个高度专业的团队，我确信他们会尽其所能对馆藏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和鉴别。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接受的捐赠品被质疑在真伪上出现重大问题，校方如何回应？能举一个在美国比较著名的例子吗？

约翰·史密斯：在博物馆的历史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随着学术进步和新的研究成果出现，我们不断得到更好的资源来帮助了解博物馆中藏品的历史。尤其是近年的科学检测，可能会提供给我们之前几代博物馆专业人士都难求的数据。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罗德岛设计学院的例子。上个世纪30年代，我们曾接受了一幅被认为是凡高原作的画，之后，其画真伪受到几位重要的凡高专家质疑，博物馆撤下了这幅画，在后来几十年里都不再展示。不过，就在最近，这幅画被送到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进行了重新鉴定和科学检测，又被确认是一幅凡高真迹。这个例子说明，真实性的问题会随时间发生一些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前不久中国一所大学接受了一笔古瓷器捐赠，多达6000件，但这些文物的真伪却遭到了博物馆界专家和媒体的质疑。如果是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启动什么样的程序来处理？

约翰·史密斯：在美国，绝大多数博物馆都会在最开始就深入调查每一件捐赠的真实性。如果发现某件藏品是赝品，我们可能会将原物返还给捐赠人，或者作为“研究收藏”（Study Collection）。但最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必须非常公开、坦诚地处理这类事件。■



秦立巍

秦立巍：大提琴人生

文 / 尤朴

艺术需要冒险，有冒险才有艺术。

秦立巍在上海的一个音乐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大提琴副首席，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师。他过去演出时，他弹钢琴的妈妈曾帮他伴奏，练琴时间比他还多，随时合练，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精密。他的大提琴演奏家之路顺理成章，又一气呵成：从小同时学钢琴和大提琴，被大提琴歌唱似的单声部旋律所吸引，就读上音附小、附中，与父母移居澳大利亚，少年成名，很多演出，早早签下

大经纪公司，一切都顺。他13岁时获得中国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1992年获得澳大利亚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然后接连不断地包揽12个国际大赛的第一名。当他23岁参加第十一届柴可夫斯基大赛时，他的父母与他组成一支专业团队，助他拿下银奖，这是华人大提琴家近40年在这项比赛中所获的最好成绩。

他却讲了一段很少有古典音乐家愿意分享的话——关于低谷。他说，当他20世纪90年代末参加柴可夫斯基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已不像再早30年前那么重要。即使是如此重量级的国际大赛，含金量也在不断减少，今年赢得比赛的选手，很可能你连听也不会听到。殷承宗拿完银奖，是毛泽东接见的；我

拿完银奖，可以受到经纪公司、唱片公司邀请；现在拿银奖、金奖，没有太大意义——比赛已经太多了。我当时拿完奖，一下子很辉煌，全欧洲巡演；一年之后，又一下子全没了。我记得很清楚，24岁那年，我开了保时捷跑车，只开了6个月；然后我没钱了，连房子租金都付不起。那时经纪公司给我排了满满一年，五十几场音乐会，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得了；第二年，一下子跌到二十几场，你的经济状况和心态全都要重新调整，这种调整需要时间，也是成长的过程”。在低谷的时候，他母亲曾在电话里告诉他：“那个时候让你学大提琴，不过是希望你有一技之长，将来生活得下去。你现在所做到的已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他卸下了很多包袱，但从高峰跌落，想再“咸鱼翻身”，重新回去的过程，他“什么滋味都尝到了”。

这也是现代的古典音乐比赛制度和市场运作的更残酷之处：每年都不断有各种比赛的获奖者进入到这个市场；以前的世界，一年大概只有10个有名的大提琴比赛，现在大概有50多个，每个比赛都有第一第二名，这些人都会有音乐会，人们对他们好奇，他们可能迅速走红，但也可能因市场快速的更替而迅速被淘汰。刚过40岁的秦立巍打量着那些国际乐坛不断涌现出来的大提琴新秀，就像看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多了一些审慎：“出道时非常强，但只有时间能证明，他到底好还是不好。在这个证明过程中，事业可能会被冲击至低谷，有时要三四年后，才能重新回到稳定的状态。”当他年轻时与伦敦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BBC广播交响乐团全都合作过后，他以为自己到顶了；再回首，他却深刻体会到，“红真的不难，最难的是持久。伟大若不恒久，则一文不值”。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只能把比赛看成锻炼自己的一个工具而已，不能把它看成事业的踏脚石。“很多人通过比赛获奖，走上了独奏的道路，但很多时候，机会在命运面前只是闪了一下，就消逝不见。”经历这些大起大落后，秦立巍把事业和金钱看淡了一些。最终，“对音乐的热爱才是本质的，成为能够推动自己往前走的唯一动力，其他的都有上有下，没有持久的热爱，巨大的失落感有时会让人寸步难行”。

对秦立巍这个年龄的演奏家来说，“天才”这个词早已不再有那么显赫的意义。虽然对于演奏家来说，天赋总是诱人，却也危机四伏，像下午斜射的阳光，形成一道阴影，缠绕着他们。这种阴影有时将人推入低谷，有时则隐藏潜伏，伺机而动，当个人成长与创

造力不相称或事业上出现停滞状态时，就会产生总的危机，使整个人崩溃。当一切不再是浑然天成，而需要通过有意识的、细致的根本调整，才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时，音乐家常常会向自己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解决内在矛盾的动力来自何处？”杰出的演奏家与老师，常常是那些曾经为了自己的技巧和演奏生涯，在那些最不顺遂的时刻，在艺术和生活方面进行过挣扎的人。

秦立巍的这种坦诚让我感到，年近中年的他更加从容了。就在我们见面前的两个小时，他刚推掉了一场明年的巡演邀请。他今年有68场音乐会，他认为“够了，不算多也不算少”。现在他更看重节奏，在家庭、演奏事业、音乐教学事业之间维持平衡。他有了一种克制，说：“也可以冲到一年80场，但这就意味着，演出间隙休息的那两三天时间，本是为下一场演出做准备的，被压缩掉了。我更在意保证我这60场音乐会的质量。到我这个年龄，一年是否多二三十场演出对我的人生来讲，已没有多大的区别。我感到状态稳定，也很满足。”

三联生活周刊：许多独奏演奏家是在一个相对单纯和封闭的音乐环境里长大的，没有上过普通学校，没有同龄人的成长经历，离开他们演奏的乐器和音乐舞台，他们几乎一无所长，难以生存。20世纪的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就曾说：“假如用降落伞把我空投到某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国家，没有小提琴，没有钱，又不会说当地的语言，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你的生活与成长经历也是如此吗？

秦立巍：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进入附中后，很快我就随父母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当然也继续学大提琴，但我考取了当地普通中学的奖学金，一所英式的贵族男校，各种文化课都抓得很紧。中学毕业时，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只能走拉大提琴、搞音乐这条路。我以不错的成绩考入墨尔本大学的金融专业，想尝试不同的行业。15岁时我在澳大利亚拿了一个大奖，17岁拿了全澳最大的大提琴奖，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在不停地以职业独奏家的身份演出，与经纪公司签约，与墨尔本交响乐团、悉尼交响乐团合作，很多机会演奏。

我一直很喜欢音乐，从小音乐就一直伴随着我，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人生没有音乐，但把古典音乐当作事业，是比较晚领悟的事了。在上音附小读书时，我的性格很有竞争性，非常努力。到澳大利亚后，在普通中学里，我觉得不需要拉琴也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



(孙海摄)

2014年2月22日，秦立巍参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青春派贝多芬·命运回响》音乐会彩排，吕嘉指挥

生活。真正意识到我离不开音乐的一刹那，是19岁时我开始在大学里读金融的时候。读了一年金融，我发现，其实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真正喜欢的还是音乐。我请求系主任为我保留4年学籍，他开始坚持只能保留2年，我请他听了一场我的音乐会，结束之后，他同意为我保留4年，让我去尝试以音乐为职业。我去英国，对自己的安排是第一年拼命读书、拼命练琴，第二年参加英国国内比赛，第三年参加国际比赛，第四年签经纪唱片公司；如果达不到这些，我就回去继续读金融。在这个状态下，我才意识到，我不仅离不开音乐，而且想以演奏音乐为职业。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上海度过了童年，13岁迁居澳大利亚，19岁又前往英国，在那里学习、演奏和生活了10多年。从古典音乐的氛围上讲，上海、澳大利亚和英国都对你有什么影响？

秦立巍：澳大利亚是新兴国家，很像美国，愿意接受新的东西。对我个人而言，上海、澳大利亚和后来的英国给我的影响都很大。中国的基本功训练很扎实，也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到了澳大利亚，可以说感觉随心所欲，想象力是唯一的局限。在上海练琴时，老师总说“你应该这么做那么做”，并不都是批评，但有种寸步难行的感觉，拉琴也不奔放，对自己要求也很高。到澳大利亚后，我的老师就认为，我应该撇开所有的包袱，音乐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世界。然后我去了英国，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虽不完全是欧洲文化，但又基本是西方文化里的欧洲部分。这三个地方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缺一不可。我在中国打的基础，英国给了我文化上的补充，13岁到19岁成长的关键6年在澳大利亚，音乐氛围肯定不如英国，不像伦敦交响乐团这么多，但澳大利亚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大的交响乐团，资金比较充足，运作顺利，没有竞争对手，水准非常高，吸收了国际上最好的音乐家。欧洲则不同，仅在伦敦一个城市，大团就有6个，小团有4个，柏林人口380万，有9个职业乐团，这么说来，古典音乐在欧洲还是很了不起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些曲子你演奏了很多遍，比如《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你觉得现在的演奏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吗？

秦立巍：很多不同，每场音乐会都不同，这就是演奏家的音乐乐趣。你无法系统化、模式化地去表现音乐；如果每场都相同，你听过我的一次演奏后就不会再来听了，与听唱片没有什么差别。人不是机器，演奏家也要让自己不停地有新鲜感。有时我一套巡演，六到七场，甚至更多，每场节目单都一样；说实在的，一般常规，第一场比较紧张，第二场找到状态，第三场可能是最好，第四场要有变化——寻找新鲜感，变的过程中可能会发掘自己以前从未发掘过的新东西。这才是西方古典音乐无穷深度的表现。西方古典音乐之所以伟大，恰好在于它可以让你无限地去发掘和探索，从演奏家和听众的角度都是这样。演奏家如果为了安全，给自己一套模式，就违背了古典音乐的初衷。有一次我在德国演出，与汉堡的NDR广播交响乐团合作，它应该是德国最好的广播交响乐团，代表着德国交响乐学派最深厚的传统。我特别紧张，晚上睡不好觉。我打开电视，正好看到法国女钢琴家埃莱娜·格里莫(Hélène Grimaud)在做一个采访。她说了一句话，使得我立刻完全调整好了第二天的心态和思想。她说：“艺术需要冒险，有冒险才有艺术。”我觉得非常准确，所有的艺术都是在挑战我们常规的想法，这也是艺术的责任和使命；表演艺术就是在一个时间框架里冒险与挑战。演出这么多年后，现在站在舞台上，我还会有紧张感，一定的紧张说明在意：在台下练兵多年，能否在台上的一瞬间体现出自己的功底？能否表现出音乐的本能和最美好的状态？我常告诉我的学生，不要去刻意克服紧张。紧张是好事，但如何控制自己的紧张，这是一门学问。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与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和音乐家之一梅纽因有过合作演出。能否讲讲那次合作的情况？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秦立巍：梅纽因去世前的最后一个巡演，我曾与他合作过。那时我19岁，他82岁，他已经是指挥了，不拉琴。我们与波兰的一个交响乐团做了一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部分国家的巡演。整个巡演里最繁忙的人就是他，整天在接受采访，整天在练习，整天在看谱子。我跟他在飞机上，他一直在看谱子；跟他在车里，他一直在跟他的经纪人讲电话；跟他在休息室里，他也一直在跟我琢磨，今天演出的海顿我们可以有哪些变化的尝试。他的敬业精神使我知道为什么他这么伟大；跟这些大师们合作，是一种熏陶。他是弦乐演奏家，因此他对弓法特别在意。海顿是非常古典的，接近巴洛克的作品，它要求右手运弓时要有空气的感觉，不能太实地贴近弦，因为我们现在用的琴是金属弦，而几百年前的琴用的是羊肠弦，梅纽因对右手弓弦间的接触方式很重视。在演奏海顿这样的曲目时，我们需要知道当时的拉琴方式，就如唱京剧的人，你要知道戏剧的历史底蕴一样。像《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就是用柴可夫斯基的拉法，弓贴近弦；但海顿就不一样，梅纽因给了我这种启发。

我的脾气很好，但有一次我对学生发了特别大的火，把手里的日历向他扔去，差点扔在他头上。他说了三个字，让我无法忍受，这三个字是“差不多”。古典音乐是非常精密的游戏，仅做到“够了”是不够的，做到“差不多”是差太远，这是我从这些大师身上学到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录制全套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的时候，之前有去听别的大提琴家演奏吗？最欣赏哪个版本？你自己的这一套对贝多芬的诠释有什么特点？

秦立巍：我听很多。有些音乐老师主张不要去听别人的演奏，认为这样会影响到自己的演奏风格，但我认为应当充分利用现代设备，而且好听得更多，听多了会对一首曲子形成比较全面的想法。最靠近我对贝多芬作品音乐想象的是匈牙利大提琴家米罗斯·佩雷尼（Miklos Perenyi）与钢琴家安德拉斯·席夫（András Schiff）的演奏，由ECM唱片公司录制。每个人对美的遐想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我教学生这里要拉得“甜美”，你要想象人生中所经历的美好，每个人唤起的想象都不一样，对声音的追求也不一样；激情一点，速度会快一点，沉稳的人，再快也不会太快。我们可能都能与贝多芬的情感形成基本的共鸣，大体知道这里是“黑暗”，这里是“快乐”，但这些情感色彩细微的变化，是非常个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演奏家跟作曲家是一种结合的原因。佩雷尼与我的接近之

处，可能在于，我们对于贝多芬任何一个情绪转变的方向理解，比较靠近。我比较原汁原味，我一直认为演奏家是一个透明的桥梁，我们的工作是把作曲家的意思传达到你的心灵里。贝多芬写得很仔细，不像有些作曲家，如皮亚左拉，比较随意，给人的空间比较大。但贝多芬对哪里渐强，哪里休止符有多长，一个音有多强，什么情绪，都写得很清楚，按谱子拉，是演奏家最起码的责任。比如刚才所说的“甜美”，音乐术语叫“dolce”，是意大利文。如果你去比较好的意大利餐馆，服务员会给你两份菜单，一份菜单是前菜和主菜，吃完之后再给一份甜品菜单，上面就写着“dolce”。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和知识，就会知道“甜美”与“优美”的不同，在拉奏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感受。

三联生活周刊：你尝试过演奏古典音乐之外的别的艺术音乐吗？有没有全新地去诠释第一次写作给你或挖掘出来的新曲子？哪些当代古典作曲家是你认为非常出色的？

秦立巍：最近与爵士小提琴音乐家彭飞合作了一首歌，叫《夜晚的猫们》，我在里面客串了一把，赢了一个台湾的金曲奖，最佳作曲。我与上海很多玩爵士的音乐家从小就认识，他们全是即兴，我们搞古典音乐的就是缺这种东西，我曾尝试过即兴，可惜一塌糊涂。两个月前我刚在维也纳交响乐团录制了写给我的一首全新的大提琴交响曲，秦文琛老师写的《黎明》，事实上，我每年要拉四五首全新的曲子。这是一个过滤的过程，可能我演奏了50首全新的大提琴协奏曲，多年后最终只留下来一首曲子，但也就达到了目的。陈其钢老师的代表作《逝去的时光》，我就拉得很多，算是一部留得下来的作品。两年前我拉了作曲家莫尔写的双大提琴协奏曲，是一个英国的唱片公司问我能不能考虑录一下这首从来没录过的曲子。这首曲子有很好的东西，但它没有流传下来，确实有它的原因。它的作曲风格和结构上有漏洞，前两章结构很好，旋律非常漂亮，很好听，但第三乐章结束时，比例不大对，有点虎头蛇尾，好像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去营造一个主题，但写到后面有事走掉了一样。这位音乐家有他的才能，但似乎没有从前辈伟大的作曲家那里学到作曲的框架。当代古典作曲家中，我认为古拜·都琳娜非常棒，但她的音乐有很强的宗教性。埃萨-佩卡·萨洛宁也非常好，他有演奏与指挥的舞台经验，所以作品容易发挥出音乐的极致。另一位是克里斯托弗·潘德列茨基，虽然他有一些讨巧的东西，但他音乐里的宽度特别容易让观众的心灵感触到。■

充满鱼子酱味的俄剧

文 / 张月寒

介绍一部最近在小众范围内非常受欢迎的《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又名《战斗民族养成记》)。

最近在B站有一部非常火的俄剧,名为《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又名《战斗民族养成记》),一洗之前俄罗斯给国人的文化印象。对于大多数没有去过莫斯科的人来说,也许对于俄罗斯的文化印迹还是来自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构筑出的那个精致、苦寒、坚忍、梦幻、深重的俄国。极度挑高带有浮雕的天花板、桃花木质地的家具、单筒望远镜……但《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却似乎构筑出一个更当代、新鲜、时髦、清新感的俄罗斯;外加它透过美国记者亚历克斯的视角描述今日俄罗斯,更让看惯美剧的观众无缝过渡。

这部由俄罗斯CTC电视台拍摄的搞笑俄剧,每集只有20多分钟,正如当年《欲望都市》的每集片长,非常适合边吃饭边看。短小精悍的剧集节奏、笑点密集的设置、颜值极高的俄罗斯女明星,或许都是这部剧一下能在中国获得如许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一部好的宣传作品能够成功的重要秘诀在于,它不只描写好的,更毫不忌讳讨论坏的,俄罗斯社会的种种缺点、对外国人的公开偏见,于全剧中也当作笑料不卑不亢地探讨。俄罗斯CTC电视台是寡头乌斯马诺夫(Alisher Usmanov)占75%股份的电视台,可是剧中对寡头阶层的调侃却是毫不留情、肆意调笑。

《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首先展示出一种如契科夫短篇小说般的那种诙谐和机智。这种反讽式的诙谐,是俄式的、暗黑又光明的,一种和英式幽默、美国脱口秀式喜剧完全不同的搞笑风格。全剧有一种“批判现实主义”式搞笑,在调侃现实的基础上又让人忍俊不禁。剧中有一幕男主角亚历克斯(Alex)去俄罗斯房产所找修房子的工人,而那天又适逢俄罗斯公休。值班大妈当时暗示了一些事。男主懂了后用现金折了一只小纸船递给大妈。大妈却说:“大休息日的如果你要把修理工请出来,是不是至少该给我两只

小船?”第七集中,在向游客出售的小摊子上,著名的俄罗斯套娃,奥巴马的小套娃被更大的普京的大套娃套住,也不得不说是一种聪明的挑衅和无伤大雅的发泄。还有一集,剧中美国记者身份的男主角,在睡着后脑袋上被人贴上“我爱普京”的便利贴。

“俄罗斯人”是全剧的文眼,也是在历史上被众多文豪所探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白痴》中的罗果仁是最代表俄罗斯人的。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说:“俄罗斯人是如此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坚强,以至于折磨自己也在所不顾;他们很少迷恋过去,总是大胆向前看……俄国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每当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来了劲头……”斯大林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中曾盛赞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为杰出的民族”。不过,英国人写的《从莫斯科到古拉格》却说,古老俄罗斯的传统民族性格,是永远无法适应包含公平、自我实现、物质化的都市等特征的西方文明。而《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也将过往俄罗斯精致贵族文化在今天的俄罗斯找到了新延续。第七集,罗马和男主不小心惹了俄罗斯黑毛子(俄罗斯人对高加索人的称呼)以后,编剧还顺便普及了一下俄国19世纪沙龙文化。黑毛子一伙站在水泥地停车场,优雅地交换了一下彼此对于马基雅维里的看法。

在《从莫斯科到古拉格》这本书中,作者蕾切尔·波隆斯基叙述了蒸汽浴对于俄罗斯文化的重要影响,“在阴暗芬芳的澡堂之中”……“俄罗斯祝福语,通常用于洗过蒸汽浴之后”。在这本书中,蕾切尔·波隆斯基称俄罗斯是“东方”。而在《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第一集中,我们除了一上来就被铺天盖地的伏特加豪饮所震撼,更记忆犹新的是他们饮完酒直接去了蒸汽浴,并在蒸汽浴中用亚历克斯从美国带来的奖杯当了舀水浇炭的瓢。也有一种说法,在俄罗斯,只有你和对方一起蒸过蒸汽浴后,你们才是真正过硬的交情。

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对俄国的印象大多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的衰落》中,他对大草原之于俄国民族灵魂的影响抱有一种诗人般的担忧。但其实,



(上、下)《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剧照

狩猎是俄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屠格涅夫所著的《猎人笔记》对此有丰富的展现。出身于旧式贵族家庭，他在书中寂静描述了那种俄罗斯远郊的狩猎之景。“春天里，当日落前一刻钟光景，您带上枪到小树林里去，不带狗。您就在树林边上找个地儿，观察一下周围，检查一下弹火门……一刻钟过去了。夕阳下去了，可林子里还是亮堂的。”这种类似通感，在《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中，怀着对古老俄国的最初幻想从美国来的全球畅销书作家（其实是影射乔治R. R. 马丁）也要求经历一场正宗传统的俄式狩猎。于是寡头阿纳托利精心安排了一场俄式山野中狩猎，不知是不是有契科夫说的俄式乡村那种“弥漫着树林、铃兰、松焦油的气味”，但从电视剧画面上看的确是有一种横阔的乡村景致的，观者透过屏幕也几乎可以嗅出树林的清新香味。

作为和中国一样的古老民族，俄罗斯也确实有着很多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哲学，这些生活哲学也植根他们今天的生活，显出一种古老和现代交错的别样感。他们也有各种迷信：叉子掉地上即是有女人找上门；不能随便吹口哨否则便会把钱“吹”走。经历过战时物质的匮乏，他们的阳台也都是放满各种杂物，家里连一个塑料袋也不舍得随便扔，说是“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多民族文化交融也是这部剧向外界发散的一个强烈信息。韩国口音的餐馆店员在莫斯科街边散传单，说来我们店尝一尝俄罗斯煎饼；主角亚历克斯的包丢在一辆黑车上以后，鞑靼司机第二天完璧归赵把包送了回来。一旁坐着的俄罗斯秃头老人很有智慧地说：“在俄罗斯，外国人总是对外国人分外友好。”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个餐厅的鞑靼人侍者也让人印象深刻，那种恭谨的狡黠，和电视剧中那个机智幽默的鞑靼人司机有异曲同工呼应。

剧集“抓人”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于细节感的叹为观止。全剧一开始，首先寡头喝的伏特加就让人眼前一亮。俄罗斯金鲟鱼伏特加，俄罗斯白色酒中的顶级，传说含有野生鲟鱼子精华。冰镇后尤其甘甜震烈，冰火两重天，先包含着一种靠近北极的那种极冰感，后又因为度数绝对高而在口中形成一股火焰般的清热。在托尔斯泰小说中，伏特加多是与鱼肉一起享用。剧中的另一款伏特加是斯米诺红牌伏特加，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价格亲民，性价比高。此剧中，寡头是在摄影展第二天因为女儿生他气而郁闷地和亚历克

斯一起喝的，直接纯纯地倒入杯中。俄罗斯民族这种类似于直接喝酒精的豪壮，似乎是美剧、英剧里所不多见的。

除去瞥见俄罗斯喝伏特加的豪气，也可偶尔学到这个传说中酒量挺好国家的解宿醉良方。第九集寡头递给宿醉的亚历克斯的，是腌酸黄瓜和番茄的泡菜酸水，据说是俄罗斯解宿醉良方。也有人说俄罗斯人第二天解宿醉的秘诀是“血腥玛丽”——一种充满浓郁番茄汁的鸡尾酒（还是酒）。不过这两者也都是有根据的，番茄、芹菜，确实是能解宿醉的两种蔬菜。

该剧注重细节还在于每个主角的手机铃声都有讲究。男主角亚历克斯的手机铃声是一首列兹金人的舞曲。这也是为什么第七集，本来想向他找茬的一群高加索人听到他的手机铃声对他有了略微的好感，因为列兹金人是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民族。剧中寡头阿纳托利经常用的在摄影展上悬疑时刻出现的手机铃声，是维瓦尔第《四季·夏》的第三乐章，那种紧急交迫大难临头的旋律，跟当时的剧情发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烘托和映衬。剧中寡头用的手机，则是钛金机身、包裹荷兰进口的小牛皮、航天科技、约人民币5万多元的西方著名奢侈手机Vertu。他穿的鞋，其中之一是Barker英国手工鞋。

正是精心安排的细节，让观者对这部短小精悍的俄剧产生真实的心理代入，也淡化了外国观众观看的文化隔膜。可惜，这部在中国目前如此受欢迎的俄剧，有关的英语报道却并不多。

其实，如今探讨我们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印象”这一话题，还是会有“刻板印象”之嫌，但是，也正如众多学者所论述，刻板印象有时是歧视，有时却是惊人精准。俄罗斯，这个国家经历过战争、饥荒、大屠杀和集权统治；也同时拥有一批伟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在《夜莺狂语》中我们曾为诗人们尽管受尽最残酷的迫害仍然不止吟唱这一点所震撼。他们的人道主义、被扭曲的对世界的看法、民族主义幻梦、史诗般的对战争和恐怖的反射，以及他们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笃信，都是使这个民族形成一种独特魅力的深层积淀。在恍惚的夜间我们在属于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的那种俄式小村庄里瞥见了自我精神上的一个梦，这个梦在知识分子心中似乎是不止的。也正如最后死于集中营的曼德尔施塔姆写的那首诗：“我既是园丁，也是花朵。在这世界的牢狱中不止我一个。”



位于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的马约卡岛一直是欧洲人钟情的度假圣地，从西班牙王室到欧美明星乃至中产家庭，都似候鸟般前赴后继飞来这里享受懒洋洋的春光



走进巴利阿里群岛 地中海最后的伊甸园

记者 邱杨



跟随我来到这个宁静之岛，那里的男人从不匆忙，女人永不衰老；那里的美景再怎样形容也不过分；那里终日阳光灿烂，就连月亮也是缓缓升起，迟迟移动。

——圣地亚哥·鲁西诺尔



人们常常容易对欧洲教堂审美疲劳，其实用心感受就能体会到每一座教堂独特的美。图为马约卡岛上的一座小教堂



帕尔马大教堂内部暗含着高迪和米盖尔·巴塞罗的现代主义设计，这些“脑洞”大开的设计让人感到惊艳

从苏黎世飞往马约卡岛的飞机坐得满满当当，连行李架也被各式各样的高尔夫球塞满。机舱里除了我们之外鲜有亚洲面孔，偶尔传来的寒暄声也以德语居多。我好奇地环顾四周，这些平素里严肃沉闷的德国人，在此刻狭窄的空间里却浑身散发着一股慵懒随性的气息——这可不怎么常见。我揉了揉眼睛，为眼前看到的一切感到惊异，一个大大的疑问在心里升起。

这趟飞行的目的地是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这座群岛环绕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南部，4座岛屿——马约卡岛、伊比萨岛、弗门特拉岛和梅诺卡岛——如同珍珠项链般散落在幽蓝地中海的最西端。或许是看出了我眼中的疑惑，同行的西班牙旅游局干事笑盈盈地告诉我，这座群岛一直是欧洲人钟情的度假胜地，肖邦与乔治·桑的爱情故事更为其增添了甜蜜的浪漫色彩。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千里之外的海岛对德国人施展了魔法。

马约卡岛是其中最大最亮的那一颗珍珠，也是我们探访巴利阿里群岛的首站。在西班牙语中，“马约卡”



早在摩尔人统治马约卡岛时期就以种植杏树来抵抗干旱，如今这些如雪花般纯净的杏花依然静静地绽放在山野中

有“最大”的意思，每年春夏时节，无数航班从欧洲各地直飞这座西班牙最大的神奇海岛。伴随着飞机滑翔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我们的“三岛游纪夫”之旅也开始了。

马约卡岛：山海间的乐园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在夜幕中抵达马约卡岛的首府帕尔马。顺着蜿蜒的海岸线远远望去，盏盏灯光在老城的大街小巷里陆续点亮，忽明忽暗远远近近地闪烁着。夜色中几乎看不清海水的颜色，只有各式游艇安静地停泊在港湾里，高高低低的桅杆伴随着海浪声，在波光荡漾中摇曳生姿，一切都是静谧美好的样子。

饥肠辘辘的我们却顾不上欣赏夜色，眼巴巴盼着时针艰难地挪到21点，才熬到了西班牙的晚餐时间。伊比利亚火腿，油醋蘸面包，蒜香烤对虾，橄榄油煎

鱿鱼卷，番茄酱肉丸子，香草蛋黄酱蘸土豆，还有香喷喷的西班牙烩饭……形形色色的西班牙传统美食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瞬间唤醒了因倒时差而倦怠不堪的味蕾，结结实实地提醒着我们：进入了西班牙时间。都说美食是最好的兴奋剂，在沉沉夜色中吃得又撑又困的我，开始期待起明天。

第二天清晨，在地中海的春日阳光中，我才真切地看清帕尔马的全貌。这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地中海港口城市，金色的太阳悬挂在淡蓝的天幕上，清晨的阳光照耀着波光粼粼的湛蓝海面，闪耀出点点光斑，如同钻石的切面。历史上这里曾是海盗的避难所，如今却是航海船只的避风港，将马约卡岛与欧洲大陆连接起来。港边大道绿树成荫，三三两两的度假者沿着海边步道奔跑着追赶朝阳。

面朝大海的帕尔马大教堂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高耸入云的塔尖和哥特式立面闪耀着米茸色的光彩，仿佛在诉说着马约卡的历史风雨。1000年前的马约卡

岛为摩尔人所控制，并以此为据点频繁抢劫加泰罗尼亚船只，终于激怒了西班牙内陆的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1229年底，他率领大军渡海攻夺马约卡岛，不料却遭遇大风暴，便起誓说，若能安全登陆就在岛上修建一座大教堂献给圣母。1230年新年，成功收复马约卡岛的国王履行诺言，在靠近海岸线的一处高地上兴建了这座哥特式古典大教堂。

如今依然屹立在海边的大教堂是帕尔马最显著的建筑。或许很多人容易对欧洲教堂审美疲劳，甚至开玩笑说游欧洲就是看“宫保鸡丁”——宫殿、城堡、基督教堂和市政厅，其实用心感受就能体会到每一座教堂独特的美。置身在帕尔马大教堂高耸的穹顶之下，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教堂细部竟然暗含着高迪和米盖尔·巴塞罗的现代主义设计——墙体上酷似海底世界的雕塑、特立独行的铁艺吊灯、欧洲最大的彩色玻璃花窗——这些“脑洞”大开的设计竟然出现在以保守著称的传统天主教堂里，确实让人感到惊艳。同行的当地人一脸骄傲地告诉我：“这就是马约卡啊，传统与现代碰撞，庄严与柔情交融的‘千面’之岛。”

马约卡的“千面”还在于，较之纯粹的海岛，它是富于变化的——不仅有无敌海景，也有雄伟山峦。来到马约卡的第三天，我们从西部海港帕尔马一路向北，去翻越世界自然遗产特拉蒙塔纳山脉。要知道，在马约卡岛上，超过1000米的高峰就有十几座。

绵延曲折的山间公路弯多路窄，却是骑行者的乐园。一路上形形色色的自行车队从我们身边不断闪过，其速度之快常常让坐在大巴车里的我忍不住惊呼。在上坡艰难的路段，大巴司机却不鸣笛也不闪灯催促，而是放慢速度等待骑行者通过，直到来到相对平缓的直行路段，才从骑行者身边开过。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玩笑：当牧师和常走这条路的司机一起来到天堂之门时，只有司机被允许进入天堂，原因是——只有司机才能让大家同时祈祷。事实上，尽管山路陡峭，当地政府在安全防护上下了很大工夫，每年数以百万的游客途经此路，却很少发生险情。

明媚春光里，特拉蒙塔纳山脉用它那结实的臂膀拥抱着沿路郁郁葱葱的橄榄树和漫山遍野的杏花。据不完全统计，马约卡全岛大约有600万到800万棵杏树，早在摩尔人统治时期就以种植杏树来抵抗干旱，如今这些如雪花般纯净的杏花依然静静地飘洒在山野中。而那些巨大的、形状怪异的古老橄榄树林，则是开创马约卡现代旅游业的奥地利大公路易斯·萨尔瓦多的“遗产”。1867年，当年轻的大公第一次来到马约卡便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一个可以实现梦寐

以求梦想的地方——天空、海洋、土地，所有风光尽收眼底。”在大公的敕令保护下，这些原始的橄榄树林得以留存至今。

蛇形山道依着特拉蒙塔纳山脉盘旋，每道拐弯过后，都向我们展露出形态各异的春日山景。恍惚中我几乎快忘了，这是一座位于地中海的岛屿。而当我们终于沿着盘山路来到马约卡岛最北端的福尔门托海岬时，一幅悬崖海景图毫无预兆地闯入眼帘——陡峭悬崖从海中拔地而起——才让我醒悟过来，马约卡是座山海间的乐园，山、海、森林在这一方海岛上达到了奇妙的和谐。我俯在观景台的铁栏杆上怯怯地往下看，雄浑的海浪不断地拍打着岩石掀起阵阵惊涛，海鸥在不远处舒展双翅掠空而过，山海静穆仿佛是亘古的永恒，在无言地诉说着马约卡的魅力。

春日里的欧洲“后花园”

巴利阿里群岛每年的平均日照天数都在300天以上，这对平日里晒不到地中海阳光的欧洲人而言，有着极致的吸引力。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笔下，早在“二战”前马约卡岛就是热门度假地，当时的英美人把这里当作冬季避寒地——冬季的帕尔马几乎一房难求，波莲萨住满了奇装异服的文艺青年，在酒吧里大谈抽象艺术。

更早被马约卡阳光吸引的还有肖邦和乔治·桑，这对爱侣大约是马约卡19世纪最著名的度假者。1838年11月，乔治·桑带着肖邦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从巴黎乘船来到了马约卡，她寄希望这里的地中海阳光，能让身体虚弱的肖邦和身患风湿的儿子莫里斯恢复健康。马约卡的美丽，让初来乍到的她发出了这样的赞叹：“诗人和艺术家所梦想的一切，造物主都在这里创造了出来。”

起初他们在帕尔马受到了礼遇，但好景不长，仅仅三周后，地中海冬日雨季的来临使得肖邦的病情恶化。很快，人们便传言这是会传染的绝症，不准他们再住在帕尔马。这对苦命伴侣，只得在40公里外的偏远小镇瓦约达莫萨的一家破旧修道院寄居。即便如此，身患肺结核的肖邦和言谈高傲的乔治·桑仍然不受小镇人的欢迎。清苦的日子里，在等待恋人回来的一个傍晚，肖邦听着洒落在修道院房瓦上的雨滴声，创作出了著名的《D大调前奏曲》，又名《雨滴前奏曲》。在乔治·桑的描述中，“这是掉落在肖邦心坎里的泪珠”。糟糕的天气进一步加重了肖邦的病情，98天后他们便离开了马约卡，而乔治·桑则把这段并不愉快

1. 马约卡岛
东海岸线上的
Porton Colom
港口美景，各
式小船安静地
停泊在港湾里

2. 瓦约达莫萨
仍然保留着肖
邦和乔治·桑
的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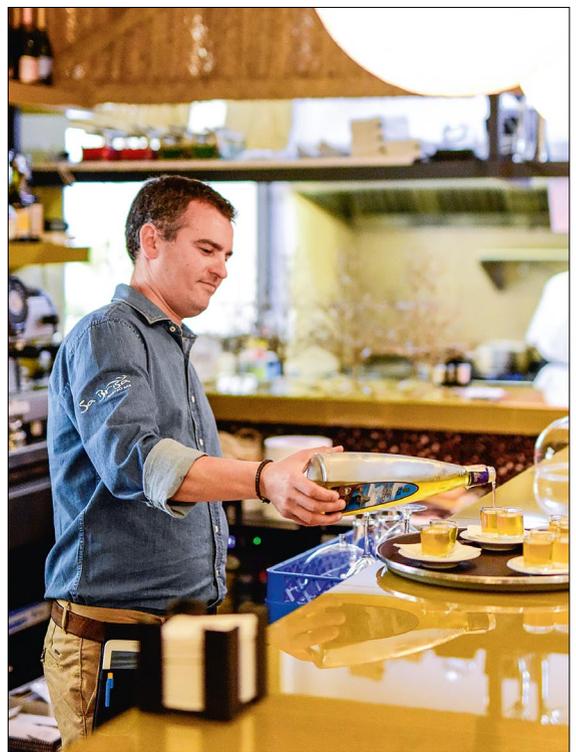
3. 美酒是夜店
天堂伊比萨岛
的唤醒剂



1



2



3

的经历写成了小说《马约卡的冬天》。

瓦约达莫萨是位于马约卡西北部群山环绕的一个小村庄，如今这里仍然保留着肖邦和乔治·桑的故居。岛上的人们愉快地售卖着各种版本的《马约卡的冬天》，并不介意作者在书里对马约卡人的颇多非议。尽管每天都有大量的观光客来到这里，但瓦约达莫萨依然保留着悠闲宁静的气氛。沿着蜿蜒起伏的小径散步，在这个鲜花环绕的小镇里遥想肖邦当年的坎坷境遇，颇有些唏嘘。我们的回程路上，竟然罕见地下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这或许是今年马约卡春天的最后一场雨吧。

100年后的罗伯特·格雷夫斯显然要比肖邦幸运，这位英国诗人的诸多重要作品都在临近瓦约达莫萨的另一个小村落迪亚写成，并在这里定居直至终老。迪亚村非常小，我们从位于村子上方的一条主路插进来，步行不到5分钟就来到了村子的入口。与南部沿海的广袤不同，迪亚村更像是一座微型山城，层层叠叠的梯田尽头是风格各异的石头小屋，漫山的橄榄树、柑橘树和柠檬树依着山势繁茂生长。

走在这里，四周寂静的山谷里传来布谷鸟的啁啾啼鸣和远处山羊叮叮当当的铃铛声，一切都显得如此慵懒惬意，只有偶尔从海上飞来的海鸥鸣叫声才打破山村的宁静。这一派空灵的马约卡山林乡村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如今这座只有700多人居住的小村落已然成了名副其实的艺术村，面朝山谷，鲜花环绕，仿若天堂。每年7月24日格雷夫斯的诞辰日，村民们都会聚集在村子里的小剧场，诵读他的诗篇。在格雷夫斯去世30年后的今天，迪亚村依然优雅娴静得近乎骄傲。

继续往北行进就到了被称为“柑橘镇”的索约尔。自19世纪起，一片片橘园和柑橘贸易是这里繁荣的保证。尽管索约尔距离帕尔马不过30多公里路程，但位于特拉蒙塔纳山脉北部的索约尔地势险要，一直以来只能依靠一条狭窄的铁路与帕尔马相连。因此，当地人更愿意从相隔不远的索约尔港跨海向法国马赛港出口柑橘。而叮叮当当的木质小火车便是连接索约尔镇和索约尔港的交通工具，曾几何时，小火车满载着柑橘的醉人芳香，亦满载着小镇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驶向远方。

如今来这儿度假的人们也依然乘坐小火车来怀旧，在春夏旺季里，车厢连接处的过道上都被挤得满满的。春日正是柑橘和柠檬丰收的季节，坐在纯木质的无窗小火车里，似乎一伸手就能摘到路旁挂满枝头的柑橘和柠檬。小火车在索约尔镇里穿行，小镇里优雅的法式建筑、精致的铁艺雕饰，流露出旧日时光里

与法国贸易的印迹。春天的阳光和风穿透进小火车里，让人的心情都变得轻快起来。就像西班牙艺术家圣地亚哥·鲁西诺尔在站台写下那段话：“索约尔的小火车不是为了赶时间，而是为了享受时间。”

如今的马约卡早已不再是欧洲人冬日的避寒地，而是春日的度假胜地。当欧洲大陆尚处于乍暖还寒的春寒料峭中，地中海的马约卡早已披上春天的盛装。从西班牙王室到欧美明星乃至中产家庭，都似候鸟般前赴后继飞来这里享受懒洋洋的春光。恰如在马约卡定居的英伦作家、爵士乐手彼得·凯尔在“马约卡四季”系列随笔中赞美的那样：“春日的马约卡岛，简直就是天堂啊！”

伊比萨岛：嬉皮士的盛夏狂欢

“克瑞肯索普先生，听说你刚刚从巴利阿里群岛回来，你住在哪儿呢？”“最近6年我都住在伊比萨岛上，那个地方比这个沉闷的国家更合我的心意。”——这段《命案目睹记》中的对话，或许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对伊比萨岛的真实印象吧。

伊比萨岛是巴利阿里群岛中距离伊比利亚半岛最近的岛屿，这座直线距离只有40公里的小岛，却拥有长达210公里的海岸线和终年照耀的阳光沙滩。如果说马约卡岛是属于春日的，那伊比萨岛一定是为盛夏而生。每年夏季初始，许多季节性航班从遥远的北欧、美洲直飞而来。我们像所有度假者一样，坐着小飞机从马约卡前往伊比萨，赶赴一场属于夏日的海岛狂欢。

首府伊比萨市坐落在一个俯瞰港口的高岗之上，阳光下熠熠生辉的达特维拉古城是整座城市的最亮点，无声地诉说着伊比萨岛乃至西班牙的千年风雨。西班牙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不同种族的大融合：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摩尔人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迹。公元711年，与西班牙一衣带水的摩尔人横渡海峡，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征服了整片西班牙南方国土和北方大部。在摩尔人眼中，西班牙就像是理想化的非洲——摒除了炎热、干旱、狂沙和恶疾，这里的少女也“漂亮得像天国的女神”。他们最终将西班牙变成了最西面的伊斯兰行省，并在这片土地上逗留了700年，伊比萨岛也不能幸免。

虽然摩尔人内部总是争吵不断，但他们建立起的定都于科尔多瓦的伊斯兰王权却盛极一时。在其鼎盛时期，宗教是自由的，女性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图书馆、大学和天文台百花齐放。当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地区，仍将生命看作死亡的过渡预备期时，在这里生

命却被阐释为因其自身就已精彩无比的东西——因求知而高贵，因每次喜乐而焕发生机。摩尔人为西班牙文化增添了些许浪漫主义的胚胎痕迹。

达特维拉古城便是古代西班牙鼎盛时期的真实写照，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里，留存着大量腓尼基、迦太基和古罗马时代的文物遗址及欧洲最大的墓葬群。有趣的是，如今的伊比萨居民仍然生活在古城里，甚至与墓葬群比邻而居，却丝毫没有忌讳的意味。我们参观完古墓出来，一抬头就看到了对面阳台上晾晒的衣服和栽种的鲜花，一派生机勃勃。这让我相信，伊比萨的魅力不仅仅是阳光和大海，它还是一座活的古城——历史烟云与民间烟火在这里碰撞共生。

夕阳下在古城里漫步，沿着高低起伏的石阶走走停停，偶尔遇上三三两两散步的行人，除此之外，暮色中的古城静得出奇，温柔的夕阳透过云彩之间的缝隙轻抚着我的脸。看日落在伊比萨岛上变成了一件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远处相拥而立的情人静静注视着光影的变幻，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缱绻的味道，仿佛从未被打扰。

夜色降临，伊比萨的另一张面孔才真正揭开神秘面纱。饱受夏天烈日暴晒的沙滩高温渐渐消散，阳光混合着海水的味道化成一股年轻的躁动，一波波人流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涌来。传说中伊比萨岛是希腊众神专门为跳舞而建造的圣地，而在1654年伊比萨岛被开发时，它的名字是“Island of Bes”——Bes是一位通过舞蹈和音乐去拜神的半神半人，而以此命名的伊比萨，毋庸置疑是音乐和舞蹈的天堂。

这里的夜晚也确实令世界瞩目。20世纪60年代，伊比萨曾是欧美嬉皮士们的精神家园，他们相约来到这里引吭高歌、驻足停留。40年后的今天，尽管嬉皮士时代早已过去，但伊比萨的夜晚仍然飘荡着自由的嬉皮遗风。在这里你可能遇见各路大牌乐队成员、好莱坞明星或世界超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到这里享受最前卫的音乐，最热情的舞蹈。伊比萨的夜晚舞动着无数个自由奔放、特立独行的灵魂，喝上一大口当地特制的茴香酒，加入到夜幕派对中去吧！

弗门特拉岛：自然的情人

弗门特拉岛是巴利阿里群岛链中最小的一座海岛，隔着8公里海域，与伊比萨岛浅浅相望。早在7000年前，弗门特拉岛与伊比萨岛是连在一起的，统称为Pitiusa岛。在见识了伊比萨岛的热烈喧闹之后，



小巧宁静的弗门特拉岛更容易让人一见钟情。当我见到它的第一眼，恍惚有种来到了希腊圣托里尼岛的错觉：蓝天白云椰林树影，地势平坦的街道上一尘不染，路边的建筑是清一色的蓝白相间，诉说着专属于纯粹海岛的慵懒与浪漫。

弗门特拉岛最早是蛮荒之地，甚至被人们幻想为陨石砸出来的飞地。它的名字来源于拉丁语“frumentarium”，意为“粮仓”。在古罗马人占领该岛之前，这里已经被迦太基人统治。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弗门特拉岛又先后被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统治。直到中世纪，这里才成为阿拉贡人马约卡王国的一部分。

在海盗横行的时代，这里是掠夺黑奴的船只从北非巴巴利海湾穿过地中海去往西班牙的重要登陆点。为了警示海盗入侵，当地渔民会在灯塔上点燃火把，退守到城中最坚固的小教堂中。教堂顶部的钟是从海底沉船里打捞而来，今天每当钟声响起时，似乎还能聆听到大海深处的声音。由于距离北非更近，岛上的建筑风格自然而然受到了影响，为抵御海盗而建起的厚墙小窗建筑也留存至今。

从前要来弗门特拉岛，只能从邻近的伊比萨岛坐轮渡，但近年来开辟出多条从西班牙本岛直航的线路。正所谓一岛一世界，不同于马约卡岛的丰富多变、伊



比萨岛的热刺激，弗门特拉岛径自守护着自然的宁静。这座面积仅为 82 平方公里的小海岛，由两个丛林覆盖的岬角构成，中间的洼地与白沙海滩相连。这里拥有欧洲最美最清澈的海滩，以适合裸体日光浴的白色沙滩闻名，对渴望远离喧嚣的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辽阔的萨利内斯海滩是弗门特拉岛最著名的海滩，三面环海的它也是水鸟迁徙途中的重要栖息地。海滩上满是细密的白沙，粉色的贝壳散布其间，在阳光的照耀下，微微泛着粉色的细碎光彩。这里的海水颜色分层，从透明到浅蓝，从宝石蓝到深蓝，澄澈的浪花在海风中奔向地中海的怀抱。当太阳缓缓下沉，蓝色的海水瞬间被玫瑰色所取代，夕阳余晖照耀在海边高高耸立的白墙灯塔上，仿若来到了上帝之岛。

弗门特拉岛的海水之所以如此清澈，得益于一种海草——海神草，又叫波塞冬草。海神草是地中海特有的濒危植物，具有神奇的净化功能。它从无性繁殖的个体开始，不断分裂蔓延，虽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每年才长不到 1 厘米，但经过千万年的繁衍生息，如今的海神草已经遍布弗门特拉岛周边海域。水里的海神草是墨绿色优哉游哉的曼妙模样，但冲上岸后却像是从碎纸机里绞出来的废纸条，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是哪艘船出了泄漏事故使废纸漂得遍布海岸。实际上，风干后的海神草对阻止沙滩流失起着很大作用，

因此人们往往任由它留在冬季的海滩上，直到夏季才清理掉。

定居在弗门特拉岛将近 40 年的知名珠宝设计师埃里克·梅杰尔 (Enric Majoral)，就常常从这些海草和自然生态中汲取灵感，海神草造型的耳环和项链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梅杰尔是个风趣幽默的老头儿，和他交谈时丝毫没有西班牙顶级设计师的架子，他将他的作品风格定义为“原始主体的本质概念”。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和谐极富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些自然生态或许并不时尚，却能成为推动潮流趋势的潜在因素”。

在这个或许是地中海最宁静的海岛上，处处流露出自然的纯粹诱惑。蔚蓝清澈的天空倒映在湛蓝的海水里，犹如少女水光粼粼的含情眼神，如梦如幻，如泣如诉。绵长的白色海滩上躺着疲惫的身躯，享受着禁锢心灵得以释放的难得休憩。英国摇滚乐队克里姆森国王的一首歌《弗门特拉小姐》或许是此刻的最佳阐释：“当阳光逐渐暗淡，时间的灰手便无法将我束缚……当星光闪烁，时间将会释放我，为我松绑……弗门特拉小姐，黑暗的情人。”在弗门特拉这片欧洲最佳海滩上憩居，我宁愿变成地中海里一株自在悠游的海神草。✍

(参考资料：“马约卡四季”系列随笔，〔英〕彼得·凯尔；《西班牙——昨日帝国》，〔英〕简·莫里斯)

左图：索约尔的小火车不是为了赶时间，而是为了享受时间

右图：迪亚村像是一座微型山城，层层叠叠的梯田尽头是风格各异的小屋

最伟大的旅程

——专访“旅行者号计划”首席科学家爱德华·斯通教授

主笔 / 陈赛

探索的冲动，内置于人性深处。

1990年，当“旅行者1号”飞船到达距离地球64亿公里处时，按照卡尔·萨根博士的建议，飞船调整飞行姿态，拍下了一张回望太阳系的照片。在那张照片中，地球是一个“只有0.12像素的暗淡蓝点”，这就是著名的“暗淡蓝点”。

这张终极版的人类自拍照，提供了一种对人类来说意味复杂的存在主义视角：在茫茫宇宙中，人类显得那么渺小，但与此同时，唯有人类，可以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回望自己。

事实上，那也是“旅行者1号”在其漫长的旅程中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为了节能，在这张历史性的照片之后，“旅行者1号”就关闭了照相功能。此后，它独自在茫茫太空以17公里/秒（5亿公里/年）的速度飞行，直到2012年8月25日，在飞行了182亿公里（121.6AU）之后，“旅行者1号”发回的数据显示，它已经正式离开太阳气泡（太阳风在星际介质内吹出的等离子态气泡）的边界，进入星际空间，成为第一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

探索的欲望，深藏于人性的深处。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动下，人类穿越海洋，攀登高山，踏遍每个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但是真正将人类探索精神发挥到极致的，却是20世纪70年代发射的这两颗小小的航空探测器——“旅行者1号”与“旅行者2号”。

2个月前，我在北大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见到了“旅行者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爱德华·斯通教授。斯通教授今年80岁，瘦瘦小小，貌不惊人，目光中却有不可思议的锐利与敏捷，我的脑子里立刻冒出了《星球大战》中尤达大师的样子。1972年，36岁的他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任命为“旅行者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此后主持“旅行者号计划”长达40多年。

根据他提供的最近数据：“旅行者1号”目前距离地球230亿公里（135.2AU），“旅行者2号”速度稍慢，

距离地球167亿公里（111.4 AU），预计还有两年也将进入星际空间。两个飞行器如此漫长的旅程，也贯穿了这位科学家的一生。

斯通教授1936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1957年10月，苏联发射斯普尼克卫星，揭开了太空时代的序幕。当时他才20岁，正在芝加哥大学读核物理学的研究生。核物理学的很多技术与太空宇宙射线的技术是一样的，所以他的兴趣迅速从核物理转到了宇宙射线和太空。

他说，真正让他对太空产生兴趣的，是“探索者1号”与“探索者3号”。“探索者1号”是美国于1958年1月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地球轨道之后，发现了范艾伦辐射带。“‘探索者1号’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备，却可以做出那么重大的发现，这就是当时新兴的太空科学对于科学家的诱惑：知识的前沿就在那里，茫茫宇宙里那么多的未知事物在等待着被发现，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发明出合适的工具，走出去，去观察，去发现。”斯通教授告诉我。

1977年，这两颗探测器相继发射升空的时候，被称为NASA的“大旅行计划”。JPL（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发现，每隔176年，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会出现在太阳的同一侧，这意味着单一的飞行器可以借助重力协航（Gravity Assists，借助天体引力实现飞行器变轨，不仅可以有效减少燃料消耗，而且可以降低任务所需的发射能量），一次性经过4个行星。

这是一场真正的发现之旅。它们走过的每一个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都向人类呈现了未曾想象的风景。两个飞行器上各自装有11个科学考察设备，包括照相机、地磁仪、等离子光谱仪等，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无线电天线，不断地向地球传回它们一路采集到的数据和照片，于是我们得以看到木星上复杂的云、风、风暴系统，以及“木卫1”伊奥（Io）上剧烈的火山活动的痕迹；我们看到迷人的土星环，成千上万的光环环环相套，像一张硕大无比的密纹唱片，密纹之上有无数神秘的辐条。

在完成了最初的土星和木星探测任务之后，两个探测器在土星分道扬镳。“旅行者1号”前往泰坦（土

星最大的卫星，大气构成与地球非常相似，被认为可以有原始形态的生命存在)，为此它不得不改变轨道，转向太阳系平面之外，放弃剩余的旅行计划；而“旅行者2号”则按原定计划，继续前往天王星与海王星。

在天王星上，“旅行者2号”发现了10个不为人知的新卫星。它还发现，天王星的表面磁场比土星的磁场更强，曲折的磁尾呈螺旋结构，延伸近1000万公里。

1989年8月24日，“旅行者2号”到访太阳系最后一颗行星——海王星。根据它发回的照片，海王星是一个狂风呼啸、飞云乱渡、生气勃勃的世界。大气中有无数湍急紊乱的气旋在翻转。海王星的南半球还有一个醒目的大黑斑，其形状、相对位置和大小比例都与木星的大红斑相似。

“旅行者2号”在海王星上发现了3个完整的环和6颗新卫星，以及一个被轨道辐射带包围着的磁场。它对海王星卫星“海卫一”的考察更令科学家们激动不已：“海卫一”比过去所想象的更亮、更小、更冷，是太阳系中最冷的一个天体，平均温度只有 -240°C ，上面有冰火山，曾喷发过甲烷等冰类物质。迄今为止，“旅行者2号”仍然是唯一到访过海王星的探测器。

斯通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太空探索有5个前沿：第一是物理的前沿，就像“旅行者号”那样，将飞行器发送到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第二是知识的前沿，理解外面是什么；第三是技术的前沿，开发太空探索所需的系统；第四是应用的前沿，利用太空的知识让地球变得更美好；第五是人类的前沿，太空环境下人类的有效运转。

对于80岁的他来说，每一个前沿都令人心驰神往。生命不止，探索不息。

2018年，在他的主持下，NASA将发射一个“太阳探测器+”（Solar Probe Plus），它的目标与旅行者刚好相反——“旅行者号”是走出太阳气泡，solar probe则是要进入太阳的大气层（日冕），到太阳风开始、太阳气泡产生的地方，探索太阳风的起源和进化。

地球与太阳相距200个太阳半径，“太阳探测器+”则将进入到10个太阳半径的范围之内，相当于5%的距离。这是人类第一次距离太阳这么近。

2020年，他主持的“30米口径望远镜”（TMT）将在夏威夷的莫纳克亚山上修建完成。建成之后，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学望远镜。透过这台望远镜长达30米的巨大镜片，科学家的目光将越过“旅



上图：“旅行者号计划”首席科学家爱德华·斯通教授

下图：“旅行者1号”1977年9月5日发射，35年后，于2012年8月进入星际空间

行者号”，投向更遥远的恒星系统，寻找宇宙中最古老的恒星与星系。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旅行者号计划”是你一生最大的成就吗？

爱德华·斯通：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认为“旅行者号”是科学生涯的高峰。因为它发现了那

么多东西，而且还在继续发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近40年来，“旅行者号”最大的发现是什么？

爱德华·斯通：如果必须总结的话，我认为它们最大的发现是，太阳系的天体是如此的多样化。每个天体都如此不同，如此独特，超出了我们之前的所有想象。

在“旅行者号”之前，太阳系内唯一已知的火山活动在地球上，谁能想到木星的一个卫星上面有10倍于地球的火山活动？在“旅行者号”之前，我们以为只有地球上才有海洋，但旅行者帮我们在木星的另一个卫星欧罗巴冰封的地壳下面发现了海洋。我们还在海王星最远的一个卫星（Triton）两极发现了间歇喷泉向外喷射高达5英里的物质，那里的温度是零下233摄氏度。

这些发现都告诉我们，仅仅根据地球来了解太阳系，视角太过狭隘，因为“旅行者号”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太阳系的天体多么的复杂和多样化。另外，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地球，地球是如何演化的，以及变化的潜力，因为所有这些天体都在不断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旅行者号”宇宙飞船上宇宙射线系统的首席科学家，当时你设计这个系统时，首要的科学目标是什么？在此之前，曾经有过飞船装载的宇宙射线实验吗？

爱德华·斯通：是的，70年代初已经有很多宇宙射线实验，只不过那时候的设备比现在小很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在地球轨道上，或者近地球的。在“旅行者号”之前，只有两个探测器是离开地球轨道飞往太阳系的，即“先驱者10号”和“先驱者11号”，它们都装载了宇宙射线测量系统。但是，它们都还是在太阳风制造的气泡之内观察宇宙射线，这个大气泡的影响遍及整个太阳系，包括海王星，屏蔽了大部分（超过75%）来自银河系的宇宙射线。1972年，当我们最初申请“旅行者项目”时，就是希望能够走到太阳系之外，探测太阳系之外的宇宙射线——只有走出这个太阳大气泡之外，才能观测到宇宙射线真正的状态。

不过，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气泡有多大，以及“旅行者号”能否坚持飞到太阳气泡之外。1977年两艘“旅行者号”发射的时候，太空时代开始才不过20年时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它可以持续40年。

但是，“旅行者号”一路出去，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我们可以研究太阳气泡的屏蔽作用到底如

何发生，是什么在阻止这些射线进来，而那些得以进来的宇宙射线又是怎么进来的？宇宙射线里其实都是普通的原子，氢、氦、氧、氮、硅、镁、离子，只不过这些原子几乎以光速运行，因此粒子能量非常强大，穿透力极强，会对人体构成极为有害的辐射。

现在，“旅行者1号”已经离开了太阳气泡，进入星际空间。我们可以观测到完整的宇宙射线光谱，从进入地球的高能量射线，到银河系最远能量最低的宇宙射线。100年来，我们第一次知道星际空间到底有多少宇宙射线（比bubble内部多4倍），我们可以测量它们的速度有多快，射线中携带的离子、氮、碳、氧的成分是多少，它们是在哪里被加速的？我们还可以问更具体的关于太阳气泡的问题，比如它的大小，为什么不是更大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旅行者1号”观测到的星际空间到底什么样子？

爱德华·斯通：星际空间充满了恒星爆炸的残余物质。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一开始只是产生了氢和氦，其他的重物质，碳、氮、硅、镁、离子……都是在恒星内部产生的。当恒星爆炸时，这些新产生的元素都返回到了星际空间，变成了星际之间的物质。所以，我们通过“旅行者1号”观察到的就是，普通的原子因为附近恒星的爆炸而被加速到接近光速。这些爆炸发生在大约500万~1500万年前。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是新近发生的事情。

一直以来，宇宙射线的起源都是一个谜。三四十年前，我们只是大致猜测这些射线可能来自超新星爆炸，但没有任何数据，但现在我们有很大的把握相信，它们就是500万~1500万年前太阳附近恒星爆炸的产物。我们可以测量这些射线存在了多久，以及是哪些恒星发生了爆炸。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有一些新的宇宙射线实验，比如费米空间望远镜、阿尔法磁谱仪2号（AMS-02），中国去年发射了暗物质探测器“悟空号”卫星，你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卫星和它们的研究结果？

爱德华·斯通：国际空间站AMS-02测量的是能量最高的宇宙射线，但这些都是到达地球的粒子——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宇宙射线得以进入地球轨道。AMS-02能非常精确地测量有多少高速粒子到达地球，但它们不能测量太阳系之外的宇宙射线。

费米空间望远镜所做的，是观测这些宇宙射线来自哪里，它们在哪里产生的，为什么速度这么快？但是，像所有的望远镜一样，费米空间望远镜也是往外

看，观察远方。而“旅行者号”是在观察它当下所在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研究宇宙射线这么重要呢？

爱德华·斯通：因为它们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你想让宇航员到火星去，如果人要离开地球的保护，你必须考虑辐射的问题，因为这是严重的健康隐患。辐射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外面的宇宙射线进来，大概有四分之一可以进来，但这是可以改变的；另一个则是太阳本身。太阳是宇宙射线进入地球的主要屏障。当太阳活动活跃的时候，会屏蔽更多的宇宙射线，但同时自身也会产生更多的高能粒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你必须学会判断太阳喷发有多严重，并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

有时候，太阳突然喷发，喷射大量的物质和能量，到达近地空间后，可能引起地球磁层、电离层、中高层大气等地球空间环境强烈扰动，比如破坏地球上的电力系统，比如1989年那次强烈的太阳风暴导致了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电网大面积瘫痪。所以，研究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为了学术兴趣，也有非常实际的目的。我们需要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宇宙射线是这个环境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太空探索的下一步？

如果以今天的技术，你要设计一个长距离、长时间的星际飞行计划，就像当年的“旅行者项目”一样，你会怎么设计？

爱德华·斯通：很显然，太阳系还有很多重要的前沿需要探索，比如那些涉及液态水的地方。在地球上，只要有液态水的地方，就有微生物。我们知道欧罗巴（木星的卫星之一）的冰壳之下有液态水；泰坦（土星的卫星之一）的大气里虽然没有液态水，但它的化学构成与地球进化出生命之前的状态非常相似；我们还知道，火星上曾经有过水。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液态水，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索是否有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伊隆·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怎么看？

爱德华·斯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远景。我想我们距离大规模火星移民还很遥远，但他们的方向是对的——必须减少发射的成本。因为送一个人去火星，比去轨道或者月球要复杂多了。你有很多东西要发射，登陆器、设备供给、长期的生活空间……你还得把人送回来。你最好有更便宜的发射方法，比今天便宜得多的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此生能看到人类登陆火

星吗？

爱德华·斯通：不。这不是科学能决定的。

三联生活周刊：人类去火星这件事情重要吗？

爱德华·斯通：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多紧迫，但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想要去火星。你可以用机器人做很多科学工作，但就跟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你不会想派一个机器人过去，你想要自己去。这种探索的冲动，可能内置于人性深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找到一种更实际的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人类会在月球上建立永久的基地吗？

爱德华·斯通：你当然可以在月球上建一个基地，就像我们在南极有科考站一样，问题是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是非科学的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霍金的“突破星击”（Breakthrough Starshot）计划？

爱德华·斯通：那是巨大的挑战，他们也知道这个挑战有多难。但重点在于，如果不试一试，你永远不知道。第一个绕地球的Navigator不是一下子就搞定的，你可以想象它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失败，直到它学会安全地绕地球运行。更大的飞船，装载更多的食物，更多的水，更多的船员……技术就是这样发展的。（编者按：今年4月，著名科学家霍金在纽约宣布了一项外星探索计划。他们将制造可达到光速1/5的“纳米飞行器”，在未来20年内抵达最接近地球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宜居带……他说，人类迟早要考虑在其他星球生活，飞到另一个星球去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都听说过“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上的黄金光盘（golden disk），其中收集的声音、音乐和图像，据说是为了向外星人介绍地球的文明。在它们将近40年的旅行中，有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外星人的证据？

爱德华·斯通：黄金光盘是卡尔·萨根的想法。虽然我们说它是给外星人的信息，但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自己的信息。它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宣布，人类的探索可以走到这一步，我们可以从地球送一个东西到那么遥远的地方。“旅行者号”能量耗尽之后，将永远停留在茫茫太空，绕着银河系的轨道运行——即使有一天，人类消失、地球湮灭不见，作为我们存在过的唯一凭证，它仍然会在那里，每隔2.25亿年绕银河系运行一整周。■

（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与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硅谷，流行吃饲料？

记者 曹玲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你的食谱上写的只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纤维素、不饱和脂肪、维生素、葡萄糖酸钾……到那时，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吗？



Soylent 创始人罗布·莱恩哈特

一个月只吃液体

罗布六七岁的时候，有次妈妈在做沙拉，他看看树上的叶子，觉得有些怪异。他想，为什么要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用一个漂亮的碟子吃长在树上的东西？

罗布·莱恩哈特 (Rob Rhinehart) 今年 26 岁，是硅谷食品初创公司 Soylent 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2012 年，他在旧金山创业，进军无线通信行业，不仅工作时间长，饮食习惯也差。到了年底，他和团队的创业项目陷入困境，最大的开支成了吃饭。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吃面包、玉米热狗和速冻墨西哥薄饼，饭余再补充点维生素 C，预防坏血病，可是成本依然太高。罗布试过只吃更便宜的麦当劳或者全甘蓝宴，但是身体感觉吃不消，于是决定找到更有效率地获得身体所需营养的方法。

他猜测，人体需要的并不是食物本身，而是食物包含的化学元素。例如人们吃水果、蔬菜是为了提取其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吃面包是为了得到碳水化合物。这让他产生了很多疑问，比如身体消耗的热量是否只来源于食物的原始材料？传统食物是否更有益于健康？我们真的需要传统食物里所有的东西吗？为此，他着手进行了一个实验，打算用各种营养素喂饱自己。

他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美国农业部的网站上发现，人体每天所需的营养成分仅 35 种。他买了几本营养学的书，通过各种渠道买来了需要的营养物质准备试验，粉末状物质让他的厨房看起来像是一个化学实验室。第一天早晨，他调配出一杯浓浓的、米黄色的液体，称为“Soylent”。最初，他并不知道这东西是会害死自己还是会赐予自己超能力。因为怕味道不好，他捏着鼻子不情愿地举起了杯子。

“事实是，味道相当好！我认为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早餐。”那一杯东西尝起来味道挺甜，口感上也不黏稠，一杯下肚他就感觉饱了，浑身还充满了力量。几小时后他又有些饿了，赶紧又喝了一杯，瞬间恢复了精神。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他试图加入缺少的元素，并找到每一种物质的最佳比例。

试验结束后，他写了篇文章——《我是如何停止吃饭的》。文章中，他说自己感觉像是六百万富翁，体格显著增强，皮肤光润，牙齿白净，头发稠密，连头皮屑都没了。甚至他自出生就患有的一种常见的皮肤病——毛发角化病，居然在第 9 天的时候也消失不见了。他有些夸张地写道：“过去我在健身房只能

跑不到 1 英里（约 1.6 公里），现在则是 7 英里（约 11.3 公里）。如今我有了大把的精力都不知道该怎么用才好。”

从时间上计算，过去他每天在食物上花费大约 2 小时。通常情况下早餐吃鸡蛋，午餐在外面吃，晚餐顶多吃个油炸玉米饼、意面或汉堡。在家吃每一顿饭都得刷碗，这还不包括去杂货店购物的时间。现在，他晚上花大约 5 分钟准备第二天的饭，每顿饭只需要几秒钟。“事实上，我可以完全摆脱厨房，不会再为冰箱有没有跳闸和没完没了的清洗或为了害虫而担惊受怕，相反我拥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而我需要的只是一个水源。”从经济上来算，以前每月他在食材上花费约 220 美元，另外还有午餐和偶尔下馆子的晚餐会花掉 250 美元。美国人平均每月在食物上的花费约 600 美元，其中约一半是食材。与很多国家相比，这一支出占收入百分比实际上是最底的，例如肯尼亚人的食物花费占到了收入的 45%。当时，Soylent 每月的成本只要 50 美元，如果规模生产，成本会更低。

几周后，他的文章登上了科技圈著名的“黑客新闻”（Hacker News）网站，点击量第一，评论呈现两极化趋势。其中一条留言就写着：“安息吧，罗布。”与此同时，也有人向他要配方。在奉行“开源”精神的黑客圈里，人们有权利知道自己所使用软件的源代码，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软件的改进。罗布也没有吝惜于分享他的发明，把配方发在网上了。

各地的黑客们开始了自己的配方实验，在网站上讨论某种成分的比例，罗布意识到应该用这个产品来创建公司了。他开始众筹，起初被 Kickstarter 拒之门外，认为 Soylent 是“非创意项目”。他转战百无禁忌的新型社交众筹网站 Tilt，在项目上线后仅 3 个小时就超过了最初融资目标 10 万美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Soylent 最终获得 75 万多美元的资金，6000 多人支持，显示了当代人对于“不吃食物存活”的强烈需求。目前，Soylent 的融资金额达到了 2450 万美元，它将致力于调整营养，改善口味，降低整体价格。

罗布非专业的背景难免给 Soylent 带来质疑，但是 Soylent 的所有成分通过了 FDA 的批准，由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类和各种微量元素组成。为了试验在 Soylent 中添加不同剂量营养剂的效果，罗布颇有些神农尝百草的勇气。缺少钠曾让他晕乎乎的，过量的镁让他全身疼痛，几乎无法动弹，而过多的硫黄则

会使体内产生过多的气体，曾经让一个爵士剧场清场。

现在这些问题在工业化量产的 Soylent 中都解决了。Soylent 的配方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你不愿意花钱购买，或者有特殊需求，也可以自己动手调制属于自己的配方。在 diy.soylent.me 网站上，来自世界各地的 Soylent 爱好者们在这里分享讨论他们各自的配方，增重、减肥、健美、生酮饮食、素食、犹太饮食，不一而足，有上千种选择，所有的原料都可以直接从市面上买到。

自 Soylent 问世以来，相继推出了 1.0 版本和 2.0 版本。其中 1.0 版本是一种粉末，泡水冲开就能饮用，可以补足一餐所需的营养，被人戏称为吃饲料；2.0 版本是液态，即打开就能直接喝的瓶装饮料，每一瓶包含 400 卡路里热量。据罗布介绍，液体和粉末产品的形态不同，因此在配方和味道上做了一点改变，2.0 版本降低了碳水化合物比例，同时提高了脂肪含量，大幅度降低了血糖指数。蛋白质来源从粉末版本的黑米改为大豆，脂肪则使用了合成海藻油。

近日，Soylent 更是不走寻常路，公开宣称接下来的主要成分将采取转基因工原料。毕竟，现阶段大多数民众视转基因食物如洪水猛兽，一些标注“非转基因”的厂商赚得盆钵满。据统计，一家非转基因产品认证公司“Non-GMO Project”就收到了 3.5 万个“非转”认证申请，每年标注“非转”的食品能比不标注的多赚 160 亿美元。这些来自硅谷的打破常规者，总是要走在最前头。

Soylent 初体验

Soylent 在硅谷各个公司中非常流行，因为可以直接从官网购买，对一些学校的学霸来说也非常实用。一名在美国西海岸就读的留学生小黄说，他刚刚又收到了一单 Soylent 2.0（48 瓶），129.2 美元。第一次他买了 24 瓶，64.4 美元，不到 3 美元一瓶。“有点像豆奶和燕麦的混合味道，奶昔质感，周围还有人说像豆奶和黑芝麻糊混合的味道，并没有特殊的风味，估计味道太特殊容易厌倦，给它打 7 分。”

Soylent 里有一本说明书，官方称之为“Release Notes”（版本说明），建议慢慢替代日常饮食，让身体逐渐适应。因为很多人在网上发布 Soylent 饮用测评，小黄也打算看看自己只喝 Soylent 能坚持几天。“400 毫升下肚饱腹感还是很强的，但是第一天饿得很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宇航员在太空吃的是牙膏食物，如今，宇航员每天一般吃 4 顿饭，一周之内的食谱不重复。

快，差不多 3 个小时就饿了，肚子咕咕叫，于是一天喝了 4 瓶；第二天稍微好了一点，因为熬夜写论文也喝了 4 瓶，嘴巴里开始没有味道，什么味道都没有；第三天开始怀念吃饭的仪式感，坐那里发呆的时候想到了鱼香肉丝，虽然这里的鱼香肉丝并没有多么好吃。看到有人说加点奶茶粉更好喝，我就加了进去，味道是好了不少，但是糖和脂肪含量都增加了，原本健康的 Soylent 瞬间破功。”

他也没有体验到传说中浓烈的臭屁，据说后来配方改良中，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第四天早上，他被室友煎培根和鸡蛋的香味唤醒，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窜到厨房“狠狠”盯着油汪汪的食物，想一口吃掉它们。“有很多人跟风试验只吃 Soylent 一周或者一个月，我忽然觉得根本没有必要，食物是为我们服务的，研发 Soylent 也是这样的初衷，如果我和它较劲，岂不是又南辕北辙，成了食物的奴隶？”

从那以后，只有在忙不过来的时候，他才会喝 Soylent。“没时间做早餐或者要赶实验、赶论文的时候，带上一两瓶去实验室非常棒，省了很多时间和麻烦，毕竟吃饭至少会打断半个小时，吃完饭有时会犯困，或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继续转回工作状态。而 Soylent 几分钟就喝完了，就像来杯咖啡差不多。它取代的不是我的正餐，而是没空吃饭时大嚼的汉堡、薯条、可乐和方便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美国的饮食文化远没有中国丰富，很多东西都算不上好吃，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这种‘太空感’的现代食品。”小黄强调，“他们可没有酸辣粉、担担面、串串香、九宫格火锅……”说着说着他停住了，打算先到一边咽口水。

2014 年，美国科技网站 The Verge 的记者克瑞斯·齐格勒 (Chris Ziegler) 也效仿许多争先进行试吃实验的人，抱着忐忑的心情试吃了一个月的 Soylent。很快他发现，和同事午餐时间闲聊，选择去哪家餐厅吃晚饭，周末去哪小酌都成了费时费脑子的事情，他深刻意识到“吃”和社交、娱乐早已交织



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习惯的小变，仿佛是日常生活轨迹的大变。Soylent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将我与大家隔离开来。”他在街上闲逛，感官通通被餐厅的香味和招牌、菜单吸引，成了一场漫长的折磨。“总而言之，选择 Soylent 可以说是抛弃了生活，选择了生存。”

最后，当他的老板手里拿着一个苹果说，“这些苹果很好吃”的时候，他几乎是奔过去将苹果一把夺过来。“毋庸置疑，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苹果：果肉丰富，汁鲜肉嫩，每咬一口，就‘嘎吱嘎吱’发出清脆的声音，比最甜还要甜。”可想而知，一个月没有吃到固体食物会对人的神经和味蕾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人对食物的需求不仅仅只有果腹和生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宇航员在太空吃的是牙膏食物，诸如牛肉浆、苹果浆、菜泥和肉菜混合泥等食物，被压到铝制牙膏壳内，吃时像挤牙膏似的挤到口中。宇航员对这些食品非常不满意，带上去的食品常常剩余，宇航员的健康水平也在下降，科学家不得不对航天食品进



上图：2013年6月24日，欧洲航天局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准备用餐，袋装太空食品漂浮在他身旁

下图：汉普顿克里克食品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希·蒂特里克在位于旧金山的工厂里为自己使用植物配料制作的人造鸡蛋做宣传

行改进。如今，宇航员每天一般吃4顿饭，一周之内的食谱不重复。国际太空站上已经能够吃到肉饼、炖牛肉、面包布丁等等，日本宇航员还带过寿司，韩国宇航员带过泡菜，中国宇航员带过月饼盒八宝饭等传统食品。相比前辈们，如今宇航员的幸福感增加了很多。

红遍硅谷

Soylent 的名字来自电影《绿色食品》(Soylent Green)，这是一部1973年发行的美国反乌托邦科幻电影，说的是2022年由于全球暖化和人口过剩导致资源枯竭，蔬菜水果变成极为昂贵的奢侈品，除了富人，大多数人都依靠“绿色食品”公司免费提供的由大豆(soy)和扁豆(lentil)制成的Soylent饼片度日。为了增加吃饭的乐趣，公司还很费心地提供一种口味多种颜色的选择：黑色饼干、黄色饼干、绿色饼干等等。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些饼干由人肉制成。

《纽约客》记者曾经问过罗布这个问题，“Soylent

就是人肉！”对此，罗布表示，每个人都建议他换个名字，投资商、媒体，还有他妈。他说他喜欢这个名字本身带点自我嘲讽的意味，以及它对吃货感官的调侃。“人们对美食的主流认识总是自然的、新鲜的、有机的和明媚的，不过Soylent却恰恰相反。”他觉得，毕竟还是有年轻人没听说过“Soylent就是人肉”这句话。“如果你谷歌一下‘Soylent’，我们是排在这个电影的前面的。”另外，他也不忘补充，星巴克这个名字来源于梅尔维尔的经典小说《白鲸》。

事实上，这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营养补充液。在世界各地的重症监护室，高达40%的患者营养不良，这会减弱呼吸和免疫系统功能。无法进食的患者通过胃肠管喂饲营养液维持生命，标准配方富含病人特需的营养素，鱼油对呼吸窘迫有好处，谷氨酰胺对严重烧伤有用，此外还有蠕动剂和免疫增强剂等等。此外，崇尚健身和美容的人也常常服用一些液体食物。而Soylent的目标群体是那些在格子间工作的人群，而非那些经常在健身房的人们或者老年人。

一些医生认为Soylent能够维持生存，但一些营

养学家却对这种方法表示了严重怀疑。很多情况下，缺乏某种微量元素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们事后才会清楚，他们举出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维生素C。几百年前的欧洲，长期在海上航行的水手经常遭受坏血病的折磨，患者常常牙龈出血，甚至皮肤瘀血和渗血，最后痛苦地死去，人们一直查不出病因。但是只要船只靠岸，这种疾病很快就不治而愈了。水手们为什么会得坏血病呢？一位随船医生通过细心观察发现，水手在航海中所吃的食物主要是船上所储存的干面包、熏肉或者风干肉，很难吃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位医生试着让水手天天吃一些新鲜的柑橘，坏血病很快就痊愈了。经过长期的研究，科学家后来从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中提取出维生素C（又叫抗坏血酸），并证实坏血病就是维生素C缺乏症。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可以降低前列腺发病率，蓝莓中的类黄酮化合物可以降低糖尿病风险等等。但是，目前却没有研究说明这些微量营养物质在人体内如何产生作用。研究过相关文献的罗布对这种争论非常怀疑，“历史上，有多少人吃过西兰花和番茄？”

尽管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每天吃一样的食物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但是，北美的饮食很难说多样化，大量的调查显示，不超过10顿饭的内容就涵盖了很多人全部的饮食范畴。而且在罗布看来，70%以上美国成年人超重，按照推荐量饮用，还有望降低体重。

体验了一阵子Soylent之后，很多人的认识和小黄差不多：Soylent比垃圾食品更健康。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用全部的“代餐”取代我们的膳食？当然不是。从某种角度而言，Soylent更像是一纸诉状打破我们大嚼垃圾食品的生活。

因为Soylent的成功，又出现了Schmoylent、Schmilk和PeopleChow这样的液体食物，风险投资家也将钱投到这些生产代餐食品的公司，包括社交新闻网站Reddit联合创始人亚历克西斯·欧海宁（Alexis Ohanian）在内的一些投资者则称自己是这种饮料的“粉丝”。欧海宁曾说，他梦想中的理想场景，可以在机场买到一些事先准备好放在冰箱里的Soylent。由于工作关系，这位企业家经常在纽约和旧金山之间飞来飞去，如果他觉得太累不想弄东西吃的话，会调上一些Soylent喝上一天。

对于异常繁忙的硅谷人士来说，吃饭真是浪费时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就表示，如果有

一种方法可以不吃饭而做更多的工作，那么他宁愿不吃，他希望有一种方法可以不必坐下来吃饭就能够吸取所有的营养。当被问到是否有试过Soylent或者Schmilk时，马斯克没有回应。在大热的美剧《硅谷》第三季片头中，Soylent和马斯克创立的特斯拉汽车公司一同出现在片头中。

目前，Soylent的用户群非常广泛，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由于他们具有“冒险精神”，通常愿意尝试这种粉末。Soylent在硅谷获得成功并不奇怪，快节奏的企业家式生活方式客观上要求一种高效率的身体管理方法，这也是“身体黑客”理念之所以盛行的原因。通过自我量化来管理个人健康，使自己既能应付大量紧张的工作，又能获得最理想的身体状态，保持健康和光鲜的个人形象。这个风潮已经刮了很多年，硅谷的技术圈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我量化者”，他们用各种装置设备监测记录“人体数据”，用以调整到最佳身体和精神状态。血压、心率、步伐、汗液、记忆力、睡眠、压力甚至性爱和约会习惯都可以被量化打分。在自我量化者看来，身体就是一台终极电脑，为什么不对其进行升级优化？Soylent只不过是自我量化之风刮到食品行业的一个表现。

除了液体食物之外，投资者们还看中了一些食品初创公司，其中使用植物配料制作人造鸡蛋的公司Hampton Creek获得了9000万美元融资。生产人造肉的公司Impossible Foods和Beyond Meat也受到了资本的青睐。Impossible Foods主要研究由植物血红蛋白中含有的分子制造食用肉及乳制品的技术，生产的素牛肉其成分主要是马铃薯蛋白、黄原胶、小麦蛋白、椰子油等其他天然香料，所有成分都是纯天然的，而且携带的热量比真牛肉要少，蛋白要更多。迄今为止，该公司已获得了总计1.83亿美元的投资。Modern Meadow试图通过3D打印技术生产符合美国农业部标准的肉类，供人类食用，目前已获得了共计1120万美元的融资。这些企业的背后，是Twitter公司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PayPal公司创始人彼得·蒂尔以及李嘉诚这样的大牌投资人。事实上，如果从创业三年内的获得融资的情况来看，这些食物初创公司们的增长速度比当初的Uber更快。

硅谷让世界变得愈发科幻。或许未来的某一天，你的食谱上写的只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纤维素、不饱和脂肪、维生素、葡萄糖酸钾……到那时，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吗？

精子危机

文 / 袁越

如今生不出孩子的夫妻越来越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丈夫的精子质量欠佳。很多研究显示，人类男性的精子质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和工业化的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有人猜测罪魁祸首就是环境中的有害化学物质。

不过，也有不少人质疑这个结论，因为精子质量的判定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很难标准化，得出来的结论不怎么可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兽医学院的准教授理查德·里亚(Richard Lea)博士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研究狗的精子。一来这家研究机构和英国一家专门培育导盲犬的种狗饲养中心有合作，可以很方便地取到样本，二来狗被誉为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很多狗都是和人一起生活的，正好可以作为人类的“验毒器”。

里亚博士及其研究团队于1988年开始了这项研究。在这之后的26年时间里，研究人员每年采样42~97只狗，加起来一共有232只种狗接受了检查，包括拉布拉多、金毛猎犬和德国牧羊犬等五个最常见的种类。研究人员一共采集了1925个精液样本，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精子的活动情况，统计健康精子所占的比例。为了保证统计的准确性，里亚博士在这26年里只用过3个实验员，从精液采样到样本制作再到显微镜观察统计等等全都使用同一套程序，这就避免了人类精子质量研究中实验程序不规范所带来的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1988~1998年种狗的精子质量一直在下降，健康精子所占的比例平均每年下降2.4%。之后那几年由于一些种狗年纪大了，数据不太可靠，没有计算在内。饶是如此，新换的一批种狗在2002~2014年的精子质量仍然在下降，只不过下降的速度有所减缓，平均每年下降1.2%。

里亚博士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6年8月9日出版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杂志上。作者还分析了种狗精液和睾丸的化学成分，从中发现了好几种自然界常见的有害化学物质，包括日用化工产品中最常见的多氯联苯(PCBs)，以及常

用的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s)等。这些化学品很早就被怀疑与人类精子质量下降有关，但一直缺乏直接的证据，毕竟科学家们是没法拿人来做实验的，只能靠推测。

但是，科学家可以通过动物实验间接地找到导致人类精子质量下降的原因。一个来自瑞士的研究小组研究了环境污染对于蜜蜂精子质量的影响，发现一种常用杀虫剂新烟碱类(Neonicotinoids)能够显著降低雄蜂的精子数量。这项研究是在可控的实验室条件下完成的，研究人员让一组蜜蜂暴露在新烟碱环境中，其浓度和自然环境中常见的杀虫剂浓度相似，另一组作为对照的蜜蜂在干净的环境中生活同样一段时间，然后比较两组蜜蜂的精液质量，得出了上述结论。

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按照这个下降速度，是否有一天狗的精子数会降到某个阈值，导致狗这个物种彻底灭绝了呢？里亚博士认为问题应该不会这么严重，但他认为精子质量降低会导致新生小狗出现健康问题，这才是值得关注的重点。研究人员发现，用那些质量下降的精液繁殖出来的小狗当中患隐睾症的比例逐年增加，小狗成年后患睾丸癌的比例也一直在增加，这说明环境中的化学污染物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睾丸组织的正常生理活动，导致精子发生了基因变异。

对于人类来说，男性精子质量的下降在可预见的未来大概也不会导致人类这个物种的灭绝，但对于每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家庭来说，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更不用说新生儿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了。

至于说蜜蜂，这才是真正应该引起人类重视的问题。蜜蜂是一种分工非常明确的昆虫，如果因为精子质量差导致某个亚群体数量下降，整个蜜蜂种群的数量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蜜蜂种群的灭绝。如果没有蜜蜂，农业将会遭到重创。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人类即使还能生出孩子，也没有粮食去养活他们了。■

你的肤色，人心激励

文 / 张斌



8月11日，在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美国选手西蒙尼·曼纽尔与加拿大选手同获金牌

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日后多年回看，依旧熠熠生辉。美国选手西蒙尼·曼纽尔和加拿大的彭妮·奥勒卡萨卡惊奇地共同游出52秒70，让观众一时难辨金银。

金牌并列是天意偶成，而西蒙尼一举成为美国奥运历史上首位获得游泳个人金牌的美籍非裔女选手才是众人铭记的传奇。过往，黑人泳者池中捞金极为罕见，科学家苦心研究阻碍黑人泳者大面积成功的各类因素，但鲜有说服人的硬道理。

因此，西蒙尼的肤色在泳池中格外亮眼。在NCAA比赛中，西蒙尼曾经两次夺得冠军，但唯有创造了历史，才让更多人有兴趣品读这位黑人姑娘写就的人生故事。梦想成真的时刻，西蒙尼一展女孩子的天真烂漫，但面对镜头时则一副天降大任的庄重：“我的终极目标是日后不在我的名字前冠以黑人游泳运动员。”

这是何等执着的目标，其实我们并不能完全读懂其背后的时代积淀和种族意识，西蒙尼的支持者狂喜之余也表达了很高的境界，这块金牌理应可以促进运动参与的民族多元性，让更多的少数族裔愿意成为泳者。激励众人，一向就是奥运金牌得主的先使命，西蒙尼感谢前辈一路的感召，让她终于成为那个改变历史的幸运儿，接过使命的接力棒，让游泳有机会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美国民间组织机构多如满天星辰，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名叫“水中运动多样性”，自我赋予了特殊使命——降低有色人种每年的溺亡数量，提升少数族裔对游泳的兴趣。雾里看花，我们对于美国的种族问题一知半解，枪击流血至今不断，种族割裂怵目惊心，单说游泳池中黑与白的对立当年居然用法规来强行规定，致使几代美籍非裔人士对游泳心有余悸。

美国游泳协会自然也乐见西蒙尼夺得奥运金牌，希望美籍非裔社区中的孩子们受到感召，而拥有更为强烈的游泳冲动。“在泳池旁，孩子们看到黑人安全员，他们就会有梦想，长大做一名安全员；如果见到一位黑人教练，那未来的人生选择就可以是一位教练。如今，西蒙尼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们看到，让奥运冠军可以成为众人的理想。”质朴的心愿就是如此简单，不添加任何杂质，根植社会土壤的游泳协会的第一使命便是，让很多人爱上游泳，金牌水到渠成。

说到激励，菲尔普斯无疑是最好的旗手，神降凡间。美国游泳协会透露，2000年，15岁的菲尔普斯首次参加奥运会时，在协会注册的泳者中男性比例不过37%，16年过去，男性增至40万会员，比例也提升到44%，菲尔普斯的推广激励作用应该记在其中。而西蒙尼肤色在奥运领奖台上的闪亮，让美国游泳协会坚信，加以10年之功，美籍非洲裔的注册泳者人数必然会有明显增长。2004~2015年，美籍非洲裔泳者总数增长55%，但在全美泳者中占比依然不过1%，典型的泳池中的少数族裔。

美籍非裔在很多项目中都是运动主宰，但泳池中微妙的种族地位会让黑人泳者心中惴惴。西蒙尼承认，进入斯坦福大学后，成绩突飞猛进，她明显感觉将美籍非洲裔社区扛在肩上。种族问题在美国何其敏感，大多数都能做到政治正确，但空气中弥漫的气氛并不能让人时时感到身心愉快。在斯坦福大学，西蒙尼结识了学长丽娜·内尔，同样的肤色让两人自然亲近，丽娜是华裔和非洲裔混血，伦敦奥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铜牌获得者。西蒙尼入学之后，丽娜压力顿减，人们都去关注新异类了，她终于可以轻松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此种心境我们何曾有机会体悟呢？

金牌，激励人心，关切苍生，价值才能恒久。道理虽如此，也苛求不得。■

美国轰炸机齐聚关岛要干啥？

文 / 宋晓军

8月10日，美太平洋战区网站展示了美空军B-2s、B-1s和B-52s三型战略轰炸机齐聚关岛的照片，同时配发了空军部长詹姆斯（Deborah Lee James）和战区空军司令肖纳西（Terrence O' Shaughnessy）的讲话。前者强调了三型轰炸机齐聚关岛是史上首次，而后者则强调了轰炸机的威胁能力将确保地区安全和稳定及对盟友和伙伴的支持。鉴于3天前美智库公布了中国在南沙三个岛礁的机库卫星照片，于是国内媒体有记者就问我：美三型轰炸机齐聚关岛是不是对南海威慑呢？对此我的回答是：看来美国空军也要吃“南海”了。

要解释这个回答，先说一下轰炸机对南海方向的作战能力。2015年9月，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一份长达600页、题为《美、中军力对比：兵力、地理、力量平衡的变化（1996～2017）》的报告。在报告的第六章“美军对中国空军基地打击能力”中，分别设置了“台海冲突”和“南海冲突”两个评估项。而每个项下都依据两国军力变化设置了“中方攻击美空军基地能力”“中美制空争夺”“美军突防能力”和“美军对中国空军基地打击能力”四个评比栏。在“南海冲突”的“美军对中国空军基地打击能力”一栏的2017年中，报告给出的结果是：美军占有明显优势。得出这个结果的依据是：尽管2017年中方的“红旗-9”防空导弹的部署将大幅降低非隐身轰炸机的效率，但美

军仍能使用隐身轰炸机和不断增强的巡航导弹关闭中方基地。具体是在一周的作战中，非隐身轰炸机能完成11%的关闭任务，隐身轰炸机能完成27%，而巡航导弹能完成62%。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报告第六章后面的“能力评估汇总评定”一节中，针对“南海冲突”的评估结果专门有这样一段描述：南海方向由于目标相对较少，先进防空导弹的部署密度较低，美军对地攻击的前景更好……但中国一直在提升该方向的防空水平，未来可能会有所变化。而恰恰是在这份报告出台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中国在“九三大阅兵”中亮相了多款新型导弹、中国在南沙岛礁加强相关设施建设和中国空军开始在南沙海域常态化巡航。毫无疑问，如果兰德公司将这些“新情况”纳入评估模型，恐怕就不是“明显优势”这个结果了。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兰德公司会在“相对优势”“大致持平”“相对劣势”和“明显劣势”其他四个评估结果里选中哪个，但是可以通过美空军部长詹姆斯在8月9日对记者的一段谈话里听到一些弦外之音。她谈话的大意是，如果国会和政府无法满足空军2017财年的预算请求，将耽误约60项武器升级计划，其中就有B-2s和B-52s的升级计划。

话说到这儿，如果我们把兰德公司的报告、中国近期在南海方向的军力强化、美三型战略轰炸机齐聚关岛以及美空军部长詹姆斯的谈话放在一起来分析，就可以得出美国空军是在利用近期较热的南海形势向国会和政府施压索要更多的经费。其实除了B-2s和B-52s的升级经费不确定外，美空军部长詹姆斯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强调了空军下一代轰炸机B-21、F-35A以及KC-46加油机等装备的研发及采购费用也都有经费吃紧的问题。而在兰德公司的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隐形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在“台海冲突”和“南海冲突”超过一周后，同样存在着数量不足的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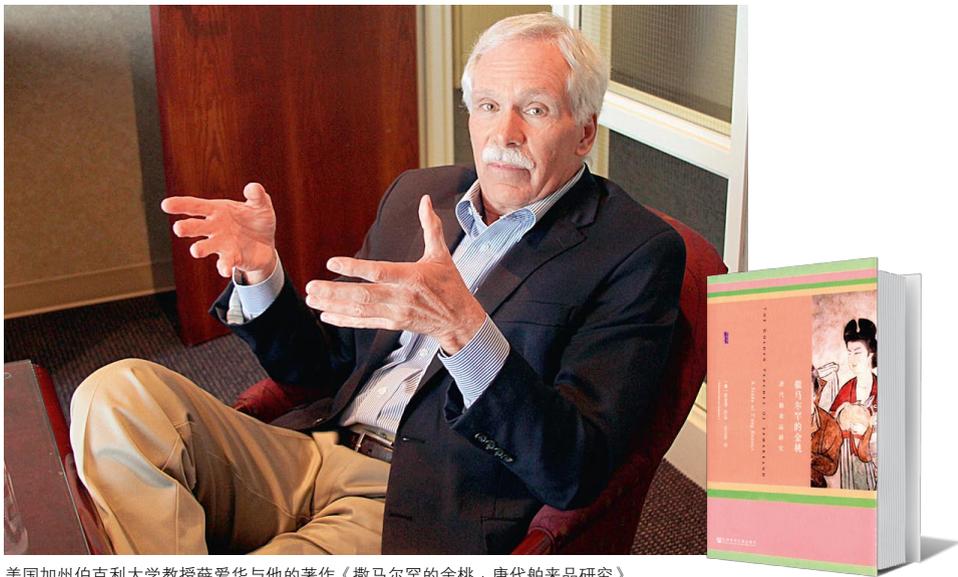
最后我想说的是，美国空军在2017财年申请的全部预算是1669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中国2016年约1450亿美元全部的国防开支，但随着中国将军力向海、空方向的倾斜，南海的“军事话题”也许还会升温。■



2月20日，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训练编队组织红蓝实兵实弹对抗演练。图为海军“武汉舰”在进行反潜火箭发射

桃子的滋味

文 / 马凌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薛爱华与他的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1963年，年届五十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爱德华·谢弗（Edward Hetzel Schafer, 1913～1991）出版了大部头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作为汉学家，谢弗的中文名字当令中国人满意：薛爱华。不过作为海外汉学家，薛爱华又足以令他的海外同行们半是敬畏半是嫉妒。此书考察了唐代的诸多舶来品，涉及人物、动物、植物、矿物、人工制造物，共计18大类170余种，参考文献包括中文典籍161部、丛书类书26部以及各种语言的相关论著数百种，言及体量之巨和挖掘之深，不遑他让，也使得作者借此跻身于伯希和、马伯乐、劳费尔、李约瑟、卜弼德等杰出汉学家之列，并成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

薛爱华出生于西雅图，受到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家境艰难，父母无力送他上大学。于是，好学不辍的他花了7年的时间一边打工一边积攒学费，他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的自学成就斐然，包括极难掌握的古埃及语言。1938年，他终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又去夏威夷大学学习汉语，于1940年获得硕士学位。不过，“珍珠港事件”打断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他以语言学家身份为海军服务，

并借此机会掌握了日语。战后他重回伯克利，1947年获得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并马上被母校的东方语言系聘用。虽然1949年因拒绝反共忠诚宣誓而与校方发生不快，薛爱华还是在伯克利工作了35年，著作等身，荣任美国东方学会主席，长期编辑《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并以伯克利最高荣誉退休。

薛爱华的人类学师从克虏伯和罗伯特·罗维，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平等的精神。薛爱华的汉学则师承于卜弼德，这位曾在海参崴和哈尔滨生活过的俄裔汉学家对于精读原典有极高的要求，训诂学学养深厚，在中文故纸堆里优游自如。薛爱华继承了导师在语言文献学方面的追求，强调语言学技能和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他也在语言方面颇具天赋，不仅精通汉语和日语，还通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拉丁文、阿拉伯文、越南文，更不用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不过，薛爱华在《金桃》一书的序言里首先感谢“无人能出其右的伯索德·劳费尔”，提示读者留意劳费尔用比较语言学研究物质文化交流的方法带给自己的启示。劳费尔通晓汉语、日语、藏语，曾多次在中国考察游历，精通中国的玉器、瓷器、象牙等物质文化，其《中国伊朗编》是极富影响的杰作。综合以上，薛

爱华的汉学研究得以建筑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共同打造的坚实基础之上，集文化史、社会史之精华，终成就于物质文化交流史。

薛爱华对于中国中古史的研究积累颇深，在《金桃》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唐代传奇中的波斯商人》（1951）、《古代中国礼仪中的朝向问题》（1951）、《合浦的采珠场》（1952）、《南唐史》（1954）、《闽帝国》（1954）、《中国制造学以及传说中的雄黄与雌黄》（1955）、《中国古代的铅色与化妆》（1956）、《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战象》（1957）、《唐代的土贡》（1958）、《中世纪中国的鸚鵡》（1959）、《唐代的猎鹰》（1959）等等论文和著作，涉猎既广、起落有据，因此《金桃》也是他个人治学的总结与延伸。

《金桃》一共有19章，第一章总论大唐盛世，特别是盛世中的外来人物、外来物品和外来文化，从第二章开始分论这些“舶来品”，包括人、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工业用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每一章又细分若干节，如《人》的一章包括“战俘”“奴隶”“侏儒”“人质”“贡人”“乐人和舞伎”，《家畜》一章则包括了“马”“骆驼”“牛”“绵羊和山羊”“驴”“骡与野驴”“犬”等。薛爱华一一考证舶来品的文史记载、可能来源、传播轨迹与社会影响，条分缕析而又洋洋大观，无愧于一部小型的唐代外来文化百科全书。本书付梓后，成为海外学者认识中华文明，特别是唐代历史文化的必读书。

中亚名城撒马尔罕有2500年的历史，它连接着中国、印度与波斯，是丝绸之路的枢纽。早在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攻占该城时就曾赞叹：“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撒马尔罕要比我想象中更为壮观。”中国最早记载撒马尔罕城的是公元554年的《魏书》，时称“悉万斤”，《隋书·西域记》称为“康国”，唐代时沿用“康国”之称。《旧唐书》《唐会要》，以及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和元代史书《辽史》均提及“康国进金桃”一事——“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在中外交流史上，这仅是个小事件，可是“金桃”意象却勾起了薛爱华的联想：“西方传说中的金苹果；见于中国古代传说中记载的、生

长在遥远的西方、能够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桃；而且这个名字还使人不禁想起詹姆斯·艾尔罗依·弗莱克《通往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以及弗雷德里克·戴流士在弗莱克的诗剧《哈森》(Hassan)中为收入其中的《通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谱写的音乐。”换言之，本书之所以用“撒马尔罕的金桃”命名，以其作为唐代中国外来事物的代表，除了真实的历史记载，也不无作者私淑的文艺作品成分。

薛爱华强调：“金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这种水果的滋味又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种种奇妙的传说，使这种水果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从而也就成了唐朝人民所渴求的所有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与坚硬的、依据考古发掘的研究不同，《金桃》给了想象和传说一席之地。“我们将要讨论的并不是真正进口货的魅力，而是在陆地和大海上无处不在的那些商货的魅力；不是真正的黄金制作的礼物，而是以这些贡物为原型而虚构的、传说中的贡品——向往的珠宝和想象的金银制品。”这种兼容并蓄，使全书不仅包含了物质生活史，也有了观念心态史的况味。入手虽然在物，落脚却是在人，是人、是一代代的人，用真实与想象，用史笔与文笔，共同建构了“盛唐中国”那最美好的时光。对于熟读《杜阳杂编》《酉阳杂俎》《开元天宝遗事》等古籍的中国学者而言，薛爱华对于这类“野史”材料的娴熟运用，特别是在正统的历史书写之外、融入生动细节与丰沛才情的写法，才是最费思量之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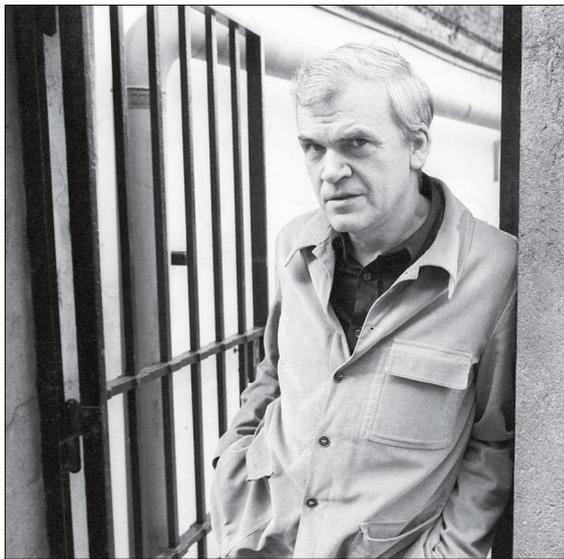
客观而言，以一人之力修“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难免有所疏漏，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的考古发掘和史学进展，也使《金桃》的部分论点需要修正。不过，虽然学术界偶有对于《金桃》的史料错误和不足之处的商榷，却一直未见大规模修正增补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憾事。《金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吴玉贵耗时5年、倾其心力译出，初版于1995年，书名意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二版于2005年，2016年是此书中译本的第三版。虽然在学界已经是“声名遐迩”，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金桃》的滋味恐怕还不熟悉。时值我国发展“一带一路”，《金桃》对盛世之文化融合的记述，或使今人有更深的领悟。■

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3）

文 / 朱伟



韩少功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

写完《女女女》，韩少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翻译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合作者韩刚是他姐姐。我记得，1986年文学圈就开始传米兰·昆德拉之重要了。第一次听到昆德拉，是在李陀家里，由孟湄开始聊起的。那时谈昆德拉，还带着神秘感：他的隐喻与嘲讽，他描写的性。后来听说韩少功正在译他的一本代表作，书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给少功的，包柏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春月》，当时与很多人有来往。

昆德拉是用捷克文写作，韩少功与他姐姐翻译的是包柏漪给的英文本，南京大学的许钧10多年后是从法文版翻译的。韩少功的译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许钧的译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从文学的语感而言，我还是喜欢前者。网上有太多两个译本对比，贬韩版。从句法认真斟酌的角度，我也同意许版也许要好于韩版（前提当然是没阅读过原文）。问题是，少功是译于大家都饥渴要一窥昆德拉真貌的前提下，1985年开译，1986年就迅速出版了。1986年，昆德拉是极敏感的，据少功说，此书译完有三家

出版社退稿不敢出版，最后是作家出版社竭力推出，出版时删掉了1000多字，还是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当时《世界文学》与《外国文艺》都没敢推荐昆德拉。作家出版社在80年代还做了一件好事，也是用“内部发行”方式推出了三岛由纪夫，我记得推出他的第一本书是《爱的饥渴》。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于1987年我们的影响，是那种对存在的思考方式——有关轻重、灵与肉，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便是重，挣脱便是轻，但人又必须证明自己。所以昆德拉说：“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这对立非指简单的两端。灵与肉的关系也这样，肉体是牢笼，这牢笼牵制着灵，灵魂就不堪其重。这小说虽以苏军占领捷克为背景，核心篇幅却是对性爱关系的思考，这是自我与他者最本质的关系。我读它，刚开始吸引我的是男主人公托马斯制定的“性友谊”原则——要性爱，其性欲是辨别、体察、鉴别每一个女人独特性之兴趣，辨识发掘是其本真，对女人独特性辨识的痴迷决定了他的不满足，而辨识一旦完成，就希望回归

独处。也就是说，上床的目的是为了下床，因为留在床上就意味着“非此不可”，而他的目的是不断辨识。昆德拉在小说中说，“非此不可”是贝多芬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的动机，其实它是贝多芬这首四重奏最后一个乐章的主题，意味着生命即将终止。生命将终止才“非此不可”，之前都是“别样亦可”。

有意思的是，昆德拉将构成这小说的四个人物称为弦乐四重奏结构：托马斯是第一小提琴，他的两个女人，特丽莎是第二小提琴，萨宾娜是中提琴（按照韩少功的译名），萨宾娜后来离开托马斯，到另一个男人弗兰茨身上寻找自己，弗兰茨提供了比托马斯浑厚的音色，是大提琴。昆德拉的深刻在于，小说的政治背景是苏军占领捷克，捷克在被强暴中的态度，是征服与被征服关系。它对应男人女人，特丽莎与萨宾娜都需要通过男人来辨识自己的身体，从这身体里感知到自我。也就是说，自我是依靠他者才能获得独立。小说中描写，特丽莎必须依靠男人托马斯来证明自己身体之独一无二，因此，当托马斯再与其他女人做爱，就等于抹杀了这身体之独特，她就与其他裸体等同，淹没在肉体集中营里，成为在泳池边列队的裸体，没有自身符号了。小说中因此有特丽莎与萨宾娜交换拍对方裸体的情节，她们都要通过相机，在注射对方时体现自己之存在。情人萨宾娜后来离开托马斯，到另一个男人弗兰茨身上去寻找自己。有意思的是，她找到的是被托马斯发现的自己，这发现甚至可追溯到她的父亲，她的背叛是如此无力。弗兰茨是大提琴，她是中提琴，在弦乐四重奏关系中，昆德拉让她通过弗兰茨体会到，没有暴力，性爱是不可想象的，而爱是放弃力量，所以，她还是不能通过弗兰茨证明自己。而成为妻子的特丽莎与丈夫托马斯的关系则是：“我被活埋了，你每个星期来看我一次，敲一敲墓穴，我就出来，我满眼是土，你就擦去我眼中的土。”结果，她在一次放浪中完成了“灵魂对身体的观看”。昆德拉描写这种身体的绽放是，“她的身体第一次在迷醉中不再平庸”，“因为没有爱情，她的灵魂终于又有了视力”。

昆德拉的两性思考，是将男权对应苏军强加的极权，这么对应，女性辨识、辩证自己的态度便成了“媚俗”，因为媚俗是极权的基础。这大约是女性读者都无法容忍的。但昆德拉其实是在强调悖论，他是以一种悲悯戏谑的态度来写这样一种生存的悖论，就如他描写苏军压迫下的杜布切克与捷克，自身已脱离之外。由此，所谓的轻与重、灵与肉，因是因非。

这部小说翻译，对韩少功创作的启发，应该首先

是哲理与故事的关系。他自己的创作就一直在处理这种关系，因为昆德拉，他意识到对理性的寻觅本就是困境，比如轻和重，彼此累赘，构成人生剧喜怒哀乐，所以，作家要表达的是思考这二者关系中的茫然与困境，这才是文学的丰富性。因此他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有很多出口与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也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出去，你经历与感受了这个公园，就够了。”

另一角度，故事也可在思考中，可用随笔的方式，随意切割表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每一节都短小，切割了冗长的表述。韩少功由此意识到了表达形式必须革命：“小说有点像日常性的中景摄影，机位已经固定，看人总是不远也不近。散文呢，没有固定机位，镜头可以忽远忽近，叙事单元可以忽大忽小。”他意识到了，其实完全可以用随笔、散文的方式来写小说。

1987年他其实已有强烈要突破自己的欲望，但一个时机搁置了这种革命实践。这一年海南建省，春天里《钟山》杂志社组织一批作家上岛办笔会，那时范小天在《钟山》，大有要开出一片新天地的架势。谭甫成参加了笔会，回来与我说起种种八卦，他们如何在沙滩上享受月光等等。海南那时像世外桃源。少功参加了这次笔会，没想到这竟成为他真的率一帮好友移居海南的一个契机。“去营建一个精神之岛”，这想法不仅使他自己激动，也确实感染了一批人。首先响应的是他的老同学张新奇与蒋子丹夫妇，然后他又鼓动了叶蔚林，张新奇又鼓动了株洲的叶之秦、南京的徐乃建。按照蒋子丹的记载，韩少功是在这年大年三十举家搬迁的，他注销了长沙的户口，口袋里带着太太的工作关系、女儿的转学证明及全部存款，毅然决然，就像要去开拓一个新大陆。姐姐韩刚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张新奇。他们大年初三到的海口。☑（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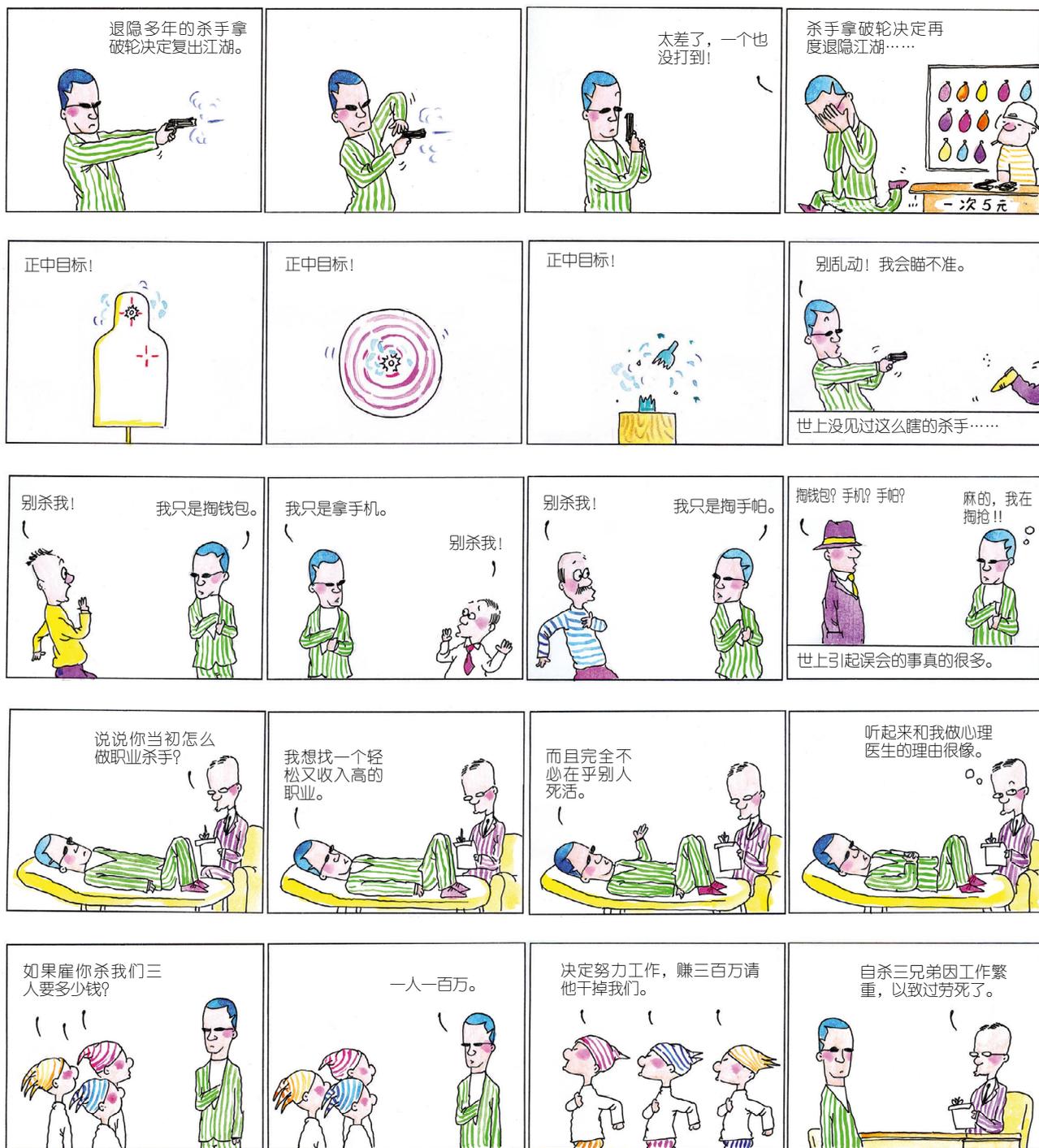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1987年内部发行的韩少功与韩刚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印数2.4万册，定价2.2元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午夜微信消息

文 / 王小骀（金华） 图 / 陈曦



晚饭喝了几口酒。酒是深山里的米酒，来自一个翠竹环伺、梯田蜿蜒的老村庄。村里几乎只有老人和孩子，静谧得似乎没有人居住。好不容易找到一对还算年轻的夫妇，看起来应该七十不到的样子，为我们杀了一只家里下蛋的鸡，舀了几碗粉红的米酒。我称赞酒好喝，老头子悲伤地摇摇头，说上个月开始戒酒啦，医生不许喝了。于是，我们把他家整坛酒都搬进了我们车子的后备厢。

一斤米出一斤酒的米酒是不容易碰上的，就像能一句接一句聊下去而不感到乏味的朋友那样难得。缘分，并不只在人与人之间，人与酒之间，也是有的。

拿起手机，朋友的微信消息，不过问晚饭吃了没，最近怎么走这么多步（微信计步里能看到），我平淡地回复了几句。然后突然看到一行字：“我很快要去另一座城市了。”想起认识不久，晚上11点多收到他的微信，耍赖那样的语气：“反正我永远喜欢你、爱你。”那时，我们不过一起吃了一顿饭。漫长的人生，一顿饭是多么不值一提的事，而一个“爱”字的分量又有多重。

当时心下想，他是喝了多少酒，才激起这无处宣泄、汹涌而至的情感。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堵在高速公路上，而且丝毫没有要通的迹象。我知道他说的那个隧道口，我也曾无数次经过，它的旁边是层层霭霭的碧绿山峦。隧道口往左数到第二座山头，它迎风的那一面有棵野枫树，一入初秋，就会像燃烧的焰火那样红。我尝试想象，无数辆亮着灯的汽车，载着奔赴不同目的地的人们，被迫停留在黑夜的路途上。他们互不相识，在午夜空寂的山林里，各自思忖、检视着自己的内心。

很快几年过去了。当我慢慢开始相信他的那句话，他告诉我，要走了。这条微信消息，是几年前那条午夜消息的答案。一切情感，都会被时间、距离稀释。有时毫无因果地消逝，有时势不可挡地被际遇带走。

微信红点又亮起，好友在四个人的微信群里回答另一姑娘的问题：妈妈明天动大手术，尽管病已经到了晚期，可家人还是想赌一下。说着，她的声音在微信语音里哽咽，语音中断了。脑子里浮现出好友母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干瘦弱小，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混沌。

3年前，好友的父亲病逝，随之母亲入院。窗外完全暗下来，对面楼的一个妈妈又开始骂学习欠佳的女儿。突然悲从中来，心酸不能自抑。眼眶开始湿润，我努力控制，但情绪常常像江河的水流那样，越堵越泛滥。我干脆抱起一只熊在沙发上轻声地认真哭起来。丈夫下楼来，看情形不对，坐到旁边给我一张张递纸巾。我抽抽搭搭地和他说谁要走了，谨慎地叙说为什么要哭。说着，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倏忽难过起来，不为谁的离开，也不为谁的辛苦，只是潜意识又触碰到、平日沉在喧嚣生活之河河底的真相：人在际遇面前是多么无力。生命很短、生活不易，一切都似乎不能真切拥有。难道不让自己难以割舍地爱上任何人、任何事才是唯一的正确解答？

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种叫“醉生梦死”的酒，据说半碗下去，可以忘掉从前任何事、任何人。这样的好东西，老天爷在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不给配备一坛子？那样，人人都敢毫无后顾之忧、沉溺地去爱。反正一口酒下去，一切都成过眼云烟。

总之，人生多艰。最后我对室友总结。

室友笑了，摸一下我的头：“艰个鬼，去中村排档30串羊肉串下去，肯定喜笑颜开。”“真的去？那我去穿衣服。”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往卧室走去，全然不顾某人在身后越来越响的笑声和嘲讽的眼神。“人生多艰，必须吃饱！”我回头大声对他喊。■